

序

20 世紀 50 年代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和土地改革^①的成果的進展，引起了許多關於日本資本主義問題的論戰。這不僅是學術界內部的論戰，而且含有政治意義，同日本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的命運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而在这个論戰中，更加細致地分析日本資本主義，並進行個別問題的研究，使其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就成為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了。

這本書就是我根據上述意義，在以往的研究的基礎上撰述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經濟史。我把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所寫的舊稿一一加以檢查，一面回顧同我休戚相共的日本工人階級的成長過程，一面站在今天的立場上，追述了歷史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是寫這本書的當然過程。批判地敘述日本工人階級歷史的權威性著作迄今尚未出現，可是寫出這樣的著作來是有絕對必要的。我深信將來經由無產階級寫成時，我這本書多少總能有所貢獻。

我於去年八月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東洋學者會議時，曾與亞洲民族研究所各位學者促膝縱談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的問題，還發現了許多意見不同之點。這本書是對這些問題的一個解答，當然在我發現自己的錯誤時，也是很願意改正的。但自 1927 年和 1932 年提綱^②發表以來，日本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拚着生命來處理這

① 指日本戰後實施的土地改革，見本書第十章。——譯者

② 共產國際分別在這兩年發表的關於日本革命的提綱。——譯者

个問題的。对于他們的处理方法的批判性的檢討，又与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历史的批判有关，只有站在重新檢討的立場，才能使問題得到更正确的解答。并且这一重新檢討的着眼点，应当不是过去的隔閡，而是当前的日本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及和平力量的斗争。

在写这本书时，我想起了許多前輩和朋友的教导之恩和深厚友誼，因而再一次感到对他們的感謝之忱。特別令人难忘的，是我在党于1931年圍繞着政治提綱^①同解党派^②发生論战和在1932年提綱发表后进行闡述工作以后，才对日本资本主义历史多少寄与关心和开始研究。当时指引教导我的是野呂荣太郎^③和平野义太郎^④两先生。以后不断鼓励我的是平野先生和山田盛太郎先生^⑤。野呂先生早年就壮烈牺牲，平野、山田两先生現在还在各个战綫上活动。借了这个机会，我要再一次祝两位先生健康，同时以弟子之礼，对他們的长年教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原来打算在这本书里叙述从德川时代末叶到现在为止的經

-
- ① 日本共产党于1931年4月发表的提綱草案。这个草案在国际上受托派影响，在国内得到解党派（見下注）喝采。其主要内容是低估天皇制和半封建势力，武断当时日本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发表后立刻引起論战，1932年共产国际正式駁斥了这个草案。——譯者
- ② 日本共产党成立后立刻遭到殘酷鎮压，党内一部分篡夺了領導权的叛徒竟于1924年作出解散党組織的決議，他們被称为解党派。——譯者
- ③ 已故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員（1900—1934），从学生时代起即参加革命运动，1933年11月被捕，在殘酷拷問下堅貞不屈，于翌年2月牺牲。他所著《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是日本第一部用馬列主义分析日本历史和日本资本主义的著作，我国有中譯本；三联书店1955年版。——譯者
- ④ 学者。著名和平运动人士，現任日本和平委员会会长、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貿易促进会会长等职，战前著有《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日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书。战后出版了《新著作集》。——譯者
- ⑤ 学者。战前主要著作有《日本资本主义分析》、战后著有《日本农业生产力的結構》等书。——譯者

济史。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大体上写到1952年到1953年前后就搁笔了。以后几年的叙述只能期之他日。但是大体看来，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是在那个时候确立的。因此写到那里，对于认识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至于省略年表、减列参考文献到最少限度、本文中沒有注解，也是由于篇幅关系。好在本文中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内容，希望读者参阅。此外，我在这次撰述中全面检查了旧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使我能够利用旧稿中的某些部分。最后，我希望有很多的人不計巨細，賜予批判。

守屋典郎

1961年3月

目 次

序

第一章 明治維新的經濟背景	1
1. 德川时代后期农民的商品經濟的发展	1
2. 开港通商所引起的商品經濟的发展和矛盾	23
第二章 明治維新和資本的原始积累	41
1. 維新政权所施行的經濟变革	41
2. 資本主义的导入与国内市場	58
3. 原始积累	77
第三章 資本主义的形成	90
1. 农业阶梯和机器工业	90
2. 資本主义的形成	110
第四章 产业資本的确立	123
1. 产业資本的确立及其本末倒置的构造	123
2. 资产階級和地主的統治与早期帝国主义	143
第五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161
1. 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国家的补充、代替	161
2. 壟断資本主义的形成	179
第六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的确立	191
1. 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大战繁荣	191

2. 帝国主义的矛盾的加剧	214
第七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	227
1. 战后经济危机	227
2. 相对的稳定时期	244
第八章 总危机的加深	276
1. 信用危机与大经济危机	276
2. 军需通货膨胀和准战时体系	291
第九章 战时经济	332
1. 中日战争期间战时经济的发展	332
2.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	359
第十章 第二次大战后占领下的经济	378
1. 战后经济的混乱和美国的占领体系	378
2. 垄断资本体系的复活	406
后序 (和约生效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素描)	447
参考文献	451
索引	453

第一章

明治維新的經濟背景

1. 德川时代后期农民的商品經濟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的脚注中，曾对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作过如下的叙述：“日本有純粹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和頗为发达的小农經濟。所以，比我們全部的大多数在資產階級偏見下写成的历史书，它为欧洲中世紀，提供了一个更忠实可靠得多的描写”^①。

我們应当首先认为日本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实际經濟条件是地租的实物形态。馬克思又在另一处写道：

“地租的实物形态——那在亚細亚，是国稅的主要要素——虽然是用那种以自然关系不变性反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为基础，但那种支付形态，反过来，也有維持这种古旧生产形态的作用。土耳其帝国得以保存至今，这便是秘密之一。由欧洲强迫引起的国外貿易，在日本引起实物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时，又把日本的模范的农业破坏了。这种农业的狹隘的經濟的存在条件，就因此失去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06頁，注192。

了。”^①

我理解到，馬克思對日本的認識，是从牧师的报告和旅行記等材料得来的。我們应当怎样来領会他對日本的論述呢？在上引論述中，馬克思不但指出日本农业的亞細亞方式的不變性，还預示这种不變性会因国外資本主义的侵入而消失，从而引起封建土地所有制崩潰的危机。但是德川幕藩体制^②不只是建立在同封建領主对立的繳納实物地租这种貢賦的本百姓^③上，还以表現在兵农分离^④三都^⑤与城下町^⑥的形成和参覲交代制^⑦等上面的一定的商品經濟的发展为基础。而且这个封建体制，虽因三百年的閉关自守而与外部世界的影響相隔離，但內部的矛盾逐漸酿成，商品經濟已在強有力的封建的限制下，以城市为中心，在全国逐漸发展。当时货币流通的範圍已达到相当的規模，商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业經有所发展，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化的农业，农民的階級分化也在进行。

由于这种情形，甚至还出現像楫西、加藤、大島、大內在《日本資本主义的成立》(1957年版)一書中所說的这种話：“當我們想到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頁。

② 在德川时代，天皇徒拥虛名，世襲將軍的德川氏掌握實权。他的將軍府又称幕府，各諸侯的封地称为藩，所以这个統治体系被称为幕藩体制。——譯者

③ 德川时代載入賦册的农民，他們在領主土地所有制下对土地有使用權，同时承担对領主繳納租稅的責任。——譯者

④ 从战国时代起，大領主为了鎮压人民和进行爭战，把过去分布各地的武士集中于他所居住的城堡附近，使武士完全脫离农业經營，同时促成城下町的发展。这种情形称为兵农分离。——譯者

⑤ 京都、江戶(東京)、大阪等德川时代三大都市，——譯者

⑥ 諸侯城堡附近的城市。——譯者

⑦ 德川幕府規定，各諸侯須于每两年中，一年住本国，一年住幕府所在地的江戶，而且妻子須經常住在江戶，事实上作为人質，称为参覲交代制。——譯者

这个问题，即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写《资本论》时对于日本究竟有多少认识时，感到太呆板地看他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不是尊重马克思之道。”(47页)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幕藩体制，是经过太閤检地^①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以古老的名田^②经营为特征的旧式中世纪土豪的土地所有制瓦解，产生缴纳实物地租的本百姓以后成立的在领地内拥有统治全权的新领主制（称为大名制），它是能与欧洲的古典庄园（Villikationsverfassung）体制瓦解后在中世纪成立的纯粹庄园体制相比拟的。关于这点，已由藤田五郎在《近世农政史论》（1950年版，33页）和高桥幸八郎在《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商品生产》（高桥、古岛编：《蚕种业的发展和地主制》，1959年版，17页）中指出过。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地位被固定为缴纳实物地租的农奴，他们的生活，由于有了永远禁止买卖土地、限制分地、限制农作物和庆安告谕^③等规定，而致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起，到衣食住的每个细节止，一切都受到限制。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德川时代末期。现在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德川时代中叶以后这个体制究竟瓦解到什么程度，这种瓦解情况对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什么影响和起了什么规定作用。

二

当然，封建制度的特征是领主剥削农民。领主的统治是以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为基础而成立的。农

① 指丰臣秀吉当权时（他任太政大臣，一般称他为太閤）实行的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译者

② 日本中世纪的土地所有者常用自己的姓氏来称呼田地，因此称为名田。——译者

③ 1649年德川幕府发布的告示，琐碎地规定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精神，是要人民拼命干活和过极艰苦的日子，把产品缴纳给领主。——译者

民劳动力的再生产受土地所有制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村社这个名詞来表现土地所有权的限制，那么封建制的基础就是这个村社。构成德川幕藩体制的基础的，是差不多吞食了农民的必要劳动部分的实物(米)貢賦(实物地租)。为了确保这种地租而实施的强制办法，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农奴制”。还須指出，在这个农奴制下，虽然还残存着劳役地租，可是一般地說，是以实物地租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在“假定直接生产者有較高的文化状态，从而也假定他的劳动和社会一般已經有較高的发展阶段”^①，农民由于商品經濟的侵蝕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得到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的可能性。

在原則上，实物地租至少要以一定程度的商品經濟为前提，并包含着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幕藩体制的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城下町的形成和諸侯以租米支付俸祿的一般化，都以它为前提。封建領主早就开始把收到的租米商品化，三都和城下町的商品經濟，就是由領主和特权商人以米为中心开展的。

被商品化了的米，是人們当作村社体制下的貢品而生产的。只就这点來說，米的商品化并不会破坏农村的自然經濟。但是都市的商品經濟的发展却使农村不能老停留在自然經濟的中心这种位置上。农村中的商品生产，不仅在城市所需要的蔬菜、衣料和日用品原料方面，还在封建貢賦的最主要的对象——米方面进行。米經過农民的手商品化，实际上是由这些情况促成的：即自18世紀初叶的享保年代^②以来，当作貢賦的实物地租的征收方法由每年勘定改为定額制、投放肥料的增加、耕作方法的改进和商人投資进行大規模开发新田，从而提高了生产力。

①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7頁。

② 享保是日本年号，享保年代是从1716年到1735年。——譯者

农民的商品经济，虽在封建生产方式之内，还是不断发展，结果村社的体制逐渐瓦解，使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者，出现富裕农民和贫穷农民，又在农民内部出现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亦即进行阶级分化。但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农民手里所保留的剩余劳动，不是归于直接劳动者，而是被土地所有制下拥有土地的农民占有，结果领主权虽然有所削弱，却使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重新编组，即在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下产生了地主与佃农对立的新关系。但是由此发生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动摇，还是促进了封建的依附关系的瓦解，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的情形，就预示了新生产方式的前提的发展。

在17世纪末叶的元祿年代^①，畿内^②及其他先进地区已出现水吞（无高）阶层^③，这说明当时日本农民的阶级分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18世纪德川时代中期以后，更以全国规模进展。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判明了这点。以下举两三个例：

“要进行全国性的数字调查是很难的。……如就尾张藩来举个例子，在元祿15年（1702年）尾浓江领地的120,189家农户中，有田地的为90,048户，没有田地的为28,041户。又在能登的一个村子里，享保9年（1724年）的赋额为212石^④。在19家农户中，13户有田，6户没有。又据人推算，在明治初年的全部耕地中，约三分之一是佃耕地，三分之二是自耕地”。（中村吉治：《日本经济史》下卷，1957年版，270页）

① 日本年号，从1688年到1703年。——译者

② 京都附近地区。当时包括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五国，故又称五畿。现为京都、大阪府及兵库县等地。——译者

③ 没有田地的贫农。——译者

④ 日本容积单位，每日石为10日斗，每日斗为10日升，每日升合1.804公斤。——译者

“各地方和各村的土地集中情况有相当差别，但是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即商品经济侵蚀深透的地方分解得快，落后的地方分解得慢。例如在畿内，到了德川时代后期，没有田地的贫农达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村子已经相当多（古岛敏雄：《近世商业性的农业的展开》，158页）；在长州，^①无地贫农平均占百分之五十弱，还有完全没有无地贫农的村子（同上书，135、137页）。在关东^②，大概以无地贫农占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地方居多（同上书，73—77页）。但是在同一个地区里面，村与村之间的差别很大，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像大村藩那样，从全部是本百姓的村子起，到一户本百姓都没有的村子止，真是千差万别（津下刚：《近代日本农史研究》63—66页）。这种差别必须用各村特殊性来说明。（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78页）。

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来说最近日本经济史学界进行的“寄生地主论战”的情形。上述阶级分化，不仅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动摇，而且是由于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关于这点，现在是没有争论了。诚然，谈到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实有从古老的下人^③关系的残余到典当佃耕关系和寄生地主与佃农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阶段之差，而最后的那种关系越来越随着农民的阶级分化而产生，到了19世纪以后的德川时代末期，更在全国迅速扩展。这是由于农村中的商品生产显著发展之故，而寄生地主制的展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

上述趋势是以这种过程为媒介而出现的：即商业性农业的发

① 今属山口县。——译者

② 包括现在的东京都及神奈川、千叶、埼玉、群馬、栃木、茨城等六县。——译者

③ 直接受地主役使的劳动农民。他们的处境近于奴隶，残存于偏僻地区。——译者

展，使农民中有中农分立出来，并向两极分化，现又受到土地所有制的限制。现在举例来说明农民中的中农的发展：在大阪周围的村子里，有半数村民种棉的例子很多。在这种村子里，上层农民日益扩充棉业生产。中农以下，一直到下层农民，都从事棉織品生产，并且也超过了副业性的家庭工业范围，还雇用几个工人，以图发展。这是典型的情况。但在这种发展同强有力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与它相结合的高利贷、商业资本对立，并受其限制时，农民的发展趋势，就不是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而是朝着寄生地主制的方向进行分化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地主制发展的，“是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即能运用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实力，乘着领主的财政紧迫，与领主权相结合，同时侵入其剥削体制，并依凭这种关系，发动领主权，把它当作武器来确保领主的贡赋和自己分得的部分。”（古島敏雄、永原庆二：《商品生产和寄生地主制》，1954年版，270页）。比如大阪地方的地主，就是些既向农民放高利贷，又有借款给领主阶层的能力的人。这个地方的佃耕关系的基本形态，是这些人结成地主团体，商定佃耕条件，向佃农强制征收高率佃租。

以这种地主和佃农关系为中心的农民的阶级分化，是不能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化等量齐观的。但是它又是以这种形态而展开的关系，即作为封建制度下的小农民经济发生破绽的结果，这些农民丧失了田地所有权，不仅要照旧向领主缴纳贡赋，还要受地主剥削，却又不得不紧紧抓住另佃农耕。佃农阶层在处于这种条件下的同时，又以向市场出售产品为目标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还被迫出卖劳动力。

农民的阶级分化既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关连，当然分化就不会停顿下来。曾经表现在劳役地租上的徭役劳动，随着货币经济

的发展，早就以“当票服役”或“典当服役”等名目，变成债务奴隶的劳动。这种债务劳动又逐渐发展为带有工资劳动性质的雇佣关系，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借钱变成付酬，债务劳动的期间缩短、进一步又发展为年雇工、季雇工和日雇工。这种关系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没落的小农民，如果只靠一小块田地，就连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能保证，因而首先必须出卖劳动力来补充家计。又因农业或小工业生产依靠分工而提高了生产力，可以雇用工人来扩大经营，补充家计性质的劳动就朝向雇佣劳动发展。工业方面的这种发展比农业方面更快。但就蚕茧业工人来说，在福岛的信达地方，只算这种雇佣关系下的流动工人，据说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明和九年(1772)，在桑折村的357户中，有男工60人、女工28人；又据明治5年(1872)的调查，伏黑村即有538人(内男工480人、女工58人)”(庄司吉之助：《明治維新的經濟构造》，1954年版，257页)。

商业性农业虽与上述农民阶级分化同时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强有力的封建限制下开展，因此不能予以过高评价。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它与当作副业的家庭工业的发展相结合，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虽有一定程度的地区差别和类型差别，却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根据堀江和古岛的研究，德川时代中期，在从各地聚集到当时最大的集散市场大阪来的商品中，与衣料有关的货物达到米的三倍。如果想到大部分的米是缴纳租税的，而与衣料有关的货物是农民的生产品，就可以知道农民的商品经济规模了。再从地区别和商品别来看，在畿内，棉和菜种集中在一个地区，成为最进步的商业性农业地区。在福岛、群馬、长野等地，由于在德川时代末期开港通商后获得广大的海外市场，所以蚕业迅速扩展，成为东山养蚕地区。此外还有不少地方，虽然就全地区来说，商业性农业并

不太发达,但是在它的范围内,都有棉、木藍、楮(桑科植物,皮为日本紙的原料。——譯者)、菜种、紅花等作物的著名产地。又在自給自足的色彩較濃的国^①和地方,虽然还可以划分米作地和旱地,但即使同为旱地,在西南地方,新作物甘薯具有重大意义,而在东北方面,則大豆占极重要地位。这里的农业經營,正如古島敏雄所指出:“可以想像为最旧式的自給性旱地作物,即夏作大豆和其他杂粮的輪作制(《近世商业性农业的展开》,1950年版,34頁,載《社会构成史大系》),也就是不发达状态占統治地位。这些发展上的差别,就对以后各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演变发生不同的影响。

三

随着这种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地方性的或全国性的市場的形成当然会达到相当的程度。

德川幕藩制度的形成,本来是在战国时代^②以来商业迅速发展以后,以大名領地^③为基础,作为全国性的統一政权而建立的。度量衡的統一、法定貨幣的鑄造、道路的修筑,都是在这个新体制下完成的。但是既然这个政权是建立在村社的体系上,商业也受村社的限制,所以不但商业首先依靠封建領主来进行,而且在三都和主要的城下町,与幕府和領主有特殊关系的特权御用商人,还作为权門商閥,列入統治机构的末端。

这种特权商人,既因兵农分离而与当时的主要生产者农民相

① 当时日本的行政区域名。——譯者

② 从15世紀末叶起,各地武士互相爭战,一直到丰臣秀吉完成統一局面止,約达百年,这个时期称为战国时代。——譯者

③ 战国时代以来割据一国和数國的武士,称为大名,他所統轄的地区称为大名領地。——譯者

隔絕，又因閉關自守而在對外貿易上受到限制，因此完全寄生于幕藩機構。但在元祿、享保年代以後，隨着農村中農民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如果他們還是維持老一套辦法，就難于應付新的環境。在這種情勢下，傳統的商人被淘汰，商業資本進行重新編組，與舊有商人并駕齊驅的新興商人就抬頭了。他們用包買的方式，力求掌握農民的商業性產品和手工業製造品，而進一步強大起來。三井、鴻池、住友^①等商人就是在那時獲致巨富的。西鶴^②所寫的《日本長久倉庫》，就活生生地描述了與權門商閥來歷不同的“近代出現的商人”。

可是從1705年（寶永2年）巨商淀屋^③被抄家的著名事例看來，當時的封建權力還是很強的。商人中的富強者與封建權力勾結起來，充當匯兌商和藏元^④等，日益伸展。與農民經濟發展相結合的商人，也成為放高利貸的包買商，他們勾結封建統治者，組成特權商人行會（“株仲間”），以加強自己的地位。幕府和諸侯們為了直接掌握經過重新編組的商業資本，就扶植這些商人，通過他們策劃封建的商業統制，並加強自己的財政。江戶的十組批發商行會和大阪的二十四組批發商行會在17世紀60年代（寬文年代）即已組成，並得到幕府公開承認。特權商人集團的結合是在18世紀前期的享保改革過程中大力進行的，但在18世紀後期的田沼時代^⑤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田沼公開承認了許多特權商人行會，通

① 德川時代的富商，後來都發展為財閥。——譯者

② 大阪市的文學家（1642—1693），本名平山藤五。寫了許多充分反映新商人氣概的作品。——譯者

③ 世代經營諸侯稅品買賣的大阪富商，幕府借其奢侈過分為名抄沒他的家產，傳說共值一億二千兩之巨。——譯者

④ 替諸侯和武士們保管租米和其他物資的商人。——譯者

⑤ 18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田沼意次（1719—1788）當權的時代。——譯者

过三都特权商人的壟断机构来加强商业統制，并依凭税金和賄賂来加强財政，結果特权商人行会与封建权力日益勾結起来，并随着这种勾結的进展而越来越带有壟断排他性质，因而成为城市特权化的典型事态，同农民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

于是城市商人的势力就在德川时代中期以后大为扩展。特别是江戶和大阪的特权商人，經由批发行制的先期貸款方式，集中了附近和全国的商品，充当藏元、挂屋^①等，經办諸侯的貨物的保管和收付，又成为金銀汇兌商，以諸侯在仓库中积存的貨物为担保，向他們进行大規模借貸，并向一般商人和农民放高利貸，积累巨富。三井和鴻池是这种巨商的代表人物。这些商人包售全国城下町和重要地点的批发行的貨物，成为全国商品的集中点。

在各地的城下町和重要地点，也出現了地方性特权商人。他們經办三都的商人的分銷行，参加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工作，又作为当地货币财产的集中积累者，向农民和家臣們放高利貸，并向領主貸款，由此日益扩展。在这些商人中，还出現了酒田的本間^②那样的人，从津輕到出羽，包攬全藩的財政，积累了巨富。

在这些商人下面有农村商人，以批发行方式控制农民的生产，这样就构成了全国商品流通的机构。农作物的商品化本来受村社的限制，本家^③农户是买卖的主体，小农户与商业不发生关系。这是所謂远隔地商业，不能成为当地的商业。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商人侵蝕与統治农村的力量增大，小农户也不經本家的媒介而

① 代替諸侯、武士們保管、汇透其出卖租米及其他物資所得价款的商人。——譯者

② 羽后(今秋田县)酒田町世代相傳的巨商，从18世紀中叶起开始与藩主勾結，經手进行“財政改革”和向諸侯与武士貸款，成为特权商人。——譯者

③ 一族的嫡子之家是本家，庶子之家是分家。——譯者

進入商業領域，村社的限制就逐漸崩潰。商人不僅向農民購買作物，而且經由批發行方式進行控制和組織生產。於是小農民就不經過本家而獨立地與批發行發生關係，農村分化也就顯著地進行了。

隨著商業資本的發展，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的流通量增大，信用制度也從元祿、享保年代以後迅速發展。幕府為了彌補財政收入之不足，從元祿年代起，到德川時代末期為止，常常改鑄通貨，致使貨幣制度紊亂。但是為了確保商業發展所需要的通貨數量，增加通貨也是必要的。因此，幕府在金銀儲備枯竭以後，就惡性地鑄制和增發通貨，增加了通貨的發行額。這種改鑄行為引起物價騰貴和經濟混亂，而匯兌商卻乘此獲得暴利，同統治者互相勾結的腐化行為也變本加厲。幕府為了維持封建制度，常常設法糾正和統一法定貨幣。但在白石和吉宗時代^①，幕府已經喪失了單獨進行的力量，而須組織特權商人集團，通過它來實行這一政策。到了德川時代後期，這種關係更加紊亂，特權商人与統治者的勾結更加密切，商人的投機性利益則非常增大。改鑄的結果，不但有好幾種貨幣流通，到了後期，各藩也發行藩票，攪亂了通貨的統一，而高利貸資本家與各藩財政的關係則更趨密切。

這種貨幣財富向商業、高利貸資本集中的情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原始積累的一個基礎。但是這種財富的集中，是寄生於封建的機構，並與它結合起來進行的，因此雖能成為這一機構崩潰的原因，而本身不能成為產生新的生產方式，並使其成長的力量。如果貨幣不轉化為資本，新的生產關係是不能產生的。

與上述過程相反，從18世紀末葉到19世紀初期，農民的商品

^① 分別指新井白石輔佐將軍德川家宣的時代(1710—1716)和德川吉宗任將軍的時代(1716—1743)。——譯者

经济又有发展。原来同城市特权商人处于从属地位的农村商人和前者对立起来，并上升为反对势力。到了这个阶段，在先进的地区，村社体制显著地瓦解，小农户成为独立进行买卖的主体，商业也不止在远隔地区之间进行，还在同一地区内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商人这个力量，在城市商人经由壟断式的包买手段对生产者进行不正当的压价购买时，不但和农民生产者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而且和农民结成统一战线，同城市的特权商人进行斗争。这时不仅商业性农业进行分化，并且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工业方面的商品生产则较农业方面更为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还处于开端状态，但总是不断出现，可是进展到什么程度和具有什么限度，却按产品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特别是在种米地区的一般农村，至少自耕中农以下的农民阶层还没有怎样离开自然经济的领域。而进展最快的是先进地区的棉业和丝业。这些部门和种米不同，自给因素少，因此商人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突破了村社的限制，直接得多地进展起来。

四

至于德川时代后期畿内的棉业中的社会分工和商业资本统治的发展情形，当时已经有大藏永常^①这样说过：

“首先，在近畿五国之内，有可以称为采棉商的人，在产棉地区采购籽棉。又有可以称为去籽行的人家，买进籽棉，雇许多人，用工具去掉棉籽，使之成为皮棉，又称为繰粉。他们把这些皮棉卖给批发行，批发行又卖给各处商人，并经办运输，有关业者就分别赚取水陆运费。各处买主又转卖给大铺家，进行弹制，使之成为弹棉

^① 著名农学家(1768—?)除《棉圃要务》外，尚著有許多有关农业的书，共达三十余卷。——译者

和棉卷，畿內称之为‘篠卷’。有人終年以彈棉花为业。接着又把它紡成棉紗，呈卷軸形状，經由中間商人，卖给各处織布业者。有的織成条紋布，送到各类染坊去染色；有的織成素布，由批发行购买以后，分別加以染色加工，制成衣料卖给布商。总之要經過十四、五道手續，提供許多的职业，养活各种家庭的人，棉花真是最好的灵芝啊”（大藏永常：《棉圃要务》，1833年（天保四年）版，載《日本科学古典全书》，第11卷，260頁）。

商业資本很早就已經对棉业进行控制。在大阪，由于附近农村的发展，在德川时代的初期就有棉商出現。1630年（寬永年間）前后，京桥办起了棉市。到了17世紀60年代（寬文年間），又有了三所（行名）棉市批发行和棉商行会，市場組織大体完成，以后更經由繳納税金而逐漸形成特权組織。

关于棉业的社会分工，在18世紀初叶，已能在各国产地看到专以采购籽棉、去籽、紡紗、織制条紋布或素布等专业者。在河內、摄津、和泉、大和等畿內各国和三河、知多、尾西、播州、伊予等处，都出現了棉織业。大阪的棉商行会拥有包买籽棉和皮棉的壟断权，毛棉批发行則拥有一手包买棉織品的特权，他們一面直接派人到产地去进行购运，一面用事先貸款的方式，使轉运地的中間商人同自己发生从屬的关系，中間商人又用同样的方式使各地采购商从屬他們，这就构成了购运統制机构。

但是随着农民商品生产的增大，农村商人在农民中間到处成长起来。他們最初是在各村平民^①拚命維持生活的情况下产生的，不久还扩展到村长阶层。到了18世紀末期的寬政年間^②，就与各国商人进行交易，而且有了与城市特权商人集团的壟断行为相

① 指村吏以外的小地主和自耕农。——譯者

② 1789至1800年。——譯者

对抗的显著力量。在这个阶段，农村商人和农民在一定意义上还没有分离，因此能够结成联合战线来和特权商人进行面对面斗争，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如在1823年（文政六年），就有摄津、河内、和泉的1,007个村子的农民和农村商人结合起来向国主提出控诉，反对大阪三所批发行的壟断行为，要求自由交易，而且达到了要求。

据说大阪附近虽然植棉业发达，而棉织品的生产，主要的是中农以下的农民进行的副业性的家庭工业。这是因为棉布市场比皮棉市场发展慢，也因为国内市场尚未完全形成阻碍了农民的正常商品生产的发展。由于大阪周围的广大种棉地区不能全部从事棉纺织工业生产，如高木所例示，在新大和川南岸的丹北郡，棉织这一最重要的附随植棉业的加工业，到了明治初期，还只集中出现于一部分村子里，当然就难以断言这里已处于农工分离充分展开的状态（高木一彦：《大阪周围棉业的发展和地主制的形成》，载历史学研究会编：《明治维新与地主制》1955年版，40页）。但是重要的问题是：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即使是萌芽形态也好，新生产方式是不是已在这个地区成长。据最近的研究，有实际材料可以证明这个地区的工场手工业已经相当广泛地展开。如《大津町志》中也有所记载的，以现在的和泉大津市为例，据中村等的报告，1842年（天保13年），在宇多大津村有18家织布行，在自己的作坊里使用了工人137人，其中87人是雇用的，同时使用工人7人以上的9家作坊雇用的工人占全部工人的66.4%（中村哲、川浦康次：《幕末经济阶段的有关问题》，载《历史学研究》，第225号，1958年11月，78页）。

与上述情形不同，在尾西，则以一宫的三八市为中心，处于比畿内更为明显的农工分离的形态，农民的商品市场早已发展。这

个市場的范围,在19世紀初叶,不仅广泛地达到尾張西部,而且在一宮、岩倉、起等地,按皮棉、棉紗、棉布等商品种类形成分工市場,并經由特权商人和远地直接經商。統治这些市場的是农村批发行資本,以他們为中心建起了农民商品流通的机构。在生产方面,也早就出現了使用雇佣劳动的作坊。特别是从文政、天保年代^①以来,可以看到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工場手工业。据对于这个地区的棉业很有研究的盐澤和川浦說,在这个地区經營棉織工場手工业的織布行,都是没有什么封建特权的中农開設的。它們既不是豪农通过封建的和村社的体制,无偿或近乎无偿地剝削附近农民而經營的工場手工业,又不是旧式商人当做批发行制度的頂点而經營的批发行工場手工业(盐澤君夫、川浦康次:《寄生地主制論》1957年版,156頁)。

对于尾西工場手工业的上述評价,还存在着有力的反对意見。但是总可以承认,这个地区的生产形态达到了比大阪周圍高得多的阶段;上层农村商人則作为批发行資本家,对城市特权商人保有强固的独立性。农民的商品生产就通过这些农村批发行資本,与領主制所加于商品流通的限制相抗衡,使其产品棉布、皮棉等經由“农民的途徑”流往很远的地区。对此藩当局常常采用发布禁令、設立特权商人行会和成立国产会所^②等方法,来加强領主的控制。而农村商人們就經由半夜装船和秘密装船等办法进行頑强抵抗,不遵从統制。因此藩营专卖事業不能收到充分的效果。甚至在1853年(嘉永6年)7月,藩当局終于解除了将貨品运往他領的禁令。

其次,关于絲业的社会分工,可以分为养蚕、制絲和絲織等阶

^① 文政年代是从1818至1829年,天保年代是从1830至1843年。——譯者

^② 一名物产会所,为德川时代各藩設立的土产专卖机构之总称。——譯者

段，另外还有具有特殊意义的蚕茧业。蚕茧的商品流通范围没有棉花广，因此其生产形态一般也比较落后，养蚕和制丝业一般也差不多全未分离。但是在若干地方，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例如福岛的信达，以前在藤田五郎的分析中，曾认为是“前期资本统制生产”的区域。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却得出以下的认识：

“在信达地方，随着养蚕业的发展，进行了蚕茧、生丝、丝织等社会分工。农民的分化，使地区内或村内产生日雇工或季节雇工，同时又从远处招雇年雇工，以发展经营。……如果认为近畿地方的棉业经营具有先进地区的形态，那就可以说信达地方也有与上述地方相比拟的先进地区形态”（庄司吉之助：《救世起义的研究》，1956年版，3页）。

信州和群馬的制丝业，在天保年间，已经呈现由农村商人创办的用锅制丝的作坊等类型，就发展阶段来说，明白显示了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形态。这点已经为很多人所同意。上州在19世纪初叶，由宽政到享和年间，也由手挽进化到坐纰。到了德川时代末期，上州的坐纰制丝业传入信州諏訪，不但使在那里出现的用锅制丝的作坊的工人工资劳动化更有进展，而且大大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达。这点已由矢木等的研究判明（矢木明夫：《日本近代制丝业的成立》，1960年版，其他）。

至于丝织业，从德川时代中期的享保年间起，就可以看出进入了新的阶段。以前在日本丝织业中占居垄断地位的西陣机织业，正好从这个时期起，迅速向各地移植，地方机织业就在各地兴盛起来。最早的是丹后地方的纰綢机织业，那是享保年间由西陣移植来的。其次是桐生地方的丝织业，则系元文年间^① 依凭由西陣得

^① 1736至1740年。——译者

来的技术而勃兴的。还有长滨地方的縹綢机織业，是在元文到宝历年間^①从丹后縹綢机織业学到技术后創办的。在这以后，岐阜、足利、伊勢崎、八王子、秩父、川俣等地的农村絲織业也有迅速的发展。

农村商人站在这种农村絲織业发展的前列，背后則有生产者即从事小工艺的农民的力量。例如桐生地方的織品，本来主要的是通过中間商人卖交江戸的十組批发行。但自农村机織业逐渐发展后，經營这种产品的地方商人开始无視十組批发行的特权，在江戸直接进行贩卖。十組批发行的行会特权实质上就被地方商人粉碎了。堀江曾就这点說道：“地方商人的斗争力的秘密，实际上是从从事小工艺的农民”（堀江英一：《日本的工場手工业問題》1949年版，74頁）。而現在的問題在于怎样来理解这种从事小工艺的农民。因为只凭前期資本对小生产的統治，是不能使劳动在形式上隶属資本的。这种統治作为一种中間形态，还可能排除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这种剝削形态又形成了向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关系，特別在它和工場手工业在同一經營主体中相結合时，后者的性质就更加明显。这样考虑起来，寄生于从事小工艺的农民分化的先期貸款批发行的意义就很明显。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是緩慢的，还是朝向形式上隶属資本的劳动发展。

附帶說一下：到了天保年間，桐生地方的养蚕、制絲和机織各部分工序发生分化，从而出現了雇用很多女織工、縹絲工和花样工的工場手工业。这种发展情况曾引起許多研究者的注意。但据最近研究，原来經營工場手工业的农村商人，在特殊織物的織制业开始广泛地吸引农民到商品生产中来时，一般都宁願縮小自己的作

^① 1751至1763年。——譯者

坊,而充当織东,采取出租織机的方式来控制农家副业。但在絲織业地区,虽然批发行制度占有极大的比重,而工場手工业却在各地不断兴办起来。不管这种手工业是否占居統治地位,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来說,总显示了劳动不但在形式上隶属資本,而且逐步在实质上隶属起来。

五

上述发展,在封建体制的强大压力下,意味着农民阶层中对抗这种压力的資本主义因素的不断成长。这对于封建統治者是个生死存亡的問題。他們一面加强封建統治体制,一面极力設法适应发展中的商品經濟而調整其体制,以图压抑对抗因素。

封建統治者的这种掙扎,表现在多次的幕政和藩政改革上。享保年間(18世紀20至30年代)的改革被看做是改革被元祿年代以来货币經濟发展攪乱了的封建体制,并获得成功的措施。在这次改革中,幕府企图按照成規来恢复专制体制。为此施行紧縮政策,設法节省冗費,同时改革通貨,统一元祿年代以来混乱的通貨,促进特权商人行会的組織,把城市商人吸收到幕府的商业統制机构中来。又在农村实行定租制,以图增收租稅;同时奖励副业,以提高其經濟基础,并緩和田地买卖的禁律,希望商人开发新田。这种办法是同建立在領主土地所有权和本百姓經營权的統一上的原有幕藩制度相矛盾的,而幕府的目的,不仅是經此同城市的批发行資本相勾結,而且在农村中适应地主富农的願望,在农民中制造分化,把地主富农拉进自己的体系中來。可是中农以下的农民的負担却由此增加,从而更加剧了农民的反抗,以致出現了1754年(宝历四年)在久留米发生的那种大規模农民起义。

到了次一田沼时代(18世紀70至80年代),幕府进一步推行

了享保改革時的經濟政策，並加強了和商業資本的勾結。幕府一面堅持向農民征收實物租稅，同時讓特權商人所統治的流通機構侵蝕農村商品生產的成果，以加強封建性的商業統制，因而更增加了特權商人的力量。但是這種措施，不但使幕藩制度由於批發行資本寄生於封建制度而益趨腐敗，並因在封建剝奪之外，加上特權商人對商品作物實行壟斷性的壓價購買，而使農村顯然更趨荒蕪。結果導致天明年間的大飢荒^①。農民起義，則如1781年（天明元年）在武藏、上州的47個市場設立絲綢稽查所所引起的關東北部的暴動和1787年福山藩的大規模起義所示，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終於使田沼政治崩潰。

寬政年間（18世紀90年代）的改革，是從對付這個農村危機開始的。改革的措施，包括改變田沼時代的商業政策、廢止多項城市商人的特權、對農民實行歸農政策、壓抑商業性農業和獎勵主要糧食作業。這時封建統治者更加積極推行增產興農政策，以圖加強封建統治。如東北地方^②各藩當局就採用了自己移植商業性農業，興辦養蠶和織物業以及實行專賣等加強統治體制的辦法。但是在畿內那些地方，這種政策卻收到相反的效果。壓抑城市商人的措施促使農民的商品經濟和農村商人發展，不久就使農村中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異常加劇。在先進地區，階級鬥爭呈現農民起義和救世起義等形態，以下層農民為中心進行，非常尖銳。

天保年間（19世紀40年代）的改革，是封建統治者面臨這種局面：即農民因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進行兩極分化和大鹽起義^③所確切顯示的由下層農民和前期無產階級站在最前列的階級鬥爭的加

① 天明3年至5年（1783—1785）在東北地方連續發生大飢荒。——譯者

② 又稱奧羽地方，包括現在的青森、岩手、宮城、秋田、山形、福島等六縣。——譯者

剧，为了确保封建的实物租税，巩固幕藩体制的原有基础而施行的。改革的办法是加强封建的反动措施，用返籍令和其他方法来压低雇工的工资和限制离籍外出，设法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策划解散特权商人行会和降低物价，又规定把江户、大阪周围十里^④的领地都提充幕府直轄地，以图重振幕府的权力机构。但因这种政策过于反动，结果改革以失败而终，而其历史意义，却在于使农村商人更加活跃，真可以说是对幕府的讽刺了。因此改革的客观意义，据说就是排斥对日益发展的农村商品生产逐步丧失控制力的城市商人的特权、解散城市的特权商人行会，以图由幕府直接控制农民的商品经济。许多地区的农民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幕府的权力无法控制的程度。幕府把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各种职业叫做余业，到处进行调查，以图在制度上把它们编入幕府的权力机构。

但是这种农民的商品生产的发展是在封建土地所有权的顽固规定下进行的，因此只能经历极为曲折的发展过程。天保改革虽然失败，而其封建的反动影响达于许多村落，在先进地区，就表现为地主统治的加强。这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促进的下层农民的活跃，推动了阶级分化和上层的反动化，攫取了商品经济成果的农村商人不久就倾向于集中土地，充当商人地主，走向寄生地主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幕府再一次采取加强封建反动统治的方针，即在改革的第二阶段，禁抑农村商人和其他领地商人之间的自由交易，力图使产品自然集中于城市批发行商人之手。古岛等重视这一改革的第二阶段，就大阪的棉农写道：

“因此对农村商人的打击是决定性的。阻止自由交易的结果，

③ 大盐平八郎(1794—1837)先讲朱子学，后改阳明学，任大阪町署的“与力”(警察干部)。1837年发动起义，在政治上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译者

④ 日本长度单位，合3.924公里。——译者

他們只好降落為大阪批發行商人的下層組織。……農村商人還直接在幕府統制下被重新編組，因而再把一時在幕府權力之外成長的農民商品經濟重新收攬回來”。（古島、永原：《商品生產與寄生地主制》，152頁）

這種評價只是片面的輪廓。事實却更為複雜。新的因素早已從這時起在各地乘隙成長。同時幕府並沒有放棄直接把農村商人掌握在自己管制下的努力，據說依憑嘉永年間^①的特權商人行會再興令，曾在一定程度上達到目的。當然重興的特權商人行會與以前的行會相比，所受幕府權力的管制要少得多。行會不僅包括文政年間以前的特權商人，還把後來新成長的商業資本家吸收為正式會員，並在相當程度上組織農村商人。這裡有着德川時代末期更加廣泛展開的救世起義^②的基礎和以城市、農村中的生產為基礎的廣泛的聯合戰線的契機。

天保改革的另一歷史意義，是強藩在同幕府政權的關係上加強了相對獨立地位。由於解散特權商人行會，原被幕府統治的全國性統一市場就脫離了幕府的控制。即使不發生這種情況，各藩本來也想同幕府權威保持相對獨立，這時就得到了相對獨立的經濟基礎。在各藩內部，當局力圖掌握自己領導下的全藩統一市場，並經由藩政改革，在藩的直接控制下創設國產會所和重新成立特權商人行會。經過這種措施，有些強藩在攫取成長起來的農民商品經濟的成果上獲得成功，或者加強了壟斷性的藩外貿易，在幕府的控制之外參加中央市場，從而使本藩的力量更為強大。

這就是說，改革導致了同幕府相對峙的強藩的出現，並產生了德川時代末期的政治對立的基礎。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商

① 1843至1853年。——譯者

② 詳見本章後節。——譯者

品經濟更加被置于封建的商业統制之下，商品經濟的发展力图摆脱这种統制，这又产生了德川时代末期和明治年間展开的复杂斗争的基础。以长州藩为例，在1831年(天保2年)发生有号称十万农民参加的防长^①大规模起义后，由村田清風負責施行了著名的天保改革，对农民攻击的目标，即城市特权商人和农村特权阶层实行压抑，以图在領主自身领导下复兴封建的統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想由藩政权直接掌握負担租稅的农民和成长了的商业資本，但不久即归于失敗，而改革派同“俗論派”^②的对立就发展起来。

总起来說，农民的商业生产有了发展，这种发展威胁幕藩体制的基础，在局部範圍內还可以看到工場手工业的展开，但是这种商品生产是在封建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下进行的，因此一般不能摆脱特权商业資本的統治而独立发展。农村商人的成长也成为寄生地主制发展的基础，并且多数被編入封建的商业机构。但在此过程中，劳动力逐渐隶属于資本，农民分化也日益加剧，可是还需要开港貿易这种外界压力，才能使产业資本进一步发展。这难道不能看成是馬克思預見所及的嗎？

2. 开港通商所引起的商品 經濟的发展和矛盾

—

从1853年(嘉永6年)培里入寇^③开始，日本对外开放国禁，是

① 长州藩分周防、长門两部分(“国”)，防长即指长州藩。——譯者

② 由上级武士組成的保守派。——譯者

③ 美国海軍提督(Mathew C. Perry, 1794—1858)，于1853年1854年二次乘舰来日，迫使幕府开放国禁。——譯者

被产业資本已經获得完全胜利的世界資本主义国家依凭他們的意志强迫施行的。这时欧洲的产业革命已經完成，先进国已經出現社会主义革命的苗头，发展到这一步的資本主义，就进入了必須在輪廓上最后組成世界市場的阶段。第一个强迫日本开放国禁的是美国，但是不久即由充当“世界工厂”的英国領先进行对日交涉，各国也都想把日本当做自己国家的产业資本的市場，加以控制。

开放国禁的要求，对做了三百年閉关自守之梦的幕藩体制提出危机的警告。农民商品經濟的发展，已經在內部动摇了这个体制，在开放国禁要求进展到通商貿易要求时，势必引起的商品經濟的发展会招致进一步震撼封建体制的危險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統治者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把維持他們的統治体制和通商要求之間的矛盾减少到最小限度，即拖延外人的要求，或由幕府和各藩壟断貿易利权，不使它落到人民手里。

1858年(安政5年)，幕府不能坚拒美、英的强迫要求，在國內不願呈請天皇批准条約一事所引起的問題，接連与美、英、荷、俄、法五国締結通商条約。但是由于自由貿易而引起的“任意做买卖”的开始，立刻使封建的商业統制陷于危机，因此幕府对于貿易采取了强硬态度。早在1860年(万延元年)，就发布了杂粮、液体油、蜡、衣料、生絲等五种商品的江戶轉运令，开始統制重要物产的輸出。接着限制銅的貿易，并在1863年(文久3年)强力压抑生絲貿易，以图阻滯其进展。在1862年(文久2年)的約定日期迫近时，又提議延期开放两港、两都^①，1863年更建議封閉橫濱港，总之是一貫企图阻止貿易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开放国禁以来的國內政治斗争，先形成“列藩会

^① 指和新潟、兵庫和江戶、大阪。——譯者

議”^①、“拉攏京都”^②、“处士横議”^③ 等活动，再經由安政大獄^④ 而发展为尊王攘夷和佐幕开国的对立。虽然幕府采取封建的貿易政策，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了对抗攘夷派，还是支援幕府，对幕府的要求表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在1863年(文久3年)8月18日公武合体派^⑤ 举行政变成功，使尊攘派受到挫败时，幕府的貿易政策轉趋积极，其中包括封閉橫濱港和压抑生絲貿易等方針。英国看到日本統治階級想要恢复閉关自守，首先主張用武力来粉碎这个企图。这就是想为产业資本找市場的資本主义的意志和企图固守古老体制的封建主义之間的对立。

于是英、美、荷、法四国联合舰队于1864年(元治元年)炮轰下关^⑥，予攘夷主張以决定性打击。英国公使阿尔科克曾在攻击前写給本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透露这一暴行的目的。他說道：“如果这次攻击成功和收到效果，就可以使上自天皇、將軍，下至佩带两刀的武士和浪人^⑦，即全部統治勢力深信完成攘夷計劃是絕望的和不可能的，并使他們今后放棄一切类似計劃”（石井孝：《明治維新的国际环境》，1957年版，199頁）。这就导致了1865年(庆应元年)天皇批准条約和1866年簽訂改稅条約，致使日本在半殖民地

-
- ① 培里胁迫幕府开放国禁后，薩摩等强藩主張把締結对外和約一事交付“众議”，以图乘机参与国政，改变幕府专政制度，这种“众議”即“列藩會議”。——譯者
- ② 从12世紀駐鎌倉的將軍当权起，天皇即毫无实权，拱居京都，这时幕府和强藩都爭先和京都的天皇朝廷联络，通称“拉攏京都”。——譯者
- ③ 指各藩武士，特别是下級武士紛紛議論国事，并进行政治活动。——譯者
- ④ 1859年幕府大肆逮捕反对派人士，处以严刑。由于那年是安政6年，故称为安政大獄。——譯者
- ⑤ 主張天皇朝廷和幕府合作的势力。当时人們称天皇为公家，幕府为武家，故称此派为“公武合体”派。——譯者
- ⑥ 屬长州藩的港口。——譯者
- ⑦ 日本武士都佩带大小刀各一把；浪人是指沒有主君的武士。——譯者

的条件下淪为欧美資本主义的市場。世界資本主义的自由貿易政策是得到完全的胜利了。

但是欧美資本主义的胜利，只是把日本当做他們的市場来加以控制。在这个必要的限度內，他們援助了封建体制的改革。1866年后，英国公开和薩长藩^①相勾結，而法国支持幕府。他們在成立以天皇或將軍为首的专制主义政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是为了日本資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英国所以希望打倒幕藩体制和建立专制主义統一政权，只是想使通商关系不止在幕府直轄領地，而且在日本全国有效。他們不想日本資本主义化，而希望成立封建联邦。写《英国策論》的阿勒斯特·沙托就曾說道：“我的建議，是把大君(將軍)从原来的地位拉下来，使他成为一个大領主，由以天皇为首的諸侯联合政体来代替大君充当統治势力”(沙托：《一个外交官所見的明治維新》，日譯本，上卷，1960年版，197頁)。

法国的行动在使日本殖民地化这点上，包含着更危險的因素。

二

但是对于已經腐朽透頂的幕藩体制，开放国禁却起了正如紧密封閉的木乃伊与新鮮空气相接触那样的作用。从下面成长的商品經濟，因开放国禁而更加迅速发展。

貿易方面，自通商条約締結以来，尽管幕府采用压抑政策，还是显示逐年发展之势。1859年(安政6年)，輸出为891,416美元，輸入为603,161美元，1863年(文久3年)，輸出达12,208,218美元，輸入达6,199,101美元，从这时起逆轉为入超，1867年(庆应3年)，輸出增至12,123,675美元，輸入增至21,673,319美元(石孝井：《幕

^① 德川时代两个大藩，薩摩在今鹿儿島县，长州在今山口县。——譯者

末貿易史的研究》，1944年版，53頁）。就商品类别來說，輸出方面，生絲占全部輸出价額的半数以上，高居首位，其次是茶和海产品。輸入則以棉織品、毛織品为重要項目，还有金屬、武器、舰船等。就国家來說，英国始終占总額一半以上，居于次位的，最初是美国，1865年后被法国追上。至于貿易港口，則橫濱經常占全部貿易額的百分之八十，大部分的生絲和茶都是从这里輸出的。

开港通商以来生絲貿易的跃进，对于以橫濱为門戶的关东、奥羽、中部^①等所謂东山养蚕地区的农民商品生产起了显著的影响。地方商人搶购生絲，促使国内生絲漲价和缺货，生絲价格經由橫濱貿易来决定，封建的商业統制就迅速崩潰。生絲价格的高漲使养蚕业发展，生产米谷的水旱田地也因增种桑树而受到威胁。幕府压抑貿易的措施虽然一度阻止了生絲貿易的进展，但在炮轰下关事件后撤銷了这种限制。还应注意的是貿易对于生产方式所起的影响。

生絲輸出的跃进促使生絲产量迅速增加，从而使养蚕业开始夏秋两季飼育和用火力进行培养，生絲生产方面，过去一般实行框纜^②和手纜，而这时各地普遍使用坐纜器。結果在生产方面，批发行控制的家庭工业成为一般状态，再进一步，各地就不断出現工場手工业。这种生产方式进步的意义，有如下述：

“开港通商对制絲业所发生的影响，与其說是在于工場手工业的发生，不如說是在于批发行控制的家庭工业的普及和发展上。但是开港后忽然在各地发生工場手工业，……却可以显示制絲业資本在日本各种产业中独树一帜的自力更生性质。……如上州的沼賀、甲州的若尾和信州的諏訪等地所見，經營制絲工业的多系生

① 介于关东近畿之間的地区，包括新潟、富山、石川、福井、山梨、长野、岐阜、靜岡、爱知等县。——譯者

② 过去日本东北地方实行的纜絲办法，用桐（后月竹）做的框子纜制。——譯者

絲商人，但是像伊勢的伊藤、加賀的鹿野那種充當村吏的地主經營制絲業的也不在少數。總之養蠶地區發生的制絲產業資本的鄉村性質和寄生的商業資本，即江戶批發行的都市性質恰好是相對峙的。”（石井孝：《幕末貿易史的研究》，1944年版，383—384頁）

但是生絲生產方式的這種發展，雖然作為崩潰中的封建制度內部的資本主義發展，是應予重視的，而在它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相互作用中，却經歷了曲折的過程。生絲貿易發展的結果，農村商人中發生了特權商人，從而在農村內部造成了商業資本同直接生產者的對立。例如1864年幕府頒布生絲、蠶茧改印令，把貿易統制的方式，從對於批發行的商業統制改變為對於生產部門的統制，許多藩也仿照實施這種辦法。在這種情況下，乘着施行上述政策的机会，同幕府和各藩進行勾結的，就是農村中的新興特權商人。

“這種統制體系的新規定是，……完全停止由經營輸出的江戶批發商和橫濱商人經辦的原有辦法，而由新指定的商人在幕府統制下進行。在信達地方，是以新興農村商人提出申請的方式交辦。這種農村商人不是舊式中間商人，而應當看或是從直接生產者中產生的商人和隨着開始貿易的潮流成長的包買商人”（庄司吉之助：《明治維新的經濟構造》，1954年版，276頁）。

儘管如此，這種統制是由江戶市場這個中心擴展到全國的。在這方面要求聯結的，不是舊式特權商人，而是新興的地方商人，這就顯示了迅速發展的新勢力的成長。當然統治者就極力設法把這種新的統治階層吸收到舊體制里面去，同時又如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所示，依憑原封不動的舊體制來做到這點，是有限度的。而勞動之從屬於資本，也在逐步從形式上的進展到實質上的了。

在茶和棉花方面也能看到上述發展。如在制茶方面，工場手

工业已在各地出現。

貿易对国内产业所发生的影响,在輸入商品方面也是很大的。而作用最大的就是1865年以来迅速增加的棉紗和棉織品輸入。例如据山口的調查,下野的真岡綿制品被廉价的外國棉紗所压倒,由农家从事手紡和手織的晒布业逐渐衰落,年产量竟由化政^①、天保年間的38万反^②,减少到明治5、6年(1872、1873)的4万反。他如武藏塚越的結城布、足利的棉織品、伊勢的松阪布、^③ 爱知和岐阜的条紋布、紀州的法兰絨等,都受到廉价的輸入棉織品的严重打击。

但在受到上述打击以后,在很多織布业地区,也有些企业改变原来的生产方法,轉而使用輸入的棉紗,走向新的发展道路。如足利的棉織业者把来自橫濱的輸入棉紗和日本自制的棉紗与絲綫混合使用,制出絲棉混織的料子,降低了价格,从而扩充了銷路,压倒其他产地的业者。武藏塚越的結城地方的棉布业亦因使用輸入棉紗做原料而获巨利。川越的业者也使用輸入的棉紗,模仿輸入棉布(唐棧布),制成“二子布”,扩大了銷路。又在爱知的一宮地方的絲棉混織业方面,起先用輸入品为經綫,日本出品为緯綫进行制造,后来經緯綫都用輸入品,不再用日本的手紡綫做織布的原料。同样地布袋地方的条紋布业和叶栗郡的名古屋織业,也都使用輸入棉紗制出佳品,扩大了銷路(山口和雄:《幕府末期貿易史》,1943年版,219—220頁)。

① 指文化年間(1809—1817)与文政年間(1818—1829)。——譯者

② 量布用的单位,通常以长2丈6尺至2丈8尺,寬9寸(鯨尺,1鯨尺合0.373米)为一反。——譯者

③ 下野、武藏、伊勢是当时的“国”(地域单位)名,真岡、塚越、結城、足利、松阪均“国”以下的地名。——譯者

这种影响不仅使生产产品的內容改变，更重要的是使生产方法本身也发生变化。洋紗的輸入，不仅迅速驅除了作为农家副业的手紡业，并使原来使用土綫和自己的織机織布的独立織行蒙受打击。尤其是其中只凭一点自給的土綫勉勉强强从事織布的小織行，更因买不起高价的洋紗而沒落，他們多被强有力的出租織机的业主組織起来，从事資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或者被洋紗买卖商人所開設的批发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洋紗的流通，对生产者重新施行控制的是与横濱的貿易商勾結的农村批发行資本，他們經由控制原紗，建立了新的批发行控制制度。同时在这种情勢下，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德川时代末叶，已經有薩藩和江戶棉批发商鹿島万平实行或策划开办棉紡工厂了。

这里还可以看出，新的批发行資本是在与封建的統制相互影响下，同特权性的利益結合起来发展的。在这一点上，棉业商人和絲业商人是一样的。就是在德川时代末叶号称棉織品工場手工业最发达的尾西，也有这种情况：

“工場手工业經營者和上层的农村商人，乘着开港引起的旧式棉业的混乱，改营洋紗行、批发行、染坊、榨油厂、当鋪、酿酒业等，并且都加紧搜括土地，迅速走上地主的道路。又在这些地主所兼营的企业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寄生于中农阶层以下的农民的商品生产，从上面通过流通过程与封建压迫来攫取劳动果实，即一面是地主，同时具有强烈的寄生性质”（盐澤、川浦、《寄生地主制論》，230頁）。

在这些寄生商人中，建立新式批发行制的洋紗商，不久就充当了替領主經營土产的御用商人，有了特权，又与巨大政商，即貿易商勾結起来，壟断当地洋紗供应，并发展为专制王制政权的基础。但在基本的市場結構起了变化，整个經濟体系发生动摇时，矛盾加

剧，不能光靠上层部分特权化来解决。洋紗商和批发行商业资本的寄生性质越是强烈，他們同依然推进着商品生产的农民与織行之間的对立就越尖銳。在下面成长起来的上层中农里面的布商、出租織机的业主和工場手工业业主就站在沒落中的农民、織行的前列，同新式的寄生特权商人进行抗爭。

这种事例不仅以尾西为然，在制絲业从基层发展起来的諏訪地方也可以看到。在諏訪，中間包买商的发展加剧了他們同农村批发行的矛盾，同时上升的上层中間包买商开始轉化为批发行性质的特权商人，而“下层中間包买商的上升却使对流通过程施行壟断統治的批发行的利益减少，因此批发行不得不通过控制生产来掌握产品，結果他們同中間包买商的对立更为加剧”（矢木明夫：《幕府末期的資本存在形态》，研究年报《經济学》，50、51号，1959年版，157頁）。这样整个的流通和生产結構就都起了变化，阶级分化也深入起来。

三

开放国禁使封建統治者也开始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德川时代末期幕藩体制的动搖，首先使封建統治者因外国势力侵入而感到危机，接着他們内部因应付外国侵略而发生了公武合体派同尊王攘夷派的对立；1864年后，又使佐幕派与討幕派的斗爭加剧。在这个过程中，幕府同强藩之間的对立日趋尖銳化，双方都极力加强开明的軍事体制。于是作为这种体制的物质基础的新生产方式之采用，在幕府和强藩方面都提到日程上来了。

例如幕府从1842年（天保13年）鴉片战争以来，为了加强对付“外夷”的軍备，就已經擢用高島秋帆^①、江川太郎左卫門^②等，研究西式兵制，并在伊豆蕪山建筑反射炉。培里入寇以来，更加紧

采用西式軍事技术。1853年令水戶藩在石川島創辦造船厂，开始建造西式帆船；1856年，又在荷兰技师指导下在长崎建立制铁厂。到了幕府末期，这种事业更有进展，1863年建立神戶造船所，1864年在江戶关口水道町建成一个大炼铁厂和大炮制造厂，1865年又在法国公使里昂·罗休^③的劝說下在横須賀和横濱建筑大規模制铁厂。

各藩也出現了同样的动态。佐賀藩走在全国的前面，从1850年（嘉永3年）以来就开始鑄造新式大炮，后来还替幕府和各藩制炮。1864年，模仿輸入的炮制成了亚姆斯特朗炮，还制造步枪、火药、木帆船和蒸汽鍋炉等。1865年，木制輪船凌風丸竣工，这是日本第一次制成的蒸汽船。1868年，又与英国的加布納尔公司合办高島煤矿，采用了西式技术。薩摩藩从1853年反射炉竣工以来，就开始了制炮事业，1857年（安政4年）建立了著名的集成館，內設反射炉、熔矿炉、大小炮鑄造場、玻璃制造炉、水雷制造所等，进行綜合軍事技术研究。据說制造玻璃是为了用在舰船的天窗和灯上面；这个藩早就注意到制造棉布，1867年就建立西式棉紡工厂，其目的即为制造布帆。制造西式舰船，也是薩摩藩开始的。到了幕府末期，长州、土佐、水戶、福井等藩都迅速进行制炮、造船等事业。

关于幕府和各藩兴办的工場手工业，如以佐渡金矿为典型的采矿工場手工业和天保年代藩政改革后作为增产兴业政策之一环

① 德川时代末叶的著名西式軍事学家（1798—1866）。自費研究西式枪炮和战术，开門授徒，还于1840年受幕府之命在江戶郊外表演，在輸入西式軍事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譯者

② 名英龙，字坦庵（1801—1855），主張用新技术來巩固海防，常向幕府建議改革兵制和制造西式舰炮，并在这方面起了先行作用。——譯者

③ 法国駐日公使（Leon Roches），从1864年起代表拿破侖三世的政权駐日，力图通过幕府來統治日本，明治維新后去职。——譯者

的上田藩与肥后藩設立的机織工場手工业，都是領主办的工場手工业。幕府末期的軍事工业，則如上所述，是幕府和各强藩依凭輸入机械兴办的机器工业。但是这些企业不是为了追求資本主义利潤，而是以幕府的强大财力和各藩于天保年代以来經由封建的藩政改革而积累的余款为基础而創办的，不仅以加强封建体制为目的，而且主要的經營与技术人員都从武士階級出身的人中采用。固然这种新生产方式之所以被采用，是以幕府末期商品經濟的发展和农民的階級分化为基础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藩营工厂最发达的西南各藩，却与幕府統治下的先进地区不同。如佐賀的均田制度和薩摩的按戶配田制度^①就显示这些地方还不許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存在，即領主体制还相当强固。

因此在建立藩营工厂时，原有的木匠、船匠、枪匠、鑄匠、鍛匠等手工业者都被用来充当技术人員，工人則从农村中招募。但是担負起領導新生产方式責任的人并没有从武士階級中順利地分化出来，大約都是些没有什么資本主义經營观念的人。从农村招募职工也沒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如1867年5月横須賀制铁所的这段記載就可以证实这点：“經办铁厂的官吏向横須賀各村招募十岁以上的少年充当工徒，由于村民知識不够，而且生活程度很低，所以应募的只有横須賀村农民胜右卫門的长子等9人”（横須賀海軍工厂：《横須賀海軍船厂史》，第1卷，1915年（大正四年）版，85頁）。

其实問題在于：这种事业不是从下面的商品經濟的发展中产生，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經手办起来的；同时这种事业之所以迅速发展，又不是为了对抗初期的外国侵略，而是幕府和强藩当作专制主义的富国政策之一环而推进的。按照当时商品經濟发展的情况，

^① 这两种制度的基本精神都是保留藩主的土地領有权，将土地分派給藩民耕种，并征收租稅。——譯者

要从外国輸入機器和建立工厂，由于資本积累还不足、农村分化还不够、分化出来的工資劳动者还少、国内市場也还狹隘，所以不能从下面进行。这种情况又使采用新生产方式一事須由封建統治者中基础最为巩固的出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無論从資本原始积累上来看，或者从采用技术上来看，同外国人聯絡都成为重要的条件。

封建統治者越是想依靠輸入新生产方式来加强自己，就越是尽力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同外国聯絡。橫須賀制鉄所的建立，是采納里昂·罗休的建議，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而其建設經費，則打算經由幕府和法国一起壟断生絲貿易来筹集。佐賀藩也从在长崎进行的陶瓷器和其他土产品貿易来积累輸入船艙和机械的資金。薩摩藩早就力图通过琉球和长崎的貿易来輸入西式机械工业設備。他如土佐、长州、福井等藩，也都設法經由土产品对外貿易来实行增产兴业和发展藩营工場手工业和藩营工厂。到了幕府末期，这种措施发展成为討幕派与佐幕派的直接政治斗争的重要环节。在长州和薩摩等藩，这种趋势于1864年下級武士集团推行藩政改革以后更为加强，对于走向以軍事改革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化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幕府也从1867年以后，在德川庆喜^①领导下，大力推行了以軍事改革为中心的迅速专制主义化的政策。

这里有着明治維新的重要的一面。只就这点來說，維新是力求专制主义化的幕府与强藩两方面的主导权之爭。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像薩摩和佐賀那种反动的領主体制最为强固的强藩能够成为討幕的重要中心。这不是由于領地內从下面起来的商品經濟的发展，而是由于結合了以藩为主体的領地外的商品經

① 德川氏末代將軍(1837—1913)。——譯者

济。这种情形成为这些藩同大阪、江戸等都市的特权商人的利益相结合的根据，又成为维新以后大久保、大隈、松方^①等人的政治立场的基础。

四

开放国禁的影响又表现为物价的暴涨，加上经济的变动，使武士、市民、农民等广泛阶层的人们生活陷于穷困。特别是由于贸易发展，开始迅速造成供求上的不平衡，不久又因国内外金银比价不同而致现金大量流出。1895年(万延元年)改订币制，又把货币改得更坏，就使物价更趋上涨。

这里有着下级武士的贫穷化和攘夷运动加剧的根据。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活动，却有待于直接生产者，即农民和前期无产阶级来进行。在幕府末期，城市贫民和下层农民的“捣毁运动”^②和救世起义扩展到全国各地。1866年(庆应2年)，延及西宫、大阪、江戸、武藏、上野、信州、越后、福岛的大规模起义使幕府的生存遭到威胁，成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

关于救世起义的性质，庄司曾经这样规定：

“商品生产要求从限制其发展的压抑下解放出来，获得经营产业的自由与直接贩卖权，在土地所有制方面，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私人占有权向私人所有权演变，从而发生摆脱抑制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封建地租的要求。这两种要求结合起来发展，就爆发救世起义”(庄司吉之助：《救世起义的研究》，4页)。

① 大久保利通是萨摩藩士(1830—1878)、大隈重信是佐贺藩士(1838—1922)、松方正义是萨摩藩士(1835—1924)，后来都是明治政权的重要人物。——译者

② 城市贫民反对囤积货物(特别是米)、高抬市价或其他富有者的不正当行为而发生的起义，以后改译“市民起义”。——译者

這一規定是否明顯地表現在當時農民鬥爭的綱領中，雖然是有問題的，但是事實證明，在這種鬥爭和要求的骨子裡確實含有上述因素。從這種因素出發，農民和都市下層居民直接向領主或代官^①強行控訴、對村長等村吏、地主和工場手工業經營者實行攻擊或強迫談判，進一步為了實現政治要求，還對領主訂定的經濟與社會方面的限制進行抗擊，並提出民主的村政改革要求。

救世起義的發展，是在這種基礎上釀成的：即幕府末期產生了龐大的日雇工和季節雇工階層，在這種雇傭勞動生長的另一極，又出現了富農、中農經營的工場手工業，即小資產階級。為了適應這種小資產階級經濟的進展，幕府和各藩當局就以城市特權商人為支柱，實行廣泛的產業統制和加強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並把新興的上層“農村商人”吸收到這種產業統制的體系中來，使之成為新特權商人，從而加強了批發行的控制與寄生地主化的趨向。救世起義就是對抗這種封建反動措施，有一部分中農和富農參加，並包含廣大的佃農、貧農而爆發的。

但是救世起義雖然成為明治維新的原動力，卻不能成為變革的主體。成為其主體的，是在動搖的幕藩體制下與人民鬥爭進行對抗的寄生地主、特權商人和與他們有共同生存關係的下級武士集團的聯合勢力。例如中井曾對幕府末期的三井作過這樣的分析：三井雖然看來很強大，卻因封建的反動措施而陷於極端的苦境，又苦於人民的壓力，就以小栗小野介^②為中心，力圖與幕府的財政政策緊密結合，在長州征伐失敗^③以後，又改向薩長勢力靠攏（中井信彥：《商人地主的問題》，載《明治維新與地主制》，241頁起）。

① 德川時代替幕府統治人民和徵稅的地方官。——譯者

② 德川幕府末期的主要負責人（1827—1868），維新後被政府軍捕殺。——譯者

③ 德川幕府曾於1864年及1865年兩次征伐長藩，均遭到失敗。——譯者

这就如实显示了城市特权商人的政治动态和维新政府的阶级基础。由于幕府末期的经济发展没有成熟，因此尽管市场因开港而扩展，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农工分化还是在以地主的批发行资本进行控制为主要形态的情况下进行。

可是领导这一变革的西南各藩的下级武士集团为什么会发挥那样大的力量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和人民运动相对立，但抱有打倒幕藩体制的目的，就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们虽然始终属于武士阶级，但是不仅在领主体制下过穷苦生活，又通过在马关和长崎从事贸易以及炮轰下关事件和萨英战争^①的体验，看到以他们为主体的新的政治方向应当是打倒幕藩体制和建立开明的、统一的专制国家。这就是坂本龙马^②在第二次幕府征伐长州时促成的萨长盟约^③的意义。也就是幕府究竟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上述意义上，讨幕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但是它本身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革命运动。讨幕运动虽然是从尊王攘夷派中发生的，但却朝着与尊王攘夷运动完全不同的进步的方面进展。这种进步性，就是在像萨摩和肥前那种施行最反动的封建体制的地方，也可以从领导人中看到。在长州和土佐那种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的地方，则经由改革派依凭武力掌握藩政和创建独立于藩政权之外的军事组织（海援队）^④而确立其进步势力。这里的下级武士集团和领地内的上层商人的直接结合虽有长足发展，

① 1863年6月英舰炮击萨藩的鹿儿岛，发生短期战斗。后来萨藩派人到横滨和英国使节谈判妥协。——译者

② 原系土佐藩有乡士身分的富商(1835—1867)，早年离藩学习海军，后来参加讨幕运动，在思想和行动上资本主义色彩比较浓厚。——译者

③ 1866年内坂本龙马促成的萨长两藩的盟约，主要内容是军事上和经济上互相支援，以图打倒幕府，恢复天皇权力。——译者

但是高杉晋作^⑤也好，坂本龙馬也好，都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來尋求國家統一和國內市場統一的。

再據關順也的研究，即使在率先討幕，又被認為是商品經濟最發達的長州藩，其發展還在落后階段。這裡從天保年間的大規模起義以來，農民的階級分化不斷進行，由於豪富的農村商人的活動，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也有一定的發展，但是“就農村全局看來，是上層耕農（頭百姓）的上升過程，農村中的寄生地主對於村落的統治還只是例外的”（關順也：《藩政改革與明治維新》，1956年版，118頁）。

在長州藩，掌握富裕中農，即上層耕農這點是藩政中最大的問題，天保年代以來的藩政改革的成敗關鍵也在此。但是農民真的和藩的命運發生重大關係，還是在1863年（文久3年）3月外艦炮轟馬關，使防衛國土成為眼前的現實問題之後。如小郡的柳井田等曾在建築炮台時號召所有階級的人一致貢獻勞力，又在各地進行組織農兵隊。1864年（元治元年）外艦侵入和幕府征伐長州時，這個藩真是十分危急，農民商民都奮起為保衛鄉土而鬥爭。但是以高杉晋作為首的改革派並不是農民的階級利益的代表者，這兩方面到後來還有對立。例如稍後一點，高杉等領導的各部隊同恭順派^⑥發生內訌時，農兵隊就採取消極立場。1865年（元治2年）2月，改革派各部隊勝利，恭順派政權垮台，全藩的意見在各部隊提出的“武裝恭順”主張下統一起來，而武士集團立刻就在各隊

④ 1867年成立，由坂本龍馬任隊長。其特色在於志願入隊者不問藩籍和經費白籍，而且規約中明白規定可以從事經濟活動。——譯者

⑤ 長州藩士（1839—1867），曾於太平天國時旅行上海，回國後組織不限於武士參加的軍隊，成為推翻幕府的主要軍事力量。——譯者

⑥ 主張與幕府妥協的保守勢力。——譯者

之上設立由武士組成的干城隊，限制各隊的隊數和兵員數額，加重軍紀，并派上級藩士擔任各隊總督，這就顯示了各隊的階級本質。儘管如此，由於各隊是下級武士所首倡，又得到充任鄉士^①的富商豪農支援，由他們毅然改革封建的身分制，利用農村過剩人口而組織的軍隊，所以能夠不受封建身分制的限制，領導者們的見識也高，故能成為長藩戰鬥力量的中心。而農民隊却是和改革派各部隊有區別的以中農階層為核心的忠實的自衛隊，但也沒有成長到縱令違抗藩命也要繼續參加倒幕運動的地步。

這種關係說明了明治維新的性質。即在幕府末期，長州藩儘管由於馬關貿易和購買外國武器而十分關心市場，但構成幕藩體制基礎的封建的自耕農（本百姓）的分化尚未成熟。雖然他們已經作為小商品生產者而轉為中農，並已進行分化，但是不用說資本主義性質的發展還落后，就是產生寄生地主的分化作用也沒有發展到超越藩制的程度。貧農和工資勞動者增加的趨勢也沒有深入到破壞鄉村秩序的地步。長州藩的這種性質，使具有防止貧農和日雇工階層發動救世起義的農民統制力的中農階層和盤踞其上的富商豪農成為變革的階級基礎，改革派武士的專制主義性質的富國強兵政策就在這些階層的支持下推行。

1866年（慶應2年）6月，幕府大軍在第二次征伐長州之役中敗北，這是討幕派勝利的一個大轉折點。7月將軍家茂逝世，8月頑固地主主張公武合體的孝明天皇也死去。那年的農民起義和市民起義與1867年的“還不好嗎”運動^②的狂潮使封建政權陷於癱瘓

① 在鄉經營農業，而有武士身分的地主。——譯者

② 1867年8月起，廣大地區的人民自發地糾集成群，搗毀富戶，並出現狂歌狂舞現象。由於歌詞中都有“還不好嗎”一句，故被稱為“還不好嗎”運動。——譯者

和混亂，德川庆喜终于在10月奉还大政^①，接着薩长討幕派于12月发动政变成功，1868年1月的鳥羽伏見战争^②就决定了大局。

由此可見，明治維新是在討幕派武士集团的指导下，以統一国内市場和确立专制主义政权为目的而推行的。由于这一变革是以先进地区的寄生地主制的发展和新旧特权商人为阶级基础而进行的，所以最初就含有反革命因素。随着新政权的成立，旧的幕府体制就垮台了。而維新政府的政策，也不外是从討幕派的阶级利益出发来推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

① 1867年10月14日德川第十五代將軍庆喜被迫辞將軍职，并在表面上請求將統治权交还天皇。——譯者

② 1868年1月德川庆喜和討幕派在京都附近进行的战争，結果討幕派获胜。——譯者

第二章

明治維新和資本的原始积累

1. 維新政权所施行的經濟变革

—

大家都知道，关于明治維新的政治性质，曾經引起长期的論战。按照本书的性质，我想避免深入討論这个問題。就我自己的看法來說，我一直认为明治維新是导致专制主义天皇制胜利的变革，同时这一胜利又成为日本資本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关于天皇制同資本主义的关系，我曾經这样写过，而且現在还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

“天皇制建立在半封建的基础上，却强力地培养資本主义，使之发展，并起了补充和代替的作用，因而在不到半世紀的期間就建立起壟断資本主义。只是由于天皇制的支持，資產階級才能积累巨資。地主則适应資本主义的发展而完成了寄生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在半封建的基础上的資本主义的国内矛盾促进了对外的軍事侵略，早就露头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更加强了专制主义的国家机构。但是資產階級虽然是这样畸形和落后的，而資本主义的发展却使他們在政治上的比重迅速增大，因此在政权中，統治階級内部的傾軋和改組就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而进行，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意义和政策在資本主义的各个阶段中发生变化。从这里可以看

出天皇制中专制主义的发展,和作为变种的世界历史意义”(守屋:《天皇制的意义及其基础》,潮流社;《經濟学全集》讲座,1949年版,47頁)。

具有这种性质的天皇制政权,从經濟发展阶段來說,却是在以落后的西南各藩的下級武士集团为主体的討幕派的主导下成立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藩从天保年代前后以来,能够把本藩的商品經濟发展控制在藩的体系下面,并早就发展了以大阪为中心的藩外商业。他們不仅傾向于背离幕府,而且从开放国禁以来,这些藩在政治和經濟上都面临迅速发展的封建危机,在这种混乱局面中,領導藩政的人很早就能認識到在十九世紀后期的世界資本主义世界中,維持旧的割据制度是沒有意义的,这对于他們的政治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点上,西南各藩和东北各藩之間是有差別的。而且不止是內部的經濟发展阶段的差別,更大的还是各藩所处地位所造成的差別。当时幕藩体制的腐朽,在各藩都已經达于极点,如果不設法打开局面,就不可能維持他們的階級利益本身,特別是西南各藩接触了外国資本主义,更能深刻体会到这点。因此这些强藩就联合起来打倒幕府政权,并接着成立統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

因此明治維新政权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課題,就是零星地、妥協地实行适应新体制的变革,以巩固經由上述过程成立的政权的基础。那就是一面廢止領主的土地所有制,一面建立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一面以商业資本、高利貸資本为基础,一面培植特权的、軍事的資本主义生产方法。劳农派^①学者认为这一变革不代表产

^① 一部分原曾主張解散共产党組織的“解党派”分子和另外一些知識分子于1927年12月发行《劳农》杂志,以后还发表不少著作,对日本資本主义和日本革命性质提出不同于共产国际和日共的見解,一般称之为“劳农派”。——譯者

業資本的利益，而始終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推行的。但是只要這一变革得到經濟发展的支持，就一定會在與半封建的商業資本的利益相結合的同時，朝向全面發展資本主義前進。因此這一变革能夠作為日本資本主義的出發點，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這個意義上，維新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就對舊的封建體制採取了與前不同的方針。但是這個過程是漸進的。1868年10月，政府規定“藩治職制”，劃分藩政與藩主的家政，把藩政負責人由家老改為執政和參政，並認定這是朝廷的事，即成為公職機關。從1869年6月的版籍奉還^①起，開始正式着手廢止封建體制，對各藩施行削減權力的干涉行動。又經過1870年9月的藩制改革，就在1871年7月斷然實行廢藩置縣，於是舊幕藩體制完全瓦解，明治政權的新體制就完成了。

“將軍、各藩藩主和他們的家臣的基於位階制的土地所有權被新政府取消。但是這一措施，對於幕府和進行抗拒的各藩雖然通過強制方法，而結果還是經由極端妥協的方式，對於其他大部分的藩，則差不多全是經由妥協方法實現的。……通過這一過程，諸侯及其家臣集團，在藩內原有的‘基於人身依附關係的土地所有權’，即在征收地租和行政、軍事上的廣泛權力就完全喪失。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即征收地租的權利，就轉換為新政府從有權自由任免的地方官依據地主所有制所征收的租稅和征自作為新政權支柱的自耕農的租稅中支付的單純的‘家祿’”（飯淵敬太郎：《日本信用體系前史》1948年版，152頁）。

但是上述過程的實現還是非用強力不可。這首先因為在各藩的割據體制，即領國制統一為中央集權政體時，核心力量是薩摩、

^① 即各藩藩主將原來領有的土地和人民交還明治政府。——譯者

长州、土佐、肥前等所謂勤王各藩，而这些藩往往享有优先于一般的藩的利益。廢藩置县是依靠从薩、长、土三藩調集东京的一万兵力（“亲兵”）为背景实行的。接着設置东京、大阪、鎮西、东北四鎮台和八个分营，解散各藩藩兵，即断然实行兵权統一。

廢藩置县以后，旧武士階級完全成为廢物，而出現了新体制所需的、主要是选自旧武士階級的龐大的官僚队伍。由于强有力地培植这个体制是新政权的課題，所以把权力集中于以常备軍和警察为中心的官僚便成为此后政府的最重要的政策。1872年11月施行了征兵令，同时按照县治条例，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充当藩知事。接着以实行改革地稅为前提，1873年，允許家祿100石以下的武士交还俸祿，用現金和公債偿付四年至六年的俸額；1874年，規定上項办法适用于家祿100石以上的武士，并发行秩祿公債；1875年，又規定家祿改为金祿。这是强迫解散由于发布征兵令而完全解职的各藩家臣集团，接着在1876年发行金祿公債，使金祿轉化为买卖自由的公債，武士的家祿就溶消在虚拟資本的一般流通过程之中。反抗这种解散旧武士集团措施的士族叛乱，一直繼續到1877年的西南战争^①，終于被鎮压了下去。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多少有些反抗，但与变革的重大性相較，旧封建統治者真差不多是唯唯諾諾地听从的。由于旧封建体制是那样脆弱，所以大部分的藩陷于財政破产、政治混乱和旧統治者束手无策的境遇。新政府的改革倒全面地解决了成为他們肩上的沉重担子的这些問題：即米收获量不稳定、农民反抗、藩內土木事业經費与扶养武士等危險和責任。也就是由政府来保证旧封建統治者的經濟生存。赫伯特·諾門說：

^① 由旧薩藩武士西乡隆盛領導的反明治政府的战争，結果政府获得胜利。——譯者

“在日本，封建領主丟掉了从农民征收租稅的土地所有权，却經由家祿的处理，把新的資本化了的財富投資于銀行、股票、产业、土地和不动产，因而成为与財閥携手的金融上的有力人物。……明治变革，在极其现实的社会契机論的邏輯所产生的狹隘的意义上，可以用麦克拉倫的这句话来归纳說明：‘政府在使用武装力量向封建貴族示威的同时，至少又用金錢上的利益来收买諸侯。即用威胁和利誘方法来征服諸侯^①。’但是明治变革并不停留在这里。……諸侯交还家祿，一方面象征旧統治階級同主要地依靠商人和地主支持的新政府之間的政治妥協，另一方面还代表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利貸者、地主、商人、金融业者和旧諸侯的利害互相融合、滲透和凝結起来，結成渾然一体的集团”（諾門[E. H. Norman]：《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1947年版，147—150頁）。

旧封建統治者的階級利益，只有依靠上述改革才能維持。也可以說是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公債政策表現在日本的特別类型。总之政府在进行改革时，老是使这些統治者得到最大限度的优先利益。对于他們用公債投資設立的第十五国立銀行和日本铁道公司給予无微不至的保护和特权；在北海道、栃木这些地方，还把政府所有的土地廉价卖給他們，使之成为大地主。在确立他們的經濟地位的基础上，1884年頒布华族令、1886年頒布华族世襲財產法、1889年頒布貴族院令，巩固了他們作为皇室屏藩的特权地位。1887年，在收入2万日元以上、納稅500日元以上的高額收入者104人中，旧藩主达35人。除岩崎^②另作別論外，毛利、前田、島

① 此語見麦克拉倫(W. W. McLaren)：《日本政府文件》(Japa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第2頁。——譯者

② 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岩崎彌太郎，以后岩崎一家一直是三菱康采恩的主人。——譯者

津、德川、池田等旧藩主都名列前茅，占有绝对优越的地位。

維新变革中的重要措施，是取消旧的土地領有关系，而其特征则为进行取消时尽量維持旧領主的特权。对于旧領主以外的武士階級，也可以說是采取了同样的政策。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旧武士階級的救济和轉业工作。据 1873 年的統計，旧武士階級有 1,548,568 人(士族戶数为 399,713 戶)，到 1876 年为止，給他們的公債，計有秩祿公債 16,565,850 日元、金祿公債 173,844,000 日元，占政府岁出的 36%，成为农民的租稅負担。但是每一士族所得的金額却很少，从这点來說，一般武士就和旧領主不同。他們的生活极为穷困，并特別以站在旧幕府方面的东北各藩为甚。如中村吉治所例示，在仙台藩，原来領取 100 石以上的“大番組”藩士，經過削封和藩制改革后降到 11 石 2 斗 5 升，折成金祿 34 日元 23 錢 7 厘^①(第七十七銀行：《七十七年史》，1954 年版，12 頁)，因此士族非常贫穷和心怀不滿，以致发展为武力反抗。對他們施行救济和授予生产資金(“士族授产”)就成为政府緩和其反抗的紧急措施。

政府采用了种种方法来实行“士族授产”，如給予生产資金、廉价发卖开垦地、貸放創業基金、劝业委托金和劝业資金，以及經由国立銀行来保存公債等。此外救济士族还是主張侵略朝鮮和侵攻台灣的一个重大原因。

尽管如此，封建体制瓦解后資本主义的发展終於使武士階級中很多人沒落，“士族授产”大多数归于失敗，而致被譏为“士族的买卖”。給士族的公債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只起了資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作用。发出的公債經過通貨膨脹和通貨紧縮的反复过程，大多丧失，大部分武士淪落为另細职工和无产者。

^① 日本貨幣单位，每 100 錢为一日元，每 10 厘为 1 錢。——譯者

二

虽然如上所述，封建的土地領有制被廢止，武士階級被解散，但是明治政府的財政基础却依然是征自土地的封建貢賦。政府最早的財源是沒收幕府和奥羽地方各藩的領地900万石，減去府中藩主德川氏的70万石^①和賞典录^②100万石后还有730万石。接着实行廢藩置县，把征收租稅权集中中央，而基础依然是原有的封建貢賦。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感到有必要將地稅形态由实物改为货币。这不仅是为了适应日本货币經濟发展的需要，而且为了抵抗当时資本主义列强的外来压力和把幕藩体制迅速轉变为近代的国家形态，也須确保必要的货币。为了实行这一轉变，就施行了准許农民自由从事商业性农业和在法律上承认土地买卖自由这一大变革，并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了与廢止封建領有制并駕齐驅的改革地稅的大事业。

大家都知道，地稅改革經過了这样的过程：即1870年神田孝平^③提出“改革田租建議”、1871年廢藩置县后大久保利通和井上馨^④向正院^⑤建議改革地稅、同年东京府境内发行地契、頒布租稅上繳令、准許在田地上种植任何作物、1872年解除永远禁止田地买卖禁令、发給买卖和持有土地的文契、1873年7月公布改革地稅条例。在这个过程中，从維新派各藩单独实行的藩政改革开始，还有

① 德川庆喜交出江戸后，政府令德川龟之助继承德川氏，在静岡(府中)封賜土地70万石。——譯者

② 給予明治維新有功人員的封祿。——譯者

③ 幕府时代即以西学者著称(1830—1898)，維新后任征土、文部少輔等职。——譯者

④ 长州藩士出身(1835—1915)，維新后任外务卿、大藏大臣等职。——譯者

⑤ 明治4年(1871)成立，天皇在此与大臣們处理国务，1877年廢止。——譯者

而可以說是站在确认地稅負擔者的立場來承認土地所有權。從而把領國制下隔絕的農業改為在全國規模上互相關連的農業，并依據由此發展起來的地主制而建立以地主和政商^①為媒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天皇制的成立就成為在日本強行扶植資本主義的重要過程，因此改革地稅既使天皇制和地主制發生不可分割的關係，又使資本主義能在這個基礎上迅速發展。關於在改革地稅過程中成立的地主所有制的結構，山田盛太郎等曾作以次的說明：

“試觀地稅改革法案所造成的地主剝削所得的米量的變化情況：從德川時代末期到改革地稅時期為止，各種稅捐（地稅、村用捐）由每反 0.690 石（收穫量 1.871 石的 37%）減到 0.544 石（收穫量 1.600 石的 34%），而地主剝削所得却由每反 0.447 石（24%）增至 0.544 石（34%），同時耕作者——佃農所得則由每反 0.733 石（39%）減到 0.512 石〔由於其中包括 0.24 石（15%）的種子和肥料費，所以佃農淨得的米就只有 0.272 石（17%）〕，這就可以顯示變化的趨勢。這樣地主剝削所得就比佃農所得米量多一倍，鞏固了地主的地位，從而成立強固的寄生地主範疇，地主制的結構就完備了。加之現金租稅與實物佃租的矛盾使地主剝削所得隨米價漲落而增減，並成為地主制發展的根據。再看一看地主用剝削所得交納租稅時在形態上所起的機能性的變化：在德川時代末期，主要的形態是由佃農直接交納租稅、桑捐和佃租，按照改革地稅的標準，就改為由佃農全部以實物形態向地主交租，地主將其中一部分以貨幣形態交納租稅和村用捐，其餘留作地主剝削收入。因此地主的機能加強，政府也一定會對作為交納地稅者的地主採取維護政策，而且這個

^① 與政府有勾結的特權商人或資本家。——譯者

机能甚至于掌握了全部社会机构的樞紐。总之地稅改革所以創立了地主制和树立了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主資格——地租范疇，无非是根据这两种剝削关系：即屬於实物地租范疇的‘实物佃租’（总收获量的68%）和具有半封建租稅性质的現金租稅（总收获量的34%）”（土地改革記錄委员会：《土地改革顛末概要》^①，1951年版，14—15頁，还可以參閱山田盛太郎亲自写的《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載东京大学經濟学部：《战后日本經濟問題》，1949年版，144—146頁）。

从以上的說明就可以知道，改革地稅确立了地主的地位，而农民的封建农奴的地位却差不多全未改变。大部分处于村社体制下的农民，毫无准备，就从实物經濟被投入貨幣經濟，并苦于租稅和高利貸，生活更为悲惨。許多关于明治初年农民起义的資料就能說明这点^②。特别是1876年12月茨城县那珂郡三十个村子的起义和同年同月三重、爱知、岐阜、堺四县的大規模起义曾迫使政府于1877年将地稅率由百分之三减为百分之二点五，可見它的力量是不小的。虽然很多地主也参加了运动，可是以后直接站在最前列的，还是作为政府的基本对立者的农民。尽管这样，由于改革地稅强行取消了純粹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就使富裕中农增强經營农耕的意願，并使农业生产力在更加广泛的市場基础上发展，又成为农民团结起来反抗政府掠奪的基础。

这一改革从1874年12月开始正式实施，1876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以上，全部完成在西南战争結束后的1881年。这一改革不仅公开承认乡士的地主式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典当与抵押的債权，还

^① 此书系山田盛太郎主編。——譯者

^② 关于明治初年的农民起义記載，詳見土屋乔雄、小野通雄編：《明治初年农民騷抗录》，勁草书房，1953年版。——譯者

在实施中損害了永久佃耕权，把寄生的佃租攫取者片面确定为原系一地两主^①的土地的所有者，村民的共有地，則多数被政府沒收或发卖。当时在先进地区，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已經在相当程度上展开，在里日本^②的单一稻地区，也已經形成酒田的本間、新潟的市島和島根的田部那样的拥有田地千町^③的大地主，即事实上产生了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革地稅法案就公认和加强了这种地主的地位。同时在許多地区，“性质不同的典当佃耕关系还占很大的比重”（永原庆二：《改革地稅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戴宇野弘藏編：《改革地稅的研究》，下卷，1958年版，154頁），而改革地稅法案还在这种落后地区承认全国性的地主土地所有权，根絕旧的領有制，确立新政权的基础，并成为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契机。

由此可見，廢藩置县和改革地稅实已成为变革旧幕藩体制、使明治政权作为专制主义的近代国家而进展的基础。随着这两項改革，还完成了种种次要的近代改革。从1870年到1873年，这些改革推行很快，除上述土地方面的措施外，还全面进行了以下各項：在法律上承认士农工商平等、廢止封建服飾与封建关卡、排斥佛教与儒家学說、改革历法、解放秽多^④、迅速輸入西洋思想和技术、承认居住与就业自由等。这不仅是政治改革，并且是破坏了原来作为經濟基础的封建村社体系，改变为以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小农的零細經營为基础的地区性的地主控制的村社体系。在这种情形下，村社被地主掌握，地主的控制束縛了所有的村落成員，迫使佃耕农民成为毫无权利的人。又因地主是以一定程度的农民商品經濟

① 即所有者与有耕作者。——譯者

② 日本本州島濱臨日本海的地方总称。——譯者

③ 又称町步，日本面积单位，合9.917平方公里。——譯者

④ 从諳在日本被賤視的人民（“部落民”），維新后虽在法律上被解放，而实际上仍受歧視。——譯者

发展为前提而出現的，所以他們在土地所有权上和对流通过程的控制就达于几个村落的村社，形成“扩大的寄生地主的統治范围”（大石嘉一郎：《我国地方自治制的成立》，载《商学論集》，第24卷，第4号，1956年3月版，120頁），基于这种地主統治，市町（相当于中国的鎮。——譯者）村制就成为官僚国家的統一体制的一部分。以后山县有朋^①为了应付人民在自由民权运动^②中提出的地方自治要求，曾以普魯士的制度为范例，成立属于官僚統治体系的地方制度，实际是这种体制的发展。

因此改革地稅这一措施不仅构筑了明治政府的財政基础，还建立了作为各項改革的根基的专制主义統治的物质基础。同时这个改革又使純粹封建的土地所有机构瓦解，使农业生产力的“成为全国范围的构造，并开始在各地区形成同过去阶段不同的体系”（山田盛太郎：《日本农业生产力的結構》1960年版，11頁）。

三

政府还认为有必要来統一货币制度和充实流通与信用机构。对于以金祿公債和現金地稅为其权力基础由政府說来，这些事业是必須举办的。

如前所述，在德川时代末期，日本的金銀銅三种現貨的比价与国际比价不同，結果不仅洋銀流入和黄金流出，而且随着幕府权力的削弱，各藩紛紛私鑄贗币，增发藩票，致使货币制度混乱达于极

① 长藩武士出身(1838—1923)，在明治政府历任陸軍卿、內务大臣、內閣总理大臣等职，是日本建立軍国主义体制的主要人物。——譯者

② 自由民权运动以1874年要求成立民选議會为始，逐漸得到广大群众支持，1880年成立的国会期成同盟有會員13万人，迫使政府約期召开国会。但因有产者分子动摇，运动分裂。以貧农为中心的人民大众坚持了斗争，发动起义多次，到1884年才被鎮压下去。——譯者

点。因此外人为了貿易上的必要，也曾要求坚决实行統一貨幣和准許國內外貨幣掉換与自由鑄造，并成为 1866 年簽訂改稅条約时的重要問題之一。

統一貨幣制度，意味着把权力基础放在貨幣上的明治政权打根基的重大問題。政府在 1868 年夺取政权后，立刻把旧貨幣和鑄币需用的金屬当作国有財產，收归公有，着手准备統一币制。但是当时討幕尚未完成，政府財政困难，軍費不足，因此发行了太政官票等几种不兌現的紙币，强制通用。例如一面禁止使用以大阪为中心而流行的銀票，一面設立商法司，用紙币收买物产，又用暴力强迫用紙币交換現金。因此通貨信用更加丧失，私鑄贗造，发行藩票和私票的行为更加猖獗，币制越来越陷于混乱状态。但在这种局势中，政府还是加强采矿政策、严禁私售鑄币需用的金銀銅等金屬，并自行收买。

統一貨幣，在廢藩置县，政府确立了基础以后，才朝着解决的方向进展。必須政权确立和政府持有的鑄币金屬增加，才能統一币制。为此政府于 1871 年頒布新貨幣条例，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又壟断矿山、扩充官办矿业，并开始向政商发卖，以配合上一政策。1872 年的矿山須知书和 1873 年的日本矿法确定了全部矿山归政府所有的原則，在这个基础上，还施行了征收現金地稅。

由于新貨幣条例的頒布和鑄币制度的成立，政府的紙币才有了基础。同年发行新紙币来兌換太政官票等旧紙币，到了 1877 年前后，就大体上实现了鑄币和紙币的統一。但因当时貿易上使用的墨西哥銀元在通商港口的流通貨幣中占有主要地位，所以新貨幣条例在一定限制下許其通用，并发行与墨西哥銀元同質同量的一日元銀币。由于以后世界銀价迅速下跌，又发生了洋銀流入和黄金流出的現象，結果于 1878 年将貨幣制度訂为金銀复本位制，

事實上打算實行銀本位制。又在推行公債制度的過程中，紙幣制度復趨混亂，現金租稅由於通貨膨脹而減額，故如後所述，政府又陷入財政困難。至於實現鑄幣制度與紙幣制度相結合，在中央銀行制度下統一管轄，並依據近代的貨幣制度，確立征收現金的租稅制度，則還需要十年歲月。

其次，確立信用制度和充實流通機構是與政府的貨幣政策相關連的，而且在財政上和達到穩定政權的目的上都具有重要意義。1868年，政府在發行太政官票的同時，為了促進其流通，曾按各藩的租稅額，每一萬石借與太政官票一萬兩，又在會計官^①中設商法司，策劃以京都大阪等處的特權商人為對象，用太政官票來推進商業和稅政，這些嘗試都在幣制紊亂和社會不安的情況下歸於失敗。1869年，政府以管理對外貿易為目的，成立通商司，即在政府內設立具有包括貿易、金融、海運、商業等在內的廣泛權限的中央集權的統制機關。其下設立匯兌公司（bank 的譯語）和通商公司。匯兌公司運用以太政官票為中心的政府借款、前期的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家的投資和作為兌換券而發行的公司票為資金，向通商公司及由舊幕府時代的特權商人行會和專賣所等改組而成的商業公司放款。通商公司則除對外貿易外，還以國內商品流通的中介工作、介紹匯兌公司同各公司之間的金融往來和輔助使用輪船的海運為主要業務。但是這種機構不僅以舊藩體制的繼續存在為前提，而且資金多係以近乎無息的條件向政府借來的，又有無限制的紙幣發行權，並且不是以商行，而是以舊藩主和士族為優先來往對象，經營極為鬆懈，因此在1871年，就留下很大的虧損而停辦了。

但是當時幣制混亂，特別是現金與紙幣的價值相差很大，紙幣

^① 當時的政府機構名稱。——譯者

流通很不流暢，在財政經濟上发生重大障碍，因此政府急图收回发出的紙幣。針對着這個問題，又当廢藩置县之际，政府从貨幣政策和公債政策出发，都有必要讲究新的对策。1872年，政府公布国立銀行條例，依据这个條例創設以政府公債为抵押来发行兌換現金的紙幣的銀行，以图解决這個問題。又从改革地稅后由征收谷米改为征收現金这点来看，这种对策也是不容延迟的。

这里不打算詳述国内銀行條例的內容。其主要內容是：資金的十分之四是充当本位的現金儲备，以备兌換发出的紙幣。另以价值相当于資金的十分之六的政府紙幣交納大藏省，領取同額的公債券，再以这笔公債为抵押向大藏省領取銀行紙幣，負責发行。根据这个條例，东京第一国立銀行等四行都受到政府的鼓励，三井、小野等行則系用旧幕府时代以来的豪商、豪农或武士階級积累的財富設立的。它們替政府管理出納，依靠經理公款和經收租稅賺取利潤，并以承受官厅与公立机关存款和举办高昂利息的长期借貸为主要业务。

国立銀行的重要利源是銀行券的发行权。但因政府要收回紙幣，受到严重的限制，所以几乎沒有得到什么利益。又从1874年前后起，由于政府增发紙幣，現金与紙幣价值的距离增大，現金因兌換紙幣而不断流出，致使銀行营业无法按照原條例进行。政府只得許可銀行用銀行券作抵来借政府紙幣。因此銀行券不能通行，政府又用政府紙幣买回卖给銀行的公債券，結果收回紙幣的目的完全不能实现。

1876年公布金祿公債條例，实行家祿公債化后，发行了巨額公債，因而产生价格暴跌的危險。这在治安上也是严重問題，所以在政府的財政方針上，維持公債价格比收回紙幣还要重要。政府的銀行政策也和公債制度結合起来，实行轉变。如在同一年內就大

大修改了國立銀行條例。

這次修改的結果，廢止了以資金的十分之四充兌換儲備的規定，只儲備相當於資金十分之二的兌換基金，余下的十分之八是公債券，將其交存政府，就可以發行同額的銀行券。這樣銀行就容易開辦了。由於廢止了現金兌換制度，國立銀行變成發行不兌現紙幣的銀行，銀行可以從發行銀行券獲得巨利，於是用華族、士族、高利貸主和地主的資本開設國立銀行就成為一種流行的事。從修改銀行條例到1879年，一共設立了國立銀行153家，資金總額3,773萬日元，發行紙幣總額3,211萬日元。以後由於不兌現紙幣增加，使通貨膨脹加劇，就不得不下令停止開設國立銀行。

在開設銀行方面，除國立銀行外，從1871、1872年前後起，還設立了依靠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類似銀行的公司。其中還有與國立銀行不同的、以行使政商資本的機能為目的的強有力的組織，如三井組和安田商店等。但在1876年修改國立銀行條例後，這些組織也能取得銀行的名稱，因此1876年，三井銀行首先成立，資本達200萬日元，1879年停止開設國立銀行後，從安田銀行起，普通銀行和儲蓄銀行也有所增加。這些銀行作為借貸資本，目的在於剝奪中小地主、農民和小市民的收入。但除三井、安田外，大多規模很小，帶有投機或高利貸的性質。1880年，又以通融貿易資金為目的，根據國立銀行條例設立了橫濱正金銀行，政府出資三分之一，並對資金運用的長期性和危險性予以極大的保護。

現在要談一下這些銀行和後來財閥發展的關係：這些金融機關在成立初期從事的最重要的業務是經理政府公款。明治政府在剛剛作為中央集權政府成立時，還無力立刻成立本身的金融機關來經理公款，就在1868年設置匯兌員，開始利用舊幕府時代以來建立了信用的大商人三井組、小野組和島田組來經理國庫款的收支

和汇兌。在經理公款的人中，經理各县公款的叫做府县經理員。中村吉治曾在第七十七銀行的《七十七年史》(34頁起)中以当时承办东北十一县租稅的小野組为例，說明这些巨商获得龐大利潤的情形。据他指出，小野組收集十一县的租米，再卖出去，把錢交給政府。从收取租稅时的米金換算率与出賣米时的米价之差，获取巨利。小野組对府县公款經理业务最为注意，但三井組也从1873年到1875年之間迅速扩展此項业务。

国立銀行設立后廢止了汇兌員，公款出納业务改交国立銀行办理。但因銀行開設甚少，业务不振，所以原来的三井組等还是繼續營業。可是过去規定承办公款經理的商家要交存相当于經營款項三分之一的担保金，从1874年起，需要相当多的担保金，致使小野組和島田組破产，三井組也只是幸免于难，后来三井組和安田商店就在新規則下經理公款。小野組等破产，是因为极力扩充府县公款經理业务，致須交存很多的担保金；又大規模做米生意，任意周轉現金之故。而三井銀行和安田銀行之所以能在創立时就有力量，是因为大部分存款是政府所存，这样財閥銀行的地位，由于同国家相勾結，在明治初期就已經开始树立了。

这些巨大政商还与国立銀行的設立发生关系，如三井与第一国立銀行、安田与第三国立銀行、鴻池与第十三国立銀行等。但在1880年时，国立銀行的股票持有情况，是华族44.1%、士族31.9%、商人14.8%、农民3.4%、其他5.7%，即旧武士階級远远領先。这是因为許多国立銀行是当作保全旧武士階級持有的公債的机关設立的，例如其中最大的一个，即1877年以資金1,782万日元創办的第十五国立銀行，即于西南战争时以1,500万日元的紙币借給政府而得到許多特权。这就最为露骨地显示政府的公債政策与国立銀行制度相結合的意义。

虽然如后所述，国立銀行制度还有改变的必要，但是通过这个制度，日本的金融信用制度是有了很大的进展。又因国立銀行都采用股份公司組織，扩展到全国各地，所以在普及股份公司制度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2. 資本主义的导入与国内市場

一

自从开港通商以来，日本变成欧美資本主义輸出商品与資本的市場和掠夺原料的地方，陷入半殖民地的危机。列强經由不平等条約，强迫日本承认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率，并攫取外人居住地的統治权和軍隊駐扎权(英、法)，美国还夺取了横濱、新桥^①之間的铁道建筑权。依凭这些权益和大炮威力的掩护，欧美各国的廉价商品就大量涌入，国内的政爭也与英法的殖民主义野心相牵扯，而受他們的操纵。

明治維新，尽管作为革命，是半途而廢的，但是在对付民族危机上，依靠人民的反抗，总算成为实现民族独立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是应当对它的历史地位从高评价的。平野义太郎和井上清已經明白指出了这点。

“这次改革却推进了在封建制度之下的艰苦斗争中萌芽的日本人民的近代民族的成长，限于在这一点上，新政府就不得不提出‘清除积弊’和‘百事一新’的諾言，并且多少施行了一些。使‘王政复古’不只是宮廷政变，而发展为不怕流血的暴力变革，并且随着廢止幕府制，又廢除了大名武士的土地人民領有制。接着于1871

^① 东京的地名。——譯者

年廢藩置县，即廢止封建的分裂割据体制，并廢止或整理旧大名、公卿、武士的家祿、身分制与其他封建特权，改革封建租稅制，扶植近代工业，和实行其他一系列的近代改革。同时又使日本的铁道修筑权毕竟沒有让渡給外国，从幕府末期1863年以来以保护侨民为名在橫濱驻扎的英、法军队于1875年完全絕迹；并使橫濱、东京、神戶、长崎等处的居留地(租界)不致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上海、天津那样的外国租界。”(井上清：《日本現代史》，第1卷，1951年1—2頁)①

政府对幕府时代被外国强加的种种負担和侵略提出了抗議，确立了北海道的領土权，收回了小笠原群島，又曾扣留秘魯的卖奴船，救出将被当作奴隶出卖的中国难民，接着派岩仓②、大久保、木戶③等为特使出国进行修改安政条約的交涉。政府还承担了幕府和各藩欠下的各种形式的債務和賠款，虽然有相当的困难，总算清理完毕。此款包括从幕府接受的旧債 588,000 余日元，从各藩接受的旧債 400 万余日元，賠款 172 万余日元，大約在 1867 年至 1875 年之間全部还清。

但是在明治年代以后，半殖民地的危机还是严重地存在。其法律根据是安政条約等不平等条約。維新政府从成立初期起就致力于修改条約，但沒有成功。政府的修改案是照旧承认領事裁判权，只打算多少得到一点关税自主权。1872 年派岩仓等前往欧美之行，并沒有达到这个目的。1873 年外相寺島宗則的提案，也因

① 見本书中譯本，三联书店 1956 年版，13 頁。——譯者

② 岩仓具視(1825—1883)，京都朝廷公卿出身，后为明治政府主要领导人之一。——譯者

③ 木戶孝允(1833—1877)是长州藩士出身，后为明治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譯者

英国反对而没有結果。政府作了一切努力来避免外人干涉內政，这点大体上是成功了，但是为了收回橫須賀造船所、筹措貨幣司經費、建設铁路和处理武士家祿，却不得不按照殖民地式的条件举借总数达 1,750 万日元的外債。为了偿付这些外債的本息，每年流出巨額現金，使政府深感痛苦。而大致說来，外資輸入能够止于此数，却显示国家經濟独立所受的損害是被抑止在这个限度上了。

現金流出所造成的經濟危局，与其說是由于輸入外資，还不如說是由于外国資本主义的廉价商品流入而引起的年年入超。明治初年的貿易进展情况，見第 1 表。

第 1 表 明治初年貿易表 (單位: 千日元)

年度	輸 出			輸 入				合 計	出 超 或 入 超
	總額	生絲	茶	總 額	棉 紗	其他棉 制 品	砂 糖		
1868	15,553	6,253	3,582	10,693	1,240	2,543	886	28,247	+ 4,960
1872	17,027	5,205	4,226	26,175	5,335	4,892	1,690	43,201	- 9,148
1877	23,349	9,627	4,375	27,421	4,085	4,211	2,794	50,769	- 4,072
1881	31,059	10,647	7,022	31,191	7,264	5,052	3,732	62,250	- 132
1882	37,722	16,232	7,030	29,447	6,562	4,232	4,446	67,168	+ 8,275
1886	48,876	17,321	7,723	32,168	5,905	2,325	5,570	81,045	+ 16,708

根据东洋經濟新报社:《日本貿易精覽》1935 年版編制。

如上表所示，虽然貿易从維新以来确有发展，而至 1881 年(明治 14 年)为止，除 1868 年和 1876 年两年外，年年入超。从 1868 年到 1881 年，入超額共达 77,644,000 日元。从 1872 年起，入超使金銀不断外流，到 1881 年止，共达 70,799,000 日元。就貿易內容來說，輸出貿易的中心，在这二十年中都是生絲和茶，主要輸出国是美国、法国和中国等。輸入貿易的中心是棉制品、其他纖維品和糖类的主要輸入国，一直是由英国遥遥領先；其次是中国和法国。生絲輸出素来以倫敦为中心市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里昂成为中心

市場，法国便成为主要輸出国。1884年后，美国又超过了法国。

以輸出貿易为中心的日本商品生产，如絲、茶等业，就以海外市場为对象而进一步扩展。又与輸入貿易相关連，一方面原有产业与輸入商品发生竞争，另一方面如国内棉布生产业用輸入棉紗做原料实行扩展所例示，以国内市場为对象的商品生产也扩大起来。但因貿易造成的年年入超，不仅使日本迅速变成世界資本主义市場的一部分，并且确实淪为欧美先进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經濟从屬国和半殖民地。

这种貿易对日本究竟有什么影响，当时的文献曾作以下的說明：

“自我国进行对外貿易以来，輸出入就发生差别，其利大多归于外国，我国只好运出现金来补偿。于是現金外流之势逐年加甚。官民均引以为患，力謀挽救。但是輸出朝增，輸入亦随之夕长，所謂挽救之策，未尝見其实效，以致現金耗損至于今日之甚。我国之患，实无更甚于此的了。又占輸出价額百分之五十三弱的为生絲与茶二物，占輸入价款百分之四十九弱的是棉和砂糖两品。可見最使我国貿易感到困难的莫如外产棉糖，使貿易保持平衡的莫如絲、茶”（劝农局、商务局：《明治十三年棉糖共进会报告》，第2号，1880年版，1—2頁）。

政府对現金流出最感痛苦，因为紙币价格由此下落，使財政更为艰困。因此政府想尽方法来奖励輸出和防止輸入。所以采用殖产兴业政策，不仅有軍事意义，在經濟上也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二

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事业，首先是适应政府的常备軍和警察的集結而施行的。山田盛太郎写道：

“这种常备軍和警察网就是支撑广大的軍事和半农奴制官府的暴力。集結这种暴力的明治維新政府同时又感到有必要集結充实构成这个暴力的基础的物质設備。軍事机构和关键产业的創立过程就显示这点”(山田:《日本資本主义分析》,1943年版,69頁)。

这个創立过程,最初是作为創立純粹的軍事警察机构而进行的,即以政府集中原屬幕府和各藩的兵工、造船設備的形态开始。这些設備都是幕藩創立的机器工厂,在幕藩經營下是不能真正发展的。主要的厂子,有幕府的关口制造厂、石川島造船所、横須賀制铁所、横濱制铁所、长崎制铁所;薩藩的敷根火药制造所、鹿儿島集成館;旧佐賀藩献給幕府的制铁机器和加州制铁所;澤太郎左卫門輸入的制造火药的机械等。这些接受过来的机器設備和工厂,一直到1877年前后,才大致整理完毕,結果成为两大陸軍工厂(东京、大阪工厂及其屬厂)和两大海軍工厂(筑地、横須賀厂及其屬厂)而留存下来。沒有被陆海軍接受的厂子多归工部省管轄,后来发卖給民間。

在充实軍事工厂的同时,政府很早就开始建設运输通訊机构,以作軍事警察活动的中心。其中铁道方面于1872年9月修通了东京、横濱之間的路綫;海运方面,政府于廢藩置县后接收了各藩船只,成立日本国邮政輪船公司;电訊方面,政府从保密的打算出发,于1872年决定官办原則,并于1873年2月架成东京、长崎之間的第一、第二綫。

政府为了保证供应近代設備,又策划經營官办的近代大工厂。于1870年設立工部省,其职权范围是“劝奖百工,并掌管采矿、制铁、灯塔、铁道、电訊等业务”(《工部省沿革报告》,1888年版,載大藏省編纂:《明治前期財政經濟史料集成》,第17卷,5頁),但首先着眼于財政和軍事目的,与一般殖产兴业政策有所不同。

关于其中的采矿业，政府規定了优先供应政府需要和官有原則，并禁止金銀銅的自由买卖。1872年，政府制訂《矿山須知书》，規定矿山都归政府所有，就算地面屬於地主，矿藏也是政府的，即确定了壟断的开采权。1873年頒布《日本矿井法》，就是在法律上确立这个原則。于是生野、佐渡、小坂、三池等矿都被政府接收，在工部省的官办矿厂管轄下，輸入新式机器、进行經營。

工部省又自己經營主要的工厂，在这种官办工厂中，重要的有赤羽工作分局（制造机器）、深川工作分局（水泥）、品川玻璃制造所、长崎及兵庫造船局等。这些工厂在当时分別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都发卖給民間。此外在大藏省管轄下，政府于1870年設立了富岡制絲所，1872年又把鹿儿島和堺市的棉紡厂收归官有。

1873年后，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有了更大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那年回国的岩仓具視等遣外使节，特别是大久保利通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回国的这些人，都认为整飭內政为当务之急。特别是大久保利通认为培养国富是最基本的工作，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久保决心实行周游各国时的抱負，設置內务省，自任內务卿，担負起这方面的任务。11月任参議，仍兼內务卿。內务省……以警察和劝业为主要业务，可以說是掌管現在的內务、递信、商工、农林等省的职务。……以后大久保又通过多次建議书強調劝业政策的重要性，并大力推行”（土屋乔雄：《明治前期經濟史研究》，第1卷，1944年版，39頁）。

內务省成立后，殖产兴业的中心就由工部省移到內务省。其主要的事业，首先是直接由政府經營农工业。农业方面，建立了內藤新宿試驗場和其他設施，进行农业技术的指导和試驗。工业方面，把富岡制絲所和堺市棉紡所由大藏省移归內务省，并开办新町

棉紡所、千住制絨所、愛知及廣島棉紡所等，自行經營。大久保經營這些企業的目的，是“振興民業”，以圖平衡貿易和防止現金外流，同時對華族士族施惠，使他們有機會直接參加殖產興業事業，並使官辦企業賺取利潤，增加積累，以增強政府財政。

可以認為，大久保等直接經營官辦企業，其最初目的就是振興民辦企業。這點從當時的政府首腦大久保、大隈重信等說的話里就可以看出來，政府的公文中也有明白規定。例如1880年的內務省《勸農局處務條例》第33條就指出，“除本局業務外，興辦生產事業亦屬急務，但人民還沒有這種意願，所以暫且創辦官立事業，示以實利，以誘導人民，故稱之為臨時事業”，並列舉富岡制絲所、千住制絨所、新町棉紡所、愛知及廣島棉紡所和三田農具製造所等6個企業為例。

政府為了在民間介紹和推廣新生產方法，在1877年和1881年舉辦了國內勸業博覽會，到日俄戰爭前後為止，這種會一共舉辦了五次，又常常在中央和地方舉辦共進會和博覽會等。但是大久保心目中的“人民”，是豪農、地主或特權政商，他企圖保護這些人，要他們承擔殖產興業事業，以促進作為政府的直接基礎的國家財政和貿易的發展，鞏固政機基礎。因此他曾試辦過由政府直接輸出特產品，又選定三井組等特定政商，支持其貿易業務。並策劃加強海運力量，解散了政府直接辦的郵政輪船公司，培植岩崎彌太郎的三菱輪船公司。

三菱得到政府在資金上的援助，驅逐了在內海航綫活動的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和英國彼阿輪船公司，又通過侵略台灣之役和西南戰爭而迅速擴充^①，並開設了內海航綫和上海、香港、海參崴

^① 三菱財閥在這兩次戰役中一手承辦軍事運輸，獲得巨利。——譯者

航綫，在明治初期壟斷了海上運輸，从而建立了財閥的基础，这是大家知道的事。这些政商特别是靠战争积累巨資。侵略台灣后，除三菱外，大仓一手承办輜重粮食伏役的供应，也建立了他的基础。在西南战争中，三菱囊括了軍費总数的三分之一，三井物产、藤田組和大仓組也担任政府的御用商，获得数倍于資本的巨利。

三

幕府末期的主要商品生产，农业方面，如前所述，从大阪周圍的棉植业起、有东山地带的茧和菜种、木蓋、紅花等經濟作物的栽培；工业方面，有爱知、泉州等处的棉織品，西障、两毛等处的絲織品，群馬、福島、信州等处的絲，以及紙、酒、醬油、陶瓷器等制造业。在这些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据业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所示，共同之点，在于生产出来的农产物和手工业品多系由直接生产者即中农阶层經常經手販賣，这显示原有的商业組織发生了变化。又在先进地区，如諏訪的制絲业、尾西的棉織业和大阪周圍的棉植业等所示，已經出現以雇用工資劳动者为中心的企业，村里还发生了沒有生产工具的工人家庭。但是尽管这样，一般說来，这些商品生产的发展，基本上还是受封建的村社和土地所有权的控制，还没有进展为資本主义的发展。其生产形态，在农业方面，还没有超越零細农耕，与农业沒有分开的家庭副业还一般地当作企业而进行。中农的发展也大多成为寄生地主制发展途中的經過点。工业方面，依靠工場手工业和农村商业积累的財富；也大多成为积累土地的寄生地主制的发展基础。

上述状态，到了明治年代以后，加上政府的奖励政策，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呢？

先就輸出品的代表、从明治初年起受到政府的优厚保护和奖励的生絲來說，作为輸出品的生絲的海外声价，由于幕府末期以来粗制濫造，在明治初年迅速下降。对此政府不得不迅即采取对策，因而采用了种种办法，如頒布很多取締規則，經由通商司和国立銀行予业者以貿易金融上的便利，在授予士族以生产資金的同时奖励創辦企业，以及举办旨在促进生产发展的劝业博覽会和共进会等。政府还率先致力于輸入海外技术，实行招聘外国教师和派遣学生到海外学习等。1870年，政府直接由法国輸入技术，筹設官办的富岡制絲所，并在1872年开办时令全国士族的妻女入厂学习操作，以普及新技术。由于政府的这种奖励，1870年前桥藩設立前桥制絲所，1871年小野組开办筑地制絲厂，都采取意大利的作业方式，开始用海外技术进行生产，推广新的生产方法。

但是尽管采取这些政策，至少在維新十年以后，即在1878年以后，才依凭新方法提高了生絲生产力，在此以前，一般还是采用几乎与前无異的生产方法。

“在明治头十年，我国絲业的发展程度，全般說来，和开港后的幕府末期沒有很大的差別。例如就生絲輸出貿易的实际情形来看，除廢除原有的輸出限制外，并沒有从事任何值得提起的改善。因而还是重复着归式貿易，只加上一个外商极为专橫的情况。又在制絲方面，生产形态和生产方法也和幕府末期沒有很大的差別。……輸出生絲中的大部分依然是个别农民制戶按照德川时代原有的幼稚方法生产出来的。如就明治8年(1875)輸出生絲的內容来看，器械制絲只占全数的百分之六点八，全数的百分之八十一是提絲、枪絲和島田式等旧式坐纜生絲”(高桥經濟研究所〔山崎和胜〕：《日本蚕絲业发展史》，1941年版：33頁)。

1878年后，生絲生产和貿易方面才采用了新式方法。这和后

述的西南战争后通货膨胀，物价高騰，使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积极性显著提高这点是有关連的。当时生絲生产方法上最大的问题是克服粗制濫造，生产能与意、法生絲相匹敌的制品。而出现的大变化，是以上州为中心的“改良坐纜制絲”的发展所导致的质量的提高和产量的迅速增加。例如从1878年到1880年的三年之間，群馬县的改良坐纜絲产量，由24,458斤增至194,171斤，而在同时期内，器械制絲产量是17,632斤和14,335斤，普通坐纜絲产量是619,889斤和530,149斤。他如福島地方，折疊絲发展起来，代替了原有的枪絲，还在这时发明了足踏器，提高了生絲质量。絲厂联合起来贩卖、包装和轉运也是从这时普及的。

这些新的生产方法促进了新式資本的形成。但是使用器械制絲的工厂，不是中央政府办的或县营的，就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中央及地方的特权政商与获得巨額生产資金的上层士族开办的，为数既少，又差不多完全没有从原来的农民經營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的資本主义企业。在改良坐纜絲的場合，则多系在勾結政府或中央政商的地方批发行控制下开办工場手工业或进行資本主义家庭工业。而大多数是在地方批发行控制下，由下层农民用自己的茧做主要原料，依靠家庭成員和定期雇工的劳动进行制絲生产。在这种形态上，中下层农民形成小生产者，他們用高利借貸經營資金，卷入了商品生产。其中也有人組織以統一产品的包装和质量为目的的加工合作社，以图摆脱地方商人的控制，但是控制这些合作社和加工工場手工业的，多系有特权的旧式商人，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就随着商品經濟的进展，特別在1883年后大量沒落。1883年后加剧的所謂东山养蚕地区的农民斗争，首先从反抗村子里的高利貸主开始，就和上述情形有关。同时这个地区的村社体制还很强，农工分离的过程尚未充分进行，商人依凭先期貸款进行的控

制還很有力，差不多完全看不到新的勞動形態的展開。

與此相反，如就從那時起在長野和山梨出現的器械制絲業來說，雖然商業資本的控制影响還很有力，但中農階層中依凭工場手工業和小工廠而自己形成的資本却迅速出現。例如1883年全國有1,043家生絲制造“工廠”。1879年，只算雇用繅工十人以上的這種“工廠”，全國就有665家，其中長野縣有358家，內詠訪郡108家、東筑摩郡96家、上伊那郡62家，顯示集中的情況。在長野以下，第二位岐阜縣有142家，第三位山梨縣有81家。詠訪郡差不多一共有2千口制絲鍋，只算直接繅絲的女工就有2千左右，這些勞動者雖然還帶有季節僱傭性質，却是新型的僱傭勞動者了。

器械制絲與坐繅制絲相比較，生產力高，絲質優良，價格也高。但除上述地方外，還沒有十分普及。一般人把採用新生產方法看成是投機性的冒險行為，多數豪農、地主不願插手。但是新生產方法主要的由地方上的中農階層採用，却成為以後當地制絲業發展的一個基礎。

在其它產業方面，商品生產和資本形成都沒有生絲那樣迅速。特別在輸入商品方面，雖然發生了對抗歐美各國的先進機器制成品的重要問題，但因生產力相差太遠，一時實在無能為力。現在來看一看具有代表性的棉製品：

先說棉紗，舊有的手紡棉紗當然不是輸入紗的敵手，大約經過了整個的19世紀70年代以後，其衰亡就成為決定的了。

“內地的棉紗漸趨衰亡。今試探討其原因：原來我國的棉紗產量，以淡路為最多，其餘各地多少都有些棉紡業，但系手工操作，連小機器都沒有，只是鄉村中的副業。所以生產的棉紗不一致，在機器工廠里使用，其便利與否，實不能與洋紗相較，而被輸入的棉紗壓倒”（1879年4月19日《中外物價新報》，轉據信夫清三郎：《近

代日本产业史序說》，1942年版，100頁）。

手紡业的衰退成为促进农村分解和开辟国内市場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为了对抗輸入棉紗，曾采取这些对策：即在1872年收买薩摩的堺市棉紡所，定为模范工厂；1877年从英国买进两套2千錠的棉紡机器；1880年開設爱知和广島官办棉紡所，又在1880年輸入十台2千錠的棉紡机，从1882年起以分年摊还价款的条件卖给有志兴办棉紡业的人。但是棉紡业的資本有机构成比生絲业高得多，新技术的移植更加困难，而且老不收效，又只以极有限的一部分特权政商和上层士族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从1876年起，政府曾作过挽救已經不断出現的棉植业衰退現象的努力，即奖励試种美国棉，并設法使棉紡工厂使用。但因受到半封建的零細农耕的限制，虽然农民作过努力，还是沒有收到了不起的效果，而停办了。

棉业方面的商品生产，虽然一般地受到商业資本的統治，但是已經有了工場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家庭工业的发展，还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长野县的臥云辰致发明了土紡机。这种紡机在1877年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覽会展出后迅速普及各地。它与1885年在五品共进会展出的洋式棉紡机相較，技术上有显著的悬隔，因此不能迎上产业革命的主流。但是这种紡机虽然装置簡單，却有这样的生产力：即与水車結合起来使用，一个女工能照管一百錠到二百五六十錠。在19世紀80年代，使用土紡机的棉紡业迅速在全国推广，作为零細的工場手工业而发展。但資本的規模很小，多数是租借了水車和用作工場的房屋进行經營的。因此使用土紡机的棉紡业主并不是独立的产业資本家，他們自始就从屬於地方棉紗商的控治。但是就当时本国人独创的机器与工場手工业結合起来推广这

点來說，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其次是織布业方面的工場手工业与織机改良相結合的发展。織布工場手工业从幕府末期以来已在先进地区出現，一般受到商业資本的強力控制，又从这时起开始发明和改良織机，迅速向各地推广。这些織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内劝业博覽会中展出很多，使博覽会的負責人对織布业机械化前途有了信心。特別有重要意义的事，是在1871、1872年前后采用了京都府和政府輸入的巴丹織机，使織布的生产力成倍增加，以后就在全国棉織和絲織业中通用。巴丹机的普及，对西陣、福井、石川等地的絲織工場手工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士族、巨商、地主也設立了許多采用巴丹机的新工場手工业。

更重要的发展，是棉織品生产所使用的原料，一半或全部改用外紗，又使用土紡机紡出的棉紗試制特別品种，因而显著提高了織布的生产力。这样的发展在原来有織业的地方最为显著，而在这些地方，批发行的控制还很強固，一方面生产受商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与工业的分离和地域的社会分工已經进行，所以商业資本对生产者的控制就更为高度化。如就泉州来看当时的这种情形，則有如下述：

“从明治9年(1876)前后起，开始用手紡紗和洋紗混織，称为‘半唐布’，并凭此打开了扩充銷路的途徑。由于西南战争，1877和1878年的商情不振，……在1879年前后使用‘鏘可机’^①，……战后国势兴隆，人心振奋，需要量不断增加，市价也漲，情况非常好。于是原来向各戶收买制品的中間商人就买进洋紗，交給織布业主，換进制品后再行出賣，用买卖中賺得的錢来支付生产費用，

^① 一种足踏手織机，“鏘可”是按这种机器运转时的声音命名的。——譯者

这就成为机器織布业发展的原因”。(《泉南郡織物同业合作社机織的沿革》，載谷口行男：《泉南郡棉織品发展史》，1950年版，24頁)

1881年时，国内棉織品产量为534万日元，而輸入的外国棉織品值229万日元，相当于前者的42%，压迫国内的棉織业，致使織戶不断迅速减少。棉織业方面生产关系的提高，就是为了对抗外国制品。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阶级分化也有所进展。

在絲織业方面，資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在原来有織业的地方发展最快。例如在桐生，虽然也設立了規模相当大的工場手工业，如1880年創办的成爱社和1822年开办的縲綢机业公司等，而成为主流的是資本主义的家庭工业。19世紀80年代后，这里由于絲棉混織和棉緞的广泛推广，工場手工业就淹沒在采用出租織机方式的資本主义家庭生产的大海中。与这同时，在商业資本的統治下，絲織和棉織业中都有粗制濫造的通弊。

四

明治初期商品經濟的发展，不止在貿易商品方面，还包括为数极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制造的商品，而在这个时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米的商品化。米过去曾作为領主的商品而大量商品化，改革地稅后又作为农民的商品而商品化。这时后进地区都被迫货币化，使商品經濟侵入农村的每个角落。就其数量來說，据山口和雄推算，从1875年到1877年前后为止，农民的米食率，平均为45%到50%，在全部农戶中，約有半数购买不敷食用的米。卖出的米占全部产量的15%到20%，数量为3,873,000石至5,171,000石，折合貨幣17,428,500日元至23,269,500日元(山口：《明治前期經濟的分析》，1956年版，41頁)。这个数字与山口在《1874年府县物产表》中所示的包括棉、絲及其他品种在内的全部織物产值17,159,141日

元和酒類產量 18,605,495 日元相匹敵，並有所超過。當然其他商品的生產和販賣額，更不能與米相較了。

當時占國內人口最大多數的是農民，例如在 1873 年的人口 33,300,600 人中，有業者為 19,897,692 人，內從事農業者 15,320,367 人，相當於 77.97%。1876 年的比率也差不多，那年的農業人口占業者的 77.20%。這些農民經由米的商品化而卷入商品經濟，對於開辟國內市場是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與工業經營者相較，特權政商和地主曾使更多的米商品化。在米隨着改革地稅而商品化時，不止前幕府時代起家的地方米商，而且小野、島田、三井等特權商人以及同三井和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從事先期收買的公司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改革地稅將近完成、米價低落時，三井物產公司與澁澤商店又同三井銀行與第一國立銀行勾結起來進行活動。這種情形已由加藤俊彥敘明（加藤：《關於地稅金納化和米谷商品化的備忘錄》，載宇野編：《改革地稅的研究》，下卷，157 頁起）。只就這點來說，米的商品化也同工業製品和其他經濟作物一樣擴大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活躍場所的規模。但在改革地稅和准許自由種植經濟作物後，雖然還是受到商業資本家和地主的強力控制，而在從事生產的農民中，適應這種新情況的活動也較前增進。而且不止米作物如此，其他經濟作物方面也是這樣。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被卷入商品生產。由於幕府末期開始階級分化，在明治初期，農民已經分成若干階層。我們不知道全國的數字，茲據庄司吉之助整理舊福島縣於 1876 年調查的《福島縣所轄（信夫、伊達、安達、安積、岩瀨、白河）六郡人民分業概況表》的結果，在全體農民 49,731 戶農民中，約有 7.5% 為富農式的地主，26.7% 為中農，64.8% 為貧農。另有被列為“有家產 4 千日元以上

者”的寄生地主 199 戶。其中所謂富农式的地主阶层，每戶平均持有土地 4 町 8 反 8 亩^①，內自营地 83%，出租地 17%，生产力很高。中农每戶平均有地 2 町 8 反 8 亩，沒有出租地，純粹是自耕农。原表載称貧农每戶有地 1 町 1 反，但其內容是：“在貧农的一町步土地中，大多有三分之二是佃耕地，不是自己所有的，連同自有地和佃耕地在內，耕种一町上下的还是最优裕的貧农，有的只有 5 反步，甚至两三反步，資力缺乏，难于維持”（庄司：《明治专制主义下的农民問題》，載《商学論集》，第 20 卷，第 3 号，1951 年 11 月版，205 頁起）。有志于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是上述各阶层中的富农和中农。

当时各地区之間的經济发展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別，后来就发展为不同的农业地区构造。現在按一般用語來說，可以区分为先进地区、大地主地区、中間地区、后进地区四种。先說所謂先进地区，是幕府末期商品經济最发展的地方，在明治初年又有进一步的进展。代表这种地区的，有大阪周圍、尾張西部、岡山县高粱川下游地区、山形县村山地方、香川县贊岐平原等处。从德川时代后期起，棉、菜种、紅花、甘蔗等經济作物在这些地方的农作物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进入明治年代后，这些作物同外国商品发生竞争，不如以前那样有利，反之自改革地稅以后，随着米的进一步商品化，种米轉趋有利，从而增加了地主与农民之間圍繞着米的商品化的对立。其次，所謂大地主地区，是后来由拥有一千町步土地的地主来代表的山阴、北陆、出羽等一些地方。在藩治期間，大地主已經进行积累土地，佃租率也相当高，并以种稻为中心。地稅改革以后，这个地区的农民使米进一步商品化，并推行了土地改良等許多事业，

① 町、反見前注，亩合十分之一反。——譯者

而大地主們就適應米的商品化，經營金融業和倉庫業等，因而使農民的階級分化更加速進行。最後，所謂後進地區，商品經濟素來最為落後，長期保持舊式的特殊佃耕習慣，但在改革地稅以後，這裡的農民也被卷入不少的商品流通活動中去了。

問題在於中間地區。這大致包括不屬以上各地的中間性的地方，大多在幕府末期還沒有正式展開地主所有制，而養蠶和經濟作物的栽培卻迅速發展。在這個地區，地主制還不怎樣強固，因此在這個制度展開以前，農民群趨於有利的商品生產，從1877年前後起，作為商品生產者的活動最為顯著。例如大石嘉一郎曾列舉福島縣中間地區六郡從1878年到1880年的商業性農產品產量，只就其主要項目來看，這三年間的增加率就達125%至250%，他又證實了農村內部的市場和社會分工的發展，而指出了這個時期的重要性（大石：《自由民權運動和寄生地主制》，載福島大學：《商學論集》，第23卷，第5號，《寄生地主制研究》特集，1955年1月，271頁起）。此外，戶谷敏之曾介紹東京府南多摩郡經營約二町步旱地的農戶從1871年到1889年的現金收支概況，也可以顯示農業經營從自給生產朝向商品生產變化的情勢（戶谷：《近世農業經營史論》，1949年版，471頁起）。

由此可見，從先進地區到中間地區，富裕中農都想發展為小商品生產者，從那時起出現的農務改良和農業技術的全國性發展也能說明這種情況。從1877、1878年前後起，在石川、三重、岐阜、京都、愛媛和全國各地舉行了種子交換會和農談會。又據井上晴丸指出，“不久以後，在形成明治年間農業生產方法上起重大作用的立持犁和馬耕方法，這時已從福岡傳入，而且很流行”，暗渠排水技術的進展和水稻種“神力”的選用，也是在此時前後（農業發展史調查會編：《日本農業發展史》，第1卷，1953年版，109頁）。這種改

良农业生产的努力一直繼續到明治中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除使日本农业基本上分成近畿型和东北型这两种农业地区外，其效果实已达于全国农业的再生产。尽管这样，这种富裕中农想发展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倾向还是受高利貸主或商业资本家的控制，沒有发展为資本主义經營，而且多数出現了破綻。农民为商品生产經營所急需的资金所迫，而致受到高利貸主和商业资本家的剝夺，“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自耕农，虽因地区不同而呈現不同的状况，但是都沒有資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迅速分化为地主或佃农，这是明治十年代(1877—1886)的一般趋势”(丹羽邦男：《明治十年代土地买卖的地区性质》，载堀江英一、远山茂树編：《自由民权时期的研究》，第4卷，1959年版，215頁)。

尽管有上述情况，而日本国内市場却大为展开，其情况見第2表。此外山口研究了当时府县之間的商业状况，总结如次：

“首先要指出的，是国内市場的大体形成。北海道的物产，不仅銷售到四国、中国^①，还远远运到九州的边隅。同时中国和九州的商品又往往从东北运往北海道。交易的商品种类很多，如果不問数量的話，我們說差不多包括所有的生产品，也不是过甚其辞。米占交易品中的首位。多数的府县都爭先輸出或輸入米。在东北和北陆地区，除石川县外，都是輸出米的县，九州除长崎外，各县也都輸出米。……米以下的重要交易品，大約是棉布、衣料和綢緞之类。富山、鳥取、广島、岡山、德島、爱媛、大阪、爱知、三重是主要的棉布輸出县，北海道、东北六县，新潟县、石川县和东京府是主要的棉布輸入地。……生絲是最重要的生产品之一，但是作为国内商品，却并不太主要，主要部分都輸出海外。在国内多利用陆运送往

^① 日本地区名，介于关西与九州之間，包括鳥取、島根、岡山、广島、山口等县。——譯者

第2表 明治初年主要农、工业生产情况

(单位:千日元)

	1874年 (明治7年)	1882年 (明治15年)		1874年 (明治7年)	1882年 (明治15年)
农 产 品			工 业 品		
米	142,799	199,794	紡織品	30,994	
麦	25,073	43,109	生絲	6,165	20,355
大豆	7,405	14,134	皮棉	220	875
其他杂粮	8,703	11,531	棉紗	1,234	1,373
芋类及蔬菜类	11,658		織物	17,159	33,377
甘薯及馬鈴薯	2,860	20,383	染物	3,033	
果实种子类	3,201		食品	46,945	
特殊农产品	27,915		酒	18,605	56,738
棉类	7,435	11,653	茶	3,951	9,186
菜种	6,037	5,927	酱油	6,338	
茧	4,917	16,853	黄酱	6,137	
木藍	3,422	4,116	盐	2,394	6,975
烟草	2,940	2,969	砂糖	1,380	
麻类	1,329	2,362	机器器具	3,061	
			制造用具	101	987
			紙	5,167	4,839
			陶磁器	2,092	1,172
			漆器	920	1,225
			肥料	3,057	

1874年的数字根据山口和雄:《明治前期經濟的分析》,6頁起;1882年的数字根据《兴业意見》(《明治前期財政經濟資料集成》第18卷)446—447頁的数字。

表內的数字不一定能够严格对照,但能显示正确的傾向。空白处是引用資料的表上所沒有的。1874年的芋类和蔬菜类中包括萝卜和其他許多蔬菜,而1882年的数字中只包括甘薯和馬鈴薯,为了便于对照,特另列这两种作物的数字。1874年的机器器具栏中,从农具起,到厨刀止,包括許多种类,另列了1882年数字中所包括的織物、生絲、醃制品与其他制造用具,以便对照。1882年的棉紗栏,只包含洋式紡紗机制出的紗和日本制的新式机器紡出的紗。

各地”(山口和雄,《明治前期經濟的分析》,1956年版,209—210頁)。

3. 原始积累

以1877年前后为轉折点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虽然基本上是在幕府末期以来的发展基础上进行的,但尤其是受到1878年后出現的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农作物、特别是米的价格高漲的促进。这次通貨膨脹,是由于濫設国立銀行和发行不兌現銀行券、西南战争时政府增发紙幣2,700万日元和第十五国立銀行借給政府銀行券1,500万日元等因素发生的。上述因素使紙幣和不兌換銀行券的流通額由1877年的119,149,000日元增至1881年的153,302,000日元,因此在1881年时,銀幣1元折合的紙幣增加到1元69錢6厘。物价指数,如以1873年为100,1881年达162,其中米价指数达221。通貨膨脹的进行使地主和富农、中农易于交納現金地稅,又阻塞了三井和其他大商业資本家及高利貸主的活動,使米更有可能正常地商品化。

通貨膨脹之所以改善地主和富农、中农的境遇,首先是由于减少了以現金地稅为基础的国家的剝夺,第3表的前半部就能說明这点。作为一个統計表,这个表是极不完全的,但能充分显示这点:即从1878年前后到1881、1882年前后,地主和上层农民收入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国家剝夺的增加。

这种情形使当时从农村中剝夺大部分財政收入的政府受到不利的影响。事实上由于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紙幣价格的低落,据說“在政府的會計上,收入的实值差不多減了一半”(松方正义,《紙幣整理始末》,1890年,載日本銀行調查局編:《日本金融史資料》,第

第3表 國家的剝奪與農民

年 度	A	B	C
1875、1876	100.0	100.0	100.0
1877	76.0	86.1	91.6
1878	77.9	88.0	112.3
1879	89.8	101.6	152.0
1880	93.1	106.6	199.3
1881	100.8	122.1	197.7
1882	101.9	133.2	165.9
1883	101.1	130.4	119.2
1884	100.2	130.7	102.3
1885	95.3	109.2	127.7
1886	95.1	123.8	110.3
1887	91.1	122.7	102.3

A 是地稅總額和地稅附加、地價附加總額，即國家對於土地的剝奪收入。

B 是地稅總額、間接消費稅、雜稅中封建剝奪色彩較濃厚的 11 類、地方稅、村用費總額及各種捐稅的合計。

C 是每反平均米收穫的價金。

根據下山三郎：《關於明治 10 年代的土產所有關係》，載《歷史學研究》，176 期，1954 年 10 月，6 頁。

16 卷，38 頁），因而使財政危機更為加劇。政府卻把現銀折合紙幣價格的提高歸因於輸出入不平衡所造成的現貨缺少，因而直接擴充官辦事業，或極力用補助金來促進殖產興業政策的實現，以圖救濟，結果反而使財政陷於越來越深的危機。這對於依靠勾結政府來迅速增加財富的特權政商資本家的利益也成為重大的問題。

這樣政府就感到有根本改變政策的必要。政策改變是從 1880 年 9 月決定收回紙幣的方針開始的。可是為了實施這一改變，必須對以前的金融和產業政策本身進行根本性的檢討。原來大量開辦國立銀行的目的，應當是把華族、士族、高利貸者和地主的貨幣

轉化为可供借貸的貨幣資本，以便培植产业資本。但因当时資本积累尙未成熟，商业信用机构尙未完备，所以虽然可以从国立銀行获得借款，而拿到借款的人并不經由正常产业資本循环过程去賺取产业利潤，却比較自然地使用在以投机为目的的活动上。許多当时設立的公司和企业“只是些进行商品制造和販卖的小工业公司和其他商业公司，他們惑于物价的强烈波动，想从中投机，賺取奇利，所以基础是不穩固的”（瀧澤直七：《稿本日本金融史論》，1912年版，137—138頁）。因此借出資本方面在收回貸款上感到不放心，而致在資本从下面广泛形成时使高利貸者又有机会进行剝削，从借出和借入方面来看，都是发展前途的显著障碍。

从政府的立場来看，通貨膨脹的根本对策不外是有效和重点地使用少量的資金，以特权政商为中心，培植产业資本，并加强寄生地主制，把国民的收入当做朝向貨幣資本轉化的媒介。这是大久保以来的傳統政策，所以改革措施先从1880年11月頒布工厂发卖概則开始。

頒行工厂发卖概則的直接目的，是把原来財政上造成亏損的龐大官办企业发卖给特定政商，以图减少岁出，增加岁入。而其意义却在于这点：即政府只留下軍事上重要的产业，其余都交给特权政商，这样一方面以軍事产业为主軸，另一方面又使这些政商資本家在生产上也同政府勾結起来，建立更加灵活的經濟体制。政府根据这一概則，从1884、1885年起，把有数的工厂和矿山用差不多近乎无偿的价格卖给特权政商，因而造成这一重要事实，即产业資本的成长，不是通过自由竞争，而自始就是經由给与特定政商以超額利潤的途徑实现的。政府不止把需要极大建設費的工厂和矿山用等于无偿的低价发卖，而且采用經濟以外的方法，授予政商以种种特权，抑制自由竞争，以阻止超額利潤的平均化。这和培植財閥的方

針是相符合的。大家都知道，發賣的這些工廠和礦山，如給三井的三池煤礦、給三菱的高島煤礦和長崎造船所、給古河的足尾銅礦、給淺野的深川水泥工廠、給川崎的兵庫造船所、給久原的小坂礦山等，後來都成為財閥的主力工廠和礦山。

1881年，素來在決定政府財政政策上居于中心地位的大隈重信于政變中被迫離開政府，由松方正義繼任大藏卿，接着正式施行紙幣整理，這在終結通貨膨脹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大隈本來想依靠外債來一舉收回紙幣，而松方的方針卻是設立中央銀行，以便把確立近代化信用制度和整理紙幣結合起來辦，並依憑這點來培植特權政商和地主的產業資本。其過程是：1882年6月決定設立當作中央銀行的日本銀行，1883年5月修改國立銀行條例，確定由日本銀行獨家集中發行紙幣，1884年5月頒布兌換銀行券條例，1885年6月發出兌換政府紙幣布告，這樣就把紙幣和本位貨幣結合起來，終於成立了近代的銀本位制。在此期間，紙幣和不兌現銀行券的流通額從1881年起逐年縮減，1886年減至97,302,000日元。現金儲備，1881年只有8.3%，1885年後達37%，1886年，紙幣與現銀價格的差別消除，物價指數也接近1873年的水平。

為了減少紙幣的流通額，政府於1882年設立賣藥印花稅等新稅，修改酒稅和煙草稅，又於1885年新設醬油稅和糕點稅，以圖增加歲入，並設法增征地方稅來減輕國庫負擔，還採取了發賣官辦企業等措施，以節減歲出。國立銀行於1883年修改條例以後，全力從事吸收存款，以備將來轉化為私立銀行。結果就改變了原來的以發行紙幣和存儲公款為基礎的經營方式，逐步進行改組為以吸收民間存款為基礎的普通銀行的準備工作。這是因為政府強行創立的近代信用制度，不是產業資本從下面發展的結果，反而在保留銀行的高利貸性質並使其繼續存在這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

虽然剥夺了国立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却保存了国立银行本身，使它们经过很长的犹豫时间，差不多全没有破产，就能转化为吸收存款的银行。

经由这次纸币整理，日本确立了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又建立了中央银行统辖下的近代信用制度。这是专制主义和特权资产阶级抑制自力伸展的商品生产和资本的形成，从上面培植资本主义的胜利指标。“同松方的方式完全对立的是自由民权运动者的纸币整理方式。……松方实行的，是压抑小资产阶级的自力发展，只促进商人资本(寄生地主)朝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方式”(大石嘉一郎：《维新政权与大隈财政》，载《历史学研究》，240号，1960年4月，30—31页)。只是由于具有这个基础，半封建的、军事的日本资本主义才能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

二

松方实行的整理纸币和确立中央银行纸币的过程，在日本经济史上，仅就确立近代信用制度的意义来说，也是一个极重要的步骤。而其意义实不限于金融财政方面。山田盛太郎曾把这个时期称为“以创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特征的深刻的体制上的凝固期(由明治14年〔1881〕到明治18年〔1885〕)”(山田：《日本资本主义分析》，6页)，即把这个时期规定为将货币强行固定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原始积累时代。而且日本的原始积累的特征，是抑制从下面自力成长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专制主义的主导下，把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以特权的财阀为中心，从上面迅速建立军事的、半封建的资本主义。这个从上面建立资本主义的措施，必须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才能实行。又在建立的过程中，站在对立地位的是小商品生产者，特别是不断朝着这个方向成长的

农民。政治上的表现，是1881年发布成立国会的詔书和1882年起迅速划定皇室财产，这只是由于把敌对的自由民权运动镇压了下去，才能办到。可见日本资本主义实在是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农民而建立起来的。

上列第三表的后半部如实地显示了这个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从1882年以来，地税和与地税有关的负担逐年减少；贩卖米的收入在1883年以后也急剧地趋于减少，但与地税收入相较，比例数却有所增加，而且始终没有恢复改革地税时的情况。山田盛太郎把这点当作地税改革所造成的结构上的变化，指出根据改革地税的检查例第2条，本来各种捐税和地主剥削收入都是34%，但是到了1885年，却分别成为16%和42%，即地主的收入部分比国家的收入部分多了（山田：《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145页）。相反地，从1883年起，国家对于直接耕种土地的农民的剥夺，却远远超过农民的收入而固定下来。这是不让农民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剥夺之加强，又是农民没落的过程。成为这一过程的直接契机的是米价的跌落。米价以1880年的每石9元28钱为顶点，以后逐年暴落，即1881年9元9钱、1882年7元64钱、1883年5元49钱、1884年4元71钱，1885年一度回涨到5元86钱，1886年又跌到5元14钱。当时受到租税和高利贷逼迫的农民的惨状，已经有许多文献明白提到。

“现在米价下落，使卖米所得的价款，在交纳地税、地方税和其他村镇税捐以后，几乎毫无剩余，而且不但没有剩余，甚或感到不够。可是尽管感到不够，还是有纳税的义务，只好设法典卖衣服或田地家产来纳税，又因金融梗塞，典卖不出去，以致有不少人受到拍卖土地处分，处境十分不幸”（农商务省编：《兴业意见》，1884年版、大藏省编：《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第20卷，117页）。

“由于沒有交納地稅和‘按土地征收的地方稅和区村捐’，而致所有地受到强制处分(拍卖、沒收、交郡区长和戶长管理)者，从明治16年(1883)到明治23年(1890)，共有367,744人。其中263,965人，即77%，纵令按官厅的統計，也被列入由于貧困而无力交納的种类。未交納的金額为114,178日元，平均每人未交金額只有31錢。而因此受到拍卖和沒收处分的土地达47,281町步，地價額达4,944,393日元(內4,783,891日元为农民所有地的地價)。他們实际損失了3,155,382日元，平均每人8日元31錢，相当于滞納稅額的27倍之多”(平野义太郎：《日本資本主义社会的机构》，1934年版，61—62頁)。

沒落的还不止农民。在初期資本形成途中的制絲、棉紡、銀行等企业，到处发生破产和亏损情形。例如关于山梨县的制絲业，《兴业意見》中除指出“从前坐纜制絲产量极少，在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到百分之一”，其余均为器械制絲外，又有这样的記載：

“由于遭到通貨价格变动的影響，这里陷于极其困难的处境，企业相继倒閉，到了17年(1884)还不能恢复旧观，能够維持的实在是屈指可数，其余只能勉强苟延殘喘”(《兴业意見》，載《明治前期財政經濟史料集成》，第19卷，123頁)。

农民、小生产者、小資本家等的貧穷化，就是大地主和高利貸資本家們的巨大財富形成的过程。他們和政府相勾結，依靠投机和放高利貸来积累巨資，并朝向大土地所有者发展。

农民的沒落使农村秩序发生很大的变化。如前所述，在幕府末期和明治初年，农村中的村社已經崩潰到相当的程度，农民进行階級分化，出現了大量的貧农。但是村社結構虽然不断崩潰，而在改革地稅以后，其束縛力还是很強。地主就利用村社习惯力量来加强对下层农民和佃农的控制。这时虽然商品經濟向前发

展，但一般地說，如中村吉治所指出，下层农民处于沒有货币的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却通过兼为地主的富农而被間接地卷入货币經濟。

原始积累的急剧襲击沉重地打击了这种村社的束縛力。例如在福島、群馬和秩父等地，从豪农或中农起，到下层农民止，都想經營把农业和制絲业結合起来的小工艺。在他們受到1831年后政府政策的影响而迅速沒落时，就掀起了以这些沒落的农民为主力，还有广泛的半农奴式的貧农参加的急进民主斗争。日益加剧的自由民权运动斗争，即1883年首先发难的福島事件和1884、1885年接踵而起的群馬、神奈川静岡等地的穷民党起义和加波山事件、秩父起义等，就是这样爆发的。

但是一般地說，由于农民的迅速沒落，以地主为中心的村社結構反而加强。沒落的农民，从自耕农轉落为佃农，或者紧紧抓住仅存的自己所有的土地，成为自耕兼佃耕农。又因只凭农业不能生活，还要从事副业、兼业和雇佣劳动，同时在村子里更丧失了权利。日本的原始积累首先促进了地主制的加强。在沒落的下层农民和貧农連在村社結構中也沒有容身余地时，就出門找活干，因而脱离农村，成为流浪者或外国侨民。

經過这个过程的日本資本主义获得了其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由于他們还没有完全与农村絕緣，所以还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階級。但是經過这一时期后，日本雇佣劳动的形成就正式跨出了一步，在先进地区，已經有許多下层农民离村进入城市。可見日本雇佣劳动的形成是由于货币經濟和資本主义的剝夺，使农村中的村社結構徐徐解体而进行的。隅谷三喜男曾就这点作如下的叙述：

“从上述的农民階級分化中，雇佣劳动以下面三种形态徐徐完

成：第一，以农村工場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适应农村地区对雇佣劳动的需要，从附近农村的中农、贫农中产生雇佣工人。第二，中农、贫农在自己家的附近找不到雇用其过剩劳动力的机会，单身到远处的工厂、矿山或其他场所去找活干。第三，与第一和第二这两种以补充农家生計为目的的情况不同，有些农民在农村中没法生活下去，全家一起或一家分散着流往城市下层，在那里充当工资劳动者”（隅谷：《日本工资劳动史論》，1955年版，26頁）。

根据隅谷的研究，第一种是与1877年前后起以制絲、織布业为中心在农村地区展开的工場手工业相适应的雇佣劳动形态。明治初年成立的雇佣劳动的基本形态，就是这样产生的上下班的工人。第二种形态，是从1880年前后起，工場手工业发展，形成了工业地区，工厂規模稍大，感到专门在附近招募职工有些难于足額，同时农民方面又有必要出来做工，以补充家計，因而出现了寄宿女工。第三种形态，是农民的农业經營完全遭到破坏，流浪到城市中留居下来，成为雇佣工人。在1881年以后的蕭条期間，这种貧民曾广泛产生。

但是从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说，雇佣工人的数目是极其少的。根据第七次統計年鉴，1886年全国民办和官办企业工人总数为207,140人，与同年的5,518,040农户相較，只相当于农户的3.8%，与佃农户数相較，則相当于8.6%。日本雇佣劳动的形成，除穷苦农民外，还以封建性的职工的解散和士族的沒落为源泉。这些貧苦农民和城市貧民，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未成熟，多数留在农村里面，充当佃农、家庭劳动者、农村雇工，或者聚居城市的貧民窟，充当人力車夫和搬运工人，或者从事糊火柴盒、卖廢品、卖破玻璃等家庭劳动。因此“日本社会的近代分化过程，一方面使原始积累期間流浪者的产生較少，反之又使全体‘下等社会’保持

小生产者的地位而日趋貧穷，以致雇佣劳动的形成規模很小。而少数的受救济的貧民和龐大的‘劳动貧民’之間，在生活內容上并不存有本质的差異”(隅谷：前引《日本工資劳动史論》，97頁)。

即使当了雇佣工人，由于同农村尚未絕緣，还是成为社会的最下层階級，以殖民地式的工資和形同監禁的劳动条件为特征，被置于吸血的劳动制度之下。制絲、織布、棉紡业女工的半奴隶状态，以高島煤矿工人和北海道士木建筑工人为典型例子的監獄工舍和囚犯劳动，以及剝削城市貧民窟中极貧苦的人的糊火柴盒、搓木屐帶和做封袋等血汗制度，这都是大家知道的，这里就用不着再讲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地主制和专制主义天皇制，日本資本主义就依靠这种殖民地式的剝削而迅速扩展。又在这个期間，无产階級虽然还处于初生状态，但已作为一个階級而走向团結和成长。高島煤矿工人于1870年到1883年发动了五次实力斗争、1883年三池煤矿工人暴动、1886年甲府雨宮制絲工厂发生爭議，1889年东京铁业工人組織“同盟进工組”，这一切显示工人已經开始成长了。

三

原始积累的剝夺就像上述那样使日本商品經濟和資本主义的发展不正常。正如在幕府末期，先进地区商业性农业发展所导致的中农阶层的成长由于領主权和特权商人的压抑而被歪曲，以致产生寄生地主制一样，那时就以全国規模确立了高利貸性质的地主制。上列第三表可以說明这个制度的結構，1884年修改地稅改革条例，使地稅固定化，就在法律上确定了这个制度。商业資本家、高利貸主和地主等以惊人的低廉地价获得占总耕地20%之多的大量土地，其中大部分是从持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买进的。又因

确立了地主制, 地价安定, 地主的地位就更为提高。

现在看一看各地区的发展情形: 在先进地区, 如前所述, 寄生地主制从幕府末期起已有相当发展。在改革地稅时, 地主們在政府計算地价时, 曾进行各种活动, 以图減輕地稅負担, 即可想見这个地主制已有相当力量。特別在大阪附近, 到了明治年代, 按棉和米的比价来算, 种米有利时, 从 1875 年的春天起, 到秋天止, 地主都和佃农另定佃約, 即使在旱地上, 也照米的收获量, 强迫佃农用米或折合的米价交付佃租, 以加重剝削, 并迫使农民从种植棉花等作物改种水稻, 以巩固其剝削地位。因此地稅改革以后, 大阪附近的地主制更为加强。在紙币整理期間一般經濟情况不振时, 这种关系又有所发展, 原来自营耕种的地主轉化为純粹的寄生地主的大有增加。例如古島曾經指出, 这个地方的地主在技术上所关心的, 从 1887 年起, 集中于米的质量和包装(古島敏雄、守田志郎:《明治时代地主制度展开的地域特点》, 载明治資料研究連絡会編:《地主制的形成》, 1957年版, 113頁), 就可以显示地主的权力和剝削更为加强。强迫种棉的佃农用米来交納地租, 曾引起他們的反抗, 因而发生无数法律訴訟, 但是都由地主方面胜訴。在这个期間, 于佃租之外加收附加米已成普遍行为, 土地集中也迅速进行, 特別是自耕地的减少比其他任何时期为显著。随着棉植业的日益衰落, 地主不再經營棉花买卖, 投資于証券、城市工业和住宅地的也有所增加。

尾西的地主由于兼营的企业不振, 便把力量集中在积累土地上。就是坚持兼营企业的, 也把基础放在土地上, 从側面来加强营业。随着他們作为寄生地主的加强, 他們的地位就不受营业盛衰的影响, 而稳定起来。

大地主地区的大地主也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的。他們和先进地区的地主不同, 其中有不少人的来历可以远溯到德川时代中

叶以前。但这些地主真正确立其大地主的地位，却是在地稅改革以后，通过金融业和倉庫业等活动，并以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展开米的商品生产和执行土地处分为媒介，完成了土地积累之后。这种土地积累是經由并吞中小地主的土地进行的，許多中小地主由于受到租稅和債務的压迫而丧失了生活上的适应力，以致沒落，并充当大地主的經管人，以維持其村内的地位，这个地区的地主控制的村社結構也就以这种形态維持下来。以后大地主还在整个明治年間繼續积累土地，并在他們的高利貸机能支持下进行。但是这个地区的地主虽然也插手购买股票和放高利貸，而在农业上还雇用年工和日工来經營一部分土地，从明治末叶起才成为純粹的寄生地主。

除确立一般的地主制外，从当时起，大地主制又經由同政府勾結的皇室、华族和財閥展开。皇室财产于 1890 年起达 365 万町步，岡山的藤田、新潟的三菱、北海道的前田、蜂須賀与华族組合等大土地所有者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

在中間地区，原始积累把先进地区的政商、高利貸資本家的权力广泛导入，破坏了下层农民經營的小資产階級式的商品經濟的发展。这里的农民分化是在村社結構还强固存在的情况下迅速进行的，因此朝向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发展，也出現了三重的諸戶家和甲府的若尾家那样的从事投机和放高利貸的大地主。中間地区的地主，一般是在明治中期到明治末期变成不营耕作的地主的，在 19 世紀 90 年代，还有相当多的豪农驅使家屬和定期雇工耕种一部分土地。例如井上晴丸列举的福岡、愛知、德島的事例，就显示了当时許多地主經營农耕（农业发展史調查会編：《日本农业发展史》，第 1 卷，93—94 頁）。

原始积累使地主制大規模展开，在先进地区，純粹的寄生地主

制也大有发展。尽管如此，就加强土地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直接对立关系的意义来说，这不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展开，而不过是封建的剥削关系改成半封建的关系。在佃耕地面积和佃农户数增加的过程中，地主制的发展不仅加强了佃租剥削，还加强了统治下层农民的半封建制度和组织。这样确立和加强了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就形成明治政府的基础，并成为半封建的、军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

第三章 資本主义的形成

1. 农业阶梯(Agricultural ladder)和机器工业

紙幣整理导致了貨幣和信用制度的穩定，地主制的确立又使原始积累大体完成，在这个基础上，日本資本主义就从 1866 年前后起开始迅速发展。

这种情况，如果从生产量来看，可以由第 4 表來說明。在这一发展中，铁道和海运，由于政府的保护，一开始就作为壟断事业而出現。棉紡、造紙等业开辟了新的机器工业生产方法的道路，站在資本主义发展的最前列。制絲和織布业等由于市場扩展，也不断試用新的生产方法。而清酒、陶磁器等保持旧有生产方法和市場的产业，則发生停滞和衰退。在农业方面，从棉花起，木藍、菜籽、甘蔗等与海外的資本主义商品发生竞争关系的作物产量也趋于减少，而养蚕和米、麦等作业，虽然保持旧的生产方法，但因市場扩大，所以还是有所发展。矿业方面，則煤、銅等与輸出和軍需有关的部門是发展的。

这种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保护和扶植，但其基础还是以商业性农业为中心的商品經濟的发展。而且在商品經濟方面，由于明治初年以来地主經營农耕与豪农經營有了进一步的

扩充，以这种经营为基础的农业与工业的互相促进关系实已超过自耕农的小生产规模的发展。例如和崎皓三曾经指出，明治初年伊势地区的地主、豪农很想从事米、茶等商品生产，开办了制丝和棉纺织业，又通过这种活动而扩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崎：《产业资产阶级的生成和地主制的展开》，载堀江英一、远山茂树编：《自由民权时期的研究》，第4卷，1959年版，89页起），这种情况并已在全国很多地区展开。制丝、织布和制造日本纸与草席面等广泛的家庭工业、雇人纺纱或出租织机的行业、批发行与工场手工业的形成，都显示了从地主自营耕作和豪农经营发展到他们兼营工业的阶段上的关联（农业阶梯）。但自股份公司制度促进铁道、棉纺那种近代大工业成立后，农业阶梯就被切断，地主投资于股票，变成了寄生者，或者一方面保有寄生大地主的性格，另一方面作为资本家的利益却逐渐多于作为地主的利益。

这种发展因产业不同而进度不一，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先就当时最进步的制丝业来说，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丝织业的发展、1877年太平洋轮船公司开设中国航线和1879年美国横断铁路的开通等因素，使美国市场大为扩展，胜过了原来的欧洲市场，这种市场基础的扩大促进了制丝业的发展。原来生丝的最大市场是法国，输出法国的价额，1883年为7,780,000日元，1887年6,503,000日元，1892年12,183,000日元，呈现停滞或渐增状态，而在那几年中，输出美国的价额却为6,052,000日元、11,166,000日元和22,716,000日元，形成跃进情况。以后这两个市场的地位发生决定性的距离，建立了生产专门依赖美国市场的体制。日本向美国市场的生丝输出额于1885年后超过中国，占居第一位，1890年后，日本丝占美国全部输入生丝的半数以上，确立了绝对优越的地位。

第4表 明治前期主要农工矿业生产情况

年度	米 千石	生 絲 千貫 ^①	棉 紗 担 ^②	棉織物 千日元	絲織物 千日元	清 酒 千石	煤 千吨	銅 千公斤	工矿业 生产指 标	铁道营业綫		500吨以 上船舶保 有数
										国 有	私 有	
										公里	公里	艘
1884	27,131	570				2,999	1,140	8,888	6.0	291	130	25
1886	37,222	719	16,217			2,869	1,374	9,774	9.0	428	267	35
1888	38,688	745	33,142			3,824	2,008	13,375	10.3	957	724	44
1890	43,084	922	108,374	13,563	17,939	3,068	2,598	18,214	11.1	892	1,845	51
1892	41,430	1,198	213,489	19,114	27,155	3,496	3,177	20,960	14.2	892	2,127	57
1894	41,859	1,391	304,584	27,168	40,785	3,600	4,261	19,908	17.0	929	2,473	91

根据日本統計研究所編：《日本經濟統計集》，1958年版編制。但棉紗根据关三：《日本棉业論》，1954年版，清酒根
据东洋經濟新报社：《明治大正国勢总覽》，1927年版。工矿业生产指数是名古屋高等商业学校制成的，以1914年（大正
8年）为100。

① 貫为日本重量单位，合3.75公斤。——譯者

② 棉紗包装单位，輸出时每个400磅，国内每担200磅。——譯者

制絲业所以有这样的發展，是因为生产力进步到能够制造在輸出市場上与意、法产品相匹敌的优质絲，在这方面，由于器械制絲的发展而統一了絲质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进行坐纜制絲时，已經逐渐注意到輸出品粗制濫造之弊，从1877年前后起，群馬、福島等县的制絲业者和批发行开始精选联合工場和坐纜戶的成品。政府也在1885年頒布蚕絲业同业組合准則，在各府县組織蚕絲业同业組合，强迫制絲戶参加，并規定将各县出品送到橫濱檢查，只有合格品才許出口。当时地方商人的地位降低，較大的生产者都設法与橫濱的全国性批发行直接联系。但是坐纜制絲方面，即使是改良坐纜絲业，也多系养蚕农户的付业，制絲方法不統一，纖維度不齐，重紡时往往会断，而且质量的等級龐杂，因而逐渐趋于衰落。而器械制絲的发展，却如第5表所示，很是迅速。到了1892、1893年前后，輸出的生絲差不多全是器械制絲和改良坐纜絲。

器械制絲的发展促使生产方式向工場手工业和小工厂进展，又促使生产者向小产业資本家进展。例如1883年有十口制絲釜以上的絲厂3,203家，与1884年的全部制絲戶数相比，只相当于其0.95%，而产量則占全数的46.46%。如果把十釜以上的絲厂中的器械制絲和坐纜制絲业分开来看，則器械制絲业占工厂数的81.2%，釜数的81.6%，产量的92%。器械制絲的这种发展逐渐拆散农业和工业的結合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轉化或上升为产业資本家的阶层則随地区而不同。

器械制絲最发达的地方是信州諏訪，这里的中下层农民广泛地展开制絲业經營，可以說是資本主义关系的自力发展。

“特別在平野村(1877年后)，十年間釜数相当增加，因为有許多制絲戶以前使用的釜数不滿十口，而以后发展为使用十釜以上的厂，这是值得注視的。总之平野村有小經營不断上升的情况，对

第5表 明治前半期器械制絲的发展 (单位: 貫)

年 度	器 械	改 良 坐 繰		旧式坐繰	合 計
		捻 造	折 叠		
1889 年	333,516	218,097	77,090	229,663	853,366
1891 年	423,587	272,041	106,051	286,297	1,087,976
1893 年	588,220	300,658	107,518	246,158	1,933,554

根据第14次《帝国統計年鉴》編制。

于这一从下面上升的力量, 实有再三探討的必要”(矢木明夫:《明治前期資本的存在形态》, 載《經济学》研究年报, 第21卷, 第1期, 1959年10月, 90頁)。

别的地区也能看到这种依凭本身力量的发展, 但是多因地主、豪农、豪商的活动而受到压抑。例如庄司和大石的研究判明, 促使福島的产业資本成长的人都是豪农和豪商出身的(庄司吉之助:《明治初年的資本存在形态》, 載《历史学研究》, 第170期, 1954年4月、大石嘉一郎:《自由民权运动与寄生地主制》, 載前引《商学論集》, 1955年1月), 这种发展同从下而起的农民的发展发生冲突, 成为福島的自由民权运动加剧的基础。群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关系。服部之总在晚年同下山三郎(《民权运动笔记》, 載《历史評論》, 1954年1月号)进行論战时, 就用这点來說明群馬的制絲資本家采取“中立”态度的根据(服部:《自由民权运动中的豪农和中农》, 載《服部之总著作集》, 第5卷, 1955年版, 276頁起)。

这些資本家在保持地主或商业資本家地位的同时, 又投资于产业, 采取这种形态的資本形成, 就日本來說, 实在是比較正常的。因此像諏訪所見的那样, 在中农阶层的分化过程中上升的制絲业者們, 成长后还致力于土地所有权的增强, 以加强作为地主这方面的势力。“由于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 圍繞着制絲业的条件距离确

立产业资本的基础还远，而持有土地却比较稳定而有利，他们当然会有这种打算”（矢木：《经济学》研究年报，第21卷，第3期，1959年12月，97页）。

在器械制丝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广泛留存以群馬县的将原料茧分发制户缫制为代表的许多家庭工业，另一方面还逐渐产生大企业，如1895年的片仓组、1896年的郡是制丝公司、1897年的岡谷制丝公司等。可是这样形成的产业资本并没有摆脱商业资本而独立，他们受到横滨的批发行经由先期贷款而实行的控制，批发行运用先期贷款，就掌握了一般制丝业的生杀予夺之权。这种批发行又向银行或外商举借资金，因此先期贷款信用代替了近代信用制度，制丝业中产业资本的真正确立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二

农业和工业经由地主、豪农而发生连结关系，在缫物业方面比制丝方面更为普遍。在这个时期的缫物业中，丝织业比棉织业发展更快。丝织品产量，包含丝棉混织在内，1886年超过棉织品产量，1889年输出额超过输入额，以后就确立了它的地位。就数字来看，1884年产量为2,233,000日元，1889年增至14,417,000日元，1893年又增至26,317,000日元，1890年后输出额占产量的10—20%。丝织业的这一跃进，是由于出口纺绸的输出进展，纺绸占丝织品输出总额的90%，主要市场是法国和美国。

“出口纺绸是从明治14年（1881）到明治18年（1885）那个萧条时期内在桐生地方开始缫制的。桐生在明治24年（1891）生产了全国纺绸产量的81.42%。桐生从‘萧条时期’起情况大为好转。……桐生首创的出口纺绸，早在明治18年（1885）就和上州式的巴丹织机同时传到米泽制丝所（工场手工业），同时又由桐生

傳入川俣”(堀江英一,《近代产业史研究》,1948年版,91頁)。

特別重要的是,福井、石川等加賀綢的旧产地,自从1887年由桐生傳入用巴丹机織制紡綢的方法后,就迅速发展为出口紡綢的产地。从明治中期后,这个地方成为日本輸出絲織品的中心,而其“基础的建立”,却是从1892年开始大量織制紡綢以后(福井县織物同业公会,《五十年史》,1937年版,273頁)。据说絲織品的輸出中心所以由桐生、西陣迅速轉移到北陆地方^①,是因为福井、石川采用了巴丹机,促进了新兴工場手工业发展,使产业資本的发展占了优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办这些工場手工业的还不是自力发展的資本家,而是士族和地主,在各郡村还存有广泛的批发行控制的家庭工业。而桐生、西陣那种旧产地,其主要生产方式依然是副业性质的資本主义家庭工业,沒有向大量生产輸出品的織业发展。

棉織品产量也在1884、1885年前后超过輸入額,并由1885年的5,345,000日元增至1889年的19,758,000日元和1893年的21,692,000日元。但在此期間,每年輸入額仍达4、5百万日元,輸出額还很低,不到絲織品的四分之一。由于棉織品的輸出市場基础是这样狹隘,就使一般机織业地区生产形态停滯在出租織机方式的資本主义家庭工业上,工場手工业的展开也比絲織业落后。以下举一两个例:

据谷口亲自在泉州調查的結果,这里以地主制为基础,广泛展开了出租織机制度。

“出租織机的业主將織机貸給农家,但不收租金,而由农家向租主交納一部分織出的布。……租主控制的农家数目,由于豪农

^① 包括新潟、富山、石川、福井四县。——譯者

不在內，約占全部农户的 80%。而从事机織的农家差不多全被租主控制，村里沒有不織布的人家，情况好的人，也雇用女僕織布”（谷口行男，《泉南郡棉織品发展史》，32 頁）。

足利、伊予及其他織业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形。而在幕府末期以来即已广泛展开工場手工业的尾西地方，有力量的生产者們在扩充产品种类的同时，又进一步发展工場手工业，从而促进了中农貧农的分化，或者发展为織物业者，或者沒落而成为佃农。这里还出现了雇用 300 人以上的工場手工业，織制絲棉混織的新式品种，打开了发展的途徑。尾西寄生地主制也是从这时正式展开的，上升的阶层，大多致力于积累土地。原来充当农民商品流通樞紐的农村商人，就經營洋紗和本国的机器紡出的紗，同大特权商人相勾結，寄生于农民的商品生产，并积累土地，以加强其营业的基础。因此織物业的发展，不但成为地主和高利貸資本家积累的基础，就是依靠自力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和地主制有密切的結合，并加强了地主制。

棉織业中的出租織机制度或工場手工业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从技术方面來說，就是同輸入的洋紗相結合而扩大生产，但是这时棉布还是繼續輸入，特别是差不多占一半的細白布輸入給原来的土白布以重大的威胁。据說輸入的棉布比原有的土布便宜 20%，为了和洋布相对抗，只有开办近代化的大工厂。因此在 1887 年后，棉織方面，也在京都、大阪开办了使用蒸汽动力的机器工厂。但其生产力还低，織物品种也有限，在 19 世紀 90 年代，一般还繼續使用旧的生产方法。

三

在 1886 年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特別重要的事，是在兵工、造

船、制铁等官办和政府发卖給民間的軍事性大工厂以外，铁道、棉紡、造纸和煤炭等若干产业方面已在专制主义的庇护下开展机器工厂制度。这种发展，固然是由于整理紙币和充实金融制度导致了利息低落和世界各国改用金本位制使銀价下降，从而出現了对产业投資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又是因为在政府保护下进行原始积累，使华族、政商、地主等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貨币資本，才能办到。政府采用支付固定投資的利息和給予補助費等方法，对这种发展予以保护、扶植。集中資本所必要的股份公司制度也經由 1890 年制定商法而趋于完备。

在这种条件下，又在整理紙币和金融告一段落时，近代大工业的展开首先表現在激烈的股票投机那种兴办企业的热潮上。这种投机活动从铁道开始，接着轉移到棉紡业，再扩展到矿业，最后达到一般企业。据說当时“一个公司成立，旁边又成立一个公司，甚至还没有調查有无利益可图，就先办起公司，刚刚說是开办公司，就收到許多訂购股票的申請书，其数超过預定股額，而且不等开办手續完备，申請书就有了价格，热狂地进行交易”（东洋經濟新报社編：《金融六十年史》，1924 年版，358 頁）。以两毛铁道公司的募股情形为例，規定交納担保金 50 錢的权利股，产生了 5 日元的價格，接着漲到 10 日元，继即高达 50 日元，即可見其狂热情形。成立的公司，“很多朝立夕亡”（瀧澤直七：《稿本日本金融史論》，1912 年版，233 頁），而且虽然成立了公司，粗制濫造的弊病显然还是很多，如在棉紡业方面，为了增加产量而放入水蒸汽，已成一般現象，最严重的，还有把手巾放进去的。

尽管如此，日本产业还是經過这种企业热潮而建立了机器工厂制度。又除专制主义政府的大力保护和培植外，只是由于商业資本的利益在特定产业中与产业革命相結合，才能确实保持这种

成果。这一发展所必需的市場基础也由于那时商业性农业和工場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已經具备。当时公司企业的发展情形見第 6 表。

如第 6 表所示，矿业、运输业、工业的发展都很迅速。銀行业在这个期間的发展却比較差些，那是因为銀行业作为华族、地主、商业資本家們的有利投資对象，已經先有发展。如第 6 表所示，1884 年年底的銀行业資本占公司資本总数的 83%，居于压倒的优越地位。但由于开办日本銀行和修改国立銀行条例等原因，国立銀行須收回发出的銀行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經理政府公款的三井銀行等私立銀行也面临着日本銀行开办后随时可能提走国庫金的危机，所以有力量的銀行都改变原来的营业方針，努力吸收民間存款，以图巩固作为普通銀行的基础。从 1885、1886 年前后起，存款吸收业务迅速走上了軌道，貸放的款項也有增加。从 1885 到 1889 年，貸放款項总数激增了 117%，这显示銀行資本和信用对于产业資本的积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1890 年，政府制定銀行条例和儲蓄銀行条例，策划培植商业銀行。在当时的銀行中，还有許多是沒有超出放高利貸的公司之域的小規模企业，也有不少銀行是为了利用存款来进行种种投机活动而开办的。而有力的資本家已在政府的保护下通过設立銀行来集中貨幣資本。住友銀行是 1895 年開設的，三菱合資公司的銀行部也是在那年成立的。銀行的发展又使地主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結合起来。这种发展不但把地主的貨幣轉化为資本，而且可以經由銀行有利地购入抵債的土地，或者用低利借入款項，再轉放高利貸，这对加强地主制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兴办企业的热潮首先出現在铁道方面，这变革性地开辟了国内市場。試观下面的例子：

第6表 明治初年公司和銀行的发展

	1884年底		1890年底		
	公司数	名义資本 (千日元)	公司数	名义資本 (千日元)	繳納資本 (千日元)
农 业①	55	1,224	439	7,668	2,576
矿 业	2	24	188	12,910	6,729
运 輸 业	204	6,892	346	103,631	49,826
铁道	—	—	31	78,941	31,869
水运	—	—	145	16,813	15,691
其他陆运	—	—	170	7,877	2,266
工 业②	441	5,266	1,119	65,147	34,359
棉紡	6	276	61	15,085	8,738
生絲③	211	2,372	687	6,216	4,439
織物	7	251	243	4,598	3,155
造纸	—	—	48	2,562	2,001
小 計	702	13,408	3,092	189,356	93,490
商 业	615	9,921	1,221	37,226	19,073
各种販卖及买卖	256	2,636	677	20,085	7,787
貨款	312	5,350	321	7,142	6,239
交易所④	19	1,185	17	1,105	1,105
銀 行⑤	1,097	87,100	1,055	96,634	96,634
特殊銀行	2	8,000	2	14,500	14,500
国立銀行	140	44,536	134	48,645	48,645
私立銀行	214	19,422	217	18,977	18,977
类似銀行的公司	741	15,143	702	14,513	14,513
其它性質不明的	114	4,796	—	—	—
总 計	2,528	105,223	5,368	323,216	209,197

根据大塚金之助、渡边謙吉：《資本积累和經濟危机》，岩波书店：《日本資本主义发展史讲座》，1932年版，26—27頁，原表見第7及第11次《統計年鉴》。

- ① 不包含养蚕业，1890年的农业数字包含漁业与畜牧业，制茶和制糖列在工业内。
 ② 包括工业及制造、販卖公司。③ 1884年的生絲内包括养蚕、制絲及販卖业。
 ④ 包括米交易所和股票交易所，由于繳納資金不明，姑以名义資本为繳納資本。
 ⑤ 特殊銀行和国立銀行栏所列的是全部繳納資本，私立銀行与类似銀行的公司部分则系全部名义資本。

“如将长野县各地与东京和其他地方修通铁路前后的运费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在铁道通到长野县以前，上田、小诸和长野等地的买卖属于东京的势力范围，松本、盐尻、諏訪和饭田则主要的属于名古屋范围。……而自明治12年（1888）信越线通到上田和大屋后，原有的运输路线起了变化。由糸鱼川驛道运来的盐系经由直江津运到上田、大屋；运到松本、盐尻来的货物系经由上田越过保福寺峰；运到諏訪方面来的货物系经由大屋越过和田峰；都是靠马车和马运送的。特别是东京至横川通车以后，野州方面运出蚕茧大为便利，有力地促进了諏訪方面制丝业的发展。原来从坂本越过碓冰峰到制丝工厂所在地的岡谷，大约有25里（日里）路程，要7天才能运到，每筐装30斤蚕茧，须付1日元50钱的高昂运费，而且会坏掉40%的茧。但因铁路通到碓冰峰，茧和其他所有货物都用铁道运输，结果到諏訪的货物经由大屋运送，到松本的货物经由上田运送，而且松本与名古屋之间来往的货物都移到东京，因此上田和大屋一时趋于繁荣。……但因明治35年（1902年）12月铁路修到盐尻，竟使上田和大屋方面的运输废绝，运货马车大多转移到盐尻、西条方面，改运西条煤和其他小宗货物。……又因中央东线富士见与岡谷之间通车，不但原来经由碓冰、篠井的货物都改由中央线运送，而且在当地所产柴炭不够供应丝厂燃料后能从常磐等处运来补充”（铁道院：《我国铁道对社会及经济所起的影响》，上卷，1916年版，378—381页）。

在此以前，政府于1872年经手修通东京、横滨之间长18英里的铁道，接着又先后修通下列官办铁道：即1874年修通大阪、神户线、1877年修通京都、大阪线，1880年修通京都、大津线。又在1881年，由池田章政等461人联名发起，以华族的金禄公债为主要资金来源，成立了日本铁道公司，在政府的非常优厚的保护下，于1882

年到 1891 年之間全部修通了東京到青森的長達 529 英里的路綫。至於東京到京都的鐵道，在軍部的主張下，政府本來按照中山道干綫的計劃，從 1883 年起着手施工，但因地形“險峻崎嶇”，又在 1886 年改訂東海道干綫計劃，於 1889 年全部修通 380 英里的東京、神戶綫和 10 英里的橫須賀綫。在這個基礎上，私營鐵道也出現了大發展。

從專制主義的立場來看，敷設鐵道的軍事意義是最重要的，但從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這一事業對國內市場的形成立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點已於前述。鐵道事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固定資本，修建期間又長，資本周轉需要相當長的歲月，因此一般是在產業革命末期，資本積累達到相當高度時實現的。但是日本的鐵道，却在專制主義的指導下，首先從軍事目的出發，從官辦開始，因而顯著促進了國內市場的開辟。又在私營的場合，如以日本鐵道公司為例，不但由政府承辦建築工程，而且免收所需土地的租稅，並在開業前保證付給股東年利 8 分，保護非常優厚，因此一開始就是極為有利的事業。

1885 年以來的興辦企業熱潮之所以首先集中在鐵道上，是由於政府從軍事目的出發極力獎勵和幫助鐵道的迅速普及，引起華族、政商、商業資本家和地主進行投機性的投資之故。於是私辦鐵道大為發展，成立的鐵道公司，1885 年有阪堺鐵道、1886 年有伊予鐵道、1887 年有兩毛鐵道和水戶鐵道等，又在 1887 年頒布了私營鐵道條例。此後成立的，1888 年有山陽、九州、大阪、讚岐、關西、甲武等鐵道公司，1889 年有甲信、筑丰、北海道煤礦和總武等鐵道公司，1890 年有參宮、日光、丰州等鐵道公司。在 1891 年年底時，開業的私營鐵道有 1,165 英里，達到官辦鐵道的兩倍，建設費為 4,400 萬日元，1891 年的利潤約有 300 萬日元，平均一英里路綫的

純利約达 2 千日元。

在铁道方面呈现上述发展时，同样包含军事意义的海运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如前所述，政府给岩崎的三菱公司以壟断性的保护，三菱的势力，不但威临日本所有的海港，还经营汇兑、银行、海上保险、仓库等业，拥有广泛的控制力。但自政府中支持三菱的大久保死去，大隈又去职后，打破三菱壟断的呼声迅速提高。以此为目的，澁澤荣一、益田孝等于 1880 年设立东京帆船公司，1882 年，在农商务卿品川弥二郎的支持下，澁澤、益田等又发起合并帆船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组成 300 万日元资本的共同运输公司，开始与三菱进行激烈竞争。这种竞争的极端发展不断造成亏累，长此下去，只有两败俱伤，因此两个公司就于 1885 年在政府的指示下实行合并，成立 1,100 万日元资本的日本邮船公司。政府保证在这个公司创立后 15 年间，如果利润不到 8 分，就帮它补足，并给予其他保护。1893 年实施商法后，日本邮船公司由半官半民改成纯粹民办，成为三菱的直系公司。在这年年底，它拥有船只 47 艘，共 7 万吨，开辟了上海、海参崴、仁川和天津航线，1893 年又开辟了马尼拉、孟买航线，实为日本最早的远洋航线，继续保持着壟断的威势。

日本邮船公司成立的前一年（1884），在大阪府和几个县的保护下，关西^①的政商投资开办了大阪商船公司，1887 年又有东洋轮船公司的前身浅野航运部成立。大阪商船公司也开辟了大阪到仁川的航线，但规模很小，究竟比不上日本邮船。到 1893 年年底为止，日本的海运已经伸展到朝鲜、中国、帝俄、菲律宾和印度，船舶达 4 百艘，共计 16 万吨，从军事上和商业上来看，都发展到了

① 大阪、京都地区。——译者

相当的程度。

四

在工业发展中，意义最为重要的是1886年后迅速发展，并确立为近代大工业的棉紡业。

在此以前，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和奖励措施，如开设官办模范工厂、以分年摊还价款的条件发卖十套棉紡机器设备、垫付输入棉紡机器价款等，结果从1880年到1885年为止，在各地开设了装设2千锭到4千锭设备的棉紡工厂。就数量来说，1885年官办和民办的合计22家，共有设备65,200锭。这些棉紡工厂，除中央政府和各县开办的以外，都是拿到土族生产资金的旧领主和批发行、地主投的资，而且多半是依靠政府的保护，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而开设的。因此经营松懈，浪费很多，没有成绩好的。至于技术上的基础，则动力多用水力，其运转受到由于寒涸、插秧、天旱而发生的水量减少的影响，而且机器运转拙劣生疏，“工厂管理不善，职工业务不专，原料选择不精，不经常进行纱质试验”（《茧丝织物陶漆器共进会报告》，1885年版，12—13页），因此成本高昂，制品的质量也和土紡机紡出的纱没有多大的差别。当然这些紡纱厂是不能驱逐输入的洋纱的，它们只能同使用土紡机的纱厂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竞争，据说在当时的“经济萧条期间”，免于损失的是极少数。

在这些纱厂中，由澁澤荣一首创，于1882年成立的大阪棉紡公司是唯一出类拔萃的。这个纱厂作为资本28万日元的股份公司而成立，前田、蜂须贺、毛利等华族投的资占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一，还有东京、大阪的有力量批发行和政商投资。他们虽然也是以追求特权性的商业利益为目标，但拥有紡机一万余锭，实为当时

日本规模最大的纱厂。在技术方面,这个厂第一个使用蒸汽动力,负技术责任的是在英国学习棉纺技术多年的山边丈夫。为了延长操作时间,还首先实施夜间作业,因此从1886年起,又在日本工厂中率先使用电灯和其他新设备,它的工作效率也非其他工厂所能比拟。据絹川云峰的研究,当时一般纱厂的工作效率,是纺制平均13到15支的纱,每锭每班工生产16、17匁^①到20匁(合现有效率标准的20%左右,见絹川:《我国棉纺史》,第3卷,1938年版,206页),这就成为许多纱厂在棉花和棉纱的价格差别上受到损失的原因。又据1885年举行的棉纱集谈会的报告说,走锭精纺机的旋转数,“西洋各国一分钟5次,而我国只有两次,有的在逐步改成3次,职工就受不了那种劳动”。可是在大阪棉纺公司所属使用蒸汽动力的车间里,每分钟已经旋转3次以上,而且还在暗中策划增加到4次(絹川:《我国棉纺史》,188页),因此从最初起就能获得高额的利润,股息也很大。

由于受到这个大阪棉纺公司的成绩的刺激,从1886年以后,政商、棉纱棉布批发行和地主等相继投资开办和充实近代化的棉纺厂。据说从1887年到1890年,在各种企业的投资总额4,100余万日元中,棉纺方面的投资差不多占40%(1,500余万日元)。大阪棉纺公司首先增加3万锭设备,接着新开办了三重纺、东京纺、天满纺、浪花纺、尾张纺、钟纺、摄津纺、洋白布织制、尼崎纺、仓敷纺、三池纺等后来成为大棉纺企业的公司。这些近代工厂的新设和充实使日本棉纺业的面貌一新,棉纱设备,由1887年的84,428锭增至1893年的475,158锭,在同一期间,棉纱产量由1,213,000贯增至10,667,000贯。这些工厂大部分使用蒸汽动力,在精纺机方面,

^① 日本重量单位,贯的千分之一,合3.759克。——译者

很多厂从走錠精紡机改用环錠精紡机, 1889年, 环錠精紡机数已經超过了走錠精紡机, 到了1893年, 环錠精紡机有391,488錠, 走錠精紡机只有81,670錠, 另有斯洛斯尔机2,248錠, 即环錠精紡机占有压倒的优势。又在这种紗厂迅速扩大的情势下, 原料方面, 只靠原来使用的日本棉花已告不足, 还使用中国棉花。1889年后, 从大阪棉紡公司起, 許多紗厂开始使用印度棉花, 美棉也逐漸輸入, 以后就不再使用日本棉花做紡紗原料了。

新式机器的使用和用作原料的棉花的改变, 使日本棉紡业成长为能与先进各国竞争的近代产业。每錠生产效率和紗质的提高如实地显示这点。在1889年前后, 按平均粗細, 即14.5支紗計算, 环錠精紡机每錠能生产87匁, 走錠精紡机能生产64匁, 而在1893年, 环錠精紡机能生产17.2支紗107匁, 走錠精紡机能生产14.2支紗74.5匁。又为防止粗制濫造, 免使紗质降低起見, 棉紡业联合会于1889年規定互相审查制品和处罚办法, 以图提高紗质。加之便宜的劳动力使日本工厂費用低廉, 如就1892年来說, “每磅20支紗所需生产費用大約为2錢2厘, 比印度的同种操作所需費用約3錢3厘低1錢1厘, 即每捆低4日元40錢”(《棉紡月报》, 1892年5月号, 載信夫清三郎:《近代日本产业史序說》, 116頁), 因而增大了競爭力。

棉紡业确立为近代产业的过程, 又是本国机器制出的棉紗与原有的竞争者相对抗, 并确保其市場的过程。由于棉織品的經緯綫不断改用机器紡制的棉紗, 所以旧式的手制紗固然受到淘汰, 就是土紡机制出的棉紗也被驅逐, 而只用在特殊的用途上。輸入洋紗的数量, 也从1889年到1890年减少了四分之一, 被国产棉紗超过, 特别是从孟买輸入的棉紗, 从1890年的1,397万斤減至1891年的454万斤, 即猛減67%, 被驅逐的速度是极快的。

棉紡业的发展虽然是这样显著,但如細察其企业内容,就可以看出它的市場基础薄弱,經營上也还有很多投机性的不健全的企业。例如1894年各棉紡公司固定資本为1,230万日元,而交納資金只有1,142万日元,差不多完全没有公積金。各棉紡公司的債券和借款共計668万日元,其利息达60万元,相当于全部純利140万日元的40%以上。以钟紡为例,开办后每年提起解散問題,終于因为还不起担保借款而落在三井銀行手里,由中上川彦次郎指导經營,起用武藤山治后才作为近代产业而复苏。1896年創立的富士紡也是每年亏损,后来归于森村市左卫門之手,延致了和田丰治,經營才臻于近代化。棉紡业的发展,与其說是为了发展棉紗制造业,不如說是地主等为了投机或棉紗棉布批发行为了确保原料而推行的,所以追求商业利益是其主要目的。在这个过程中,1882年,由官办的爱知棉紡所发起組織棉紡业联合会,1888年改組为大日本棉紡同业联合会后就进行了早期的卡特尔活动,一面成为向政府要求国家保护的有力机关,同时策划对付工人的資方联合行动,或者締結关于生产和販卖的协定,以对抗輸入的洋紗。在沒有关稅自主权的情况下,这种措施对这个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棉紡方面确立近代化大工厂的同时,棉織业中也創立了近代化大工厂制。大阪棉紡公司于1887年用英国輸入的动力織机333台开办了大阪織布公司,1890年并入大阪棉紡公司,成为棉紡公司“兼营織布的先驅,并率先經營染色加工业务”(《东洋棉紡七十年史》,1953年版,102頁)。在大阪織布公司成立的前后,政商、批发行資本家投資开办了京都棉紗織物(天滿織物)、小名木川棉布、白洋布織制等公司。但是当时差不多完全没有訂购大量同类制品的戶头,織制的方法也非常分歧,染色的手續很复杂,連

大工厂里也沒有超出手工业以上的程度，因此經營相当困难，不能像棉紡业那样发展。在这些公司中，白洋布織制公司自始即以朝鮮、中国市場为目标发展經營，倒是值得注視的。

在其他工业中，造紙业的发展也很显著。1875年，在政府的奖励下，王子造紙公司以印制地契用紙为目的而設立，1887年把資本增加到50万日元，添建工場。在此前后，还成立了东京板紙、富士造紙等公司，确立了近代的大工厂制。但因原有的日本紙另有用途，所以仍旧作为农家的付业而繼續存在，从生产量來說，1894年洋紙产值为2,288,000日元，而日本紙为8,061,000日元，日本紙的比重大得多。

重工业方面，在当时的阶段，还是軍事上有必要的陆海軍工厂占压倒优势，民办企业的发展很低微。就其中发展最快的造船业來說，原在19世紀70年代前半期借用海軍軍用地和久留米藩的机器而創立的石川島平野造船所和田中机械工厂（后来的芝浦制作所），这时在海軍的保护下，改組、扩充为近代大工厂。1886、1887年，又相继将兵庫、长崎两造船所分別发卖給川崎和三菱公司。由于当时机械工业一般还没有形成，所以这些造船厂又兼具机械工业的性质，但如与政府的設備相較，可以說只比得上海軍工厂的一个分厂，如在1890年，以横須賀海軍工厂和11家主要民办造船厂相較，后者的动力机和职工的总数还比不上一个海軍工厂。

至于鋼铁业，与軍备关系最深的炼鋼作业也还差不多全在陆海軍工厂中进行。制铁方面，有用旧式砂铁炼制法生产的土铁，但成本很高，超过輸入品一倍，而1884年发卖給田中长兵卫的釜石铁山，則因軍部需要增大，予以支持，才能在1891年、1892年前后具备年产7千吨的制铁能力。据1890年大阪兵工厂的試驗，证明釜石铁的质量超过意大利的古列高里铁，可見已能生产质量良好

的铁。但就产量来说，釜石铁还不能超过中国地方用旧式砂铁炼制法制出的铁。

再说矿业，这时已对煤、铜等矿进行投资和使其近代化。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已将高岛（卖给后藤象二郎，后于1881年让给三菱）、足尾（卖给古河市兵卫）两矿发卖，从1884年到1896年，又将小坂（久原）、院内（古河）、三池（三井）、幌内（北煤）、佐渡（三菱）、生野（三菱）等矿发卖给括弧内所列公司。这些大矿率先实行近代化的技术改革。例如足尾矿于1890年修成水力发电站，进行采矿电气化，1893年完成酸性转炉制炼法的试验，建立了古河财阀的基础，在生产铜的方面领先。当时日本已成为世界有数的铜产国，输出其产量的80%。煤矿方面，高岛、幌内、三池因规模远远超过一般企业和导入外国技术，在这方面的发发展占领导地位，形成三菱矿业、北海道煤矿和三井矿山的起点。但是即使是这些矿业，以后在很长时期内，经营上还被三井、三菱等财阀追求商业利润的动机所支配，在这点上，和以投机利益为目标的煤批发行经营的小规模矿山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至于财阀的商业资本利益和矿业的关系，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三井物产公司^①的创设，即以工部卿伊藤博文^②和三井的益田孝缔结三池煤委托贩卖契约为起点，足见自始就有紧密的关系，将三池发卖给三井，也是为了物产公司的利益。日本煤矿业不是由于产业革命导致机器工厂的发展，因而适应制铁和工厂动力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当时日本的煤，除一部分用于制盐外，其重要用途是供应对外通商后轮船所需燃料和铁道发达后所需动力，并特别以输出为重要目标。因此与政府相勾

① 实际上是商业和贸易公司。——译者

② 长藩低级武士出身的官僚（1841—1909），曾任内閣总理大臣、枢密院院长、韩国统监等职。——译者

結、占有壟斷市場的特權政商就在日本煤礦業中建立了重要地位，特別是與三井物產公司相結合的三井系的三池煤礦、與郵船公司相結合的三菱煤礦和與鐵道相結合的北海道煤礦占有統治地位。

最發達的煤礦是出產輸出的煤、並與利用瀨戶內海的舢板的批發行有密切關係的筑豐礦區，其產量由 1885 年的 23 萬噸劇增至 1897 年的 272 萬噸，所占全國煤產量的比率，亦由 18% 增至 52%，形成日本煤礦業的中心地區。筑豐礦區首先是由當地士族、地主出身的小煤礦主開發的，後來政府策劃合併這些小煤礦，指定選定礦區，把礦區擴大了几十倍。在此期間，松本（安川）、貝島、麻生等地方煤礦主在井上馨等官僚的庇護下擴展起來，從 1889 年到 1896 年，三菱、日本郵船、住友、古河等也到這裡來活動，稍遲一點，從 1896 年到 1901 年，三井也攫取了田川、山野等礦。1885 年起，海軍以筑豐為中心指定預備煤田，不許一般業者經營。筑豐於 1881 年建成利用蒸汽力排水的設備，從 1883 年到 1889 年，在各豎井和斜井中都使用機器進行搬運，又從 1887 年前後起普遍使用火藥爆炸。也有別的煤礦業使用了近代化技術，如常磐從 1882 年起，宇部從 1886 年起逐漸開始使用，北海道煤礦則除幌內外，還開發了幾春別、空知和夕張礦，繼續對鐵道和石狩煤區進行壟斷式的經營。但是煤業的主要生產方法，還是高島煤礦的殘酷事例所顯示的那種奴隸式的勞動和囚徒勞動等手工操作，這又是煤礦業者最重要的利潤基礎。

2. 資本主义的形成

上述迅速進行的資本積累加劇了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在資

本主义的发展中，虽然商业資本占有显著的优势，但又促进了棉紡及其他产业中的机器工厂的迅速发展，而生絲、織物等部門却在—部分采用机器的同时一般地停留于工場手工业阶段。重要之点是：机器工业的生产还没有把工場手工业生产并入自己的范围，而适应这些生产而开展的国内市场，由于除上层农民外，农村中一般保持着贫穷状态，因此还停滞在狭隘的规模上。这是由于农村中继续存在着半封建的零細农耕，資本主义的侵入剥夺了农民的副业，因而进一步加深他們的贫穷，結果工业生产并没有扩大市场，反而受到商业利益的支配。加之信用制度还没有充分发展，商业市场的衰退立刻引起金融紧迫和商品价格的下落，并将牺牲轉嫁在生产者身上，发生一般的危机状态。

1890年爆发的危机就带有上述性质。这是在投机性质的兴办企业热潮发生后金融极端紧迫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美国的政策导致銀价高涨，使生絲輸出激减，又因歉收造成谷价騰貴，使米的入超剧增，这就成为危机的起点。

“危机的显著爆发，是在1899年的下半年，九、十月之交。当时发生了風水及其他災害，歉收已成定局，米价高涨，同时到处鬧金融紧迫，除谷类和以谷类为原料的食品外，其他商品都从那时起开始决定性的跌价，特别是皮棉的跌势十分显著。到了1890年，各方面都感到商品呆滞和不景气。1890年5月，日本銀行采取了危机对策，規定以股票为担保进行支票貼現的新办法，以救济各产业和銀行。全国棉紡业者于11月举行联合大会，討論救济办法”（大塚、渡边：《資本积累与經濟危机》，《日本資本主义发展史讲座》，34頁）。

自从大塚等进行分析后，一般人都认为这次危机是日本第一次資本主义危机。誠然这次危机是与迅速的过剩积累相关連，其

性质与 1881 年到 1884 年的深刻蕭条确实不同。特別在經歷着迅速的产业革命的棉紡业方面，显然出現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現象。其状况有如下述：

“在明治 23 年(1890)經濟不振达于极点时，棉紡业也由于产品停滞，紗价激落而陷于不可名状的困境。試观当时这方面的情况，虽然棉花依然保持高价，而紗价反而日益低落，制品銷路越来越壅塞，使銷不出的制品堆滿仓库。……棉紡业所以陷于此种苦境，是由于种种不利的情况相继发生，如金融紧迫、米价騰貴、連月淫雨、外汇跌落等。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大原因，这个大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棉紗供过于求。……一方面尽管棉紗的供应量異常增加，另一方面棉織业者却还没有想出使用这种成倍增加的棉紗的办法，結果供过于求”(庄司乙吉：《棉紡业开工減縮史》，1930年版，1—2 頁)。

棉紡业的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已于上述，但一般的說，当时机器工业还不发达，大部分的产业还是工場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这些工場手工业还没有并入机器工业，因此不能认为它們的厄运是生产过剩的結果。危机之所以沉重地打击了股票投机者和貿易商，是由于不正常的股票投机和公債募集造成金融紧迫，又因米的歉收和銀价騰貴所导致的貿易逆轉而成倍加剧的結果。因此把这次危机看成第一次周期性危机，是有問題的。当然也可以考虑到世界危机在日本的反映，但是 1890 年的世界危机并不是那么大的。由于生絲貿易的媒介，与日本关系最深的是美国，而其危机发生于 1893 年，和日本的危机没有发生好大的关連。因此这次危机造成的損害虽大，但如只就生产过剩这点来探討其性质，却只能认为它是涉及棉紡业和其他一些工业的局部生产过剩危机，而不是全般的資本主义危机。

可是这次危机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危机对投机热潮浇了冷水，许多经营不善的小公司垮台，萧条的状态一直拖延到 1893 年前后。但是棉纺业的生产过剩促使这个产业倾向于开辟海外市场，迈出了输出机器工厂制品的第一步。在危机期间，棉纺业者集結于棉纺业联合会，1890 年 11 月，議决扩充制品的海外市场、要求免除棉紗輸出稅、防阻孟买紗的輸入、扩充国内銷路和扩大商业信用上的便利措施，并决定五年內在每年 3 万捆的限度內进行輸出。1891 年 7 月，大阪棉紡公司向厦門輸出 20 支紗 5 捆，这是日本棉紗輸出的开端。以后棉紗輸出逐年飞跃增加，从 1891 年的 32,000 斤增至 1893 年的 316,000 斤和 1894 年的 3,539,000 斤。1894 年免除了棉紗輸出稅，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輸出更有增加。这显示在当时采用机器工厂制造方式的日本棉纺业的生产力已經超过了印度棉纺业。而那时所以有此可能，是因为虽然这个产业有机构成还低，只凭投放的固定資本还不能与先进各国相竞争，而商业資本家和地主等积累的貨幣資本已經达到了一定的規模。

棉紗向輸出市場的进展更加剧了同外国棉紗之間的竞争。为了提高棉紗质量和由粗紗逐步改制細紗，紡紗用的棉花就迅速由本国棉和中国棉改为印棉和美棉。1888 年，棉纺业联合会已經議决請求廢除棉花輸入稅，1893 年又和日本邮船公司訂立印棉运输特約，使直接运入印棉的体制趋于完善。1896 年，棉花輸入稅終於廢除，棉纺业就确立了近代产业的地位。

二

第 7 表(1、2)显示从 1886 年到中日甲午战争发生那年的貿易趋势。輸出从 1886 年后迅速增加，其中生絲占总額的 35% 左右，

位列第一，其次是傳統的茶和米，新出現的銅、絲織品、煤、火柴等亦与茶、米相匹敌。輸入也有显著增加，但原居第一位的棉紗輸入从1890年前后起迅速减少，退居第三位，而棉花輸入却从1889年前后起迅速增加，跃居第一位。以下是砂糖、棉織品、石油、铁类等素来就靠輸入的物品，机械类也占有与它們不相上下的地位。就主要貿易国來說，輸出方面，购取生絲和茶的美国占总額的36—37%，位列第一，其次是輸入銅、火柴、煤等貨品的中国和买进生絲和絲織品的法国，各占22—23%。輸入方面，出售棉紗、棉織品、毛織品、机械等貨物的英国位列第一，占全數的32—33%，輸出棉花、砂糖的中国居第二位，占21—22%，接着是輸出棉花、棉紗的印度、輸出石油、棉花的美国和出售毛織品的德国，各占10%以下。

第7表(1) 1890年前后的輸出 (单位:千日元)

	总 額	米	綠 茶	生 絲	絲織品	煤	銅
1886年	48,876	3,301	7,512	17,321	75	2,208	2,203
1888年	65,706	7,421	5,880	25,917	268	3,186	3,537
1890年	56,604	1,321	6,068	13,859	1,181	4,796	5,378
1892年	91,103	4,162	7,239	36,270	4,460	5,006	4,902
1894年	113,246	5,593	7,569	39,353	8,489	6,578	4,930

第7表(2) 1890年前后輸入表 (单位:千日元)

	总 額	米	砂糖	石油	皮棉	棉紗	棉織品	毛織品	机械类
1886年	32,168	19	5,570	2,358	618	5,905	2,317	2,992	583
1888年	65,455	22	6,830	3,519	1,652	13,612	4,692	5,988	3,514
1890年	81,729	12,303	8,410	4,950	4,135	3,928	4,129	6,726	3,857
1892年	71,326	2,053	9,535	3,328	11,027	7,132	4,668	5,663	1,490
1894年	117,482	8,413	13,259	5,135	19,104	7,977	6,958	6,269	6,104

根据东洋經濟新报社：《日本貿易精覽》編制。

如这种貿易情况所示，虽然已經开始出現由棉紡业領先的产业的近代化发展的影响，但是主要的輸出品是原料和手工业制品，主要的輸入品是机器工业的完成品，这显示当时的日本經濟还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状态。又在輸出入方面，由外国商人經手处理的貿易品都占总額的 75—85%。由国内商人經手的貿易品，于 1893 年，有最初的机器工业制品棉紗，約占此項輸出总額的 90%，輸入方面，有棉花、机器、铁类等，各占总額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見貿易上爭取自立的努力是同依凭机器工业发展生产力相結合而进行的。

当时銀行和若干主要产业的近代化发展还只停留在局部範圍上，大工厂制还没有在国民經濟的再生产中占統治地位。因此資本主义要在世界市場上进行竞争，还需要进一步打好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中資本主义的发展，不但要和地主、豪农的农业經營結合起来进行，而且需要专制主义政府的庇护、培植，才能实现近代化。因此由于資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产业資本的利益，并不和政商、前期資本或地主的阶级利益相对立，反而为这些人的利益所左右，他們一起受专制主义的庇护，站在同一剝削基础上，共謀发展。自由民权运动的惨败和 1889 年明治专制宪法的实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专制主义的不可动摇的体制就和資本主义的这种发展相結合而建立起来了。

“經由明治維新和此后的資產阶级变革而打开了前进道路的資本主义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必須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轉折点上加以总结，在一切資本主义发展的动向中，总括地找出其結構。……总之一方面有基于利用官僚組織、軍事力量等进行控制的統治原理及在它下面被培养和发展起来的私有财产的原理而成立的双重組織的結構，另一方面有在資本主义发展同本身是近代产物，但又构成半封建生产关系基础的土地所有权之間起媒介作用的官

僚政治，加上对此种結合作用增添力量的官府式的議會而成为一种混合組織，这些組織按照自己規定的专制主义原理而統一起来”（平野义太郎：《日本資本主义社会的机构》，207—208頁）。

当时資本主义积累的基础还薄弱，又没有关税自主权，因此在占优势的商业資本家致力于同欧美先进国家竞争和夺回国内市场，并策划向国外市场发展时，除受到专制主义的庇护外，一部分企业中已經自己形成早期的壟断形态，1880年的造纸联合会和1882年的棉紡业联合会的組成和活动就是例子。同时在专制主义政府和官僚保护下产生出財閥，即福澤諭吉^①所謂“在豪富的大資本家的号令下”（福澤：《富豪的要件》，載《福澤諭吉全集》，第9卷，194頁）策划資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这种壟断形态的早期形成不是工业資本主义发展的結果，而是商业資本想使工业发展从屬自己而实现的，但还是促进了工业发展，又增加了专制主义的权威，成为維持、发展其政权体制的新形态。

到了19世紀90年代，大政商变成財閥，銀行和产业結合起来，显示了后来发展为金融資本的方向，可是那时的工业还很幼弱，到底够不上称之为壟断資本。但是以第一銀行为基础的澁澤荣一的活动过程被人們认为是“近世实业发展史”，1891年經井上馨介紹参加三井銀行的中上川彦次郎的活动，打好了三井康采恩的基础，1893年在岩崎弥之助领导下成立三菱合資公司，成为三菱康采恩的出发点。这些財閥的經營情形，如以三井銀行为例，在90年代終結时，本来把投資固定在王子造纸公司和北海道煤矿公司上，未見成績，中上川死后，改将重点移到物产^②和矿山上，以追求

①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1834—1901)，创办庆应义塾，其著作《劝学篇》，《文明論概略》等在在我国有中譯本。——譯者

② 实际上是从事国内外商业活动。——譯者

孫

商業資本的利益為中心。三菱也把中心放在追求商業利益上，除礦山、海運外，銀行、保險、造船等部門還很幼弱，不值得注意。就是造船業，也要依靠政府根據造船獎勵法給予的補助金，才能維持經營。可見他們在本質上，是勾結專制主義政府，通過國家而迅速獲得驚人巨富的資本主義投機者，並且是作為商業資本的掠奪者而肥大的。因此財閥把勾結官僚當作頭等重要工作，如三井與井上、三菱與大隈、松方都勾結得很緊。又如三菱的川田小一郎、岩崎彌之助和山本達雄，從1889年起，十年內先後擔任日本銀行總裁，這說明財閥的代理人還滲入了官僚組織內部。

三

資本主義和專制主義相結合，以上述形態而發展，就成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基礎。修改條約是明治初年以來長期沒有解決的懸案，這時專制主義者就從財閥、商業資本家的立場，而不是從人民的立場出發，與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勾結起來進行這一工作。

在此以前，井上和大隈在整個19世紀80年代推行的政府修改條約的方針，只要看了他們的那種歐化政策，就可以知道實際上是這樣的專制主義政策：即將對歐美的半殖民地狀態訂在條約上，以卑躬屈膝的迎合的態度與先進國家通好，同時進行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人民對這種方針進行了反抗。自從1885年各民主黨派進行大團結和三大建議運動^①以來，他們在內政上抵制外來干涉、外交上爭取平等條約的綱領下，一再迫使政府停止執行其方案。但自1890年以來，原來的民主政黨墮落^②，其態度起了變化。他們打算在當時的帝國主義的環境中，站在財閥和商業資本家的立場

① 自由民權派向政府提出的三項要求，即“言論自由”、“減輕地稅”、“挽回外交失策”，一時成為全國民主勢力的共同綱領。——譯者

来解决这个问题，“把争取完全平等的条约这一民族要求和国内民主斗争割裂，只提出对外强硬的要求。结果建立了反对卖国条约的国民统一战线，这固然是件好事，但是领导权落在国权主义者手里，使政府的侵略政策易于推行”（井上清：《修改条约》，1955年版，226页）实在是与政府沆瀣一气的。

政府力图把人民的要求转移到迫使近邻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上，使列强，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不受人民反感的影响，而得以保持，并本着这种打算进行修改条约的交涉。终于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由外相陆奥宗光于1894年7月与英国签订新约。这次修改条约的目的，是保持对中国和朝鲜的不平等条约的原状，让欧美帝国主义承认日本在东洋的特殊地位，而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远东的马前卒自任。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的这种地位，在军事方面，除英国以外，还为其他列强所承认。1894年11月又修订了对美条约，到1897年为止，与主要列强都缔结了经过修改的条约。这样除贸易上对日本不利外，就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与列强勾结起来向中国等地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活动的途径。

导致修改条约成功的，不止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如甲午战争的胜利所示，专制主义的军事力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甲午战争的胜利抬高了专制主义在军事上的威信，最后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这次战争的基础所在，是日本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环境中所走的特殊道路。

谈到这里，应当指出当时日本和朝鲜的关系的重大意义。从明治初年，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专制主义的保护、培植下迅速走

② 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起过进步作用的自由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因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上层分子的动摇、叛变，后来都和专制政府妥协，对内服从帝国宪法，对外鼓吹侵略扩张。——译者

上軌道的时候起，日朝之間的貿易关系就是異乎尋常的。早自足利时代^①起，对馬地方的領主宗氏就和朝鮮进行貿易，德川时代也照旧进行，但因1876年締結江华条約^②，反由日本把不平等条約强加在朝鮮身上，迫其开放国禁，以后日本廢除了彼此之間的治外法权和关税，到1884年甲申事变^③为止，差不多壟斷了朝鮮的貿易。当时日本的对朝貿易，在輸出品中，粗白布和其外国商品占压倒的优势地位，日本商人从中轉手，用差不多相当于买价20倍的价格出卖，賺取暴利。輸入方面，也用十分低廉的价格购买朝鮮的农产品或原料，而以5倍以上的价格在日本出售获利。

1884年的甲申事变使日本在朝鮮的政治势力衰退，清朝在政治上取得优越地位，同时清朝商人也迅速展开經濟活动。特別在輸出方面，从1887年前后起，清商的活动十分显著，到了1893年，日清两国的地位差不多相等，在仁川、元山等地，由于清商的活跃，使日商的势力大为丧失。清商力图在輸出上夺取日商的洋白布轉手貿易，而日本的輸出品却由轉手貿易逐漸轉向輸出銅及其他日本商品，在1893年前后，日本产品占其对朝輸出总額的80%以上。可是为了維持其貿易地位，还必须依靠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支持。在輸入方面，这时日本还占压倒优势，日本商人以釜山、元山等处为根据地，經由高利貸剝削和掠夺性的商业，包买米和大豆等物資，从而迫使朝鮮的封鎖性經濟体系瓦解和朝鮮农民迅速沒落。朝鮮政府于1889年发布禁止輸出谷物的防谷令，以图維持封建体系，但

① 足利氏充任征夷大將軍，实际上統治日本的时代(1338—1573)。——譯者

② 日本政府于1875年派軍艦侵入朝鮮的江华島，迫使朝鮮于翌年2月簽訂不平等条約，一般称为江华条約。——譯者

③ 1884年12月日本駐朝鮮公使和朝鮮亲日分子发动政变，被朝鮮軍民在清朝駐軍帮助下击败。——譯者

日本政府橫加干涉，迫使朝鮮取消防谷令，還要求賠償損失 14 萬日元，即圖用暴力來維持朝鮮市場。由於這種情形，所以甲午年（1894）的農民戰爭（東學黨起義），是在“斥倭洋、倡大義”的旗幟下發動的。

日本對朝鮮的強力掠奪活動，就是這樣依憑政治、軍事力量來維持的。代表這種經濟利益的，是從貿易商起到僑民中的“一旗組”^① 止的商業經營者。信夫清三郎等認為引起甲午戰爭的原因是以棉業為中心的日本產業資本家攫取市場的要求。對於這種見解，南說子曾提出正確的批評如下：

“如果從貿易表來看日本輸出的棉布的品種，就可以知道，甲午戰爭以前輸出的棉布，主要的是棉制法蘭絨、縐布、手巾布等家庭工業或工場手工業制品。白洋布、天竺布等大工業制品，大約在明治 29 年（1896 年）後才出現在輸出品中。……在生產輸往朝鮮的棉布的伊予、三河、大阪、足利等地，白棉布和縐布工場中已經使用巴丹機，但與其說這是朝向產業資本發展的過程，卻不如看成是經由租借巴丹機而日益從屬於進行包買的强大批發行的過程。而且從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在這種批發行統制下被緊密地結合起來開始，一直到後來成立工廠工業止，批發行資本始終占居優勢地位。所以在分析當時對朝鮮的棉布輸出時，如果認為是出於產業資本家的意圖，則似乎是勉強的（南說子：《日清戰爭與朝鮮貿易》，載《歷史學研究》，第 149 號，1951 年 1 月，45 頁）。

不用說，推動戰爭的潛在力量是雖然發展並不正常和尚未成熟，但却在迅速成長的資本主義。因此縱然專制主義軍部站在侵略朝鮮的最前列，而且他們從 1884 年甲申事變以來全力進行這種

^① 沒有什麼資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招搖撞騙的人。——譯者

活动的首要目的是維持和扩大专制主义权力，但是甲午之役并不是同資本主义无关的专制主义者单独发动的战争。就专制主义者的政策和資本主义的关系来说，首先原始积累是在天皇制政府指导下进行的，而且又是执行軍事上所需要的工业化的任务。又因天皇制的特殊的軍事冒险主义和近邻弱小民族的易于掠夺而成倍加重了这个任务。特别是以朝鮮为对象的商业資本主义的殖民政策成为专制主义政府的重要政策。到了这个时期，又加上日本資本主义的发展和朝鮮市場問題，更因世界帝国主义的侵入，东亚風云告急，使日本早就有了帝国主义性质的分割市場要求，因此为了扫清資本主义道路，作为資本主义政权的专制主义就成为必要的了。

有人說我曾經說过甲午战争是“民族战争”（丰田四郎，《日本資本主义論爭批判》，第2卷，1958年版，83頁、126頁；古屋哲夫，《历史教育的問題点》，載《历史評論》，1959年2月号，86頁），現在想就这点談一談：这几位都沒有指明我在什么地方說的。因此对我的批評沒有明确的根据。我以前的意見是这样的：

“甲午战争，(在上述)基础上，是在专制主义者，特别是軍部主导下发动的，因此是确立軍事的和半封建的日本資本主义及决定其結構的战争。这是在天皇制指导下迅速成长的日本資本主义从旧社会飞跃前进时必须經歷的冒险性的侵略战争。有的人简单地称这次战争为軍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战争，有的人认为它是专制主义在政府与議会的斗争中为了保持霸权而采取的‘孤注一擲的激烈行动’，或者說是‘玄洋社^①的阴谋’。我对于这些看法都不能同意。这次战争是从日本資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质产生的走

^① 1881年由头山滿等发起成立的鼓吹和进行侵略活动的团体，起名“玄洋”，是越过九州的玄洋滩侵入大陆之意。——譯者

向資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只就这点來說，可以說是‘帝国主义’战争。又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看到天皇制朝向軍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过渡”（守屋：《日本資本主义发展史》，1955年版，86頁）。

用一句話來說，这是专制主义者适应当时那个阶段的資本主义发展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經由这次战争的胜利，日本資本主义摆脱了长期成为悬案的不平等条約的束縛，加强了与天皇制的勾結，坚定地走向好战的道路，而这种基础是在这次战争以前就已經打好了的。

第四章

产业資本的确立

1. 产业資本的确立及其 本末倒置的构造

—

中日甲午战争的結果，日本确立了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馬关的媾和談判中，清朝承认朝鮮独立，付給日本賠款 2 亿两，割让辽东半島和台灣、澎湖島。日本还迫使中国承认与其和欧美各国締結的相同的不平等条約，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四处为商埠，并承认日本臣民在清朝各商埠、港口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的权利。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島还给中国，而中国加付賠款 3 千万两。

这些是以专制主义者带头的日本統治階級攫得的非常大的掠夺品。賠款总数合日币 364,868,586 元，日本統治階級就在战后用以增强軍事力量和撥充确立金本位的基金。中国割让台灣和澎湖島，使日本获得殖民地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基础，承认朝鮮独立和开四处商埠，又打开了日本資本主义壟断和扩充市場的道路。

“这次战争成为日本資本主义确立的契机，又决定了日本資本主义的軍事性格，天皇制主导下的資本主义还把实行臥薪尝胆以报复三国干涉当做对外侵略的口号。但就經由这次战争迫使中国

在长江沿岸开商埠和允许日人在中国内地自由从事制造业这点来说，日本在奴役中国方面自封为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的远东代理人的地位就实现了。以英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从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就采取了在中国扩充商埠的政策，而在中国内地自由从事工业活动的权利，却是在马关条约后依凭最惠国条款均沾而得的。于是列强的资本输出就侵入工业生产领域。这样日本因战胜而获得的优越地位即为列强所承认，因而摆脱了长期成为悬案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中国却被当作狮子的化石，成为瓜分的对象。又因中国为了支付赔款而举借外债，对华借款就代替了贩卖鸦片，而成为列强施行经济统治的主要武器”（守屋：《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1955年版，90页）。

站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前列的是对战争起主导作用的政府。1894年，山县有朋已经在著名的奏折中陈述战后扩充军备的必要，他说如果想当东亚的盟主，就应当策划从维持主权线推进到开辟利益线，1896年，伊藤内阁把这个方针落实在扩充军备的十年计划上。所需经费共计781,000,000日元，拨用赔款的一大部分，计325,000,000日元。其后各内阁都承袭这个方针，于1896年、1899年增税两次，增加酒税与地税等，新设营业税、登录税等；并开办烟草专卖，头两年就分别增加岁入2,600万日元和4,100万日元；又以事业公债、铁道公债等名目发行公债284,000,000日元，以充此项用费。按照这个计划，政府以全力进行增设6个师团、建立六六舰队^①、充实新锐武器等扩充陆海军的工作。

这个方针不止包括军备，还包括建立能够维持军备的基于工业。结果采取了创设官办八幡制铁所和扩大陆海军工厂等措施。

^① 由战斗舰6艘、巡洋舰6艘组成的主力舰队。——译者

从1894年到1903年，投放于以军需工业为中心官办企业的资本总额，由317万日元增至2,344万日元。为此增加的财政负担压抑地主和资本家的投资，致使政府和政党常常对立，但因政府措施导致资本扩大和地主持有的公债和股票价格上涨，结果发展为政府与政党沆瀣一气的新基础。于是资本主义越来越形成与专制主义勾结起来发展的独特形态，它从政府获得金融上的保证，并因军事力量加强而得到补充力量，所以能够确保中国与朝鲜市场。

这样资本主义就随着政府的战后经营而迅速发展。甲午战争也和西南战争一样，使御用商人即“死的商人”——三井物产公司、大仓组、日本邮船公司等获得巨大的利益，但是资本主义在战时并没有好大的发展。战争耗费了军事费2亿余日元，先拨用2,300万日元国库存余金，接着按照军事公债条例募集公债117,000,000日元，抵充了一大半。这些公债全是在国内发行的，因而大大妨害了事业投资活动。就当时的金融市场来说，超过1亿日元的公债，竟与全国银行的存款总额相匹敌，实在不是一笔轻易的负担。因此只好在战时极力压低其他投资。

但因战胜后获得巨额赔款，日本银行也放宽了放款方针，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随着政府的战后经营，以猛烈的兴办企业热潮的形态开始。这次兴办企业的热潮以铁道为中心，扩展到棉纺、银行、煤炭、水运、保险、电灯、造船等事业。在农村中，也到处流行着权利股票的买卖，就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况。还出现了许多空有计划，曇花一现的公司，从1895年1月到1896年底，计划资本额达1,280,000,000日元。其中实际成立（新设与扩充）的主要产业部门的企业公司数与资本额见第8表。

这种兴办企业热潮不久就在1896年秋导致危机，但自1897年2月议会提出采用金本位制法案起重复产生。1897年到1898

年再度发生危机后，由于政府募集外债1亿日元，又燃起了一次，一直持续到1900年危机发生为止。这次投机的盛行还不是建立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货币资本的主要泉源是地主或商业，高利贷资本家，他们不是为了取得工业利润，而是追求股票投机的利益而争先投资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总算是在使用机器的大工业主导下巩固了再生产的结构，因而确立了产业资本体系。

第8表 甲午战后的企业勃兴

		1894年		1896年	
		公司数	繳納資本 (千日元)	公司数	繳納資本 (千日元)
酒	类	38	1,254	62	2,057
制	糖	7	705	9	1,474
烟	草	15	43	25	1,113
棉	紡	53	14,338	76	28,771
生	絲	158	2,064	259	3,870
絲	織品	48	3,916	24	245
棉				織	69
肥	料	2	133	41	6,530
机	器	5	212	16	2,106
电	灯	22	2,379	37	4,624
造	船	4	273	5	2,273
造	紙	19	2,780	28	2,873
	煤	9	973	17	9,500
采	矿	30	7,234	34	8,586
買	易	12	915	17	2,157
保	險	56	3,759	120	7,406
交	所	96	5,588	118	7,078
銀	行	862	101,380	1,277	166,196
铁	道	32	65,973	57	90,104
水	运	81	13,887	101	20,232

根据龍澤直七：《稿本日本金融史論》443—445頁編制。

二

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政府的军事计划和地主、商业资本家的投机性的兴办企业热潮而达到确立阶段时，其发展的方向也相应形成。投机热潮首先开始于军事上输送兵员的主要工具和可以希望受到政府无微不至的援助的铁道，次一对象是日本银行援助下以放高利贷为主要活动的银行。依靠铁道和银行的发展，地主和商业资本家还可以期望扩大谷米市场和土地投机的机会。

关于铁道的发展情形：在此以前，1893年公布了铁道敷设法，确定铁道干线国营的原则，并成立铁道会议，由川上操六^①担任第一任议长，在军事优先的方针下进行官办铁道的建设。这样从1894年起到1901年止，奥羽、北陆、中央、鹿儿岛等路线先后全部或部分通车，全部里程超过一千英里。在这个基础上，兴办铁道企业的热潮使私营铁道以数倍于官办铁道的速度伸长。兴办企业热潮的情况，有如下述：

“当时兴办企业热潮的中心，首先是铁道，其次是银行。凡是有名胜古迹的地方，一定被订入铁道计划，如有人发起修建半僧坊铁道、宗吾铁道等。——当时的老官僚和实业界的无赖，往往在酒楼的二楼或商店的一个角落里，拿一把尺在参谋本部印发的地图上划道线，就找几个名人领衔募集股票，往往一下子就成立几十万、几百万资本的铁道公司，以每张三、五日元的价格发行权利股。据说为了用来计划铁道企业，参谋本部的地图竟被购买一空”（东洋经济新报社：《金融六十年史》404页）。

第9表显示铁道的扩展情形。那时铁道的建设是在政府奖励

^① 萨藩出身的军阀(1847—1899)，甲午战争前任参谋次长，极力推动侵略战争，1898年任参谋总长，进行日俄战争的准备工作。——译者

下出于投机的动机进行的，结果把大量的农村资金固定在铁道上，使金融市场受到不平衡的压力，因而往往在危机发生时有人提出铁道国有的主张。但是铁道的发展导致了客货运输的迅速增长，特别是煤、谷物、木材、肥料等占了货运的大部分，使农村的自给经济被资本主义的商品破坏，从而迅速开展了国内市场。又因铁道的发展，还设立了铁道院直轄工厂、火车制造、日本车辆等铁道车辆工厂，并增加了煤的需要，因而促进矿业的扩充。铁道的敷設使局部地区市场迅速发展为全国性市场，从而使出产地和全国性市场易于連結，显著地扩大了全国性市场上的大商业资本家在流通与金融方面的統治范围。

第9表 明治后期铁道与海运的进展

	铁道营业线(公里)			船 舶 数	
	国 有	私 有	合 計	500吨以上	1,000 吨以上
1894年	929	2,473	3,402	91	
1896年	1,011	3,015	4,025	48	126
1898年	1,234	4,262	5,496	51	144
1900年	1,524	4,689	6,193	61	159
1902年	1,962	4,845	6,805	66	182
1904年	2,286	5,253	7,539	88	241
1906年	4,947	2,761	7,708	134	321
1908年	7,268	767	8,035	140	337
1910年	8,210	405	8,615	140	338

根据日本統計研究所編：《日本經濟統計集》。

在交通与市场的扩展中，甲午战争又导致海运的巨大发展。日本邮船公司包攬了大部分军事运输，加上政府的补助，就扩大了运输力，于1896年开辟欧洲、北美、澳洲等三大航线，共有航线22条，成为世界规模的大海运公司。政府于1896年制定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津貼排水量1千吨以上，速力10海浬以上的钢铁船，

这种大輪船的制造也迅速发展。1897年，浅野航运部解散，設立东洋汽船公司，开辟了香港至旧金山的航綫，大阪商船公司也增加了資本。海运的这种发展当然具有軍事意义，但又成为日本开展輸出市場的重要武器。

仅次于铁道的兴办企业热潮的中心是銀行。政府曾于1896年制定营业滿期国立銀行处理法，到1899年止，差不多全部改为普通銀行。这意味着一贯保护从1882年开始成为近代信用制度結構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华族、高利貸主和地主的貨幣資本。銀行方面的兴办企业热潮，即以这种銀行的前期性格为其基础，地主和商业資本家由于战争造成的米价和地价騰貴而获利，他們想用高利貸的方法来扩大这种利益，就倾向于設立自己的銀行。这方面的进展是迅速的。如在1894年，銀行行数为869家，名义資本为129,064,000日元，繳納資本101,409,000日元，而在1898年底，行数增至1,806家，名义資本增至384,996,000日元，繳納資本增至252,683,000日元。其中包括資金只有7万日元或5万日元，甚至至少到3万、1万日元的小銀行，多系投机性质的。儲蓄銀行也在1895年后有所发展。而銀行的利潤的确是具有投机性的，每100日元銀行資本的純利，其全国平均数，1893年为16元57錢，1894年增至17元22錢，1895年20元58錢，1896年又增至27元93錢。因此兴办企业的热潮稍有动摇，首先就波及銀行。1896年秋发生危机，接着1897年的棉紡业难关在1898年春引起危机，又在1900年受到世界危机的影响，銀行业都遭到很大的打击。

政府面临这种情况，认为小銀行分立有害，就以設立大銀行为急务，指导进行，因此以这次危机为起点，开始了早期集中的过程。当时銀行的主要資金来源，不是产业資本家的准备金或貨幣資本，而是一般国民收入，因此集中的程度距裁并中小銀行还远，但是第

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五大銀行在政府的保护下，其規模之大和营业之稳定，远远超过其他普通銀行，而且銀行同产业的結合更为紧密，实已确立为財閥的樞紐机关。大銀行經由保有國債而与国家財政日益結合，到了日俄战争时，竟使政府于发行國債时必须探詢大銀行的意見。

銀行制度的这种发展，虽然是信用制度的近代化的发展，但因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零細农耕方式还存在于全国，又在商业資本占优势的情况下，批发行家庭工业和工場手工业依然广泛展开，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中小銀行等投机性的、高利貸性质的金融机关还有充分的存在理由。大銀行的近代化信用只限于一部分特权大資本家才能利用，反之大銀行却須使高利貸性质的中小銀行从屬於自己，利用它們做吸取利潤的輸导管，以建立其統治地位。这种情形，使大銀行单独在信用制度的进程中发展极为偏畸的商业信用，一般企业还广泛依靠着政府信用和高利貸，产业資本的确立，便与这种信用制度一起进行。

关于这个时期的銀行发展，另外有一項值得注意的事，是設立各种特殊銀行，又因邮政儲金的发展，使大藏省存款部資金的运用从这时起增加了重要性。所謂特殊銀行，有日本劝业銀行(1897年开业)、各府县的农工銀行(在1898年到1900年之間陸續开业)、北海道拓殖銀行(1900年开业)、日本兴业銀行(1902年开业)；1900年，又制定产业組合法，策划发展信用組合。劝业銀行試图依靠发行債券来确保資金，設立的目的是以不动产为主要担保品，向以大地主为中心的农、工业者放款；农工銀行与信用組合則以劝业銀行放款的代理店等方式，成为劝业銀行的下級机关，又以中产以下的小生产者为营业对象。兴业銀行是当做从事有价証券担保借款的專門銀行設立的，同时也担任导入外資和信托等任务。这些金融

机关的意义，在于通过劝业和兴业銀行的債券以及邮政儲金和信用組合存款等搜刮人民的另星儲蓄，用国家信用来担負长期投資，以补充大銀行的发展，并成为特权政商、产业資本家和大地主的信用机关，又在于在全国的規模上补充銀行的以高利貸方式剝削小生产者的作用。兴业銀行总是对政府和产业进行重要借款与投資殖民地的銀行团的一員，在收回貸款有危險时，就由兴业銀行出来承担，或通过兴业銀行放出救济資金，因而保障了大銀行的利潤。

三

由于地主和商业資本家的投机性的兴办企业热潮，資本主义工业化就在甲午战争后迅速开展。但是这一工业化究竟还是以追求投机利益为目的，因此和十年前的兴办企业热潮时期一样，工业化的基础还是弱的，1897年和1900年連續受到危机的襲击，就是这个原故。只是由于弱小企业的淘汰，才使工业化得以进行。又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商业資本的力量还是很强，許多产业的主导力量还是大商业資本家。从各部門的公司繳納資本来看，当时商业公司資本約占一半，銀行資本又占另一半的半数，比工业公司的繳納資本多些。产业資本的确立，就是在这种結構上进行的，并意味着不是同时确立各个产业資本的基础，而是一面受到前期性統治的强力影响，一面依靠大机器工厂而确立資本主义的机构。

主要产业的发展情形見第10表。从这个表也可以看出，虽然工业发展迅速，但从其結構來說，棉紡、制絲、織物等紡織工业还占主要地位。如据1900年的工厂調查，紡織工业占工厂总数的73%，馬力总数的46%和工人总数的67%，远远超过其他产业，并成为輸出产业的主流。紡織工业在工业中占居主要地位，并成为輸出产业的主流，就能以它为媒介而輸入重工业制品，以弥补其发

展之不足。

第 10 表 明治中叶农工矿生产情况

	米 (千石)	生絲 (千貫)	棉 紗 (捆)	棉織品 (千日 元)	絲織品 (千日 元)	啤 酒 (石)	煤 (千吨)	銅 (千公 斤)	工矿业 生产指 数	物价 指数
1894年	41,859	1,391	304,584	27,168	40,785	14,271	4,261	19,908	17.9	33.8
1896年	36,240	1,547	428,864	35,886	63,151	32,867	5,110	20,079	25.2	39.1
1898年	47,388	1,573	670,067	47,997	88,263	81,331	6,696	21,024	32.8	45.6
1900年	41,466	1,894	647,484	57,745	94,854	120,371	7,371	24,317	42.4	48.9
1902年	36,932	1,934	770,853	53,030	77,443	91,046	9,549	29,035	39.1	47.4
1904年	51,430	1,997	695,213	50,651	55,437	95,243	10,724	32,123	41.9	53.0
1906年	46,303	2,190	945,167	80,386	95,100	159,367	12,980	37,431	61.1	58.6

数字来源与第 4 表同，但清酒改为啤酒，物价指数以 1934—36 年为 100，系日本銀行編制。

棉紡业是当时机器工业的代表，并因壟断朝鮮市場和侵入长江沿岸而扩大了輸出市場，故能迅速发展。这种情况見第 11 表。1897 年棉紗輸出量超过輸入量，以后一直增加，而差不多全部輸往中国和朝鮮市場。由于获得这些新市場，棉紡工业就以这样的速度向前发展：1894 年 45 家公司，紡机 627,816 錠，1897 年 65 家公司，1,207,174 錠，1900 年 76 家公司，1,361,122 錠。又因这种生产发展只是由于产品的将近 30% 得到輸出市場才能保持平衡，所以承购大部分产品的中国市場之消长，就控制了日本棉紡业的命运。

但是棉紡业尽管有上述发展，而棉紡公司的地位还是不如銀行資本和商业資本，在 1900 年发生危机时，很多棉紡公司由于付不出棉价和其他債務，而被銀行和商业公司等查封財產，成为投机的对象。就是钟紡那样的大公司，也因为借入資金困难，而到处央借零星小款，一旦丧失投机的好处，連控制它的三井銀行也在中上川死后出卖其股票。神戶的中国貿易商吳錦堂买了許多这个公司的股票，后来吳錦堂以投机目的卖出这些股票，落在上州的投机商

第 11 表 明治中叶棉紗輸出入对照表

	棉紗輸入量 (千日元)	棉紗輸出量 (千日元)	輸出占棉紗產量的百分率 (%)	重要輸出地區				上欄合計數占輸出總額百分率
				中國 (千日元)	朝鮮 (千日元)	香港 (千日元)	合計 (千日元)	
1893年	7,253	8	0.05	—	—	—	—	—
1895年	7,413	1,034	3.0	683	—	—	683	—
1897年	9,881	13,490	27.4	9,655	796	3,106	13,466	99.3
1900年	7,375	20,589	32.2	14,630	2,121	3,544	20,345	98.8
1902年	2,108	19,902	25.9	17,496	1,398	952	19,776	99.3
1905年	1,702	33,246	29.5	28,694	3,253	939	32,885	98.9

根据三瓶孝子：《日本棉业发展史》1941年版，96—97頁。

鈴木久五郎之手，此人堅主發行增資股票，竟使反對此項主張的常務董事武藤山治不得不暫時辭職。可見即使在棉紡業的發展方面，也不是產業資本的獨立發展，而時常被當做銀行或商業資本家的活動手段而進行。

當時日本棉紡業的生產能力比英國還差得很遠。如據大藏大臣辦公廳第二課出版的《1897年英國人甫列蘭視察日本商業情況報告書》（1898年出版，轉見三瓶孝子：《日本棉業發展史》，1941年版，85頁）中列舉的數字計算，就可以看出，就每錠生產的14支紗來說，英國是9小時內生產60.4匁，日本是21.4小時生產129.6匁，生產1捆所需人工，英國是6.55人，日本是13.8人，只是依憑包括深夜操作的長時間勞動和低廉工資，才能在粗紗和中級紗方面勉強保持競爭力。但是棉紡業的發展，是把這兩個因素最有效地結合起來進行的：即依靠輸入機器的最新技術和在工資低廉、深夜操作的半奴隸條件下為了補助農家生計而做工的婦女勞動。橫山源之助的《日本下層社會》（1898年出版）和農商務省的《棉紡職工事件》（1903年出版）生動地描述了女工的悲慘情況。但是棉紡業產業資本的地位就在這種情況中逐漸建立，還涌現出武藤山治、和田

丰次那种新型的經營者。

从这时起，棉紡业不止生产棉紗，还兼营織布。織机以这样的速度增加，即1897年2,105台，1902年4,887台，1905年8,140台。因此白洋布、天竺布、云斋布等輸出品，差不多全是使用动力織机的兼营織布的大紗厂生产的。

至于各織业地区从事織布的工場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的生产，則因兼营紡織的大工厂的压迫而相对地降低了地位，而泉州、知多、播州、远州、伊予、川越、和歌山等地已能織制小洋白布、条紋布、白点花紋布、法藍絨等，并进行生产的积聚与技术的改良，以图获得新的发展。但是积累程度很低，就生产的积聚來說，大多还处于工場手工业阶段，例如在知多的17家主要棉織工厂中，1901年使用动力的，只有使用蒸汽机的4家，使用石油发动机的两家，使用动力織机的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这些工場手工业大多是剛由批发行改的，“在开始把工人集結在自己的工厂里，直接施行产业資本式的統治的同时，又間接对厂外的很多劳动——农民家庭劳动、晒布业者和浆布业者进行商业資本式的統治”（藤田敬三編：《分包制工业》，1943年版，188頁）。

織业地区的技术改良也是有限的。例如1896年丰田佐吉发明了动力織机，从1897年前后起为白棉布和条紋布的織制业者使用，但因机器易于损坏，石油需要額外用費，修理又不方便，以致据說尾濃地方从1900年前后逐渐停用。泉州則从1894、1895年前后起廢棄原有的脚踏机，改用大鼓机。这是一种改良机器，将棉紗做成“洋卷”，可以使織出来的布的颜色沒有濃淡之別，并利用随着运轉的机器而移动的鼓里的砂的重量，使經纒自然綳紧，为一般厂家所乐用。脚踏机的80%以上是农家制造的，而大鼓机却不是农家做的，都由租机行租給农家，成为資本主义家庭工业的基础。

泉州在 1905 年时，工场手工业还很少，大部分由农家租机进行织布。

织布地区的这种形态，是与半封建的农业相关联的。批发行资本家和棉纺织业相结合，掌握了原料纱，所以易于控制织业。这些批发行资本家充当棉纺织公司的包销店，以购置现货或事先订货方式从特约的棉纺织公司买进棉纱，并以同样方式卖给出租织机的批发行，加以控制。在各地的有力量的批发行中，为了维持地方棉业的统治，还出现了自己开设棉纺织公司的，和歌山、岸和田、一宫、伊予等棉纺织公司就是在织布地区开设的中等规模的棉纺织企业。

四

一直占居输出品首位的生丝的生产，由于 1896 年废除生丝输出税和美国输出市场的扩大而更有进展。由于输出丝特别注重品质均匀，所以器械制丝的发展日益超过坐纛制丝，1903 年前者的产量倍于后者，同时大规模企业逐年增加，雇用十人以上的丝厂，于 1896 年时占生丝产量的 62.4%，茧消费量的 56.6%。十人以上的丝厂的发展情形见 12 表，并出现了片仓千駄谷（大宫）和郡是綾部那种大工厂，工厂规模的增大和器械制丝的发展是逐年进展

第 12 表 明治中叶生丝生产按规模区别工厂数

工厂规模	1893年		1900年	
	器械	坐纛	器械	坐纛
雇用 500 纛工以上	3	3	18	14
100 纛工以上	131	17	262	136
50 纛工以上	349	39	523	43
10 纛工以上	2,129	542	1,269	404
合计	2,602	601	2,072	597

根据土屋乔雄：《产业史》，1944 年版，234 页。

的。这一发展系依凭剥削半封建式的包身女工进行，农商务省編的《生絲职工情形》（1903年版）就描述了这种情况。又因这些企业的发展受輸出市場左右，所以資金上被橫濱及控制全国的大資本家操纵。1897年，政府以制絲、織物業为主要对象，制定了同业組合法，在法規上确立了大商业資本家对生产的控制。

由于手工业技术在制絲业中还保持主要地位，所以在工厂生产发展的同时，如群馬、福島等地所見，还有許多家庭工业，以結成制絲合作組織进行生产的形态存在于全国，并同样地受到控制全国的資本統治。茲就其中心地群馬來說，在1903到1904年时，养蚕农家有80,118戶，兼营制絲农家47,199戶，专业制絲农家4,314戶，养蚕农家的半数兼营制絲，占压倒的优势地位。他們大部分依靠家庭成員劳动，也有一部分雇用工人。群馬县的这种制絲业的結構，显示当时經營农耕的地主与工业发生联系这种农业阶梯还繼續存在（山田盛太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165頁）。

占輸出品第二位的依然是絲織品，其产量由于紡綢輸出的跃进而更有增加。在1900年前后，紡綢輸出額約占絲織品生产价額的40%。最发达的是福井、石川等北陆地区企业。例如福井，由于1896年福井、敦賀之間修通了铁路，市場更为活跃，产量从1894年的530万日元增加到1899年的1,480万日元和1904年的2,311万日元，达到全国总产量的20—40%。1899年福井有器械机12,093台，手織机7,568台，与西陣和桐生那种器械机还少、大多数依靠手織机的情形相比較，技术上要优越些。可是北陆地区在技术上虽占优势，也还处于使用巴丹机阶段，在使用动力織机上落后的，1905年的动力机数，石井还只有71台，福井5台，与使用机器的絲厂并存的，还有商业資本控制的工場手工业和广泛的家庭工业。在西陣和桐生，已于19世紀80年代終期出現采用公司組織的大

規模工厂，可是后来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广泛展开了采用出租織机等方式的批发行家庭工业。絲織业中異乎寻常的零細性质規定了这种关系，并与半封建的农业保持特別长久的关系。

五

在产业资本的确立过程中，生产生产資料的重工业也从这时起多少建立了一点基础。只是由于重工业的資本有机构成高，所以維新以来仅在 30 年內迅速地在大体上确立資本主义的日本，还不能达到欧美的最新技术和企业規模的水平，大部分机器有賴于英国和其他国家輸入，重工业的发展，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的，而且主要地限于軍事上有必要的部門。按照日本資本主义的情形，使用半封建性质的劳动力生产輕工业制品，以其輸出来代替重工业生产，对資本家有利，这种关系成为日本資本主义的特殊构造，以后保持很久。

在重工业中，专制主义政府从軍事的需要出发，早就致力于确保铁的自給。陆海軍省和工部省在 1880 年即已提出創辦制铁所的建议，1891、1892 年，政府亦曾向議會提出設立制鋼所法案。甲午战争的胜利一举而解决了这一长期悬案，議會积极建議設立鋼铁厂，1896 年議决成立八幡制铁所，1897 年着手創建。这样日本就在軍部的指导下迈出了成立鋼铁联合企业的第一步。

八幡制铁所本来是以供应直接軍需品为主要目的，但是軍用色采随着計劃的扩充而淡薄起来，海軍另外扩充吳港工厂，建立制造装甲板的車間，并成为制造高級鋼材的世界水平的大工厂。至于八幡的生产結構，是把主要原料的基础放在筑丰的煤矿和中国大冶的铁矿上，依凭以九州北部地区的半封建农村为主要来源的半奴隶式的劳动力建立起来的。依靠这个工厂，日本資本主义毕竟

有了自己的制铁机构,从1901年八幡制铁所开业起,十年之内,国内一共生产了生铁1,067,000吨,超过同时期内输入量955,000吨。但是国内钢材产量还只有738,000吨,比输入量2,984,000吨差得很远。

重工业中特别发达的是在海軍指导下受到保护和培植的造船业。1896年制定造船奖励法后,造船业渐能克服船价高和造船技术不熟练等困难,长崎、川崎等大造船厂已从建造小型船发展到建造大型船。1898年长崎造船所造成6,127总吨的常陆丸,虽然花了十年的准备功夫,设计和材料都靠英国造船业的帮助,但被称为日本造船史上划时代的成績。可是当时大型輪船的生产量还不如输入量。例如从1898年到1907年,在700总吨以上的輪船中,国内制造的只占全数的25%。在海軍工厂的指导下,造船技术趋于确立,如1905年开始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战艦薩摩,就是使用日本材料,自己设计施工的。

造船业的发展,在一般机械工业不发达的情形下,只是由于政府的保护,才能实现。因此造船厂还須兼办有关的机械工业和钢铁业,这种情形不但使日本机械工业的发展形态不正常,并因机械工业只須担負修理任务,所以长期成为限制其发展的原因。重工业的发展是基于軍事上的必要进行的,因此如第13表(見下頁——譯者)所示,軍办工厂和民营机械工业的发展极不平衡。机械工业发展之不成熟,最为典型地显示了日本資本主义的这一特征,即“軍事工厂中生产设备优越,一般生产企业反而落后的本末倒置的矛盾”(山田:《日本資本主义分析》,134頁)。

和重工业同样与生产资料的生产有重大关系的矿业,也在这时建立了近代化基础。最主要的矿产品产值,以1900年为例,煤为25,133,000日元,銅为15,716,000日元,其次是金、銀、石油,产

第 13 表 明治中叶官办军事工厂和民营机械工厂发展的对比

		1899年	1903年	1906年
官 办 军 事 工 厂	职 工 数	25,073	53,593	63,704
	馬 力 数	8,438	19,843	68,403
民 营 机 械 工 厂	职 工 数	20,872	32,029	55,829
	馬 力 数	4,054	5,494	15,464

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发展史》，载《日本产业机构研究》，1943年版，96页。

值只有一、二百万日元，煤和铜占压倒优势。煤的输出部分比重还是很高，这时集中筑丰地区已成为决定性的情形，这里的产量所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从1894年的39%增加到1903年的50%。但如第14表所示，从1900年起，煤的销售渐由输出转移到国内市场，特别是工厂需用量增加，铁道、轮船的需要也飞跃增进。在采煤设备的近代化方面，1894年119米的三池胜立竖井的完成和三池制作所的设立被称为划时代的事件，开始了所谓“大竖井”时代，接着从甲午战争以后到1902年，着手建筑12个井，又从日俄战争到1912年开掘9个井。但是虽然说是开掘竖井，而在深层采掘中，只在大部分必要的地方采用通风、排水井，一般还是采用沿层倾斜前进方式，在多数煤矿中，还流行着依凭囚徒劳动或纳屋制度^①的残柱式采掘办法。

至于矿工的状况，依然保持着奴隶式的旧友子同盟^②和纳屋制度，他们在租自矿山的大杂院里生活，所需日用品，大部分从矿山

① 又名饭场制度，由把头（纳屋头）招募单身工人，迫使他们住在简陋的房子（纳屋，或称饭场）里，一起食宿上工，另一方面与矿主订约包工，进行严峻管制和残酷剥削。——译者

② 以师徒和互助名义成立的矿工组织，实际上在取得“友子”资格前要“学艺”三年多，事实上受到“师傅”的残酷剥削，“出师”后还经由封建式的盟约而受到师傅的束缚。——译者

賒购,或由矿山供应,价款从工资中扣除。但是随着煤业中采掘机构的发展,总算有些矿山从这时起廢止了納屋制度,三池、北煤、安川等矿采用了公司直轄制,不再把工资一起交由納屋把头轉付,而改由公司直接向工人支付工资。但是这只是为了利用包工制来提高劳动效率,家族关系和納屋制度的約束依然暗存在,旧納屋把头还作为包掘矿井的主脑,与公司保持身分上的关系。所謂“大鑿井”时代的这种情况,使煤气爆发,矿井塌陷等事故激增,例如1897年发生23次,死伤43人,1903年增至472次,死伤874人,即能显示事故与产量同时增加。

銅和其他矿业的情况也是一样。銅矿方面,从1902年前后起,足尾、佐渡、别子等大矿改用裂岩机,其效率相当于原用的活塞式裂岩机的5倍以上。但劳动强度也由此更为增加。

第14表 明治中叶煤的国内市場的发展 (单位:千吨)

	生产量 (A)	輸出量 (B)	船舶用	铁道用	工厂用 (C)	制盐用	B/A %	C/A %
1895年	4,810	1,860	747	223	1,198	522	38.7	24.9
1900年	7,489	3,379	1,464	507	2,652	639	45.1	35.4
1905年	11,542	2,528	1,997	842	3,276	500	21.9	28.4
1910年	15,535	2,794	2,408	1,238	4,319	906	18.0	27.8

根据木下悦二:《日本の煤矿业》,1957年版,21頁。

六

上述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紡織业的工业化的进展,使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結構得以树立,从而确立了日本的产业资本。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产业资本的确立过程是与欧洲各国不同的。在欧洲所看到的是在原始积累以后,以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进行产业

資本的自由竞争,在这个过程中,資本以大机器工业为主要武器,首先統治主要的輕工业,接着以此为基础而統治重工业,生产本身开辟自己的市場,同时經由对原材料加工增值而填补資本主义的全部产物,从而建立再生产的結構。而在日本并没有经历資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却由专制主义政府保护、培植特权的大資本家,压抑自由竞争,又由商人的投机行为左右生产,还依靠攫取賠款和向大陆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活动,才实现了資本主义工业化和确立其結構。

虽然产业資本有了进展,但是商业資本的控制力还是很大。生絲、織物、火柴、陶磁器和肥料等大部分产业,还受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商业資本控制。即使在棉紡业方面,不但資金的基础依靠銀行,而且占用生产費大部分的棉花、煤等都是向三井物产及其他大商业資本、貿易資本組織賒购的,因此无法摆脱这些資本的控制。此外虽然在輕工业方面,从棉紡业起,迅速确立了大机器工业,可是重工业的发展迟迟不前,反因輕工业通过貿易資本发展成为輸出产业,依靠其产品輸出来輸入重工业品,而建立了輕工业发展代替重工业发展的結構。这样便增大了貿易資本的比重。

这种結構使貿易在資本主义发展中具有头等重要性。因此在

第 15 表(1) 明治中叶輸出表 (单位:千日元)

	总 額	茶	生 絲	棉 紗	棉織品	絲織品	煤	銅
1894年	113,246	7,569	39,353	956	1,861	8,489	4,674	4,930
1896年	117,843	6,004	28,831	4,029	2,224	7,439	6,243	5,512
1898年	165,754	7,862	42,047	20,117	2,593	12,787	12,241	7,390
1900年	204,430	8,105	44,657	20,589	5,724	18,604	13,709	12,922
1902年	258,303	9,826	75,859	19,902	5,993	27,987	17,270	10,563
1904年	319,261	12,351	88,741	29,268	7,743	39,099	14,838	13,423
1906年	423,755	10,095	110,443	35,304	15,619	35,679	16,280	25,311

第 15 表 (2) 明治中叶輸入表 (单位: 千日元)

	总 額	米	砂 糖	皮 棉	棉織品	毛織品	铁 类	机械类
1894年	117,482	8,413	13,259	19,104	6,958	6,269	4,811	5,104
1896年	171,674	5,662	13,744	32,106	11,611	16,088	8,263	8,721
1898年	277,502	48,220	28,439	45,410	10,879	10,601	11,831	13,603
1900年	287,262	9,022	26,607	58,500	18,438	17,757	21,743	9,749
1902年	271,731	17,751	14,468	78,780	14,868	9,979	14,221	9,460
1904年	371,301	59,792	23,043	71,467	9,012	6,459	19,679	11,975
1906年	418,784	26,172	23,726	81,294	18,887	19,946	27,798	19,444

生产以輕工业为中心而发展的同时,貿易也如第 15 表(1、2)所示,有了显著的进展。

在貿易的进展中,甲午战争后实现的修改条約和采用金本位制这两件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修改条約方面,在 1894 年与英国締結新約以后,同年与美国改訂,到 1897 年与德、奥改訂为止,一共修改了与 14 个重要国家之間的条約。撤銷了治外法权和領事裁判权,恢复了关税自主权。1899 年改訂关税率法,經由这次改訂,虽然还留存不平等的关系,如对 104 种貨品訂定新稅定率,关税还是从量,而不是从价等,但比原有的安政条約大为不同,从此日本資本主义才与外国資本主义处于平等地位。

采用金本位制,就是参加 19 世紀 70 年代后在全世界扩展的金本位通貨制度,意味着日本在貿易上与各国站在平等的立場。在决定采用时,棉紡业資本家和貿易业者恐怕丧失銀价下落导致的利益,表示反对,而政府不顾他們的反对,毅然实行金本位制。这是因为从那时起已經打算导入外資。

就貿易的品目来看,輸出方面,还是生絲、絲織品領先,茶停滯,棉紗飞跃增加。輸入方面,棉花列居首位,原占多数的砂糖、棉織品、毛織品和米停滯起来,机械类与铁类增加。按貿易地区区分的

情况见第15表(3、4)。从表里可以看出,生丝、丝织品输出美、法等国,棉花等原料由印度、美国输入,机械、毛织品等由英、德等国输入,此外棉纱、铜等输出中国,米、砂糖、工业原料等由中国输入,这就形成了日本贸易的结构。

第15表(3) 明治中叶按地区区分输出表 (单位:千日元)

	中 国	香 港	印 度	英	法	美
1894年	8,814	16,199	3,688	5,950	19,499	43,324
1897年	21,325	25,390	5,563	8,481	26,214	52,436
1900年	31,871	39,177	8,704	11,263	19,150	52,566
1903年	64,994	29,725	8,087	16,545	34,279	82,724

第15表(4) 明治中叶按地区区分输入表 (单位:千日元)

	中 国	香 港	印 度	英	德	美
1894年	11,512	9,000	10,560	42,190	7,910	10,983
1897年	29,266	12,027	29,776	65,406	18,143	27,031
1900年	29,961	10,660	23,516	71,638	29,200	62,762
1903年	45,458	1,740	69,894	48,737	26,959	46,274

2. 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 与早期帝国主义

以上述形态进行的产业资本的确立,使日本经济完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产业循环中。诚然,就产业部门来说,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形态也是畸形的,但在商业资本的强力媒介下,各产业之间的关系是更加密切了。特别在棉纺织业和制丝业方面,中国或美

国市场的动态竟能决定其生产的盛衰，实已完全卷入世界经济，1897到1898年的危机和1900年的危机，就是在世界市场影响下发生的。

由于1897年10月日本采用金本位制，中国市场上发生银价下跌和上海银根吃紧等情况，致使棉纱对中国输出梗塞，结果日本国内纱价惨跌，并出现一两家停兑的银行，呈现危机状态。接着在1898年秋，由于棉纺业生产迅速发展和在中国市场与印纱的竞争加剧，棉纱价格再度惨跌，结果许多小纱厂破产，棉纺业进行了大纱厂收买小纱厂和设立大阪联合棉纱公司等集中活动。这次棉纺业危机还波及其他企业，1898年4月久留米银行发生停兑，并以八王子织物中间商人的支票停止兑现为起点，使关东织业地区感到困难和不稳。但因政府于1898年6月起采取了救济措施，如购买公债、放出资金和劝业银行贷放工业借款等，这次困难不久就告终结。从金融上看来，这次危机的深度，“仅凭只花4千万日元上下购买公债即能充分解决当时险象的事实，即足以证明所谓经济界的困难，不过是以股票交易所和银行为中心的局部性质的”（东洋经济新报社：《金融六十年史》416页）。

当时资本主义已经正式确立，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环。1897年到1898年的危机只是以棉纺业为中心的临时危机，而与此相反，1900年的危机，却成为周期性的世界危机之一环，而被指为“日本第一次的普遍性工业危机”（瓦尔加主编：《世界经济危机史》，第1卷第2部，日译本，1938年版，257页）。

这次危机的经过是这样的：从上年12月起，已因南非战争的影响，使黄金供应不稳定，而开始银根吃紧，从1900年2月起，由于中国北部发生虫灾水灾，使棉纱对中国输出减退，又因4月义和团事件，而致差不多在这一整年中，棉纺等对中国输出产业都陷于

危机状况，生絲輸出也因美国銀根吃紧而趋于减退。日本出兵鎮压义和团一舉更使危机加剧，因为除对中国輸出断絕外，并因軍費用費激增，增加了金融上的压力，政府为了筹措軍事开支，又不能对企业进行救济。但是造成危机的，并不是天災、战争等偶然性质的因素，而是以棉紡业为首的机器工业的生产过剩。在棉紡界于1900年春陷入困境时，曾提出作为生产过剩对策的停止夜間操作的主張，其理由是“我国棉紡公司的产量已經超过需要量，照目下实况来看，如果不是每年向海外輸出二、三十万俵^①，就不能維持市价”（庄司乙吉：《紡紗业开工減縮史》，46頁）。

从那年12月起，又发展成为銀行危机。12月熊本第九銀行停兌，立刻使九州一带的金融界发生动摇。人們对銀行的不信任，加剧了全国的不安心情，1910年1月波及橫濱，接着影响东京，并使关东一带的織业地区都出現了烏云滿天的現象。3月，危机又移到大阪，从北村銀行发生破綻起，到了4月，大阪市内就差不多有20家本行和分行，加上堺市的两家銀行，都发生挤兌。这种風潮还蔓延到奈良、京都、香川、爱知、三重、长野和全国各地。

这次不止是日本的危机，还与欧洲的生产过剩危机有关，日本必須与受到危机襲击的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爭夺中国市場，使这个市場显得更加狹隘，因而加深日本的危机。所以危机对輸出产业的打击特別深刻，“工商业者在买卖和經營上的困难，以大阪、京都和其他关西地区为最深刻。特别是从关西的貿易公司起，与煤、洋布和肥皂等有关的工商业中破产者层出不穷，此外名古屋的陶磁器业和两毛地方的織业等，一时都陷于悲慘的境遇，报纸上連日登載出頂、歇业和破产等坏消息”（明石照男、鈴木宪久：《日本金融史》，第1卷，1957年版，170頁）。

^① 包裝单位，同捆。——譯者

在这种危机的过程中，小资本遭到淘汰，以财阀、政商为中心的大资产阶级就在危机期间肥大起来。在1898年的危机中常被引用的《东京经济杂志》的一篇文章，描述了财阀和大资产阶级活动的大体情况，其中写道：

“三井物产公司大阪支店历来把机器、棉花和煤等卖给棉纺公司，来往很多。近因棉纺业不振，棉纺公司无力支付价款，日前摄津棉纺公司的财产就被查封，结果被三井接收，改名柴岛棉纺公司营业。……朝日棉纺公司广岛分厂，也因这个公司不能偿还欠三井的225,000余日元，而作为这笔债务的担保品，被三井接收，已经办了登记手续，由三井全权处理。……其次，浪花棉纺公司也被查封财产，由于清偿债务困难，也许会交给债主，亦未可知。还有其他内部不稳发生困难的企业，结果也难免为三井所吞并。债主以不到建筑费半额的价格接收这些企业，只要加以彻底整理，并充实流动资金，即能进行营业，实在是非常有利的。金钱的权力真可怕啊”（《东京经济杂志》，第939号，引自1898年8月6日的《杂报》）。

在1900年的危机中，集中的趋势更加明确，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力更为增大。棉纺业方面，从1889年后以大棉纺公司为中心进行合并与联合。参加棉纺业联合会的公司，由1896年的79家减到1903年下半年的40家。制麻业方面，在以日本纤维公司为中心进行激烈竞争以后，1902年三家公司实行合并，成立了日本制麻公司这一大垄断企业。银行方面，1897年后小银行不断消灭和进行联合，以1901年的2,385家为顶点，以后行数日趋减少，1905年只剩2,230家。存款逐渐流入财阀系统的大银行，这些大银行在金融上的统治就确立了。

以上情形说明，早在产业资本确立的过程中，已经种下了垄断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种子。

二

在资本主义依靠专制主义和商业资本的强力媒介与机器工业而经历上述进展时，生产发展的不止是工矿业，还见之于农业。特别是棉、木蓝、甘蔗等作业虽然衰退，而在改营的经济作物种植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桑园有显著的进展，米、麦等作业也有确实进展，商业资本对农作物的统治则更为扩大。

农业方面的这种发展，是在当时还留存的地主自营农耕和豪农经营的主导下和政府、官僚的指导下进行的。由于19世纪80年代起逐渐改善的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有了显著提高。短犁马耕法由九州北部普及到东北、关东一带，提高了农业生产；近畿、濑户内海地区则使用长犁牛耕法，形成两种系统的农业地区和“两种农业生产结构”（山田盛太郎：《日本农业生产力的结构》，17页）。此外还有许多新的农业技术，如湿田干田化、修整田区、采用长方形秧田、分条插秧、使用神力及龟尾等改良米谷品种、盐水选种、增用购买的肥料，特别是由鱼肥改用豆糟，都在这时普及全国。政府策划在地主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1896年制定劝业、农工两银行法；从1899到1900年，又陆续颁布府县农事试验场国库补助法、农会法、耕地整理法和产业组合法等。

但是尽管农业生产有所增进，而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一般尚未发展，进行生产的农民的状况，虽然各地不同，但还是悲惨的。商品经济侵入农村，促进了农民的分化，使自耕农的分化和中间农民阶层的逐渐减少不断进行。农业生产力的增大，并没有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其主要结果，却是在许多地方使地主由自营农耕的转化为寄生性质的，并加强其地位。地主与商业资本家相

勾結，參加米谷交易所的投机活动，其經濟状况，由于都市人口增加，米的販賣市場擴充，使米价高漲，而更加有利。这种投机活动是同产业資本以地主和商业資本家进行股票投机为基础而确立这一事实相关連的。甲午战争后 10 年之間，平均每年的米谷交易数量竟达国内产米量的 1.77 倍。1898 年制定的民法，确立了地主在资产階級法制上的地位，使土地所有权絕對压倒耕作权。

大約在这个时期以后，地主制就作为寄生地主制而在全国确立。由于資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米谷市場、农民的沒落使高昂的佃租率固定下来，商业、高利貸的剝削加深了农民的債務奴隶状态，因而导致寄生地主制的确立。全国佃租率增加，超过了 40%，在大地主地区，1,000 町步的地主的地位最后决定了农村的再生产結構。地主的門第和地主的信用一般是极高的，如在地方銀行放出的貸款中，最多的是土地抵押借款（拜司靜夫，《土地抵押借款与銀行》，載《資本主义的成立与发展》，土屋教授花甲紀念論文集，1959 年版，92 頁起），地主只凭投資于土地，即能获得充分的利益。地主自营农耕的情形，除一部分落后地区外，大約就从这个时期起迅速趋于消灭。如据 1897 年在东京駒場附近进行調查的結果，将雇工經營农耕者与寄生地主的每反田地平均經營收支相比，地主的利益就多了 1 日元 20 錢（《日本农业发展史》，第 1 卷，94 頁）。

地主制虽然是在农业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增进上确立的，但在这个时期以后，与地主自营农耕和豪农經營趋于衰退的同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久就迅速接近下坡路。劝业銀行、农工銀行对地主的貸款和政府的補助費，在相当多的場合成为农村資金轉化为工业資金的媒介，所以許多人說农业資本变成了“电影”^①。特别是接近大都市的先进地区，大地主从出卖佃租米所获得的利益，投

① 好景不常之意。——譯者

投资于股票、公债和企业的比投资于土地的还多。如果看了第 16 表所示新潟和大阪的大富翁的职业类别，就可以知道先进地区的资本家的地位比地主要高得多。但是向村内穷苦农民放高利贷或充当小商人进行盘剥的中小地主却也一直存在。

第 16 表 1901 年大富翁按职业区分的人数

	总数	农业	农业兼 他业	商业	贷金业	银行业	交通业	工矿业 及其他 营业	任职	其他
新 潟	19	15	1	2	1	—	—	—	—	—
大 阪	42	—	—	10	9	9	5	4	3	2

· 根据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志》，1941 年版，第 11 卷，314 页（引自古岛、守田：《明治期间地主制度展开的地区特质》，119 页），这里的大富翁是指资产在 50 万日元以上者。

尽管如此，当时农业还是占产业的主要地位，试从国民收入来看，农业还是占压倒的比重。中村金藏曾在《帝国人民的收入》（载《统计集志》，第 255 号，1902 年 6 月）中列举当时国民收入的数字，这和后来土方成美根据大正年代的数字推算出来的指数显然不同。现将中村所列举的 1900 年的国民收入转录如次（根据山田雄三：《日本国民收入推计资料》，1957 年版，12 页）。

农业 812、工业 206、商业 261、输出 70、水产业 89、木材业 63、矿业 49、俸给 81、利息 37、房租及其他 129，合计 1,799（单位都是百万日元）。

又从按产业区分的有职业人口来看，据大川一司推算，1900 年第一次产业（农林水产。——译者）17,331,000 人，第二次产业（工矿等。——译者）2,929,000 人，第三次产业（财贸交通服务行业等。——译者）4,508,000 人，共计 24,768,000 人，第一次产业占有业人口的 70%（昭和同人会：《我国完全雇用的意义及对策》，第 4

部,統計,1957年版,29頁)。还要指出,那年工业人口有3,281,000人,其中屬民营工业的2,783,000人。

农业在整个产业中的这种地位,是在农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上展开的地主制下建立的。同时农业的这种重要性,又与銀行和商业資本相結合,在政府的保护和保障下加强了地主制。地主制的加强,复使資本家能把农村中剝夺所得轉化为商业利潤,兴办企业热潮又使农村中的資金投在工业上。

三

但是尽管地主制有所加强,而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在經濟和政治方面,資本家的势力都超过地主,而居于主导地位。如在1896年取消棉花輸入稅时,虽然地主和农民方面极力反对在議會通过此案,但終于不能抗拒資本家的压力,就如实地显示这点。1893年众議院通过此案时,河内地方的农民深感惊恐,乃鳴鑼击鼓,聚集許多人向府署訴苦,亦即举行反对示威运动,而棉紡业联合会却信心十足,坦然处之。名和統一曾經叙述过这种情形(名和:《日本棉紡业和原棉問題研究》,1937年版,202頁)。

又在1899年,山县內閣为了筹措扩充軍备的財源,向議會提出增征地稅法案时,地主方面激烈反对,展开著名的地稅論战,但終于被压抑下去,这也可以显示上述情勢,其理由則有如下述:

“宪政党之所以贊成增征地稅,和政府妥协,……更具本质性的动机,是由于选举区居民的构造因产业革命之进行而大有变动,大地主多半成为寄生地主,把手里积累的剩余价值投放在商业、銀行和购买股票上,接近于靠利息过活的人。他們希望增征地稅使政府財政稳定,經濟上恢复常态和好轉,从而使他們持有的股票漲价。因此增征后受打击最大的,是寄生地主化进行緩慢、自營

农耕的地主还占优势的东北和里日本^①的种米地区”（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編：《日俄战争史的研究》，1959年版，79頁）。

順便提一提，在那个时候，山县还和宪政党的星亨^②接触，据《原敬^③日記》（第2卷，456頁）所載，山县曾向宮内省支用98万日元的巨款来收买議員，据說是把邮船公司的紅利定为5分，而将其余的利潤撥充这笔用費的。在这个山县的领导下，还修改了选举法，把选举人資格从直接交納国稅15日元的人降低到10日元以下，取消被选举人資格中的納稅条件，又把全国議員名額划一起来，結果农村地区大約13万人口合到一名，而在城市地区，如果人口在3万人以上，至少可以选出一名，采取大选举区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在最反动的“憎恨政党”的山县执政时采取这种措施，是值得注意的。

地主不止收取佃租米，还与貸款利息、公債利息、铁路股票紅利发生显著密切的利害关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勾結就在这种关系中进行。资产阶级中的真正领导力量，是以当时已成长为真有統治力量的財閥和政商为中心的大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指导下建立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1896年由伊藤內閣改組为松方、大隈联合內閣时，人們就說“实业家”的金钱力量已經达到更迭內閣的程度，尾崎行雄^④还說过如果日本是共和国，三井、三菱就会当大总统，亦可想見他們的强有力的地位。当时日本的政治形态，“客观上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統治已經开始鮮明化，而且在这种政治构

① 沿日本海岸的地区总称。——譯者

② 曾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后与专制政府妥协，有“軟化議員經办人”之称（1850—1901）。——譯者

③ 政友会首領（1856—1921），曾任內务大臣、总理大臣等职，所写《日記》共有9卷，为研究明治、大正年代历史的可貴材料。——譯者

④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59—1954）曾多次参加护宪和普选运动。——譯者

造的重要性增大的情况下，在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間，具备了他們和曾經是对抗势力的‘藩閥志士’融合一起的基础”（平野义太郎：《日本資本主义社会的机构》，210頁）。

四

确立了的資本主义和加强了的寄生地主制之間的这种結合，使施加于資本家的对方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对方佃农的剝削与掠夺相互結合联系起来。

农民的状况，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而更趋悲惨。横山源之助說过：“在明治年代，佃租高昂、肥料漲价，弱者一直受到欺負”（横山：《日本的下层社会》，1898年，岩波文庫版，261頁）。他又說：“背乡离井，出去找活干或者迁居，难道不是今后农民生涯中会要经历的过程嗎”（同上书，273頁），即指出农民轉化为无产阶级的前途。农民只靠农业不能生活，如果不在家庭工业、批发行、工場手工业或工厂充当雇佣劳动者、出外找活干或当日雇工就不能补充生計，这些龐大的潜在过剩人口就成为資本主义所需劳动力的蓄水池。工业所必要的劳动力能够充分由农村供給，地主对佃农的半封建的剝削方式成为資本家对工人实行殖民地一样的剝削的条件，两者結合在一起，长期成为資本主义发展的条件。

随着产业資本的形成和确立，其对方的雇佣劳动者也有所发展，并形成其結構。在19世紀90年代前期，工人数目虽然很少，但以铁工为典型形态的近代无产阶级已經发生。在棉紡和制絲等工业中可以看到极其貧苦的农民的子女为了补充生計而从事雇佣劳动，在矿山、铁道和其他土木工程中有半奴隶形态的不熟练劳动，还有血汗制度的近代家庭工业劳动。但是当时机器工业的发展还只是局部的，可以称之为近代工人的为数很少，棉紡、制絲等

业中的工人，也因农村的村社体制尚未完全瓦解，所以资本家在获得所需劳动上还有困难，以致在“争夺职工”时还发生流血惨剧。

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的阶段，农民的没落扩大到全国范围，机器工业发展，近代产业工人的数量相应增加，并形成自己的阶级。当时构成劳动市场的成分是：只改变了形态的没落农民的单纯体力劳动者（还占雇佣劳动人口的大多数）、以补充农家生计为目的的工场手工业女工、还没有割断与土地的联系的农业劳动者、山林劳动者、家庭工业劳动者、搬运劳动者和外出找活干的半农奴式劳动者、还有潜在的过剩人口。合起来人数是庞大的。关于20世纪初叶全体雇佣劳动者（从近代工人到极贫苦的农民）的种类和数量，大体上可以这样来推算：

“官办工厂工人 53,000 人，雇用10人以上的民营工厂、矿山工人 473,000 人，合计 526,000 人，加上铁路工人（1908 年国有和地方铁道工人共计 94,000 人），以上这些是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的，有 10 人以下的工场（小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工人；据山田推算，1899 年制丝业工人有 51 万余，织物业工人 77 万人，合计 129 万人（《日本资本主义分析》，60 页），以上约共 190 万人。此外还有下层农民（农业工人和依靠兼营村业才能生活的农民）即半无产阶级（据山田推算，1899 年，生产日本纸、麦秆纤维带、草席面、各种垫席等物品的 43 万人、生产自用棉布的 26 万人，共计 69 万人，另有养蚕业者 135 万户，制茶业者 62 万户，合计 197 万户，见《日本资本主义分析》，60 页），一并推算，至少超过 400 万人，这就画出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的轮廓”（向笠良：《日本工资法则的特质》，载大阪市立大学：《经营研究》，第 32 号，1957 年 12 月，49—50 页）。

从这些工人的成分也可以知道，他们大部分还没有摆脱农村

的半封建剥削，低下的欲望水平和最坏的劳动条件构成这种雇佣劳动关系，从而具备所谓“半奴隶的工薪劳动者”的性质。官办、民营机器工业和重工业的熟练工人，也不是在长期的工业自主发展中生长的，大部分工业无产阶级是棉纺织业和其他工业中的女工，还广泛施行着儿童劳动，这是畸形的产业资本确立的基础。但是劳动已经不是人身依附性质的无偿劳动了，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已经形成工资，民法大体上确认了工人享有私权，工人之间的职业偏见也丧失了持续的依据。劳动的价格与农村中的半封建关系相结合，极端低廉，并以米价为标准，使工资甚至带有米的代金性质。但是规定工资的并不是半封建的关系，而是整个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加上半封建的关系，使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更为有利，日本资本主义就是有利地利用这种条件而获得迅速发展的。

资本家的剥削形态，如棉纺织业这一典型事例所示，是工人的半奴隶式的低廉工资和采用深夜操作两班制等办法的长时间劳动。资本家比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日本棉纺织业在远东市场上进行国际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举例来说，在1900年危机时，棉纺织业联合会曾决议废止深夜操作，把它当做生产过剩的对策，但实行极其困难。这种依凭长时间劳动而进行的绝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加上形同拘留的宿舍制度，就变成磨损女工身体的制度。

低廉工资也不止施行于棉纺织业，实已成为日本输出产业的最有力的武器。这点已为当时欧美资本家所注视：

“日本商品低廉是由于其职工的工资微薄，而其工资微薄则由于生活简易。一个男工的工资只有六便士，一个女工的工资只有三便士。日本既有低廉工资，又应用西洋知识，所以不仅在英国的东亚市场上，就是在欧洲市场上也是一个强敌。看吧，日本制造的自行车，以8镑的价格出售，还是赚钱，挂钟只卖两先令半，火柴每

盒放 114 根, 只卖 8 便士半”(《环球》(The Globe), 1896 年 5 月 4 日, 《国民新闻》, 1896 年 6 月 27 日转载)。

“英国在商业上的不共戴天之仇, 不是普鲁士, 而是日本。日本拥有棉纺设备 100 万锭, 工资低廉, 手艺精巧, 而生活费很低。并且不止棉纺业如此, 所有的产业都是这样”(《发明》(Invention), 1896 年 6 月 6 日, 《国民新闻》, 1896 年 7 月 14 日转载, 以上二则均见信夫清三郎:《日俄战前中国东北市场上日本输出棉布的趋势》, 载《经济评论》, 1935 年 10 月号, 16 页)。

规定这种劳动力的状态和结构的, 是和半封建的地主制结合起来发展和确立了的日本资本主义。由于农民的贫穷和工人的工资低廉, 所以资本主义不能希望国内市场扩大到一个一定程度之上, 但能增加工人、农民的负担, 来奠定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农村的潜在过剩人口不断为资本家供给劳动力, 失业工人无需一文失业保险费, 就回农村, 这又加剧农民的土地饥饿, 使地主征收的佃租率更为提高。土木工程、矿山、水产等业中的师徒制度^①、饭场制度^②, 棉纺、制丝与织物等业中的包身工制度、宿舍制度, 以及一般工厂中的职级制度, 都是把农村中的旧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运用到资本主义方面来, 用低劣的劳动条件和严酷的监督办法来剥削工人, 以提高资本家的剩余价值。

日本资本主义是在上述基础上发展的。维持这个基础的是半封建的地主制和专制主义天皇制政权, 资产阶级只有同它们勾结, 才能保证其发展。当然他们很早就同藩阀、官僚相勾结, 放棄了最后一面“自由”旗帜。而拾起这一“自由”旗帜的便是当时在数量和

^① 把头以师徒名义招募控制一些工人, 并与矿山等业主订约包工, 从中进行剥削。——译者

^② 即纳屋制度, 见前注。——译者

质量上都已經在不断成长的无产阶级。横山源之助說，“我认为工人問題在甲午战争以后开了一个新紀元，战争的结果促使机器工业勃兴，从而引起了工人問題（横山：前引《日本的下层社会》，304頁）。工人从1897年起，在全国各地不断进行斗争与組織。1898年日本铁道工人举行大罢工，同年劳动組合矯正会成立。1900年谷中村事件^①达到最高潮，1901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专制主义政府保护古河財閥的利益，用警力驅散举行請願示威的农民，并于1900年制定治安警察法，禁止工会运动和罢工，以防止其进展，又因害怕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制訂了文官三法令^②和軍部大臣須由現役軍人担任等制度，进一步加强官僚組織。社会民主党主張实施普通选举和廢止貴族院的呼声使专制政府震惊，一天就禁止了这个党。可是无产阶级的先知先觉者却在群众斗争中得到教育和鼓舞，他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从这时起迅速走上了自己的新的道路。

五

甲午战争以后，东亚風云迅速告急。中国变成世界帝国主义的分割对象，列强分別以租借的名义，无限期地侵占重要地点，并攫取铁路修筑权、建立工厂、洋行，爭先进行蚕食。日本資本主义的确立，恰好和帝国主义在远东开始斗争同时。日本資本主义就同列强一起参加帝国主义竞争，力图在大陆确立經濟掠夺地位。

① 古河財閥經營的足尾銅矿的廢矿石和矿水流入渡良瀨川，使栃木县谷中村一带受到很大的矿毒損害，这一带的农民被迫起而斗争，除往东京請願外，还曾与派来鎮压的警察进行格斗。——譯者

② 文官任月令、文官分限令和文官懲戒令，其目的在于建立排他性的官僚系統。——譯者

日本在远东的最大市场是中国，但是完全压倒别国、深入掠夺的地方是朝鲜。下引记载叙述了1897年前后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情形：

“从京城到仁川的40俄里水路之间，每日有日本小轮船往返航行，……仁川的全部海岸差不多都是日本市街，其中只看到有限的别国领事馆、商店以及海关，朝鲜人的区域在日本街后面，其破陋的景况，实令游人触目惊心。……这里进港的船舶多数是日本人的，由船只到码头的运输业务则专由朝鲜人办理。”（1897年2月8日的《读卖新闻》所摘译的俄国杂志《新时代》的一段，引自石川常雄：《关于创建京仁铁道的一个备忘录》，载《明大商学论丛》，37卷，4、5、6号，1954年5月，85页）。

但是日本对朝鲜的政治侵略还赶不上经济侵略。甲午战争时，日本以改革朝鲜内政为名，拥立亲日派的大院君，夺取了政权。但自三国干涉以后，日本势力转弱，特别在1896年2月俄国海军在仁川登陆，进入京城时，原被亲日派势力挟制的国王走出宫廷，跑进俄国公使馆，解除亲日派的官职，以后韩国朝廷就完全按俄国公使的意旨行事。为了对付俄国的这种活动，日本决定直接控制住朝鲜，因此就由专制主义者带头，以扩充军备和布置在朝鲜的帝国主义侵略设施为最大的急务。

日本在朝鲜的帝国主义侵略设施，是依凭国内的低微的资本积累和专制主义政府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的。1878年，第一国立银行已以5年摊还、6分利息的条件向政府借得5万日元，在釜山开设支行，以后又在元山、仁川、京城开设分行，实行垄断关税征收和其他活动，后在甲午战争时代办日本的公库事务，并保管和收支军款，1903年后事实上成为朝鲜的中央银行。又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军部主导下攫取京釜、京仁等铁道敷设权，成为重要

的問題。战时虽然强力夺得这个权利，但是当时日本的財政力量不足，不能靠国庫进行修筑，又不能发动民間資本。以致京仁铁路敷設权于1896年落在美国人摩尔斯之手。这时日本不得不起而对抗，适逢摩尔斯資金不足，提出出让这一敷設权的交涉，1897年，澁澤荣一等就在政府的大力援助下組成財团，加以接受，1899年这条铁道才告完成。京釜铁道的完成还要晚得多，那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以后了。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日本立刻和英、美、德、俄、法、意、奥等世界列强联合出兵，和帝国主义伙伴们一起进行殘酷的镇压和破坏性的掠夺，并起了主要的作用。在这一事件中，列强都怀着独霸的私欲而来，像盜賊似的偷偷地打算分割中国，而日本的軍事能力却获得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很高的评价，日本也就第一次在列强會議中取得平等的地位。这时俄国派了15万大軍到中国来，事件終了后还留駐中国东北，向列强要求取得全部中国东北的富源开发、铁道建設与管理的独占权，并向朝鮮增强压力。

俄国占領中国东北和日本对朝鮮的侵略引起它們的对立。但是从日本資本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打算出发，都不能从朝鮮退却。在日本政府内部，以确保朝鮮为目的，发生了对俄妥协和日英同盟两种意見的爭执，山县和桂^①主張即使与俄国反目，还是以和英国合作为得計，結果1902年成立了日英同盟。日俄妥协論者是想以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地位为交換条件，要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鮮的壟断地位，而主張成立日英同盟的人，却是想利用英美对于俄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活动所抱的威胁感，和他們采取联合行动，以图保住日本在朝鮮的利权，进而侵入大陆。

^① 长藩出身的軍閥（1845—1913），曾任陸軍次官，陸軍大臣，总理大臣等职。

——譯者

日英同盟的成立增大了日俄战争的危机。日本在英美的援助下，不停地进行战争准备。这意味着它站在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分割斗争的第一线。尽管专制主义者掌握着主导权，而利害关系最大的是以财阀为首的资产阶级。于是1904年2月，日俄战争就以日本海军奇袭旅顺和仁川展开序幕，而在资产阶级最大支援下爆发了。

在上述意义上，从日、俄双方来说，日俄战争是带有双重意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在亚洲第一次大规模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分割世界战争，双方分别同英美和德法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勾结。日本资本主义虽在甲午战争后确立，但还没有达到垄断阶段，可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商业掠夺性质，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当时环境中确立了产业资本，并已占有台湾和策划侵占朝鲜，具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不成熟的资本主义起补充、代替作用，使其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活动的是专制主义。关于专制主义的这种发展上的意义，我从前的看法还没有修改的必要。

“天皇制的军事力量，由于其后援者（英美帝国主义）的金融和军事上的援助而趋于强大，依靠这种强大力量，垄断资本主义也迅速成长。虽然资产阶级在天皇制政权中所占的比重增大，但资本主义还是幼弱的。因此日本也像俄国那样，‘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极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①。日本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在日俄战争后形成的，而军事上的垄断权和掠夺朝鲜、中国和其他异民族的特殊便利的地位却使日本很早就参加了帝国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4页。

主义战争，因此天皇制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出现为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守屋：《天皇制的意义及其基础》，68—69页）。

这里所说的天皇制在一定意义上出现为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具有下述意义：即资本主义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垄断阶段，但天皇制不止是半封建的政权，还在世界帝国主义环境中出现为帝国主义政权。而规定这种情形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特质。

由于帝俄内部分崩离析，日本得到英美的强有力的援助，而且日本人民的爱国热情被帝国主义者狡猾地利用，所以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结果日本资本主义更朝向好战的资本帝国主义迅速进展，以日本和亚洲的劳动人民为牺牲品，提高了作为世界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宪兵的地位。

第五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1. 帝国主义的形成和 国家的补充、代替

日俄战争同西美战争（1898），英布战争（1899—1902）以及1900年的经济危机一起成为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日本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而异常增大，特别是对中国处于地理上的优越地位，并且进一步成为西太平洋的垄断势力。“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1898—1914年间最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的”（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①）。

日本资本主义在这个军事上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下，迅速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的强大显示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日本的胜利又展开了中国再分割斗争的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一经成立，就作为年青的和异常迅速进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后退的俄国同为太平洋沿岸的两个强国，以中国为中心而对立。

在日俄战争时，死的商人—财阀、政商们也获得暴利。日俄战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4页。

爭花了战費 1,716,000,000 日元，其財源的構成是岁計存余 4%，增稅收入 10.5%，公債、國庫債券募集金以及临时借款 82.5%。其中公債共達 1,584,000,000 日元，國內發行的 783,000,000 日元，國外發行的 8 億日元。用這筆巨大战費在國內購買軍需品，又支用輸入的外國資本，使國內貨幣資本迅速增加，其中絕大部分流進死的商人的荷包里。當時已經有人指摘大倉組、三井物產、三菱、高田商會、古河合名等因戰爭而獲取暴利。例如有一件文獻中寫道：

“天使我國富豪借甲午、日俄兩大战役而更加致富。戰爭是災害，會使民力疲弊，但是富豪常因戰爭而增富力。尤其是三井獲得最大的利益。……有價證券隨着戰勝而漲價，使三井銀行的資產一下子就膨脹起來。三井物產的奇利不是理智所能想像的。軍艦上用的燃料是英國加的夫的煤，由三井物產一手承購。澳洲的馬也大多由三井物產經手輸入，裝載大炮、彈藥和各種軍需品的船隻直接開進橫須賀軍港，以修理為名，停在港內。三井物產還從經辦米糧上侵占巨利。戰機一動，政府就令它在台灣、朝鮮收買米糧。……還有許多別的方面。總之戰時物價上騰，即能獲得非常特別的利益。三井的大富豪基礎，就更加鞏固了（大塚丰次編：《三井與三菱》，1913 年版，424—425 頁）。

日俄戰爭後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還是以軍部為前鋒的政府。生產的集中和銀行的發展成為戰後帝國主義經營的前提，官僚政府和財閥勾結起來建立對外侵略的體系。以戰後西園寺^①和桂太郎輪流執政的形態進行的壟斷資本同專制主義的勾結，最為集中地表現在政府的戰後經營上。

第一是戰後的軍備擴張。陸軍方面，已在 1905 年新成立 4 個

^① 旧貴族出身（1849—1940），曾任文部、外務和總理大臣等職，後以元老身分長期參與國政。——譯者

师团，1907年政府又訂定战后軍备扩充計劃，包括增設两个师团、采用2年現役制等，这些經費和兵器与其他折旧費等，只就与陸軍方面有关的來說，即規定11年内繼續支用175,000,000日元。海軍方面，于1907年訂定八八舰队^①計劃，規定7年内繼續支用351,000,000日元，1911年改为到1916年止繼續支用434,000,000日元。由于实行这个計劃，陆海軍的平时力量扩充了70%以上。

第二是与軍备扩張同时并进的國家資本的加强。主要措施是1906年实行铁道国有，为此政府付出了公債456,000,000日元，又在朝鮮以2,200万日元购买了京釜、京仁两铁路，同时由國家接管京义、馬山两軍用铁路。政府还在1906年决定3年内繼續支用1,100万日元来扩充制铁所，1911年，又决定第二期扩充計劃，在5年内追加預算1,200万日元。另于1907年决定在6年内撥用2,700万日元扩充电话事业，1911年开始实行第一期修治全国主要河川計劃，預算达193,000,000日元。

第三是經營朝鮮、中国东北和庫頁島。特別在南滿铁道公司創立时，政府在資本总额2亿日元中出資1亿日元，其中2千万日元作为公債、8千万日元作为公司債券，在倫敦募集。另外根据韓國保护条約，成立資本1千万日元的东洋拓殖公司，并发行相当于繳納資金15倍的債券。

战争获胜后，人們預料会取得像甲午战争結束时那样的巨額賠款，一时掀起了股票投机热潮。但因1905年9月的媾和条約决定沒有賠款，所以經濟界到1906年上半年为止还陷于蕭条状态。继因外資輸入使金融緩和，增发紙币使物价騰貴，又因政府决定铁道国有方針，朝鮮和中国东北的壟断市場在望，情况有了变化，遂

^① 以8艘战艦、8艘巡洋艦組成的主力舰队。——譯者

以1906年6月成立南滿铁道公司為起點，再一次開始了興辦企業的热潮。到了1907年，這次热潮就發生頓挫，可是新成立的和擴充的公司資本，到1908年上半年為止，已達19億日元，其中1906年10億日元，1907年上半年5億日元，成為戰後發展的起點。關於主要工業公司的發展情況見第17表。

在日俄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中所表現的與前不同的特征，是不僅新成立許多像甲午戰後那樣的小規模公司，而且廣泛地進行已有公司的擴充、合併和創設資本雄厚的公司。這意味着新的投資不止來自農村等資本主義的外圍，還作為資本積累的發展而進行。政府採取的輸入外資、鐵道國有、補助企業和經營大陸等政策所導致的金融和緩又大規模地促進了這種趨勢。

從1873年到1897年，日本政府處於不平等條約之下，把輸入外資當做列強侵略的觸角，力求避免。甲午戰爭時募集公債，也不依靠外資。在甲午戰後的經營中，才從1897年起利用外資，但在1903年底時外資只有101,000,000日元左右，還是微不足道。日俄戰後迅速輸入外資，到了1913年，已達1,767,000,000日元，相當於當時貨幣流通額的10倍多。外資輸入的主要形態是借貨幣資本，大部分經由國家周轉，只有一部分直接投放於企業，但都起了資本積累的補充作用。主要的用途是軍事、大陸經營、港灣、上下水道、電氣鐵道、內債償還等。桂內閣於1910年改發代替原有債務的低利公債。電力、海運、煉鋼、電機、棉紡等業都在戰後設立了巨大企業或進行擴充。

但是戰後經營使龐大的資本固定下來，因此從1911年起入超增加，償付外債本息成為一種巨大壓力，到了1912年前後，竟至“沒有錢來支付外債利息”（井上准之助：《我國國際金融現狀及改善辦法》，1926年版，2頁），陷於難以收拾之局，成為日本經濟的

第 17 表 日俄战争前后按产业区分的主要工业公司的发展情况

	1902年		1908年		1912年	
	公司数	資 金 (千日元)	公司数	資 金 (千日元)	公司数	資 金 (千日元)
制粉	27	735	23	3,951	31	5,407
酿酒	198	4,246	172	5,707	369	9,848
啤酒	8	3,262	4	9,710	3	12,464
酱油和黃醬	85	1,422	154	7,044	225	5,308
制糖	8	2,738	7	9,213	13	15,017
制药	54	2,710	80	1,274	155	6,566
造纸	40	10,275	51	17,733	70	32,151
水泥	19	3,993	23	11,061	22	11,164
肥料	21	1,683	53	7,373	72	13,760
棉紡	50	35,367	31	52,519	32	65,173
毛紡	21	7,335	—	—	6	6,656
制絲	301	4,788	292	4,384	307	6,361
棉織	68	1,364	119	3,507	169	11,130
毛織	6	2,548	8	5,582	17	11,369
各种机器	23	796	44	2,808	78	7,460
电机及机器	—	—	19	2,643	33	5,535
造船	17	10,653	17	13,062	25	28,033
制材	42	667	91	6,354	155	5,045
小 計(A)	977	95,142	1,288	163,946	1,787	248,247
煤气	4	4,917	13	18,276	79	54,548
电力	62	10,347	114	51,717	270	159,808
其他(B) (繳納資本 500 万日元以下的公司)	1,263	43,232	1,650	206,918	2,124	84,358
(A)(B)合計(C)	2,240	138,374	2,938	370,864	3,911	332,605
总 計	2,306	153,638	3,064	440,857	4,260	546,961
A/C	43.6%	68.8%	43.8%	44.2%	45.7%	74.6%

高桥龟吉：《明治大正产业发展史》，1929年版，330—331页。

(A)栏所列的是1912年的繳納資本 500 万日元以上的公司。

沉重压力。外資輸入不限于國債，还有市債和公司債，特别是兴业銀行起了很大的作用，經過兴銀借来的外資中，有44%用于对大陆的資本輸出，即与英美分夺剝削殖民地的利益。

二

铁道国有的实施，不仅是为了促进战后經營中資本的流通，而且是为了在軍事上确保战争胜利后获得的中国东北和朝鮮这些壟断市場，才毅然进行的。这是那个1892年的铁道會議以来的悬案之大規模实现，即把日本国有铁道和朝鮮、中国东北铁道統一起来，壟断和統制这些运输工具，以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在实行铁道国有时，三菱表示反对，甚至发生过三菱业主的女婿外相加藤高明^①辞职的事。可是壟断資本家实因此获得巨利。只就收买价格来看，政府根据1906年3月頒布的铁道国有法收买17家铁道公司，其收买价格，系将最近2年的平均利益作为年利5分折算出来的，結果把一共花了239,000,000日元建設費的资产作成471,000,000日元，在17家公司中，特别是日本、九州、山阳、关西、北煤等属于特权財閥的五家公司占被收买公司的資本总额的83.3%，由于这几家公司平日获利比其他公司大得多，所以收买它們的价格也远为高昂。实行铁道国有的結果，不仅使被收买的大铁道資本获利，而且能把不稳定的铁道股票改成安全的铁道公債，因此又受到銀行資本的欢迎，有相当數額的收买铁道的公債归于銀行之手，增加了它的力量。銀行还以收买铁道的公債为媒介，投資于南滿铁道等許多产业，更增强了对产业的統治力。

这样铁道国有的实现就在专制主义加强軍事統制的同时，又

^① 岩崎弥太郎的女婿(1860—1926)，在三菱支持下，历任駐英公使、外务大臣、总理大臣等职。——譯者

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和市場基础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山田盛太郎曾經指出，铁道国有的实现，既贯彻了軍事的警察的目的，又是与它相结合的“第一阶段的开始形态的金融資本的具体表现”（山田：《日本资本主义分析》，101頁），对帝国主义的成立有巨大的意义。由此可见，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自始就含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因素。

在战后资本主义的扩大过程中，财政更与金融相结合，因而資本的統治力量更加增大。

金融方面，从1900年經濟危机以后，銀行的家数不断趋于减少。但速度还慢，例如从1902年到1913年，只减少241家。一般說来，銀行还是很分散的，試观个别銀行的資力，在1914年时，資本不滿10万日元的还占全国普通銀行的38%，若就不滿50万日元的銀行来看，則占84%，每行平均資力是貧弱的。相反地总的銀行資力却大有增加，从1901年到1913年，普通銀行的繳納資本增加了56%，存款总額增加了220%，特别是以5大銀行为首的大銀行和兴业銀行、正金銀行等特殊銀行确立了压倒他行的地位。据1913年底的数字，5大銀行占全国普通銀行的存款总額的22.5%，放款的18.4%，并因存款超过放款而以經營健全相夸耀。这些大銀行特別在承购公司債和公債业务中占居强有力的地位。从1906年訂立凭担保品发行公司債券的制度起，到1914年止，一共发行了7,300万日元，其中兴业銀行承购77%，因而加强了銀行与大企业的結合。特別在1910年桂內閣发行代替旧債的低利債券时，关东、关西的16家銀行組成國債財团，展开了财政从屬金融的序幕。殖民地方面，1909年在朝鮮設立韩国銀行，合并朝鮮后在1911年改成朝鮮銀行，成为朝鮮的統治机构。在臺灣，1898年開設臺灣銀行，20世紀10年代后活动甚力，成为侵略南洋的中樞。正金銀

行則从日俄战争起，作为在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帝国主义侵略尖兵而展开活动。

三

日俄战争以后生产发展的主要数字见第18表。在这个统计中还没有列入重工业，工业的主流依然是轻工业，但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重工业总算开始和各部門一道发展了。

第 18 表 明治后期至大正初期农工矿业生产情况

	米 (千石)	生絲 (千貫)	棉 紗 (捆)	棉織品 (千日元)	絲織品 (千日元)	煤 (千吨)	銅 (千公斤)	工矿业 生产指 数	物价 指数
1906年	46,303	2,190	945,167	80,386	95,100	12,980	37,431	61.1	58.6
1908年	51,933	2,711	878,570	101,187	124,245	14,825	40,653	61.9	60.9
1910年	46,633	3,174	1,134,780	122,152	141,617	15,681	49,324	73.9	58.8
1912年	50,222	3,645	1,352,209	152,748	147,268	19,640	82,422	109.6	64.6
1914年	57,008	3,756	1,666,184	150,386	128,025	22,293	70,463	100.0	61.8

资料来源与第4表同，物价指数以1934—36年平均数为100，系日本銀行所編制。

在轻工业方面，日俄战后最发达的是棉纺织业，这是因为輸出市場扩大的原故。战后的兴办企业热潮也在棉纺织业方面出现，在1906年12月时，新設公司資本有20,353,000日元，扩充的資本有30,669,000日元，合計51,022,000日元，1907年的股息达10%到40%。1908年后棉紗业陷入深刻的危机，多次施行减縮开工時間。在这个过程中，大紗厂合并小紗厂，确立了7大棉紡公司的霸权。棉紡設備也确有增进。在这个时期中，值得注意的是第19表所示兼营織布的棉紡厂之增加，这是由于作为战时軍需品的棉布需要增大，关税定率法的修改和中国东北与朝鮮市場的扩大等原因，所以显著增加。

第 19 表 日俄战争后棉纺织设备的扩充

	紡机錠数(千錠)	織机台数(台)
1903年	1,381	5,043
1908年	1,696	11,146
1913年	2,415	24,224

棉纺织业联合会調查。

对中国的棉紗輸出，由 1907 年的 2,600 万日元增至 1913 年的 6,900 万日元，逐年进展，把英国紗从中国市場赶走，并与印度紗爭霸。棉布則向中国东北及其他地区、朝鮮和印度輸出，对于素来占重要地位的朝鮮市場，1906 年在三井物产的联络下，由大阪紡、三重紡和白洋布織制等三公司組成三荣棉布輸出組合，进行壟断。又对战后成为重要布場的中国东北，也在三井物产的倡导下，由大阪紡等 5 家公司組成棉布輸出組合，赶走了素来在这里銷售的美国棉布，实行壟断。

其次，制絲业由于战后美国市場的大量需要和夏秋养蚕的发达，就以器械制絲为中心而进一步发展。經營規模扩大，器械制絲和座纜制絲方面使用 500 釜以上的工場都有增加，但自 1910 年前后起，坐纜制絲业一般趋于衰退。可是在这个产业中，家庭工业还是广泛留存，租釜进行坐纜制絲的經營方式，还在諏訪地方强力展开。

在織物業方面，絲織与棉織方面使用动力織机的全有迅速增加，副业生产、家庭工业、小工場手工业等都不断向小工厂轉化，第 20 表說明了这种情形。絲織方面，北陆地区已經决定性地动力化了，如在 1914 年，福井有动力織机 8,751 台，而手織机只有 2,373 台，每一企业平均雇工数目已达 10 人。与此相反，在西陣和桐生，

第20表 明治后期織物業經營形态的变迁

		工 厂		家 庭 工 业		副 业 經 营	
		企 业 数	职 工 数 (人)	企 业 数	职 工 数 (人)	企 业 数	职 工 数 (人)
福 井	1905年	444	9,111	2,123	13,431	2,472	2,904
	1907年	450	9,931	2,157	11,593	4,594	5,464
	1910年	633	11,431	1,854	8,043	4,247	4,599
	1912年	642	11,967	1,130	4,733	3,352	3,371
爱 知	1905年	285	8,244	2,580	8,420	38,067	56,673
	1907年	365	9,176	4,108	7,410	35,228	43,846
	1910年	680	15,058	2,275	7,042	16,053	21,748
	1912年	627	15,266	2,330	4,377	16,677	18,383

根据藤田敬三編:《分包制工业》,1943年版,12頁。表中所謂“工厂”指雇工10人以上者,“家庭工业”指雇工不滿10人者,“副业經營”指农家为了补充家計而从事的手織操作。又在爱知县的織物生产額中,純棉織品于1905年占82%,1912年占73%。

还是以租机經營为主,只有几个特殊工厂使用动力織机。

就棉織业來說,战后各棉織地区都采用了小型动力机,原有的出租織机制度迅速衰落,而小工厂却日益推广。例如在泉州,据《大阪府統計书》的数字,1907年才有动力織机数的記載,計400台,1908年有472台,1909年2,319台,以后逐年飞跃增加,1912年达9,227台。同时使用动力織机的工厂也有增加,原来在家里織布的妇女变成織布厂的女工,女工数从1908年的940人起,每年約增加1千人,1912年达4,782人。而《統計书》中所列“工厂”(指工場手工业)內的織东(出租織机的业主)却迅速沒落,試观其戶数,1905年为150戶,1909年为154戶,而1910年只剩68戶,1911年剩36戶,1912年剩13戶,减少得很快。

在日俄战后迅速发展的还有毛織业。除由日本毛織公司等大資本企业进行外,还盛行于尾西等毛織地区,特别是薄毯子的产量

剧增,完全赶走了輸入品。

織布业动力化的过程,打破了原来以使用手織机的家庭工业和副业經營等形态出現的地主、豪农所造成的农业与工业的連带关系,这意味着劳动方式、剝削方式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进一步促进了村社的瓦解和地主的寄生化。

此外,报纸的剧增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特别是为了利用北海道的森林,富士造纸公司和王子造纸公司分别建立了江别工厂与苫子牧工厂,都是规模宏大的。

在这个时期,值得注視的輕工业,是在殖民地經營刚刚有了基础的台湾发展起来的近代化制糖业。从明治前期以来,砂糖和棉織品同为輸入品的大宗,輸入糖挤垮了本地旧式糖业,受到政府保护的、在北海道开办的甜菜业也不能获得很大的成績。政府从占领台湾以后,策划在总督府的领导下发展这里的糖业,1900年成立半公半私的台湾制糖公司,1902年起对本地人的旧式糖业(糖廬)进行近代化改革。台湾制糖公司于1905年新建近代化的大工厂,做出了成績,后来在日俄战后的兴办企业热潮中,从1907年到1910年陸續開設了大日本、明治、盐水港、新兴、新高、帝国等大資本制糖公司,展开活动。1909年就压倒台湾原有的糖业,并于明治末期排斥了本地和其他国家的商业資本,确立为近代化工业。从台湾运进日本的砂糖价值,1909年为2,300万日元,1911年达3,700万日元,占从台湾运进日本的貨物总值的三分之二。这些大資本企业与殖民地統治相結合,从20世紀10年代后統治了广大的公司所有地,以一部分自行經營农場,一部分租給殖民地奴隶式的佃耕蔗农耕作,又以壟断价格收买一般蔗农經由零細耕作生产的甘蔗,攫取超額利潤。

四

重工业在这个时期建立了发展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构成这个发展基础的主要部门是军需产业，供应社会需要的产业还很微弱。

制铁业以扩充八幡制铁所为中心，在这个时期内大体确立。八幡的第一期扩充，是从1906年起，作为连续4年的工程进行的，新建了160吨的高炉和160吨的混铁炉；第二期扩充工程从1911年开始，1916年大体完成，建立了250吨的高炉和柯派斯(Koppers)炉120座。由于八幡增产，1913年日本生铁自给率达48%，钢材自给率达34%。八幡所占全国产量的比例，生铁为73%，钢材为85%。再看技术上的进步，如就第一高炉每日平均产铁量来说，1904年4月为11.2吨，1904年7月至1910年6月增为144.5吨，1910年10月至1915年4月，又增至162.2吨，焦炭消费率则由1904年的1.43减到1912年1.04。

在这个时期，民营钢铁业也和军部的需要结合起来有所发展。

神户制钢公司设立于1904年，1905年被铃木商店收买后，一时陷于困境，只因1909年归并吴港海军工厂，才有了发展基础，1911年又成为独立企业。住友铸钢于1889年开办，1901年被住友收买后，由于日俄战争时和战后得到海军大量铁锚订货和国有铁道订货，才确立其地位。新成立的还有室兰地方的日本制钢公司，这是经由海军的接洽，由北煤于1907年与亚姆斯特朗·维克斯公司联合开办的，开始炼钢和制造兵器。同年为了供给日本制钢公司需要的铁，又由北煤投资设立轮西制铁公司。此外1911年大仓成立本溪湖煤铁公司，三菱开办兼二浦制铁所，1912年白石、大仓等成立日本钢管公司。日本钢管以制造煤气与水道所需钢管为目

的，但是最初也是在海軍保证下筹办的。

由于海軍的指导、訂貨和 1909 年政府发布远洋航綫补助法等原因，造船业发展很快。海軍工厂的造舰能力于战后更加提高。在横須賀和吳港的工厂建成薩摩号与安艺号战舰后，又在本国工厂里造出了河内、摄津、扶桑、山城、伊勢、日向等第一流战舰，在 1906 年到 1915 年期间登記的海軍舰船中，国内制造的占 80.8%。在海軍的指导下，增設了长崎、川崎等大造船厂，并增加資本，使其規模和制造能力迅速增进。长崎造船所于 1908 年后造出了天洋丸、地洋丸、春洋丸等世界有数的蒸汽透平船，国内制造的船就超过輸入的船了。1910 年长崎、川崎造船厂都应海軍的訂貨，开始建造巡洋舰和巡洋战舰，确立了补充海軍工厂的地位，更扩大了規模。

造船业中显示了資本积聚和集中的情形。例如 1911 年长崎造船所的职工达一万名，川崎、三菱神戶、大阪铁工等造船厂也以規模巨大相夸耀。但是造船业的这种扩展情形却增加了它同其他产业之間的不平衡，甚至与制铁业发生很大的悬隔。造船所需鋼材，在八幡制铁所投入生产以前，本国完全不能供应，八幡投入生产后只能供給海軍工厂造舰所需鋼材，民間造船所需鋼材差不多全靠輸入。海运业也随着造船业而发展。日本拥有的船舶数量，1906 年有 100 万总吨，1911 年增至 1,375,000 总吨，占世界船舶总吨位的 3.1%，居世界第 6 位。

由此可见，重工业的发展是依靠軍需，而沒有同社会再生产配合进行。在机械工业中，除造船业外，只有火車和电机制造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别的部門的水平还很低。火車制造业方面，从日俄战后川崎造船所开始制造機車和客貨車以来，国产火車車輛迅速增加，到了 1912 年，铁道院就下令停止向外国訂貨，即大体上达

到了自給的程度。电机的生产量在当时电气事业勃兴期中迅速增加,从制造小容量的电机进展到制造发电机、变压器等大容量的电机。特别是芝浦电机公司于1909年与通用电气公司合作,确立其技术基础,率先发展。1905年,三菱电机作为三菱神戶造船所的附屬工厂而設立,1909年制出日本第一台500瓩的蒸汽透平发电机。1911年日立制作所作为久原矿业所的山立工厂,开始投入生产。

但是机械工业的一般水平还低。工作母机方面,池貝工厂于1905年根据东京工业学校教員弗兰西斯的图样,才做出完整的美国式車床。唐津、大隈等厂也从20世紀10年代起着手制造工作母机,但还没有超出仿造外国制品的程度。产业机械方面,1906年由于三井的奔走,成立了丰田式織机公司,但在1910年时,原来用来号召的丰田佐吉都被当作无用的人,迫其辞职。至于机械工业的工人組織情况,徒弟制度还广泛留存,作为无产阶级的核心的机械工人,是在軍事工厂、造船厂、制铁厂等企业形成的。如第21表所示,官办軍事工厂的发展实在远远凌駕民营机械工业。

第21表 日俄战争后軍事工厂和机械工厂之比較

		1906年	1909年	1912年
官办軍事工厂	职工数	63,704	68,605	76,526
	馬力数	68,403	97,063	129,590
民营机械工厂	职工数	55,829	46,834	69,810
	馬力数	15,464	29,904	53,515

小山弘健:《日本軍事工业发展史》,載《日本产业机构研究》,96頁。

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动力和制铁所需的煤也有增加。如第22表所示,工厂用煤差不多占全部产量的半数。同时生产規模更加扩大,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1906年,戶畑矿完成了新式装煤設備,从八幡二瀨起,各处开始挖掘竖井,1907年后电力采掘作业迅

速推行，1908年，三池、小樽、室兰等矿完成了港灣設備。煤产量进一步向筑丰地区集中，1908年九州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9%。又在1907年前后，撫順、本溪湖矿都被日本占有。三井、三菱、北煤、明治、具島等財閥和大資本家控制了煤业的一大半，他們同官僚勾結，占居壟断地位，获得巨額利潤。但是資本尽管集中，而半奴隶式的劳役制度依然是主要的經營方式，技术革新主要地只施行于搬运等方面，而没有同样行之于采掘方面。

第22表 明治后期煤的按用途区分的消費情形

(单位: 千吨)

	产 量	輸 出 量	船 舶 用	铁 道 用	工 厂 用
1905年	11,542	2,528	1,997	842	3,276
1910年	15,535	2,794	2,408	1,238	4,319
1914年	21,316	3,558	3,942	1,915	8,359

根据木下悦二：《日本的煤矿业》、日本統計研究所：《日本經濟統計集》和东洋經濟新报社：《日本貿易精覽》編制。

在这个时期內，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电力工业从这时起迅速发展。試观1907年1月按部門区分的新办企业計劃，在公司总数404家、資金9亿余日元中，电力工业占137家，資金4亿日元，即可想見这种情况。特别是水力发电业从这时起有所发展。自从1907年东京电灯公司完成把电送到駒桥的工程，1908年秋田电气公司实现高压远距离輸送以来，水力发电的成本显著降低，因而压倒了火力发电业。又电力原来大部分用在电灯上，从这时起迅速发展为近代的原动力，1911年，在与軍事有关的工厂中，电动机馬力数超过蒸汽机，到1914年为止，水泥、造紙、肥料等化学工业中的电动力設備也超过了蒸汽动力。动力的电气化促使工业向大都市集中，猪苗代水力发电公司于1914年建立了115,000伏特、200

公里长的猪苗代输电线路，把 37,500 瓩的水电力送往东京。动力的电气化又使小工厂也可能使用机器，由于动力被大发电公司所占有，促进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显著地充实起来。

水力发电的发展产生了剩余电力，为了利用这些电力，碳化物和氮氯化钙制造业就应运而生。其中最大的是 1908 年野口遵办的日本氮气公司。这个公司在三菱的援助下，利用鹿儿岛县曾木电力公司的剩余电力，在水俣制造氮氯化钙。

五

产业资本的确立，得到商业资本和贸易资本的大力补充，这种结构，在日俄战争后重工业勃兴，垄断资本形成以后，依然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大小商业资本家总是站在扩充国内市场和在海外市场进行活动的最前列，从以三井物产公司为首的贸易资本企业起，到一旗组止，日本商人结合着本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地位，垄断朝鲜和中国东北市场，并侵入中国其他地区。贸易的发展情形见第 23 表，输出市场的扩大使棉纺等轻工业更加发展。

第 23 表(1) 明治后期到大正初期的输出 (单位: 千日元)

年度	总额	茶	生丝	棉纱	棉织品	丝织品	煤	铜
1906	423,755	10,095	110,443	15,304	35,619	35,679	16,280	25,311
1903	378,246	10,544	108,313	20,724	14,611	30,371	18,234	21,578
1910	458,429	13,410	130,182	45,347	20,463	32,797	16,301	21,176
1912	526,982	12,850	149,853	53,681	25,766	30,101	20,285	25,181
1914	591,101	12,755	161,249	78,555	34,841	34,023	23,915	28,468

1911 年改订关税率，采取了自主的保护政策，这成为重工业、化学工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由于 1889 年修订的条约的有效期间为 12 年，所以在这年废弃这个条约，重订税率，将旧条约的单方面承

第 23 表(2) 同期内输入表 (单位: 千日元)

年 度	总 额	米	砂 糖	皮 棉	铁 类	机 械 类	矿 油
1906	418,784	26,172	23,726	81,294	27,798	19,444	13,404
1908	436,257	22,689	19,604	88,713	31,820	35,842	16,252
1910	464,234	8,644	13,140	157,824	32,780	15,546	16,443
1912	618,992	30,193	16,021	198,935	57,287	29,267	15,099
1914	595,736	24,824	21,679	217,873	39,934	24,942	11,236

第 23 表(3) 明治后期到大正初期按地区区分的输出表

(单位: 千日元)

年 度	朝 鲜	关东州 ^①	中 国	香 港	印 度	英	法	美
1906	23,257	—	117,779	27,061	10,352	22,553	40,289	125,964
1908	24,040	17,239	60,507	18,539	13,632	25,521	33,746	121,997
1910	25,349	19,148	90,037	24,460	18,713	25,781	44,925	143,702
1912	40,756	27,545	114,824	28,713	23,648	29,792	43,871	168,709
1914	39,047	22,270	162,371	33,277	26,048	33,086	31,209	196,539

第 23 表(4) 同期内按地区区分的输入表 (单位: 千日元)

年 度	朝 鲜	关东州	中 国	香 港	印 度	印 尼	英	德	美
1906	7,235	—	57,397	685	60,315	23,520	101,311	42,500	69,949
1908	10,963	12,817	50,967	1,116	49,328	23,965	107,795	46,279	77,637
1910	15,379	9,740	68,570	675	106,361	18,880	94,701	43,946	54,699
1912	15,369	25,707	54,807	882	134,742	19,063	116,147	61,076	127,016
1914	28,587	31,277	58,306	876	160,324	22,025	92,302	44,922	96,771

担义务的协定改成双方承担义务的协定,在输入税率方面,降低原料品税,提高完成品税,完全实现了保护关税。

表现在改订关税率上的保护贸易的实施,使输出方面原料品

① 日俄战后日本从俄国攫取我国旅顺、大连的租借权,日本称之为关东州,这里的数字实系对中国东北的贸易。表内的中国则指东北以外的中国地区。——译者

减少、制成品增加，輸入方面原料品增加、制成品减少。但如前所述，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平衡地推行工业化。主要的輸出品还是以美国为对象的生絲，同时从印度、美国輸入的棉花原料更有增加，此外輸往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市場的棉紗、棉織品成倍增加，棉織品的輸出量終於超过了絲織品，从欧美各国輸入的机械和铁，則因扩充軍备而有进一步的增加。第23表的(1)、(2)两表显示了上述貿易結構。这种結構維持得很久，一直到中日战争发生时还存在，抑制了重工业的发展，使作为輸出产业的輕工业不平衡地扩大。

在这种貿易結構下，如果輸入的原料便宜，輸出的制成品高昂，那么工业化在国际收支上看来是有利的，若是貿易关系相反，則如不进行饥饿輸出^①，以扩大其数量，就不能維持貿易平衡。而这方面的实际情形是：以1913年数字为100，制成品輸出单价指数，1907年为118.5，1910年为98.4，而原料品輸入单价指数，則1907年为85，1910年为93.2，即越到后来，原料品越是相对地高昂（篠原三代平：《經濟发展与貿易的关系》，載中山伊知郎編：《日本經濟的結構分析》，下卷，1954年版，111頁）。这就在結構上决定了要把貿易的主流从原料品改成制成品，就須經由社会傾銷^②以进行饥饿輸出，而不是推进工业化。在不能把这种饥饿輸出执行到一定的程度时，貿易收支就会不断亏损，事实上这个时期內的貿易，除1906、1909年外，都有巨額入超，加上偿还外資本息，就在1912、1913年前后迫临現金儲备缺少危机。还須指出，这个期間的貿易业务，在1900年前后，輸出入方面都被外商控制60%，日本商人只經办40%，到了1910年前后，才改变这种情况，同时載运

① 牺牲国内需要而进行的勉强出口。——譯者

② 压低国内工人工資而进行的对外傾銷。——譯者

商品的外國船和日本船的比例也有同樣的改變。這意味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在一定的範圍內顯示經濟的自立化。可是在生絲輸出方面，在全部明治年代，還是外商占優勢，到大正年代才改變。

2. 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

在日俄戰爭後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從1907年起拖得很久久的嚴重經濟危機和蕭條，造成了如貿易上的逆差所表現的經濟困難。

1907年的危機構成那年秋天從美國開始的世界危機的一環，再加上日本的特有情況，就釀成長期的混亂。在1907年1月，由於三井、三菱對股票的操縱活動，已經使股票價格大跌，從而使興辦企業熱潮停滯，從3月到6月，便發生危機。由於生絲、棉紗等貨物的輸出還能保持，所以還沒有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一旦美國危機於10月爆發，立刻波及日本，從1908年到1909年期間呈現了悲慘的現象。打擊最大的是輸出不振。生絲價格從1,400日元左右降到800日元左右，對中國的棉紗輸出，也因銀價暴跌而完全停頓。1908年又不斷發生銀行停兌，全年陷於陰暗狀態，到了1909年，1月就有大日本制糖公司發生破綻，接着藤本證券經紀銀行破產，大日本水產、東洋輪船、寶田石油、東京米谷交易所等也相繼暴露窮態，經濟情況更為蕭條。著名的“戊申詔書”^①就是在1908年10月頒發的。

在美國和德國，1907年的經濟危機都比以前的危機嚴重，但

^① 詔書中要“臣民”“忠實服務，勤儉治產”和“去華尚實”，實際上是要人民束緊腰帶，多為剝削階級服勞役，以圖擺脫危機。——譯者

在 1 年至 1 年半以后，各国都开始迅速恢复，这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加剧，大家极力扩展重工业，特别是造船业和制铁业，致使固定设备增加，从而迅速打开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市场。而在日本，正因为在同一情况下进行扩充军备和增加重工业投资，却使国内市场感受压迫，输入增加，以致危机恢复延缓，呈现慢性萧条的现象，一直到 1910 年至 1912 年之间，才恢复转来，开始上升。但在 1913 年又出现颓势，并延至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萧条的慢性化暴露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显著弱点。大内曾对这些过程作了如下的说明：

“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使战后几年中出现‘从未有过的经济萧条时代’。欧战以前几年间笼罩日本的乌云，使日本经济前途显得似乎完全无望，这完全是由于日俄战争本身使日本经济具备以下特征，因而必然会有那种命运。第一个特征是：由于日俄战争的军费是依靠巨额公债，特别是外债支付的，所以日本经济界出现了物价腾贵的现象，而致新的企业都是建立在投机上的，为数过多。第二，日本农村在日俄战时、战后迅速货币经济化，虽然对扩展日本商品市场显然有所贡献，但是通过这次战争，生产力有限的日本农村并没有增加多少财富，却反而增加了财政上的负担，结果整个的农村并不能成为多么好的国内市场，而且逐渐显示其局限性。……第三，日本必须在朝鲜、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进行的侵略经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立和开发时所遭遇的自然上和历史上的困难，又需要更加强大的权力和军备。……明治 40 年（1907）后的经济萧条，实是这种命运的表现，当时似乎简直找不到依靠本身的力量来摆脱这种厄运的办法。”（大内兵卫：《日本财政论——公债篇》，载改造社：《经济学全集》，第 22 卷，1932 年版，116—117 页）。

但是这个过程正是大规模促进资本集中的过程。如据大岛的统计,从1907年4月到5月底,解散的公司共达175家,其中资本5万日元以上者的资金合计109,120,000日元,在合并、减资、解散的企业中,有日本、北海两制麻公司合并成立帝国制麻公司、东京电灯公司合并东京电力和中央电力公司、共同火险与东洋水泥等公司的减资、台湾与大东两制糖公司的合并等(大岛清:《日本危机史论》,上卷,1952年版,329页)。经过这个时期,大资本企业在各部门进行合并、吸收。如在棉纺织业方面,1913年钟纺、大阪、三重、摄津、尼崎、富士瓦斯、大阪联合等7家公司占参加棉纺织业联合会的44家公司的缴纳资本的57.7%和设备的58.7%,啤酒业方面,1906年由日本、大阪、札幌等三家公司合并成立的大日本麦酒公司,于明治末期掌握日本啤酒酿造量的72%。制麻业方面,则帝国制麻公司占麻业总投资额的96%,成为一个大托辣斯。卡特尔在这个期间也极为活跃,棉纺织业联合会多次实施缩减开工时间,过磷酸、铁道车辆、无烟煤、石油、砂糖、制粉、板纸等业都成立卡特尔联合会,实行协定价格、联合贩卖、分配订货、限制生产等壟断活动。

財閥开始朝向康采恩的形成进展,三井于1909年改变原来的组织,成立资本5千万日元的三井合名公司,统辖分立的商业、矿山、银行、仓库等嫡系企业,还拥有北煤、王子造纸、钟纺、芝浦电气等旁系大企业,在日本经济界中建立一个统治网,三菱则在三菱合资公司下统御矿山、造船、运输、银行、地产等直轄事业,又因铁道国有之实施而获得巨大收买价款,更确立其发展的基础,旁系企业有邮船、明治制糖、日本氮气、富士纺等,亦以规模宏伟著称。住友也在1912年把银行部从总店分立出来,安田在同一年设立保善社,都朝向康采恩之形成迈了一步。这些財閥勾结元老、上层官僚及政党,和政治发生比以前更加密切的关系,在以后的政治史上,

經常作为或明或暗的势力进行活动。

二

虽然壟断資本像上面所說的那樣迅速形成，但从整个国民經濟来看当时的經濟，重工业的发展还是落后，而靠貿易来补充，結果貿易、銀行、矿山等方面的壟断組織之发展比工业方面更快些。因此虽然称之为壟断資本，却不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近代金融資本，而是內部頑強地殘存着旧的前期性格的壟断者或財閥，他們的活動含有許多妨碍近代发展的因素，也就具有掠夺和好战的性质。在当时的工业中，大工厂数目还少，大部分生产还是以小工厂、工場手工业、家庭工业和織布副业为主要方式。采用大工厂方式的主要产业为棉紡、制铁、造船、人造肥料、洋紙、啤酒和制糖等，其中除棉紡业外，大多是剛剛开办的。至于生絲、棉織品、絲織品、針織品、鑄器、陶磁器、日本紙、清酒、酱油等物，則主要部分是由小規模生产单位制造的。这种情况提高了資本总額中商业和貿易資本的比重，这些小規模生产受到到处散布的地方銀行和地方批发行的高利貸或商业資本性质的統治，全国性的大資本通过这些地方机构进一步扩充了全国性的統治网。在那个阶段，所謂“中小企业”問題是不能存在的。

三井物产公司典型地表現了壟断資本的高利貸或商业資本性质。三井物产壟断日本貿易額的22%，經營的商品，从米、煤、棉花、棉織品、机械、铁、生絲起，到苹果、鸡蛋为止，共达300种，如就經營鸡蛋來說，它从向爱知县的农户买蛋一直到送往倫敦，插手于一切方面。同时又率先进行殖民地侵略活动，在南滿铁道公司成立时，即曾代表民股，送去两名重要負責人。至于三井、三菱在統治矿山方面的前期性质，則有下面这种記載：

“明治 41 年(1908)，三菱合資公司改組，許其所轄企業採用獨立核算制，明治 44 年(1911)，三井合名公司把礦山部分獨立出來，改組為股份公司，它們看起來似乎是獨立的煤礦業。但是三菱規定礦山部必須在每一決算期內向總公司交納資金的 10%，達到一定數額以後，就當作上交的純利。……三井方面，則將改組前的明治 44 年下半期期終的固定資本除以當時實收煤量，算出當時出煤 1 噸的資產折舊額，用它做以後折舊的標準，一直到大正 14 年(1925)還不改變。換一句話說，雖然在表面上看來組織是近代化的，而實際上還是極力限制對煤礦企業的再投資，盡量把利益吸收到總公司去，因此不外是原有的‘大老板’機構的重新編組。……煤礦企業對於財閥的發展是有必要的，但財閥們却越來越不把錢花在煤礦企業上，而朝着提高利潤的方向做去。結果專門設法開採最容易出煤的礦層，力圖花最少的錢來採掘價值高的優質煤。採掘作業集中於與煤產量不相稱的過大的礦區和卡特爾的早期組成等現象就是這樣發生的”(大木洋一：《煤礦業的構造》，載有澤廣巳編：《現代日本產業講座》，III，1960 年版，240—242 頁)。

日本帝國主義就在上述基礎上，並得到軍事上的壟斷權和掠奪朝鮮、中國的特殊便利地位的補充，成立為侵略的帝國主義。日本在 1905 年同英國締結第 2 次日英同盟，又在美国同意以後，于那年 11 月用盡脅迫和收買手段搞成了日韓協約，淪朝鮮為保護國，並在 1910 年合併這個國家。在中國東北，則以南滿鐵路為中心策劃壟斷活動，因此從 1906 年後加劇了和美国的對立，又自 1907 年以來同俄國締結多次協定，相約支持它們在中國東北和蒙古的侵略勢力範圍。在中國其他地區，或者策劃利用革命來達到其侵略目的，或者支持腐朽透頂的清廷，還陰謀策動中國東北和蒙古獨立。

对朝鮮的殖民地經營，是从这些确立資本主义侵略的基础工作开始的，即依靠总督府的专橫統治，在封建的土地制度上强制設立近代的土地私有權，組成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农业关系，又由国家来壟断交通運輸和整理充实金融货币。資本主义的侵略活动以商业和矿业为主，日朝貿易在以三井物产公司为首的日本商人的統治下有了增加。对于中国东北，則以南滿铁道为中心进行掠夺活动，并依凭铁道附屬地的行政權和各种企业的所有權以及駐扎中国东北的軍隊和独立守备队的軍事力量，扩大侵略。中国东北同日本之間的貿易从1907年大連港开放以来飞跃增加，排挤了美国資本的侵略活动，建立了以三井物产为首的日本資本的統治。对于中国其他地区，則由正金、兴业銀行領先，大規模地进行铁道借款、汉冶萍借款等政治性的資本輸出和貿易資本的輸出。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时，三井物产和日本邮船曾以攫取汉冶萍公司的利權为目的而展开活动，1912年英、法、德、美向袁世凱政权接洽四国借款，由于日、俄硬要参加，采取了联合行动，終于改成六国借款。軍部和財閥在这些活动中完全一致，实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三

壟断資本以这样的形态形成，又使地主制的存在仍有重要的意义。

“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是勾結着专制主义国家进行的，而其剩余价值的基础則在于各种半封建的关系之加强，因此尽管壟断資本的地位提高，而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并没有减少。明治40年代(1907—1916)的农业发展，虽使下层农民中的农产品商品化有所进展，但是基于土地所有權的地主的剝削却更为加强，同时被债务束縛的农奴似的农民增加，又强迫施行谷物檢查制度，^①并在

各地提高了地租率。地主在政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例如在明治43年（1910年）修改关税时提高了谷物輸入稅，在战时增收的稅中首先減輕地稅，又如米价高漲和有更多的农民迫于貧苦出賣谷物，虽与壟斷資本的利益不合，但仍听任其发展”（守屋：《天皇制的意义及基础》，71—72頁）。

日俄战争以后，寄生地主制大体上在全国完成，地主变得对农务不热心了，因此原来在大地主的主导下发展的农业生产力却从地主方面趋于停滞。担负起提高农业生产力責任的是地主制度下进行小規模耕作的农民，过磷酸石灰、硫酸等化学肥料和足踏旋轉脫谷机、稻谷脫壳机的使用都有所推广，还出现了旭、陆羽系等新的米品种，特別在近畿、瀬戶内海地区，还抗拒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显示农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政府为了軍事上的需要和适应城市消費人口的增加，也在1903年农商务省发表文告后强迫实施被称为“軍刀农政”的农业改革。由官僚和农会合作进行技术指导，督促地主制下的农民发展生产。但是这种发展一般地由于地主在賣米上的优势而被轉移目标，担任直接生产的佃农反因佃租在质和量上同时增加而受到更厉害的剝削，結果生产力的进展表现为小經營中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和复种作物的扩大。寄生地主制由于1910年后水利事业的划时代进展和战后在全国确立的米谷檢查制度而更为加强。地主又通过補助費政策的媒介而加深了同官僚的勾結。

当农业生产力在寄生地主制度下經歷不正常的发展时，农民階級分化方面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趨勢。耕种5町步以上和3到5町步田地的农户和耕种不滿5反步田地的农户这两极不断減

① 由地方行政机构伙同地主檢查佃农所交谷米的品质、包装等，对交納不合規格的谷米的佃农加以处罰。——譯者

少，耕种 1 到 2 町步田地的中間阶层不断增加。这是以后日本农业中的基本趋势，一直維持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而其基础是自耕农的不断进行分化。据说“自耕农分化的情况，如果細加分析，就可以知道，在時間上以受到日俄战争影响的时期（1904—1909）为最显著；在地域上，則北部、东部地区（东北、关东）的地主剝削厉害，中央地区（北陆、东海、近畿）比較緩和”（山田盛太郎：前引《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159 頁）。农民經濟的商品經濟化从这个时期起更有进展，但是相对地說，这种进展比起工业方面的资本主义进展来要落后得多，进展中的动态也不与资本主义的經濟周期相吻合。例如米价的变动就与工业的周期不相符合，而首先受到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

“明治 38 年（1905）一歉收，39 年米就涨价；40 年和 41 年丰收，42 年和 43 年米价即显著低落；可是 43 年年成不好，44 年又迨于騰貴。可見在过去 10 年中，米价总是随着产量的丰歉而漲跌”（河合良成、鈴木直二：《关于米谷法制定經過的資料》，1938 年版，3 頁）。

以农民进行小規模耕作为基础的农业的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工业的情形，从这个时期起日益显著，因此中間阶层的分化随着商品經濟化的进展而正式进行，致使佃农爭議在全国頻繁发生。由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承担者由地主变成从事小規模耕作的农民，因而加深了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与农民的小商品生产之間的矛盾。如在种米的新潟县，从 1910 年前后起，每年出卖青苗的价額达 6 万日元。由于生产力的增加，农民有了經濟上向上的可能，但受到佃租增加和由于貧穷而被迫出卖谷米的压迫，所以从那时起，已經出現了土地国有或“土地均享”的呼声。

寄生地主制的确立又扩大了它同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这个

矛盾特別集中表現在相對的剩餘價值的剝削和米價的關係上。地主的要求和資本家的要求，在修訂關稅、運入台灣米和鐵道運費問題上常常發生對立。米價於1907年的經濟危機時大跌，而在1910年却因各地發生大水災而飛漲，使資本家們感到驚恐。從國民收入來說，這時農業的比重雖然漸被工業追上，但還占首位。如第24表所示，克拉克和土方兩人的調查和推算結果雖有不同，但都指出農業領先的情形。

第24表 明治後期到大正初期的國民收入

(單位：百萬日元)

調查者	年 度	農 林 業	其 他	合 計
克 拉 克	1908	1,164	1,224	2,388
	1914	1,513	1,534	3,047
土 方	1908	1,154	867	2,021
	1914	1,158	1,501	2,659

根據山田雄三：《日本國民收入的推計》，13頁。

由於地主制在前述基礎上還很強固，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能消除它和地主制的矛盾，反而同地主制勾結起來，結果廣泛存留着小工業企業，加強了對工人、農民的剝削，又促進了帝國主義性質的殖民地掠奪。但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已在這個時期暴露無遺，在這個意義上，曾有人指出，這個時期是“地主制的全盛時期，同時……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獨特的发展過程中形成、成長的地主制，現在還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留存下來，但已走向衰退，因此又是過渡時期”（山崎春生：《日本農政史中的明治40年代》，載大阪市立大學：《經濟學叢志》，第40卷，第1期，1959年1月，57頁）。這時在大地主中，雖已出現一面以施恩的姿態把土地賣給農民，以取得資本，同時打算加強半封建關係的人（如靜岡的高林家、岡山的大

原家等),但就一般的情况看来,大地主还在继续积累土地,和吞并村落共有林和族有地,可见地主制的统治还在朝向完成之域发展。

四

在垄断资本主义与寄生地主制相结合,带着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性质而形成时,与它对立的雇佣工人,还是由近代无产阶级到家庭劳动者这些复杂的成分构成,并处于半奴隶条件之下。

工人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农村,到明治末年(1911)为止,工厂工人中女工占多数。农村流出的男子,大部分充当商店的伙计、手艺人 and 徒弟,留在农村中当长工的也占很大比重。但是中等规模以上的工厂中工人增加,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变得更加明确。当然由于工业中小生产企业的留存和商业资本控制力的强大,所以并不要求农民彻底朝向雇佣工人分化,大工业工人的工资也是照农村的工资水平规定的,例如纺纱厂女工同农业女工的工资就差不多没有区别。工资系按米价规定,但如第25表所示,1912年工资却远远低于米价。

第25表 明治后期的米价与农业工资的关系

	1890年		1899年	1908年	1911年	1912年
	实数 (日元)	指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米价	6.940	100	147	199	242	296
男工工资	0.211	100	142	191	242	268
女工工资	0.146	100	149	206	251	278

根据松尾一太郎的调查,引自井木正吉:《我国的工资问题与农家劳动力》,载《经济评论》,1958年7月号,43页。

在连续的深刻危机和经济萧条中,工人的生活更加恶化,据说1906年解雇的工人有80万之多,同时劳动加重、时间延长、实际工

資下降，因此發生很多罷工和爭鬥，而工人的要求却被軍警的力量鎮壓下去。大河內一男曾對當時的情況作了如下的描述：

“明治44年(1911)，第27屆議會通過了工廠法，這算是日本最初的社会政策，但‘被抽去了实际内容’，政府和产业資本家也沒有實施的誠意，完全沒有廢止明治20年代以來(1887年起)的原始的劳动关系。农商务省在《职工情形》中所叙述的劳动情况，一直到明治末期还是一样，看了大正2年(1913)出版的石原修写的《从卫生学上看女工現况》就可以明白这点。所謂福利設備和宿舍制度對於‘出来干活的女工’起了什么作用，实已不必再加說明。本应从大正5年(1916)實施的工厂法，却把禁止成为原始劳动关系的重点的女工夜間操作那条延緩实施15年。在矿山里依然存有飯場制度和友子同盟，在大企业中加强了共济組合^①和师徒关系那种身分职級制。另外在中小企业和‘街上的工厂’里，血汗制度还在批发行資本和大工厂控制下普遍进行。……一切工人組織被搞垮，領導者被壓抑，致使日本工人运动不得不从头做起”(大河內：《黎明时期的日本工人运动》，1952年版，220—221頁)。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大規模罷工和爭議都發生在大量形成近代无产階級的厂矿，如小石川、吳港、大阪等陆海軍工厂、长崎、石川島等造船厂、足尾、別子等金屬矿和煤矿、东京市電車公司等。斗争中还有带着蜂起性质的，沒有組織的和自发的很多。可是在这些斗争中，同壟斷資本的形成和确立相对立的无产階級的初期組織和階級意識就在抗拒殘酷的鎮壓的同时产生。1906年日本社会党的成立和1912年东京市電車公司的爭議即能說明这点。由于資本主义已經完全确立，統治階級对工人的成长感到深刻的恐

^① 表面上是互助性质的組織，实行上被把头操纵，并借以盘剥工人。——譯者

怖，山县和桂太郎在 1910 年制造“大逆事件”^① 就显示这点。正如壟斷資本主义带有很多前期的性格，所以工人的組織也带有很多小资产阶级的、分散的因素，但是工人阶级已经作为同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权相对抗的力量，在历史上露出头角来了。

① 日本政府借口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謀刺天皇，株連逮捕許多毫无关系的进步人士，并判处幸德秋水等 12 人死刑。——譯者

第六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

1. 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大战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1913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过程整个地起了变化，并使1913年到1920年的经济周期完全变形。交战各国的经济完全变成为战争服务的，工业的绝大部分与军事订货发生关联，民需商品制造部门发生生产太少的情况，从而在主要交战各国出现特殊的类似经济危机的周期。这种经济情形深刻影响并规定了战后经济周期的性质，再结合起政治上的混乱，就展开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

但是这种经济周期的变貌却在日本造成相反的现象。日本帝国主义乘着欧洲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混乱的机会全面发展，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以达到繁荣的最高峰而自豪，垄断资本主义就确立了。大战的爆发根本改变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力量对比，在日本和美国前面摆着在中国市场取得有利地位的机会，并因欧洲各国从远东市场后退和欧洲市场的扩大而暂时缓和了日美的对立。这样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在这个时期使日本一跃而为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

正如元老井上馨所说的，大战的爆发，对统治阶级来说，实在

是“大正时代一个大天賜良机”。日俄战争后軍閥的强橫行动和連續的經濟蕭条，激使人民于1912年起而斗争，掀起大正政变^①，震撼了专制主义者的地位。长閥桂太郎內閣垮台后組成的薩閥山本权兵卫內閣，虽然廢止了文官三法令和軍部大臣須由現役軍人担任的制度，些微表示一点进步的姿态，但因他們与三井勾結起来搞的西門子事件^②被发觉，又在人民的压力下垮台。軍閥、財閥們都想打起向大陆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好把人民的压力轉移到国外去，大战正好提供一个絕好的机会。

日本以日英同盟的关系为借口，不顾英国反对，于8月参战，占領原被德国霸占的山东省和南洋群島，建立了在中国和西太平洋的軍事优越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者支持想当皇帝的袁世凱，并当作交換条件，于1915年1月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又于5月发出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凱接受。领导这一露骨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的是三菱业主的女婿加藤高明外相。这样一来，日本就强夺了山东、中国东北和蒙古的侵略利权，把汉冶萍公司弄成中日合办，占有在福建省的优势地位，并侵害中国的軍事、警察、教育等主权。1916年6月締結第四次日俄协定，以美、英为主要对手，并与帝俄結成有关控制中国的軍事同盟。在大战的4年期間，日本从債務国变成債权国，貿易增加3倍，銀行資力增加两倍，生产平均增加一倍。关于日本的这种情况，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

① 1912年陸軍强力提出增加两个师团的要求，并由陸相上原勇作逕訴之天皇和单独辞职，迫使西园寺內閣辞职，这种强橫行为激使人民起而斗争，1913年2月东京群众包围議會，大阪、京都、神戶、广島人民也起来斗争，結果軍閥首相桂太郎下台，一般称为“大正政变”或第一次护宪运动。——譯者

② 海軍高級官員勾結三井，在建造軍艦和购买其他軍需品时从德国西門子公司、英国維克斯公司接受巨賄，此案(西門子事件)又激起人民包围議會，迫使以海軍軍閥头子山本权兵卫(1852—1933)为首的內閣辞职。——譯者

的最高阶段》中指出：“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各国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日本）。”^①

但在大战爆发后约一年之间，日本经济却呈现差不多完全无望的状态。大战前的经济，由于偏重日俄战争后的军事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而致连年入超，政府保有的现金竟不够支付外债利息，国家财政陷入濒于破产的危机。特别在大正改元以后，从1912年下期到1913、1914年，物价下降，公司、银行不断发生破綻，一直根据国家政策放宽经营方针的兴业银行也暴露了窘态，1914年8月大阪的北滨银行歇业，出现了危机情况。

大战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使日本经济进一步陷于混乱状态。大战于1914年7月爆发，使汇兑中断、海运断绝，而致贸易受到重大打击。复因银价大跌，使中国市场前途暗淡，欧洲各国停止买棉，又使棉花价格惨跌，因而陷入凄凉之境。加以国内米价大跌，必要的原料和资材输入断绝，使依靠从海外输入这些物资来进行经营的产业发生困难，而致银行不轻易放款，物价普遍暴跌，商品市场出现危机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拖到1915年上期。政府发布米价调节令和籼米是在1915年1月，第一次成立帝国蚕丝公司，以挽救丝价暴落是在那年3月。

二

但自1915年下期前后起，输出开始显著增加，海运出现活跃景象，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输出增加的原因，是世界的物资需要由于战争而增加、帝俄和其他协约国订购军需品、欧洲各国对亚洲输出断绝，因而扩大了纺织品和杂货等商品的市場。第一次大战期间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7页。

的貿易进展情形見第 26 表的 1 至 4 表。特別增加得多的，輸出方面是輸往美国的生絲和輸往中国、印度的棉紗与棉織品；輸入方面是印度、美国的皮棉和南非、南美的羊毛等。特殊的項目，是基于 1918 年 3 月和美国訂結船铁交換契約而进行的大量輪船輸出和铁的輸入。在貿易上輸出远远超过輸入，1916 年后出超額迅速增加，到 1920 年为止，4 年之間，出超額約达 14 亿日元。

日本海运业活跃的原因，是世界海上運輸的需要、德国潜水艇造成的協約国船舶丧失和貿易与沿岸運輸的增加等。海运運費和租船費大漲，使海运业者获得巨利。海运业的兴旺又导致造船业的繁荣。商船吨数的增加、運費的高漲和海上保險費的增加使貿易外收支好轉，在大战期間，这方面的收入約計超过支出 14 亿日元，加上貿易入超数，一共从海外賺得 28 亿日元。日本銀行于 1918 年底拥有現金 1,588,000,000 日元。日本已經承购英、法、帝俄的軍事公債，从开战时約欠 15 亿日元的债务国变成了借出 2,770,000,000 日元的債权国。

由于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热狂的战争繁荣，通貨膨脹、物价和股票价格騰貴、企业純利增加、輸出产业和造船等产业发展与扩大等現象就同时出現。紙币发行額从 1914 年到 1918 年将近增加三倍，而且有保存在国内外的現金做保证，所以金融空前和緩。物价与股票价格增加好几倍，加上金融和緩的帮助，結果在股票、船、铁、銅、棉紗、生絲等当时价格飞跃的各方面从事投机的人中产生許多大小暴发戶。例如鈴木商店的老板金子直言进行大規模的投机得手，一时竟能与三井物产相抗衡，他在世界範圍內大肆进行投机活动。在他的《傳記》中这样写道：

“到了大正 3 年(1914)11 月，他好像得到神灵托夢一般，……对一切商品和船舶进行投机购买。……在他收买的貨物中，最早

第26表(1) 大正前期輸出表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总 額	茶	生 絲	棉 紗	棉 織 品	絲 織 品	煤	銅	輪 船
1914	591,101	11,755	161,249	78,555	34,841	34,023	23,915	28,468	711
1915	708,307	13,401	151,774	66,211	38,511	43,219	19,237	46,163	399
1916	1,127,468	12,383	266,693	77,592	60,051	50,532	20,406	69,910	17,179
1917	1,603,005	13,774	351,904	108,139	127,458	62,858	26,456	96,289	97,679
1918	1,962,101	20,377	369,036	158,300	237,913	117,533	32,009	50,814	80,061
1919	2,098,873	16,997	623,517	114,932	280,311	162,476	37,724	25,890	3,367
1920	1,948,395	16,346	389,922	152,394	355,266	158,416	45,300	12,721	15,592

根据东洋經濟新报社編:《日本貿易精覽》編制。

第26表(2) 大正前期輸入表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总 額	米	砂 糖	皮 棉	羊 毛	铁 类	机械类	矿 油
1914	595,736	24,824	21,679	217,873	14,784	39,934	24,912	11,236
1915	532,450	4,886	14,805	216,472	30,584	34,420	9,064	11,114
1916	756,428	3,083	12,978	274,478	33,507	89,738	16,271	8,445
1917	1,035,811	6,513	11,697	329,954	52,112	207,240	29,838	8,367
1918	1,668,144	89,756	33,625	513,738	60,146	300,718	58,498	15,862
1919	2,173,460	162,071	58,184	665,680	61,304	234,900	80,222	29,769
1920	2,336,175	18,059	60,212	720,161	121,629	264,326	110,571	36,513

第25表 (3) 大正前期按地区区分的输出表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关 东 州	中 国	香 港	印 度	印 尼	俄 亚 洲 地 区	英	法	美
1914	22,970	162,371	33,277	26,048	5,479	10,413	33,086	31,209	196,539
1916	37,060	192,713	34,981	71,617	17,419	117,693	102,658	64,007	340,245
1918	116,374	259,151	63,700	202,522	71,677	40,034	142,866	142,190	530,129
1919	150,129	447,049	59,156	116,879	57,335	70,958	111,453	66,845	828,098
1920	113,686	410,270	74,066	192,249	107,225	22,863	97,797	71,653	565,017

第25表 (4) 大正前期按地区区分的输入表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关 东 州	中 国	香 港	印 度	印 尼	越 南	英	美	澳 洲
1914	31,277	58,306	876	160,324	22,025	15,052	92,302	96,771	14,580
1916	33,954	108,639	1,015	179,465	14,228	6,037	81,732	204,079	43,333
1918	100,518	281,707	833	268,185	48,837	55,408	66,067	626,026	48,874
1919	162,394	322,101	1,537	319,478	65,528	124,125	127,542	766,381	56,630
1920	196,861	218,091	2,232	394,930	68,629	20,619	235,353	873,182	62,459

根据《日本貿易精覽》編制。

譯者按:“关东州”指对中国东北的輸出入,“中国”指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輸出入。見第177頁的釋注。

注意的是铁。他看到战争开始后铁的需要会要增加，海运也会活跃起来，首先买英国的铁，接着伸手到美国的铁上，又注意到船舶，曾一次向三菱造船所订购1万吨的货船3艘，引起世人震惊。当时川崎造船所的松方幸次郎也预料船价必将飞涨，就回绝海军和其他方面的订货，订出修建和囤积船只的计划，所需的铁，大部分仰仗铃木商店供给。松方执行这个计划的结果，造出将近100万吨的船舶。……铃木商店除供应松方实现这个庞大计划所需要的大部分铁外，还向三菱造船所、石川岛造船所、大阪铁工所等造船工厂供应很多的铁。自己又经营播磨、鸟羽两造船所。这时铃木商店的财产忽然号称有二、三亿之巨”（金子柳田两翁頌德会：《金子直吉传》，1950年版，100—102页）。

投机热潮于1915年底到1916年初以东京等处股票暴涨为标志而出现。船舶、棉纺、交易所、毛织、砂糖等业的股票飞涨三、五倍，日本染料公司的认股数竟达公募额的850倍，又据说久原矿业公司增加资本时所发股票的售价超过票面价格82日元以上。这种股票投机的热潮使经济界相信大战将是长期的，并引起兴办企业的热潮。如第27表所示，造船业、输出工业、输入来源断绝物品的制造业等的开办和扩充计划，高达过去的几十倍，同时日本产业的规模一跃而增加了好几倍。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的发展依然具有以投机为基础而进行的特征，站在最前列的是保持商业资本性质的财阀和大贸易资本家。铃木商店在最盛时控制的公司约有50家，投资额超过10亿日元。

以日本银行为中心的政府机构的援助在金融上支持了财阀和大贸易资本家的投机活动。战争发生后交战国早就停止汇兑，或者禁止现金输出，1917年9月美国也禁止现金输出，日本随着在同月内禁止，从此以后，一直到1919年6月美国解禁为止，现金就

第 27 表 第一次大战期间银行和公司的发展

年 度	物价指数	股 票 价 格 指 数	企 业 利 润		开办与扩充 计划的资本 (千日元)	新繳納的公 司債券和股 票 价 款 (千日元)
			上期%	下期%		
1914	100	100	14.8	14.9	250,797	120,028
1915	103	117	17.8	21.9	292,584	150,958
1916	144	196	34.1	40.4	658,697	343,586
1917	179	228	50.0	62.5	1,562,530	704,805
1918	230	221	59.2	63.3	2,676,901	805,029

根据东洋经济新报社：《金融六十年史》，512 页。

在国际流通上絕迹了。日本之所以禁止現金輸出，是出于軍事上的顧慮，又准备战后向中国进行資本輸出，所以想以現金方式保持資金。但因战时貿易出超，从日本流出現金这点并不成什么大問題，倒是拿回輸出价款，以充投入兴办企业热潮和进行投机所需的貨幣却成了問題。即因世界金本位制停止生效，出超价款只能存放海外，而且汇兌銀行为了周轉出超資金，还須归还向日本銀行和商业銀行借来的錢，政府就向汇兌銀行购买放在海外的現金，来解决这个貨幣循环上的矛盾，这些現金还是放在海外，結果国内的貨幣就增加了。政府购买这笔現金所需資本，是取自大藏省存款部資本和一般會計的余款，购买的結果，政府于 1919 年底保有的在外現金达 10 亿日元，从而助长了通貨膨脹。政府又通过日本銀行帮助汇兌銀行，日本銀行借出的汇兌資金差不多从来没有超过半年 1 亿日元的限度，但从 1916 年下半年起显著增加，特别是从 1918 年上半年到 1920 年上半年，每半年超过 12 到 13 亿日元。由于通貨膨脹的进行，日本銀行的存款，包括政府和民間的在內，从 1914 年底的 115,000,000 日元激增至 1919 年底的 1,182,000,000 日元，同期內一般貸出款項由 8,700 万日元增至 716,000,000 日元，紙币发行額也由 385,000,000 日元增至 1,555,000,000 日元。

与这同时，普通銀行也有所发展。貿易的发展使大銀行增加了貿易金融方面的活动，从而更增强其地位。原来貿易金融周轉期較长，还因入超和現金外流而带有風險，所以差不多只有得到政府保障的正金銀行独家經理。一旦貿易急轉为出超，而且显得很安全，台灣銀行、朝鮮銀行等特殊銀行和三菱、住友、第百、三井、第一等財閥銀行就都开办对外汇兌业务，以扩充他們的势力。汇兌銀行的活跃又促使短期金融市場和票据貼現市場发展，日本銀行訂出所謂盖戳票据制度，加以保障，因而助长了商业信用和通貨膨脹。在1918年后企业投机进入高潮时，銀行的金融活动由外汇业务轉至一般业务，从大銀行起，銀行的存款、放款和对有价証券的投資都有迅速增加，特别是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和产业規模的扩大，对大銀行的巨額信用的需要增加，就加强了銀行集中的趋势。在产业資本的資本构成中，外来資本的比重从1914年上期的35.7%增加到1920年的43.1%，在全国公司債券发行总額中，銀行持有部分的比重从1914年的14%增至1919年的24.6%，可見銀行同产业資本的融合是显著进行的。关于銀行在大战中的发展情形，見第28表。

第28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普通銀行营业状况 (单位:千日元)

年度	銀行数	支行办事处数	名 义 資 本	繳納資本 与公積金 合 計	存 款	放 款	每行平均 繳納資本 公積金与 存款合計	每行平 均放款
1914	1,393	2,175	575,375	533,489	1,519,760	1,726,850	1,281	1,084
1916	1,424	2,158	525,932	508,130	2,256,831	2,232,881	1,941	1,563
1918	1,372	2,367	768,872	672,654	4,639,315	4,146,940	3,871	3,022
1919	1,340	2,540	1,057,837	879,361	5,744,097	5,666,461	4,942	4,223
1920	1,322	2,772	1,576,118	1,212,093	5,826,526	5,902,963	5,324	4,465

根据《金融事項参考书》編制。

三

大战期间的生产，就在上述投机性质的兴办企业热潮中有了如第29表所示的增长。从这个表中也可以看出，尽管生产一直上升，但从数量上来看，战时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物价或股票价格的上涨，而且发展显然是不平衡的。战后生产发展更快，是因为大战初期的经济萧条使人们不敢轻易扩充生产，而且发展是在输入剧减、输出剧增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能迎上输出浪头的企业反而感到困难，能够迎上这个浪头的企业，也因大部分机器和原料仰仗海外输入，不能迅速获得充足的生产资料，只好从事一种饥饿输出。

生产的扩大，首先使原有的企业扩充，接着又使新办企业增加，但这种增加是在狂热的兴办企业高潮中进行的，基础薄弱的投机事业很多，因而更增加了商业资本活动的机会。与这同时，大资本家同国家勾结起来，乘着经济繁荣的高涨，以迅速积累的货币资本为基础，更趋强大。企业勃兴是从1916年前后起以军需工业和造船企业的扩充与新办开始的。

军需工业的扩大，是以帝俄和其他交战国的订货和日本扩充军备为基础的。为了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陆军于1912年要求增设两个师团，曾引起陆相上原勇作的帷幄上奏^①问题，受到人民的反对，而致成为大正改变的原因。大战爆发后这个要求经由大隈内阁付诸实施，并实行改善兵器、设立机关枪部队、统一国产兵器等。海军在1914年巴拿马运河修通和1916年威尔逊提出海军扩充三年计划的刺激下，于1914年7月由海相八代六郎订立八四舰

^① 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借口，主张关于军令事项应由军部直接秉承天皇（统帅）旨意办理，因此可以直接诉之于天皇，而且极力推广解释军令事项，称为帷幄上奏权。——译者

第29表 第一次大战期间农工矿生产的发展

年度	米 (千石)	生 絲 (千貫)	棉 紗 (捆)	棉 織 品 (千日元)	絲 織 品 (千日元)	船 舶 (千日元)	煤 (千吨)	銅 (千公斤)	工 矿 业 生 产 指 数	物 价 指 数
1914	57,008	3,756	1,666,184	150,388	128,025	13,698	22,293	70,463	100.0	61.8
1915	55,924	4,046	1,720,264	182,384	149,094	—	20,491	75,416	126.0	62.5
1916	58,452	4,520	1,925,579	304,490	196,744	—	22,902	100,636	170.7	75.6
1917	54,568	5,316	1,923,841	396,134	265,705	—	26,361	108,038	231.3	95.1 ^p
1918	54,700	5,796	1,803,366	624,216	449,036	—	28,029	90,341	342.9	124.6
1919	60,819	6,360	1,920,782	1,033,832	804,580	312,216	31,271	78,443	484.3	152.6
1920	63,209	5,834	1,816,976	—	—	468,423	29,425	67,792	413.9	167.8

资料来源与第4表同。棉織品和絲織品的数字引自《农商务省統計表》，但自1920年后只有《工厂統計表》的数字，所以沒有引入此表。根据《工厂統計表》，棉織品产值，1919年为789,965,000日元，1920年为591,427,000日元，絲織品1919年为449,814,000日元，1920年为270,617,000日元。只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单价格上涨甚猛，所以产量与产值不能对比，因此列举日本銀行編制的物价指数，以供参考。

队计划^①，1917年和1918年由海相加藤友三郎将所需經費預算提出議會，获得如数通过。同时长門、陆奥两战艦已經动工，即已开始进行八八艦队的建設，并于1920年的临时議會中通过了所需經費。这次扩充軍备所需用費，包括1914年到1920年的7年陆海軍省經費、临时軍事費和征兵費在內，共計3,511,000,000日元，比过去任何时候为多。

軍需工业方面，除扩充东京、大阪的炮兵工厂和横須賀、吳港的工厂外，民营兵工厂也有发展。归于三井之手的日本制鋼公司，在維克斯、阿姆斯特朗指定的制造商罗易得公司的指导下，以最新的規模和設備进行活动。三菱于1917年3月在造船部下开办长崎兵器制作所，建立了足与日本制鋼相对抗的地位。日本的軍事技术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世界最强的战艦长門、陆奥的程度，政府与財閥勾結，极力培植純粹以軍事生产为目的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但是尽管軍需工业有所发展，“事实上到战敗时海軍消灭为止，特殊的器材固不在說，就是零件、計算仪、原材料、工作母机和生产技术等一切方面，都非依靠外国不可。日本虽然已經不是兵器制成品的市場，但在新技术和工作母机方面，却比以前更加依靠外国”（林克也：《日本軍事技术史》，1957年版，172—173頁）。

在世界大战中，陆海軍和空中使用的兵器資材的精度起了革命的变化，发生了火力旺盛、抵抗堅韌、隱蔽困难等显著特征，又发明了飞机、战車、物理化学兵器等新武器，日本政府就根据这些經驗来培植軍需工业，同时全部产业已成为国防的重要因素，因而加强了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体系。軍部的要求同壟断資本家的利益相結合，于1915年制定染料医药品制造奖励法、1916年制定理化

^① 作为完成八八艦队的第一阶段，即先建战艦8艘，巡洋艦4艘。——譯者

研究所国庫補助法、1917年制定制铁业奖励法和船舶管理令、1918年制定軍需工业动員法和軍用汽車補助法等，强力地要求和奖励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軍事統制下进行发展。軍需工业动員法之制定提供了朝向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发展的法律基础。在大战过程中，壟断資本主义通过貿易和軍需而获得迅速的发展，因此有力量促使这一法律制定。山田盛太郎即曾指出，制定此法是壟断資本主义“确立为第二阶段的正式金融資本形态的过程”（山田：《日本資本主义分析》，161頁、177頁）的标志，同时壟断資本主义又依靠国家軍事力量的补充而更趋强大。

企业的勃兴，首先在造船业和染料、碱、硫酸等化学工业中进行。

先看造船业的发展情形：1916年造船量超过10万总吨，1919年增达636,000总吨之多；能造1,000吨以上的船只的造船厂，由1913年的6家增至1918年的57家，船塢在同时期內由17台激增至157台，实在兴旺已极。在这个基础上，日本持有的海輪由1913年的2,075艘、151万总吨增加到1919年的2,870艘、284万总吨，特别是1,000总吨以上的大型船增加得快。就日本持有船舶数量的世界地位來說，1913年占世界总数的3.5%，居第5位，1920年占5.6%，仅次于英、美而居第3位。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財閥和貿易資本家站在最前列，进行活动。

三菱于1914年新建彦島造船所，1917年10月，三菱合資公司把造船部分出去，成立三菱造船公司，下轄长崎、神戶、彦島三造船所和长崎兵器制造所；三井于1917年在物产公司內設造船部，建立玉造船所，久原于1916年大阪铁工所增加資本时掌握了这家船厂；同一年內鈴木收买了播磨造船公司，淺野在鶴見建立淺野造船所。在这个期間，技术上使用了往复轉动机和透平机，有所提高，

但因所需钢铁材料的主要部分依靠输入，而世界各国禁止输出，所以感到材料困难。1918年与美国签订两次船铁交换契约，交给美国船舶院45艘船舶，共计37万总吨。造船业的发展虽与海运兴旺相关连，但与大規模扩充海軍也有密切关系。例如特大战舰加賀号和土佐号就是分別向川崎和三菱造船所定造的。

化学工业的发展完全是被軍事上的需要促进的。在战前世界的化学工业中，染料业被德国壟断，氨制碱业受英国統治，不让別国超赶。但因染料工业中可以生产毒气和烈性炸药，所以战争一开始，各国就决定設法自給，日本也在1915年制定染料医药品制造奖励法，以促进染料和炸药的原料甘油的生产。在政府的优厚保护下，1916年成立日本染料公司，1917年成立日本甘油工业公司。制造甘油的技术简单，只要能从澳洲輸入牛油就没有什么问题，而制造最重要的靛青等染料的技术就很高深，因此日本染料工业在技术上建立独立的体系还有待于战后的昭和年代，第一次大战期間还不能做到。同时由于染料輸入断絕，大战爆发后染料市价飞漲，如在1914年底漲了2倍，1915年底竟漲到30倍到40倍。因此产生許多制造硫化染料等低級染料的小企业，三井矿山也在三池开始生产茜草色素染料。制碱工业沒有受到政府的保护，但1916年旭玻璃公司开始用氨制法生产，1915年保土谷制碱公司开始用电解化生产，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在大战期間实现飞跃发展的化学工业是战前已經开始成为大工业的过磷酸工业和氨氮化鈣工业，大日本人造肥料公司和日本氮气公司都从生产中獲得巨利。大日本人造肥料公司早在1887年就集合財閥系統的資本成立，与肥料商人有密切关系，开辟了农村市場，又因大战期間的积累而确立大产业資本企业的地位。日本氮气公司以1912年施工的鏡工厂为基础，有了飞跃进展，与1915

年建厂的三井系的电气化学公司一起在輸入断絕时壟断了日本的硫銨市場。

其次，在重工业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是机械工业和鋼铁业。

机械工业，除造船和火車車輛制造业外，其他部門也出現从未有过的发展。在大战初期，帝俄訂购导火綫时，由于一般对于这种精密作业还不熟练，所以感到很大的困难。但因机械輸入断絕和国内需要增加，就使紡織机械、矿山机械等产业机械的产量提高、工作母机的生产发展，并使发动机和电机生产奠立基础。但是尽管有所发展，而在产业机械方面，如以紡織机械为例，距制造整套設備还很远，只能制造丰田式織机和棉織、絲織与毛織所需发动机。矿业机械部門还不能制造割煤机和采掘搬运机。工作母机的情况，則如1922年农商务省主办的第一屆工作母机展覽会上所見，“国内制品很少自出心裁的。……甚至于有些在开足馬力运轉时机身震动猛烈，以致不能进行精密作业，还有些装配后不能修理，……又有些完全不适合本国人的体格和体力”（藏前工业会工业調查会：《机械工业調查书》，1926年版，第53頁）。一到战后外国制品开始輸入，立刻就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挤垮。

可是电机工业的技术水平却在大战期間有所提高，又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和增添設備，建立了电力資本自立的基础。芝浦制造所于1912年有資本200万日元，經過两次增資和添加設備，于1920年扩充到2千万日元，同时王子造纸公司的千岁发电厂造成6,250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猪苗代水电厂造成11万伏特、4,400千伏安的单相变压器。久原矿业公司所轄日立制作所和三菱神戶造船所所轄三菱电机厂也在这时树立了独立基础。日立制作所原来只有制造几百馬力的水輪机的經驗，这时已能制一萬馬力的水輪机，三菱也能承造5,700千伏安的水力发电机，两厂都經過不少

的苦心钻研,才迅速打好技术基础。日立和三菱电机分别于1920年与1921年独立,成为以财閥为背景的强大产业资本。

钢铁业随着铁价的高涨,于1917年后迅速扩展。铁价高涨的原因是铁的输入断绝和造船等方面需要增加。随着大战的爆发,德国和比利时的铁输入完全中断,英国于1916年,印度和美国于1917年分别禁止钢铁输出,战前日本所需生铁的50%和所需钢材的将近70%依靠海外输入,因此钢铁价格就在这种情况下猛涨。例如生铁的平均市价,1914年为49日元,1916年10月涨到93日元,1917年10月涨到308日元,1918年10月又涨到461日元,实涨8倍以上。从1914年到1918年10月,圆钢也从75日元涨到426日元,钢板则自85日元涨到939日元。

在这种情况下,1917年制定了制铁业奖励法,大小资本家纷纷以投机为目的而开办或扩充制铁厂,年产能力5千吨以上的制铁厂由战前的7家增至停战时的42家,5千吨以下的则由14家增至166家。从1914年到1918年,生铁产量由30万吨增至58万吨,钢材由28万吨增至54万吨,钢管由5千吨增至23,000吨,八幡制铁所于1916年实行第三次扩充,三菱制铁、日本钢管、釜石制铁等财閥所属工厂也迅速扩展。这种发展的结果,从产量来说,日益扩充的民营铁厂已经超过或接近八幡,民营铁厂生产了生铁的53%和钢材的49%。但是民营铁厂的设备中还有美国输入的一半旧货,操作也不纯熟,还用粗劣的矿石和杂乱的废铁做原料,生产效率反而降低。垄断资本又以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军事控制为背景侵入大陆,大仓的本溪湖、三菱的兼二浦和南满铁道的鞍山铁厂分别于1915、1918、1919年开始生产。

四

輸出产业也从 1917 年前后起开始迅速发展。

在棉紡織方面，棉紗和棉織品的輸出，从 1916 年前后起迅速增加，特别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英国貨对远东和南洋方面的輸出减退，就使日本的棉織品和針織品遍銷中国、印度、印尼和海峽殖民地等南洋市場，并經由印度向巴尔干地区和非洲方面輸出。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棉布的原料的棉紗感到供应不足，加上投机活动盛行，遂使棉紗市場从 1916 年起迅速出現活跃景象，特别是三品^①市場上的棉紗市价从 1917 年春起趋于狂漲。例如那年 2 月，限于当月有效的 20 支紗每捆价格为 179 日元 25 錢，4 月超过 200 日元，7 月初超过 300 日元，同月中旬跳过 400 日元，下旬的价格漲到 500 日元以上，竟使交易所买卖一时中止。这次棉紗价格高漲，固然也是由于需要剧增，而紡机輸入困难；劳动力缺乏，以致供不应求；以及通貨膨脹和生产費用增加等因素，而基本原因却是投机热潮所造成的空头需要的剧增。因此棉紗价格在 8 月中旬就出現暴跌情形，到了 10 月中旬，竟有跌到 200 日元以下的。这时关东、关西的棉紗商人都向紡紗公司請求减少产量，以資救济，并在那年 11 月到 1918 年 12 月止实行减縮生产。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对棉紡公司保持对等或优越地位的棉紗商人轉居下風，在 1920 年发生經濟危机时，这种关系就确定下来了。战时棉紗业大量进行增資、扩充和开办新厂，发展极为显著。据說从 1915 年到 1917 年的三年中間，向英、美訂購的紡机共达 127 万錠，由于从英、美輸入机器和发动机困难，到处出現建厂中

^① 指棉花、棉紗、棉布。——譯者

第30表 第一次大战期间棉纺织业的发展

年 度	公 司 数	繳納資本 (千日元)	錠 数 (千錠)	棉紗产量 (千捆)	織机台数 (台)	棉布产量 (千碼)
1914	42	85,820	2,506	1,666	25,443	454,902
1917	43	115,623	3,009	1,924	36,181	—
1919	54	165,758	3,436	1,920	44,401	739,390
1921	61	295,648	4,117	1,811	59,690	700,698

棉纺织业联合会调查，见武藤山治：《棉纺织业》，载《现代产业丛书》，《工业篇》，下卷，1928年版，26—27页。表内载入1921年的数字，是因为大战期间公司增资和扩充的效果在战后才发生。

途停工的现象。这种发展的数字见第30表。又在这次发展中，不止粗纱生产，连中级纱和细纱生产也有所扩大。

在棉纱和棉制品中，特别是棉制品输出的发展显著，1916年就超过丝制品，1917年赶上棉纱，1920年又差不多追迫生丝输出量。承造大部分输出的棉制品的是兼营织布的棉纺织业，棉纺织业中兼织以门面宽的匹头为中心的棉布的企业增加一倍，并进行漂白、印染加工业务，他们在扩大棉制品输出中站在最前列。织布专业者和中小织布业者也参加输出品制造，据说从战争爆发以来，这方面工厂的新办和扩充盛况都胜过其他产业。特别是原来朝着絨制输出布发展的泉南、知多等地就确定成为输出布织制业的地区，推进了织机的电力化。这些地区把重点放在输出用的宽门面匹头上，例如从1915年到1916年，狭门面的动力织机，在泉南由8,786台减至7,308台，在知多由5,644台略增至5,887台，而宽门面的动力织机，在泉南由1,409台增至2,887台，在知多由432台激增至1,103台，发展极为迅速。固然在这次扩展中还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即使在泉南，据说“在夺米风潮^①时，连理发店和米店都经营出租织机业”（谷口行男：《泉南郡棉制品发达史》，第75页），可见

經營出租織机业的行家很多，但是随着織机动力化的进展，机織业者的地位是确立了。在这些地方，中等規模的織布厂已經不經本地的批发行，而徑与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商业資本建立平等的商业关系，它們在批发行把主要力量放在三品等货物的投机活动上时建立了独立地位。而素来以产銷国内为重点的远州也从这时起轉向輸出，寬門面的动力織机日益推广，但織厂規模很小，还是受当地批发行的控制。

生絲依然占輸出的首位，由于美国經濟繁荣，生絲輸出从1916年前后起更有增加，1919年出現624,000,000日元的最高成績，絲价从1914年11月的700日元高漲至1920年3月的4,360日元，产量由1914年的3,755,000貫(产值176,112,000日元)发展到1919年的6,359,000貫(产值919,927,000日元)。至于制絲业在这个过程中的生产力：器械制絲方面，每釜平均产量，1915年为14貫400匁，1918年为17貫760匁，1921年为21貫224匁，不断提高，坐纜制絲方面也多少有些提高，但在器械制絲发展的情况下趋于衰退。这种情形使长期受商业資本控制的这个产业也成长为独立的产业資本，特别是片仓、郡是等大資本企业逐年扩大其統治范围，他們不止制造生絲，还插手于养蚕和生絲販卖业务，片仓打好了后来的康采恩的基础，郡是則与三井、三菱結合起来进行扩充。

坐纜制絲业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远远不如器械制絲，在原来用自己的蚕茧制絲的农户中，放棄制絲业，专门养蚕的日益增加。由于茧价随着絲价高漲，地租的束縛力又沒有种稻的場合

① 从1918年7月下旬开始，由于以三井等財閥为首的大小米商屯米居奇，政府为了准备干涉苏俄革命，又收屯軍米，使米价飞漲，激起全国夺米風潮，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投入了这次运动。政府单凭警察已不能制止，出动了軍隊才鎮压下去。——譯者

那样厉害，所以富裕中农以上的农户有希望从养蚕的小商品生产者发展为资本主义经营，在长野和群馬等地，已产生雇用季工 25 人至 50 人的大养蚕农户。1922 年的养蚕工人数，男子为 334,000 人，女子为 283,000 人，共 617,000 人。极大部分是离乡背井找活干的人，包括东京深川的装卸工、千叶和茨城的酿酒工、季节早的养蚕地区的贫农儿女以及富山、新潟等处的农村工人等，都是走几县来的。战后这种情形趋于衰退，特别在昭和危机^①后成为定局，但是在养蚕业中显示的这种“日本富农经营的成立和养蚕劳动队伍的扩大”（户田慎太郎：《日本资本主义与日本农业的发展》，1947 年版，188 页），却是这个时期内值得注意的现象。

絲織业也以輸出品为中心而飞跃发展，織机的电力化亦有进展。特别在原系輸出品織业地区的北陆，从 1917 年下半年起生产激增，如 1916 年福井产值为 50,127,000 日元、石川为 14,079,000 日元，到了 1919 年，福井达 145,833,000 日元，石川 45,883,000 日元，充分显示其进展情况。同时以批发行资本为中心的公司和工厂迅速增加，动力織机普及到农家副业和家庭工业，手織机则减到动力織机的 10% 以下。桐生和其他产销国内的織业地区也能看到这种趋势，但在这些地方，还是以地方商业资本控制下的农家副业和小工場手工业为主体，尽管动力化有所进展，手織机还占绝大多数。

另一迅速发展的紡織工业是羊毛工业。这个工业本来是以軍需为对象，依靠战争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大战前的經濟衰退，完全陷于困境。继因帝俄从 1914 年战争刚爆发时到 1915、1916 年继续訂购大批軍用呢絨，就发生划时代的活跃情况，加之英国禁止澳洲輸出羊毛，交战国和国内需要大增，于是呢絨、毛毯等物的市价

^① 指昭和 2 年(1927)的信用危机和昭和 4 年(1929)波及日本的世界經濟危机。

高涨，羊毛工业也卷入了兴办企业的热潮。1915年至1919年，日本毛織、东京毛織、东京毛毯等公司一再增加资本，成为大规模企业。尾西織布地区则从1917年起由織制棉織品改为生产以斜紋嗶嘰为中心的毛織品。

許多工业的上述发展导致了煤和电力等供应动力原料的产业之扩展。

煤产量于1919年达31,271,000吨，比1915年产量增加50%，創立最高纪录，其中九州出产2,101万吨，还是集中在三池煤矿和筑丰地区，产值则增加3倍，达443,000,000日元，显示空前盛况。国内需要情形，如第31表所示，钢铁、化学、窑业、电力等工业需要量都有所增加，以三池煤矿为中心、經由三井物产输出的煤也增加了。但是生产技术并没有随着需要增加而提高。例如在三池煤矿，在明治年代已经使用小型电机运转的运煤鋼索和电车，但是另一方面还增用馬和手推車，据说单行坑道中的馬匹运煤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十分盛行，几乎全没有車輛设备。通风设备亦以自然通风的为多，随着深部作业的增加，空气污浊，矿井塌陷剧增，劳动强度又增加，因而灾害事件增加。在这种采掘机构下，矿工逃亡者日增，煤的需要增大又造成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强度增加，并于1918年夺米風潮时发生矿工斗争。但是煤价暴漲，如三池的矿場平均

第31表 煤的国内用途別消費量 (单位:千吨)

年 度	船 舶 用	铁 道 用	工 厂 用	合 計
1914	3,942	1,915	8,359	15,028
1916	4,388	1,993	10,423	17,646
1918	4,776	2,940	14,244	22,526
1920	6,016	3,220	14,695	24,709

根据日本統計研究所編：《日本經濟統計集》編制，合計数内包括制盐用煤。

煤价,1916年为3日元37錢,1920年漲到17日元59錢,給煤业資本家带来巨額利潤。“当时的煤矿实在不是靠增产获利,而是靠煤价高漲賺錢。要凭劳动效率低和富于移动性的矿工来增产是不可能的”(《三井矿山五十年史》,引自大木洋一:《煤矿业的结构》,載有澤編:《現代日本产业讲座》,III,231頁)。由于煤价高漲,素来专靠三井、三菱供煤的铁道院从1916年起开始购入开灤和撫順煤,并急忙开发北海道煤矿与掠夺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的煤,来对付带有商业資本性质的壟断价格。

在其他矿业中,与軍需和輸出有关的銅和亚鉛生产也猛烈增加。銅产量于1917年出現108,038吨的最高紀錄,国内消費量的增加特別与电力事业的发展成正比例,計由1914年的32,557吨增至1920年的82,954吨,以后消費量就超过生产量。随着生产的扩展,出現許多小銅矿,其中不少是投机性质的,而古河、住友、久原、三菱、藤田等財閥系統的矿山革新了选矿技术,由手选法改为比重选矿法,又将运输設備电气化,并加以扩充,提高了技术基础。亚鉛产量于1917年創立54,718吨的新記錄,国内需要量比輸出量增加得更多,这个矿业在三井的控制下,于大战期間有极大的发展。

电力的需要随着工业、特别是电解化学业的发展而剧增,以致出現空前的电力不足时期,发电能力由1914年的110万瓩(內水力发电76万瓩),增至1919年的218万瓩(內水力发电151万瓩)。在这次发展中,如第32表所示,与电灯相較,电力的发展要显著得多,工业的动力由蒸汽力改成电力的時間,虽然各产业有所不同,而大体上是在1915到1916年左右(上林貞次郎:《日本工业发展史論》,1948年版,137頁)。改用电力使壟断資本十分便于統治动力,因为必要的动力能在經濟上最合算的条件下大規模产生,由电綫随意輸送各处,只要接洽一下,具备一个厂房,有一些防火和

第 32 表 第一次大战期间电力需要的增加

年 度	电 灯 (千灯)	电 力 (瓩)
1915	1,581	28,085
1916	1,617	54,506
1917	1,740	77,761
1918	1,846	98,001
1919	1,973	117,235

根据新田宗雄编：《东京电灯股份公司开业五十年史》，1936年版，121页编制。

简单的控制办法，就能使用，而省去热力的耗費。

壟断資本依凭电力来控制动力是通过激烈的减价竞争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电力价格显著下降，这又使电力和电灯更为普及。构成降低电力价格的技术基础的因素是：在水力发电的长距离送电方面，由于絕緣材料的进步而使送电电压上升；火力发电方面，因透平机的大型化而降低了燃料用費；又在当时占需要量一半的电灯方面，由碳絲灯泡改为鎢絲灯泡，降低了每支烛光的电力消費量。与此同时，如东京电灯公司同其他两家公司訂立三电协定等情况所示，各电力公司的竞争极为激烈，在全部物价都高涨时，只有电力价格差不多完全没有动。因此原来被视为奢侈品的电灯就普及到大杂院里去了，家庭工业、小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也迅速扩展，特别是素来依靠人力和水力的农村中的工业，由于使用了电力，从家庭工业和小工場手工业变成中、小工厂的日益增多。当时这种改用电力，使大量电力供給一切場所使用的情况就成为日后金融資本建立統治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产业的发展又导致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国内市場随着农村的商业化而扩大。由于铁軌輸入中止，所以战时铁道的扩展并不太

快。但行車里程还是有所增加，并增設了电报和电话綫。交通的发展和国内市場的扩大轉而加强产业資本，原来受商业資本壟断的許多部門中产生了独立的生产企业，又扩大了市場范围。

2. 帝国主义的矛盾的加剧

一

虽然大战期間所有的产业都有迅速发展，但如将农业、水产业、矿业和工业分开来看，則以工业为最快。就产量來說，根据政府的統計，1914年农业产值为1,401,000,000日元，占全部产值的45.4%，工业为1,372,000,000日元，占44.4%，但1919年农业产值为4,162,000,000日元，只占35.1%，而工业产值为6,738,000,000日元，占56.8%，它們的相互地位有了改变。在工业的各部門中，紡織工业的地位还是占压倒优势，在工业总产量中，1914年占46%，1919年占49.4%，其次是化学、食品、机械工具，各占10%上下，其中大部分是小企业。可見产业结构虽然由农业轉向工业，而其主流依然是輕工业，加强了依靠貿易为媒介而树立的再生产机构。

重工业也在大战期間显著发展，大企业依靠高利潤而巩固了基础，但从全体来看，地位还是較低的。一旦在1918年11月大战結束后与欧美制品发生竞争，鋼铁、化学、机械等工业就都陷于困境。但是輕工业在战后繼續发展，紡織和雜貨等业从1919年下期起发展比战时还要迅速，出現狂热的繁荣。这可以說是大战中变了样的經濟结构又恢复原状。这次繁荣是以通貨膨脹和战时积累的利潤为基础进行的，达到空前的高度，1920年发生危机，才有了改变。

資本主义的这种发展使財閥的統治地位在依然保持旧性格的同时更加提高。三井于1918年1月将物产公司的資本增加到1

亿日元,同年12月将各名公司的资本增至2亿日元,1919年7月又将银行的资本增至1亿日元,并以一部分股份加价公开出售。三菱于1917年后进行改组,把造船、造纸、贸易、矿业和制铁等原属合资公司的各企业部门分立出来,并于1919年8月创设资本5千万日元的三菱银行。住友也在1915年开办住友制钢所,1917年4月把住友银行的资本增加到3千万日元,公开出售一部分股票,在财阀股票公开出售上先行了一步,1920年又增加到7千万日元。财阀经由贸易和投机赚钱,侵吞庞大军需预算中的大部分,又在殖民地进行掠夺,攫取超额利润。财阀银行一面与兴业和其他特殊银行勾结,同时承购英、法、俄等协约国的外债,又参与对中国的借款。这样,财阀银行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从大战到战后时期,财阀们通过经济繁荣和危机过程,进行了扩充和吞并、收买,不断发展。

在上述基础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随着大战的进展而日益增大。企图实行武力扩张的专制主义者和统治阶级于1916年10月搞垮大隈内阁,代之以军阀寺内正毅为首的最反动的贵族院内阁^①。寺内在袁世凯于1916年6月死后,在军阀割据的中国支持北洋军阀段祺瑞,提供220,000,000日元的所谓西原借款,以图挑起内战,并扩充日本的势力。这种对中国的借款,不能说是过剩资本的输出现,而是带有政治、军事性质的。承办机关以兴业、朝鲜和台湾等特殊银行为中心,对垄断资本的资本输出起补充、代替作用,并使资本输出具有显著的掠夺和投机性质。

随着政府的武力侵略,从三井、大仓组和棉纺资本起,到侨民中的一旗组止,大小资本家都侵入大陆,在军事力量的帮助下从事侵略。日本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于大战期间显著增加,如第33表

^① 寺内(1852—1919)是长州派军阀头子,他的组阁得到反映官僚、军阀意志的贵族院的支持(政党也采取妥协态度),故称之为贵族院内阁。——译者

第33表 大正前期朝鮮台灣貿易表 (单位:千日元)

		朝 鮮			台 灣		
		1911	1915	1919	1911	1915	1919
輸出移出 ^①		18,837	50,920	221,947	64,684	75,623	177,508
輸 出		5,516	9,320	22,099	13,173	15,430	35,622
移 出		13,341	40,901	199,849	51,508	60,193	141,886
移 出	米	2,826	21,333	106,550	7,901	8,058	34,492
	大豆	4,233	5,157	20,593			
	砂糖				36,873	35,922	79,112
輸入移入		54,088	59,695	283,077	53,294	53,369	154,660
輸 入		20,029	18,159	98,159	19,555	12,782	64,133
移 入		34,058	41,535	184,918	33,739	40,587	90,527
移 入	布 匹	8,365	10,897	69,160	4,348	5,375	10,139
	棉織品	7,383	9,772	65,603			

根据东洋經濟新报社:《日本貿易精覽》编制。

所示, 实已完全把殖民地变成日本壟断市場。其中朝鮮市場过去由于入超而极不稳定, 这时改成大豆等粮食和原料基地, 貿易額迅速扩大; 台灣除砂糖外, 又成为产米的基地, 提高了重要性, 貿易額也有增加。

在朝鮮的掠夺同专横統治相結合, 規模特別大。1912年制定的土地調查令强制树立近代的土地私有權, 这种政策在合并朝鮮以前的1910年3月已經开始实施, 但花費了8年10个月時間, 一直到1918年12月才告一段落。日本殖民者利用复杂的申請手續来掠夺农民的土地, 划定广大的国有地(驛屯土), 并使日本的地主、官僚和朝鮮的土豪、貴族能够大規模地夺占土地。日本人占有

① 日本把它对殖民地的輸出入叫做移出入。——譯者

的土地面积,从1910年到1915年,由69,000町步剧增至171,000町步,特别是东洋拓殖公司占有的土地从1910年到1920年增加9倍,约达10万町步。为此丧失土地的农民,就被迫在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下遭受半封建的奴役,或以殖民地的条件,依靠低工资劳动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外每年有好几万人流浪到日本和中国延边等国外地区。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机关以朝鲜银行、东洋拓殖公司和朝鲜殖产银行为中心,又于1915年发布朝鲜矿业令,以便三井、三菱等日本资本家前往掠夺铁矿和其他矿产。

日本资本又在日本进行武力侵略活动的同时侵入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对中国东北的贸易,从1907年大连港开放后大规模发展,这个地区在大战期间变成日本的垄断市场,贸易额增至战前的3倍。对中国东北的投资,北部以中东铁路为中心,是帝俄的侵略势力范围;南部则以南满铁路为枢纽,由日本实施垄断控制。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侵略则因占领山东省而巩固了基础,棉纺资本侵入青岛和掠夺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都是在武力支持下进行的。

经由1917年11月的“兰辛-石井协定”^①,美国也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和蒙古的“特殊利益”,日本又于1918年8月出兵西伯利亚,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遍及远东全境。列宁把日本和“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并列^②,并且指出它的军事上的垄断权和掠夺中国或其他异族人民的极便宜的地位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的财政资本的垄断^③。说这句话时正是在大战中的1916年,而这种性质还随着大战的进展而扩大。

① 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交换了关于侵略中国的文件,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东北的南部的“特殊利益”,日本保证中国“门户开放”。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在牺牲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取得的暂时妥协。——译者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卷,第251页。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卷,第114页。

二

大战期间的经济繁荣对受到寄生地主制束缚的农业也起作用，农产品价格的高涨导致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因农村人口被都市吸引而促进农民分化。农产品价格方面，茧从1916年起高涨，在1919年的繁荣时期达到战前的3倍，鸡蛋、畜产和园艺作物等也从1917年后飞涨，小麦、大豆等则从1917年到1920年之间比战前翻了一番。而米则在1913年因歉收而出现高价，但在1914年到1916年时反比战前低40%，从1917年前后起才上涨。1918年后，米成为一个大投机对象，价格急腾，甚至引起夺米风潮。

农产品价格的高涨，不是从米，而是从旱地作物开始，这使商品经济对农村的侵蚀又进了一步。农民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力较弱的旱地作物方面致力于发展经济作物，养蚕业已不止在东山地区进行，还扩展到近畿、濑户内海沿岸和九州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在素来养蚕的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富农经营。东海、近畿、濑户内海沿岸等地的养鸡、畜牧、制茶、果木、蔬菜等一切经济作业都有迅速扩展。由于农村中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方面，复种和米麦兼种也从这时起显著发展。

但自1917年起米价趋于上涨后，米作为商品生产物的地位提高，致使地主和农民围绕着的对立日益尖锐。地主极力扩充佃租地，农地的佃租从那年起维持在46%这个最高率上，而要求减租的佃农争议亦从那年起从东海、近畿地区开始迅速展开。同时农民更想提高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因而更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例如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地区也迅速扩展畜耕，近畿、濑户内海沿岸则推广了脱谷去壳等农业机具。又在近畿和濑户内海沿岸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和地主的限制作斗争的同时进行

的,因此更加剧了这个地区的佃农爭議。第34表可以显示大战期間农民地位的提高。从这个表可以看出,自耕农和佃农与地主同时增加了收入。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耕地的改良和扩充,同时耕

第34表 第一次大战期間农家經濟的变迁

		实 数(日元)		比 率	
		1912 年	1920 年	1912 年	1920 年
地 主	水田佃租(米)	3,106	3,808	62.36	68.53
	旱地佃租	242	311	4.86	5.59
	自营农耕收获(米)	304	482	6.10	8.67
	自营农耕收获(麦等)	62	47	1.24	0.84
	园艺、畜牧、养蚕、特殊作物等	54	131	1.08	2.36
	山林收入	171	184	3.43	3.30
	放債等利息收入	873	363	17.53	6.52
	杂項收入	169	232	3.39	4.17
	合 計	4,981	5,556	100.00	100.00
自 耕 农	水田收获(米)	594	1,163	63.33	70.35
	水田收获(麦等)	85	79	9.06	4.75
	普通旱地作物	98	86	10.45	5.21
	园艺、畜牧、养蚕、特殊作物等	73	182	7.78	11.01
	山林收入	14	17	1.49	1.00
	放債等利息收入	20	36	2.13	2.18
	杂項收入	54	91	5.76	5.52
	合 計	938	1,654	100.00	100.00
佃 耕 农	水田收获(米)	450	1,041	63.83	73.52
	水田收获(麦等)	68	67	9.65	4.70
	普通旱地作物	55	69	7.80	4.91
	园艺、畜牧、养蚕、特殊作物等	57	130	8.08	9.21
	工資	35	61	4.96	4.28
	杂項收入	40	48	5.67	3.39
	合 計	705	1,416	100.00	100.00

根据斋藤万吉的調查,引自栗原百寿:《农业危机的成立与发展》,下卷,載《日本帝国主义讲座》,1949年版,92頁。

地整理工作有了迅速进展,化学肥料的消费量有所增加,品种改良工作也逐渐见效。在农户的成分方面,从1917年起,自耕兼佃耕农的中农化趋势日益显著,同时产业组合的购买和贩卖业务都有所扩展,信用组合的存款超过放款。

尽管这样,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受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束缚,没有超出一定的限度。物价高涨和农村劳动力的缺乏所造成的生产费用的上涨,使中农以上的农民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何况等而下之的农民,更越来越需要从事家庭副业或雇佣劳动来补充生计。农家的家庭副业随着工业品的不足而扩展到薄荷、竹制品、刷子、草席面、纒条、柳条制品、制靛青和洋粉等许多部门。特别在近畿地区,农民依靠农业以外的收入已经成为一般现象。农民出外挣工资的情形见第35表,此外完全放弃农业的人口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第35表 从事农业者季节性外出工作的职业类别调查

(单位:人)

		农业者 总数	男	女	农业者、 渔业者及 其他从业 者总数	农业者占 总数的%
总数		705,431	311,103	394,331	1,044,375	67.5
农 业	作 蚕	21,133	11,293	9,840		
	养 蚕	46,550	10,002	36,548		
	摘 茶 制 茶	31,463	8,819	22,644		
	采 果	283	283	—		
	合 計	99,429	30,397	69,032	105,340	94.4
林 产		7,436	7,073	363	9,082	81.9
水 产	捕 魚	35,629	35,058	571		
	其 他	363	121	242		
	合 計	35,992	35,179	813	251,278	14.3

矿 山	金 属 矿	3,438	2,984	454		
	煤 矿	37,375	25,536	11,839		
	合 計	40,813	28,520	12,293	46,125	88.5
工 业	制 絲	257,034	23,414	233,620		
	棉 紡	53,835	6,720	47,115		
	机 織	10,991	1,163	9,828		
	酿 酒	96,686	95,947	739		
	各 种 工 厂	22,406	12,639	9,767		
	共 他	14,936	14,029	907		
	合 計	455,888	153,912	301,976	527,961	86.3
土 木	木 工、鋸 木	10,462	10,462			
	其 他	8,866	6,475	2,391		
	合 計	19,328	16,937	2,391	25,856	74.8
	船 員	—	—	—	562	
行 商	藥 药	14,451	14,265	186		
	其 他	6,032	5,470	562		
	合 計	20,483	19,735	748	35,916	57.0
	游 艺	2,711	2,711	—	3,232	83.9
	杂 业	23,351	16,636	6,715	39,023	59.8

根据农商务省：《关于副业性质的季节性移动劳动力的调查》，1932年版，48—53页编制。

地主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提高生产力的限度上建立其统治基础。地主勾结从事投机性的米谷交易的米谷商，乘着米价异乎寻常的高涨而攫取最大的利益，并利用农民所提高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强制维持和增加佃租上。这种做法和志在提高小商品生产者地位的农民发生利害冲突，因而加剧了阶级斗争。这时地主还有力在大战期间继续集中土地，可是拥有50町步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数于1919年增加到顶点，以后除东北地区仍有增加外，已在全国范围内趋于减少。农业生产力的提

高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間的矛盾就表現在这点上，而其直接表現就是階級斗争的加剧。

地主对米谷交易的投机活动达到空前高度，例如从 1915 年到 1924 年，全国米谷交易額的年平均数为 309,655,000 石，竟达平均年产量 57,599,000 石的 5.38 倍（内池廉吉：《米谷統制政策和米谷交易所的机能》，载日本学术振兴会：《米谷經濟研究》，（3），1941 年版，213 頁）。因此，据土方的調查，在 1919 年的国民收入 10,657,000,000 日元中，农林业收入为 3,898,000,000 日元，仍占首位，超过第二位工业的 2,216,000,000 日元和第三位商业的 1,959,000,000 日元。这說明了米价高涨中独占其利的地主的地位，他們的寄生性质的利益是与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利益相对立的。农民依然为穷苦所迫，而不得不在秋收时出卖大約占全部販卖額半数的米，階級分化也繼續进行，并在他們越来越想提高小商品生产者地位的同时增加了与地主制之間的对立。

三

工业发展又使工业工人数目剧增，特別在 1916 年到 1919 年三年之間，工业吸收了 57 万劳动力，这等于当时适龄劳动人口的增加数，大約相当于需要就业人口的两倍。大战期間工人数目的增加見第 36 表，由于重工业的发展，男工的比重总算接近了女工。大战期間主要产业中的工人之增加情形則見第 37 表。增加的工人，大部分是从农村流出来的劳动力，致使农村感到劳动力缺乏，資本家为了应付迅速增加的生产的需要，极力設法获取劳动力，特別是制絲、棉紡等企业加强了募集女工的机构，爭先用預先借款的办法来开辟新地盘。公司的发展又使靠薪資为生的人剧增，在大战期間，大学毕业生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的人数已經超过在政府机

第36表 第一次大战期间工人数量的增加

		年 度	总 数 (人)	职 工 (人)	杂 役 夫 (人)
实 数	总 数	1909	1,012,313	917,896	94,417
		1914	1,187,249	1,085,808	101,441
		1919	1,820,961	1,685,647	135,314
		1924	1,857,003	1,789,618	67,385
	民 营 工 厂	1909	842,160	800,637	41,523
		1914	1,017,619	948,265	69,354
		1919	1,613,193	1,520,466	92,727
		1924	1,703,451	1,642,479	60,972
	官 办 工 厂	1909	170,153	117,259	52,894
		1914	169,630	137,543	32,087
		1919	207,768	165,181	42,587
		1924	153,552	147,139	6,413
指 数	总 数	1909	100.0	100.0	100.0
		1914	117.3	118.3	107.4
		1919	179.9	183.6	143.3
		1924	183.4	195.0	71.4
	民 营 工 厂	1909	100.0	100.0	100.0
		1914	120.8	118.4	167.0
		1919	191.6	189.9	223.3
		1924	202.3	205.1	146.8
	官 办 工 厂	1909	100.0	100.0	100.0
		1914	99.7	117.3	60.7
		1919	122.1	140.9	80.5
		1924	90.2	125.5	12.1

根据《工厂统计表》和《金融事项参考书》，显示经常雇用5人以上的工厂中平均每天职工数。不包括在本表内的雇用4人以下的工厂中的职工数。据1920年的国情调查和工厂统计，占全部就业者的55%，男工的62%，女工的42%。

第 37 表 第一次大战期间按产业区别工人的变迁

	1914年 (人)	1919年 (人)	以1914年为基准 的1919年指数
制 絲	224,287	287,437	128.2
棉 紡	124,637	204,197	163.8
織 物	153,606	273,614	171.4
机 械 制 造	29,717	62,540	210.5
船 舶 車 輛	29,159	97,156	333.2
金 屬 品 制 造	24,172	56,848	235.2
窑 业	33,632	69,895	190.8
造 紙	14,473	29,160	201.5
染 业 等	944	6,491	687.6
人 造 肥 料	2,517	10,269	408.0
釀 造	36,855	50,653	137.4
制 茶	11,583	6,239	53.9
碾 谷 制 粉	7,645	14,256	186.5
金 屬 精 炼	3,638	16,982	466.8
加上其他的总数	948,265	1,520,466	160.3

根据农商务省：《工厂统计表》编制。

关就业的人数了。

工人的工资也随着物价高涨而有所增加，以1914年为100的平均工资指数，1916年为105.7，1917年为121.7，1918年为161.0。但是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高涨，所以实际工资反而下降，如据井口调查，以1914年为基准，1916年为105.1，1917年为98.4，1918年为92.3（井口东辅：《我国的生活费和实际工资》，载《社会政策时报》，第184号，1935年1月，39页）。信夫计算出来的指数还要低些，即以1914年为基准，1916年为74，1917年为71，1918年为68（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第2卷，1951年版，542

頁)。这两个数字究竟哪个更符合事实，姑作别论，总之是工人的生活情况并没有沾经济繁荣的光，反而更加困苦。下级公务员受到职规的束缚，薪资的增加又没有伸缩性，生活也同样的苦。当时饮食费用约占生活费的50%，在米价高涨的1917年，特别是1918年，如下文所述，工人和下级薪资生活者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

“在大正7年(1918)，每人每天维持最低生活的伙食费为21钱，如果不加分类地单纯计算，五口之家就是一天105钱，一年386日元25钱，所以日本人民中的92.7%的收入，都只够支付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伙食费，此外毫无余裕。因此如果实际收入一减，立刻会威胁动物般的生活，到了大正7年，就迫临要么默默而死，要么起来斗争的境地。……至于大正8年的工人家计，如果只算家主的收入，每月要比全家纯支出少6日元49钱，薪资生活者(小学教员)则少12日元68钱，薪资生活者的生活更苦”(玉城肇：《夺米风潮的社会背景》，载《人民评论》，第4卷，第7号，1948年8月，16—17页)。

工人的罢工从1917年起迅速增加，这是同实际工资降低所造成的生活困难相关连的。米价从1918年初开始急腾，特别是由于铃木商店、三井物产和伊藤、增贯、岡半等投机商人乘着7月间出兵西伯利亚而进行投机活动，使大阪堂岛米价由6月的26日元56钱飞涨，7月达31日元29钱，8月达41日元6钱，终于在8月3日爆发震动全国的夺米风潮。

夺米风潮爆发的原因在于工人、下级薪资生活者、农民和其他贫民的生活与米价暴涨成反比例地趋于贫穷。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封建制度下由歉收等因素造成的那种贫穷，却正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引起的贫穷。工人和下级薪资生活者的数量扩大使城市感到米谷不足，因而提供了米谷投机者的活动

基础。又因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货币经济广泛侵入农村，结果米谷生产与经济作物的扩大成反比例而减少，买米的农民增加，急于从事米谷投机的地主加强佃租剥削，又促使农民益趋贫穷。这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上的矛盾，即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还是以米谷生产为中心，并迫使农民在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下进行小规模农耕这种矛盾的爆发。

由于资本家有压低工资的必要，所以也非常关心米价高涨，但是日本资本主义又乘着投机的浪头，把农村的货币吸收来做工业资本，因而获得迅速发展，当然就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这个矛盾不仅使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随着资本主义同时发展和轻工业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畸形成长，而且使基于低工资的小规模工业存在与寄生其上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加强，又在农业方面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小规模农耕一般化，致使国内市场狭隘，因此力图在中国和其他近邻国家强力开辟其帝国主义市场。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米价上，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达到繁荣顶点时通过米的问题而暴露其弱点。这是资本主义与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爆发，又显示资本家、地主同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就把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拉在自己这边，以图在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中继续进展。这种情形又完全证实日本资本主义以夺米风潮为起点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

第七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

1. 战后经济危机

一

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11月7日又在列宁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于是世界经济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决定性地陷入总危机状态。帝国主义各国发动了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在远东，日、美、英的海军陆战队于1918年4月在海参崴登陆，日、美政府又于8月发表联合宣言，组织干涉战争。

日本所以参加干涉，除抱有扼杀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共同目的外，还因为梦想抓住这个夺取苏联在远东的领土的机会。但是日、美帝国主义围绕苏联远东领土的利害冲突，不久就拆散了它们的联合行动，美军于1920年开始撤退，而日本还顽强地坚持干涉战争，挑起庙街事件^①，以图霸占沿海省和库页岛。但是日本的阴谋完全失败，终于在1922年6月声明全部退出西伯利亚，并不得不在1924年退出库页岛。

^① 由于日本干涉军在海街残杀居民，又撕毁同苏联游击队缔结的停战协定而发动突袭，激使游击队采取一些报复行动（后来苏联政府曾对负责人进行公审和处刑），日本干涉军就借此扩大干涉行动。——译者

大战期間日本資本主义的发展，只是由于国际形势有利才能实现，又是以对工人进行殖民地般的剝削、对农村进行狂暴剝夺以及对殖民地施行殘酷掠奪为基础的，因此資本主义的矛盾日趋尖銳。正是在出动大軍干涉苏联的时候，国内矛盾以夺米風潮^①为发火点而爆发。朝鮮于1919年3月1日发生万岁起义^②，中国于同年5月4日掀起五四运动，日本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有空前发展。工人斗争十分激烈，以致常常发生流血事件，而且規模很大；农民也在各地发动坚决斗争；社会主义理論已經同工人运动結合起来。最大的工人团体友爱会改名为工会总同盟，向左进展；水平社^③和日本农民組合也組織起来，日本共产党則于1922年7月成立。

夺米風潮的結果，寺內內閣垮台，成立了以原敬为首的事实上的第一个政党内閣。这个內閣的使命是調整充实大战期間发展了的壟断資本主义体系，用虛伪的宪政幻想来欺騙人民群众，并防止推翻資本主义的暴力革命危机。由于战后人民的民主主义的成长，統治阶级感到有必要来排除元老等旧式专制主义分子，成立騙人的政党内閣，因此一面加强财政寡头制的作用来应付总危机，一面采取比較近代化的形式，以天皇制为中心而增强他們的政权，这就是成立原敬內閣的目的。在这种新情势下，天皇制依然是国内一切反动政治和封建殘余的主要支柱，但是以壟断資本为首的剝削阶级又在政党内閣的幌子下，把天皇主义的国家机器当做他們专政的强固靠山，来对付資本主义总危机。

① 即所謂“米騒动”。——譯者

② 朝鮮人民展开的反日民族运动，当天举行了50万人参加的示威大会，发表独立宣言，以后在各地与日本軍警坚持了三个月的搏斗，由于起义群众高呼“独立万岁”，故被称为万岁起义。——譯者

③ 被歧視的特殊部落居民的全国性斗争組織，成立于1922年3月。——譯者

第一次大战于1918年11月告終，而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对立却比战时还要厉害。当时列宁指出：

“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有力的保卫者表明，他們在每个問題上都是互相拆台的。……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已經完全决裂了。1,250,000,000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們占世界人口70%！英、美、日（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現在沒有別国的帮助，它無論在財政上或軍事上都沒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极少数富强的国家，这两三个国家已經无法調整它們的經濟关系，它們正在推行一种政策，一种破坏国际联盟盟友、国际联盟伙伴的政策。因此产生了世界危机。这个危机的經濟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輝煌成就的主要原因”（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①。

帝国主义各国之間的斗争促进了俄国革命的胜利，又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起了有利的作用。日、美的对立有助于朝鮮的民族运动和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并在出兵西伯利亚时发展为日、美军队的直接对立。

日本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上获得五大强国之一的地位，并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和南洋島屿的委任統治权，但是国际上对日本战时政策的譴責日趋强烈，美国就領先迫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因此日本必須在金融上和軍事上具有不靠別国支持的自主的力量。为着維持大战期間在东亚获得的有利地盘，原敬內閣进行了空前的軍备擴張，并增强西伯利亚的干涉部队和扩大軍事財政。陸軍于1920年停止执行以前决定的22个軍团（44个师团）方案，优先提高軍隊的质量，以新成立的預算經費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8頁。

(486,000,000 日元)和以前的預算結余(两共 560,000,000 日元),从 1921 年起,作为 15 年的連續的事业,进行军队装备的改善充实。海軍則在八八舰队計劃下与美国进行造舰竞赛。战后的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发的。

二

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任务是保持大战期間的急剧膨胀局面和以之为基础而获得更大的发展。但是在战争期間,已經有人认为大战期間资本主义的異常繁荣只是依靠战争带来的特殊原因,从而預料到一俟战争終結,經濟上就会发生重大影响,到了战争末期,这种論調逐渐普遍。果然与 1918 年 11 月停战同时,从原来輸入断絕的商品开始,物价立刻暴跌,同 1918 年 8 月比較,在 1919 年上期,生铁惨跌五分之一、鋼材三分之一、銅二分之一、碱灰七分之二、染料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貿易重新轉为逆差,从 1919 年 1 月到同年 6 月为止,入超达 220,000,000 日元,同时船舶需要减少,租船費比战时跌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战时匆匆成立的生产上述商品的工业就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这时在全国掀起了罢工和怠工浪潮,如东京炮兵工厂、足尾銅矿、川崎造船所、釜石矿山等处工人都曾展开斗争,1920 年 2 月,又扩展到八幡制铁所和許多大工厂。工会組織也迅速发展。

但是經濟逆轉情勢从 1919 年 4、5 月前后起又趋于好轉。这是因为美国战后繁荣促使日本的生絲和紡綢等輸出增加,从而整个輸出再度增进。又因欧洲各国战后进行恢复并非易事,不能迅速夺回东方市場,反因它們进行恢复的需要而使日本更有希望增加輸出。貿易从 7 月以后又轉为出超。加之在 1919 年 6 月到 7 月之間发生了美国解除黄金出口的禁令和签定对德和約这些有利

因素，市場就迅速重新活跃起来，从那年以后出现了战后繁荣。这次繁荣的特征是食品和消费品的价格暴漲，从而更加深了工人与薪資生活者的生活貧困，而促进其斗争与革命化。这次繁荣的进行情况如下文所述：

“欧洲各国的战争伤痕恢复不易，不仅粮食等各种物资的需要量未见减少，而且美国市場逐渐好转，向日本订购许多生絲和紡綢。在大正八年(1919)四、五月之交，生絲、棉紗和其他商品市况都有恢复之兆。过去惨跌过的金屬、染料、药品等也多少有些回升，海运界亦立刻复苏，因此人心逐渐振奋，产生了股票漲价和物价騰貴的动机。一般經濟界早就摆脱了停战时的悲观后退状态，重复出现良好形势，战时几年間城乡居民积下的丰滿的錢袋，就表现为旺盛的购买力，通貨膨脹和濫使信用更助长此勢。人們大多过于相信战后繁荣的来临，結果投机倒把的企业濫立，揭开了国内經濟界的热狂繁荣之幕。这种情势从大正八年(1919)夏秋前后逐渐加剧，本行曾多次发出警告，并两次提高利息，政府当局也曾加以抑制，但终于沒有使狂热的市場鎮靜下来，大正九年一、二月間又达于极点”（日本銀行編：《世界战争结束后我国經濟界动蕩史》，1924年版，94—95頁）。

这次繁荣进行的速度和范围是十分惊人的。当时任日本銀行總裁的井上准之助后来在1925年东京商科大学举行的特別講座上說：“經濟情况，在这样短促的期間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日本历史上固然沒有，世界上也未曾有过”（井上：《战后我国的經濟和金融》，1925年版，30頁）。股票固然不用說，所有的商品也都被卷入激烈的投机漩渦中，当时投机的勁头是非常狂热的。如在棉紗方面，不付一文担保金，就进行一年或一年半的先期交易；又如在神戸盛行投机的麻袋，人們推測每年实际輸入日本的数量是一千几

百万个，运到神户的约4百万个，而每天的交易额达1百万个到6百万个；最盛的时候甚至达到8百万个到1千万个。商品和股票的飞腾价格远远超过战时的高价，如棉纱的战时高价为465日元，而战后高价为699日元；生丝也由177日元涨到444日元；米的期货价格由38日元69钱涨到52日元69钱；东京股票平均价格由480日元涨到549日元。与这同时，兴办企业的热潮也疯狂地高涨，从电力、棉纺织业到织物业、银行和杂项工业等，设立计划的规模比大战期间增加1倍到几倍。1919年下期新创和扩充事业计划的资金总数为3,162,000,000日元，比上年同期的战时最高数增加一倍，1920年初春又比1919年下期剧增1至3倍。“例如1918年下期的每月平均数约为267,000,000日元，1919年下期约为5亿日元，增加了1倍；1920年1月和2月分别达到10亿余日元和11亿余日元，到了投机热潮达于顶点的3月，实达2,186,000,000日元之巨。3月份的这个全月数字比战时繁荣正盛的1917年的全年数字还多”（高桥龟吉：《明治大正经济变动史》，上卷，166页）。

这次兴办企业热潮是被这些因素促进的；即美国的繁荣、欧洲进行恢复的需要、战时的高额利润所造成的过剩资金、输入一度断绝的机器和原材料的输入。它在本质上是以极端的信用膨胀为基础的投机，从其基础来说，是非常薄弱的。因此从投机达到最高潮的1919年底起，到1920年初为止，贸易已经逆转，特别是进入1920年后，入超数量，1月为28,000,000日元、2月96,000,000日元、3月135,000,000日元，接着银根逐渐吃紧，生丝和棉纱等库存数量不断增加。可是从铃木、茂木等大投机商开始，一直到农民小市民为止，所有阶层的人的资金都被动员出来进行投机，出现了这个热狂时代。

三

上述情况的逆轉趨勢从 1920 年 3 月后出現。这一逆勢从股票危机开始,发展为日本从未有过的經濟危机,并波及美、英,成为战后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机。危机的过程是:3 月 15 日东京股票市場的股票价格首先暴跌,4 月 7 日大阪的增田建筑經紀銀行暴露破綻,因而成为正式的股票和商品危机。接着全国的地方性中、小銀行发生挤兌,5 月 24 日,属于橫濱貿易商茂木商店系統的第七十四銀行休业,标志着大銀行也卷入挤兌風潮。到了 6、7 月間,美、英等国发生經濟危机,日本又受到它們的影响,危机趋于长期和一般化,在那一整年中股票价格和物价連續跌落。井上准之助曾将当时的混乱情形描述于次:

“日本在大正九年(1920)时全国陷于黑暗状态。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所有的交易所全停业了,从股票交易所开始,只要是进行买卖的市場,全都关闭。棉紡业、制絲业和地方織布业等也都停了工,在几十天里茫然无所事事,也許还没有仰天长叹,但都低着头愁眉苦臉”(井上:《战后我国的經濟和金融》,67 頁)。

这次危机造成的物价和股票价格的跌落情形,与 1919 年相較,見第 38 表。如这个表所示,商品和股票价格都跌到年初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休歇和倒閉的工商业不計其数;从 4 月到 7 月止,遭到挤兌的銀行达 169 家之多。工人、家庭工业者和經營小規模耕作的农民的情况則更为悲慘。关于对工人施行的削減工資和解雇情况,即据土方的不甚可靠的数字,也显示每一制造工业工人的劳动收入从 1919 年的 423 日元減到 1920 年的 416 日元,其人数由 3,638,000 人減到 3,555,000 人。家庭工业者減少更快,据山田的調查,1915 年有 2,649,000 人,1920 年減至 2,175,000 人,他們

第38表 1920年危机期间商品和股票价格的惨跌

种 别	(a) 1919年 最低 指数 括弧内为月份 (日元)	(b) 1920年 最高 指数 括弧内为月份 (日元)	(c) 1920年 最低 指数 括弧内为月份 (日元)	a-b		b-c	
				市盈率 (日元)	市盈率	跌落率 (日元)	跌落率
棉花(美 棉)	79.50(3)	145.50(3)	58.00(12)	66.00	0.83	87.50	0.61
棉纱(大阪先期货)	309.50(1)	649.10(3)	221.10(10)	339.60	1.09	428.00	0.66
生丝(横滨先期货)	126.30(2)	444.00(1)	111.70 (7)	317.70	2.52	332.30	0.75
米(东京先期货)	27.05(3)	52.69(3)	23.43(12)	25.64	0.95	29.21	0.55
东京股票市场							
东京股票交易所	183.1 (1)	549.0 (3)	100.5 (9)	365.9	1.99	448.5	0.82
钟 渊 棉 纺	244.4 (1)	574.0 (3)	184.0 (6)	329.6	1.35	390.0	0.68
日 本 制 糖	110.0 (4)	190.1 (1)	66.5(10)	80.1	0.73	123.6	0.65
日 本 啤 酒	135.1 (2)	258.0 (1)	79.6 (6)	122.9	0.91	173.4	0.69
王 子 造 纸	101.1 (2)	183.0 (3)	79.9 (6)	81.9	0.81	103.1	0.56
日 本 钢 管	38.1(12)	77.4 (3)	18.8(12)	39.3	1.03	58.6	0.76
石 川 岛 造 船	63.5 (2)	179.8 (3)	45.0 (6)	116.3	1.83	134.8	0.75

根据高桥龟吉:《明治大正经济变动史》,上卷,288页。

的沒落是令人惊異的(山田雄三,《日本国民收入推計資料》,第70頁、52頁)。

为了应付这种局勢,政府从4月起采取了种种对策,如动员日本銀行、兴业銀行、劝业銀行和大藏省存款部資金来推行救济性的通貨膨脹政策;对东京、大阪、名古屋的股票市場和制糖、羊毛、棉紡等产业联合組織与增田、第七十四等銀行予以特別通融;将救济性貸款借給工业公司和地方蚕絲业者等;以及在9月間創立第二次帝国蚕絲公司,以阻止生絲市价暴跌等。为了挽救这些企业,从日本銀行和存款部拿出来通融的資金在360,000,000日元以上,用以施行股票交易所和棉紗交易所的总清算、限制生产、收买滞銷貨物和对外傾銷等方案,力图消灭經濟危机。

与这同时,資本家力图把危机的損失轉嫁在工人身上,以減輕自己的負擔,因而使用了减少工資、封閉工厂和解雇工人等等方法。因危机而解雇的工人,只算雇用5人以上的工厂,就有57,000人,矿山解雇的估計有138,000人。对此工人进行了抗議和斗争,而資本家則发动解散工会和驅使警察宪兵和打手团体实施镇压等攻势,阶级斗争显然加剧。因此从統計上来看,虽然1920年的爭議件数和工会會員数等都比上年减少,而爭議日数延长,連續在东京市電車公司、富士棉紡公司押上工厂和芝浦制作所等处发生艰苦的斗争。又在这一年举行了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紀念活动,并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①。

政府的危机对策是建立在原敬內閣的积极扩軍政策上,企图把战时不健全的膨脹現象弥合到最小限度。这个政策以經由通貨膨脹来救济企业为主要內容,結果有許多本来可以通过危机而消

^① 1920年12月,由各种傾向的社会主义者組成的联合团体,不少具有阶级覺悟的工人参加了这个团体,1921年6月被政府解散。——譯者

失的弱点，还是原封不动地留在經濟内部。危机从1921年春前后起大体上达到最低点，以后轉向蕭条阶段，但是經由通貨膨脹而弥合起来的内部弱点却阻碍經濟的真正复苏。也許可以說日本資本主义結構上的缺点阻害了危机的彻底整理作用。但以后还是依靠通貨膨脹来进行弥合，以致在十年中一直陷于慢性的蕭条情况。

經濟周期虽然走到蕭条阶段，但在以后几年中还是間常发生危机或局部危机。1921年虽然算是复苏了，但系依靠通貨膨脹所导致的游資的投机性的投放，而不是真正的恢复。就这时的总形势來說，欧洲以德国为中心的混乱情势依然存在；中国各地爆发抵制日貨运动；又从1921年10月开始举行的华盛顿會議决定裁减海軍軍备，同时財政趋于紧縮；因此恢复繁荣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这时資本家繼續向工人进攻，在1921年一整年內，足尾銅矿、北海道煤矿、川崎造船、三菱造船和石川島造船所等处相继发生空前大規模的罢工。

到了1921年下期，經濟情况略为好轉，但于1922年2月发生石井定七事件^①后又告停頓，而且暴露了石井同高知商业銀行以及鈴木商店同台灣銀行之間的那种不正当的固定貸款情形，1922年股票再度跌价，全国銀行都在11月、12月間发生挤兌。这种蕭条景况一直到1923年还是沒有起色，9月間关东发生大地震，更使东京一带的經濟活动一时完全陷于停頓。受到地震災害的人口达3,405,000人，財產損失共达4,570,000,000日元。

在大地震的混乱期間成立的山本权兵卫內閣立刻采取了种种非常救济措施。9月7日用紧急敕令发布了支付延期令，同时日本銀行取消貸出資金的限度，政府动员大藏省存款部資金来向受

^① 高知商业銀行把大部分款項长期借給投机商石井定七，于石井发生破綻时暴露出来。——譯者

災的工商业者进行救济性的产业資金貸款，并向地震地区大工业貸放救济資金，又于9月27日发布震災票据貼現損失补偿令，由日本銀行率先进行救济活动。政府还訂立帝都复兴和震災复兴計划，不惜重息举借外債550,000,000日元，以充复兴資金。

这样通貨膨脹就进一步发展，由于日本銀行扩充信用和政府实行財政膨脹，使复兴繁荣大体上在1924年出現。但因恢复地震損失而造成的入超數額，从1923年9月到1924年7月为止，共达836,000,000日元；在海外的現金儲备由1923年9月的560,000,000日元激减至1924年3月底的290,000,000日元；所借外債利息极高，以致被称为“国耻外債”；这使日本国际信用丧失，汇率大跌，复兴繁荣不久即告消灭，以后又繼續处于慢性的經濟蕭条中。

四

在1920年的危机中，农业危机也交織着工业危机而爆发，以后农业方面亦陷于长期的蕭条情况。当时国民收入中的农业、工业和其他各业之間的关系見第39表。农业还是占国民收入中的主要地位，所以农业蕭条对整个經濟情况的影响很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农业收入以1919年为頂点，从1920年起急剧下降，以后如第39表所示，其絕對数量和相对地位都趋于低落。

1919年的繁荣高峰使茧和米等商品化的农产物价格暴漲，扩大了以投机为目的的商业性农业，結果造成农业生产过剩，成为农业危机的原因。这次农业危机是与世界工业危机相結合的世界农业危机的一环。由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适应大战期間的巨大需要而显著地增加播种面积和农产品，但是需要随着战争結束而停止，就出現了危机。只是世界农业危机是以小麦为中心而爆发，而日本則以与工业关系最深的茧和米为中心，不以小

第33表 20世纪20年代国民收入的变迁

(单位:百万日元)

年 度	农林业	工 业	交通业	矿 业	商 业	公務員	包括其他 业的合計
1919	3,898	2,216	683	257	2,083	529	10,657
1920	3,285	2,093	540	190	1,279	749	9,436
1924	2,788	2,767	568	187	2,298	1,098	11,496
1928	2,683	3,103	775	196	2,460	1,302	12,424

根据土方成美:《国民收入的结构》,1933年版,13页。商业栏是商业与借贷业收入的合计数。

麦危机的形态出现。

茧价受到生丝惨跌的影响,急剧跌落。1919年春蚕茧价为11日元93钱,夏秋蚕茧价为11日元21钱,1920年春蚕茧价跌至7日元59钱,夏秋蚕茧价跌至5日元12钱。为此养蚕农户迅速减少,停止养蚕的农户,1920年夏蚕季节有43,000户,秋蚕季节有89,000户,1921年夏秋两季共有92,000户,大约相当于这两年的养蚕农户的一成。米价也从1920年6月起暴跌,计自3月的高价52日元69钱跌至12月的低价23日元48钱。这是因为米谷和工业制品同样成为激烈的商品投机的对象之故。政府拿出3千万日元来借给养蚕农户,以资救济;对于米价的跌落,则在地主团体的压力下于1921年制定了米谷法。

农业危机的这种进展显示:即使在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下进行小规模农耕,也会在农业随着商业性农作的进展而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环时同工业危机结合起来,形成经济危机的一环。但因这是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下的危机,所以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受到地主和资本家两方面的剥夺和转嫁损失,因而情况更为悲惨。

佃农斗争从这次危机后以全国的规模展开,农民放弃农业和

无产階級化的趨勢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921和1922年,在統計表上也可以看得出农民戶数的减少。这显示作为小商品生产的农业的发展的限度与其发展的方向。佃农斗争是对地主制度的攻击,而放棄农业者的增加、改用人造肥料和采用农业机械等事实則意味着农民正在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对于工业来說,农业的慢性蕭条又意味着由于大战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的农村中的国内市場急剧逆轉。以后国内市場虽然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有所扩充,而作为市場的农村的相对地位却降低了。

农业危机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将佃租米的八成予以商品化的地主。地主勾結壟断資本,力求获得国家的保护,結果增加了对他們的輔助費,并制定了米谷法和产业組合中央金庫法等,但因1921年前后起佃农斗争日益加剧,使地主制度发生动摇,除沒有发生佃农爭議的东北地区外,大地主开始出卖土地和离开乡村,以图另开利源,因此中小地主在地主制中的比重就增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就壟断資本和地主的关系来說,地主的地位迅速趋于低落,而壟断資本日益确立其优越地位,地主轉变为資本家、薪金生活者和自耕农的倾向也从这时起更为加强。

从1920年发生經濟危机起,农业的慢性蕭条一直拖了10年,大部分农户年年亏损,米价虽于1925年前后略为恢复,但在1926年后又趋低落,而且一般物价同农产品价格之間的剪刀差并未消失,致使大部分农民要依靠农业以外的收入才能勉强維持生計。至于农民的階級分化情形:在近畿地区,农户总数减少,同时出现了这种显著趋势:即以耕种1至2町步田地者为中心的自耕兼佃耕农成为标准的农户;在东北地区,則农户总数增加,包括不滿5反的阶层在內的不滿3町步的阶层增加。整个地說,是3町步以上的上层农户减少和下层农民的沒落与放棄农耕。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想充当小商品生产者的愿望表现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佃农争议的加剧上。肥料方面，从1923年后豆糟减少开始，硫酸、氮化钙等化学肥料日益增加。同时平整耕地有所进展，水利事业也有值得注意的成就，如冈山县高梁川的水库、大阪府的枚方水渠和爱媛县吉岡泉等大工程都是战后完成的。此外还进行了米麦品种改良，特别是在米的方面，日本西部的旭系、东北的陆羽132号和里日本的银坊主就从这时起与原有的关东地区的爱国一起成为主要的品种。至于农具，则除草机已经普及使用，脱谷机、去壳机和碾米机已一般化，在岡山、佐贺和静岡等地还可以看到石油发动机和电动机之使用。政府又对农村方面施行了社会政策，从1925年起，发给农村的补助费占农林经费的25%到40%，1923年设立全国购买组合联合会，1924年设立产业组合中央金库，把存款部的资金低息供应农村，又在那年发布佃农争议调停法，1926年制定自耕农创设维持法。

地主制虽然开始衰落，而地主同农民的对立却在农业的慢性萧条中进一步加剧。1922年日本农民组合成立，1923年后佃农争议发展到每年2千件上下的程度，从1924年前后起，争议要求中大半是争取减低高昂的佃租，地主则发动收回佃耕地的攻势，以资对抗，结果在农民为争取耕作权而掀起的斗争中常常发生流血惨剧，农民对抗宪兵警察和打手团的群众行动也扩大到近畿、岡山、香川、新潟、熊本和全国其他各地。农民斗争的加剧使他们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在1925年实施普通选举，初次举行全国各市、镇、村的议会议员选举时，日本农民组合的候选人408名中有339名当选，接着在日农的主导下，于那年12月成立了作为全国唯一无产者政党的农民劳动党。

农业危机所造成的米价低落，对于依靠米的投机买卖博取巨

利的大地主和米谷商人是最大的打击，从资本家的立场来看，这种情况却能使工资低落，成为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基础。因此农业危机的慢性化有对资本家有利的一面，但是为了壟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又有必要同地主制妥协，采取确保粮食的有效政策。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措施是增加朝鲜、台湾等殖民地的米产量和运入本土的数量。这样壟断资本就能在维持地主制的同时确保大量的便宜米。

五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展，战后的殖民地经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增加了重要性。在20世纪20年代，朝鲜、台湾同日本的贸易，在移入日本的货物中，朝鲜方面以米占半数；台湾方面则砂糖仍占三分之二上下，但在20年代后期米的数量增加到20%到30%。就米的移入数量来说，1923年朝鲜为345万石、台湾为113万石；1928年朝鲜增至707万石、台湾增至243万石。而日本移出的商品却是品类繁多，最重要的布匹类也只占全数的10%到20%。

日本资本对朝鲜的掠夺活动，由于万岁起义所显示的“治安不宁”的原故，进行并不顺利。总督府于1920年变更开设公司的办法，由原有的许可制改为与本国相同的登记制，又改变关税制度，施行同本国相同的关税法，以图保护日本资本的活动，可是开办的大多是碾米厂等小工厂，未能轻而易举地使朝鲜工业化。而在台湾，则糖业资本于1926年占台湾资本总额的半数，使本地原有糖业陷于没落，台湾（三井）、明治（三菱）、大日本（藤山）等公司控制了糖业的四分之三；三井还开始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的茶园经营。台湾的土地原来是在豪族和“头家”等大中地主手里，日本占领台湾后他们还保持了土地所有权，但是已经被大资本企业侵蚀了一大部分。

第 40 表(1) 大正后期的殖民地貿易(輸出移出)

(單位:千日元)

年 度	朝 鮮				台 灣			
	輸 出	移 出	米	大 豆	輸 出	移 出	米	砂 糖
1920	27,639	169,381	73,214	17,262	35,173	180,816	17,119	135,224
1923	20,403	241,262	112,954	20,693	29,152	169,442	23,637	111,808
1926	24,779	338,176	192,259	24,294	49,315	202,110	63,092	98,376
1929	35,773	309,891	148,550	22,067	33,188	238,705	49,321	142,602

第 40 表(2) 同上(輸入移入)

年 度	朝 鮮			台 灣		
	輸 入	移 入	棉 織 品	輸 入	移 入	布 匹
1920	106,175	143,112	30,673	60,367	112,041	7,930
1923	98,338	167,452	35,291	39,111	71,018	8,310
1926	123,934	248,236	43,750	62,008	121,405	24,482
1929	107,768	315,326	37,430	64,541	140,370	21,598

根据东洋經濟新报社:《日本貿易精覽》,商品栏里的是移出入数字(譯者按:輸出入指对日本以外各国的輸出入,移出入指对日本的輸出入)。

殖民地銀行是資本侵入殖民地的樞紐机关,大战期間都有迅速发展。但是它們又用一半的資力向本国活动,如台灣銀行同鈴木商店和朝鮮銀行同茂木、增田、高田等之間的关系所示,这些銀行放出了許多不合理的固定貸款。在战后的慢性蕭条过程中,这种关系使殖民地銀行迅速发生破綻,虽然进行了几次整理和减少資本,以图挽救,但台灣銀行的破綻过深,以致成为 1927 年信用危机的大原因。在朝鮮則因“治安不宁”,日本資本大多經過銀行进行活动,所以朝鮮銀行对朝鮮和中国东北的貸款数額从 1924 年前后起日益增加。

在这个期間的殖民地掠夺活动中,意义最为重要的是朝鮮和台灣米的增产計劃。这主要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粮食供应,但就朝

鮮來說，这里除米以外差不多再沒有很值錢的产品，因此米的增产計劃就成为高藤实总督的“文治政策”^①的重要內容，以图依靠經濟上的好轉来稳定万岁起义以来陷于不稳定的“秩序”，从而便于日本資本侵入朝鮮。在臺灣方面，也因糖業資本对种植甘蔗的农民进行殖民地的剝削，使他們过于疲憊，所以从治安上来看，产米計劃又是作为安撫农民的政策而采用的。1920年开始建筑嘉南大圳的灌溉工程，1922年导入日本的种米方法，开始生产蓬萊米。但因殖民地的米增产計劃是适应日本的需要而制定和执行的，所以一旦殖民地米的运入压迫日本米价，即在昭和年代以后对臺灣米的增产特別加以抑制。到了七七事变以后才重新进行增产。

朝鮮的米增产計劃开始于1920年，由于这里只有米是主要的农作物，与臺灣情况不同，所以以后还积极推行。这个計劃的实施对象是可能改善的原有水田約40万町步和可能經由开垦、排水填地和改变土地种类而新开的水田約40万町步，合計80万町步；实施項目是帮助、指导和奖励在这些田地上进行的耕地改良和扩充事业。第一期筹划在15年內对427,500町步田地进行改良和开垦，以求达到将米的年产量增加到900万石的目的。实施后朝鮮米的移入量迅速增长，增加了日本国内的米供应量，然而这实在是以东洋拓殖公司为首的殖民者地主对朝鮮农民进行殘酷剝夺的結果。試以1930年至1933年同1915年至1919年相較，朝鮮的米产量增加370万石，而消費量减少270万石，移出量增加640万石，就可以說明这点。在这个过程中，朝鮮农民进一步沒落下去，自耕

^① 朝鮮人民发动万岁起义后，日本政府改朝鮮总督武官制为文官制，改宪兵为普通警察，并以諮詢机关的名义拉攏一些朝鮮民族敗类，以图粉飾其强暴的殖民統治，并自称为“文治政策”。——譯者

农和自耕兼佃耕农减少，佃耕农的比重则由 1919 年的 37.6% 增加到 1930 年的 46.5%。在这个期间，每个朝鲜人的平均米消费量减少了 63%，经常吃小米，这就是标榜日朝融合的“文治政策”的主要内容。

2. 相对的稳定时期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总危机的世界资本主义从 1924 年前后起获得局部的稳定，进入所谓相对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这次稳定局面，不仅是由于美、英、法、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方法和规模上取得暂时的妥协，而且是由于无产阶级在战后世界的混乱政局中暂时后退，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欧各国的经济在美国的金融控制下有了平衡恢复的可能。这意味着在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具备了新的竞争条件。因此虽然各国壟断资本依靠加强对国内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而有所恢复，但是帝国主义各国又在战后的条件下展开新的对立斗争。

日本资本主义在战后危机以后的慢性萧条中受到沉重的打击，又须在政治上被迫从中国后退和面临国内阶级斗争加剧的条件下筹谋恢复。这时被迫从中国后退，不只是由于受到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又是由于五四运动后迅速觉悟的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对于把殖民地侵略当作发展的基本因素的日本帝国主义具有致命的重大意义。又在国内阶级斗争的加剧过程中，日本共产党于 1922 年成立，以后工人、农民、学生等不断革命化和组织化，反抗统治体系的运动也趋于大众化，

这对于勾结专制主义和利用天皇制的权威来构筑其剥削体系的日本资本主义成为最大的威胁，并不断震撼其基础。以后这些国内外的不稳定因素还日益加剧，并因其根源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深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的危机比其他国家更为深刻。

如下文所述，经济情况也是不妙的：

“物价于刚刚地震后多少看涨，但不久即因人们心怀警戒而转落，致使过高估计复兴需要，进货过多的输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等遭受损失，事业经营一般陷于困境。金融方面，由于可靠的资金需要者减少，一般并不忙碌，因此商业票据贴现率就从大正十四年(1925)起趋于低落。可是订出冒失计划的人和急于摆脱困境的人却不嫌利息高昂，力求通融。有存款的人怀疑银行经营，动不动就提款，所以根本上很不稳定，呈现不安状态”(深井英五：《回顾七十年》，1941年版，215页)。

这种状态之所以持续不变，不仅是由于采用了通货膨胀的弥合方法来代替利用战后危机彻底整理矛盾的政策，还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特质规定了这种不稳定的整理办法，因为在这种结构下，要靠危机来强制整理矛盾是不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力图经由提高垄断资本的结构和伪装民主姿态来打开新的道路，1926年6月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①就是这种打算的政治上的表现。共产国际的1932年提纲指出这个内阁实施普选一举反映了“天皇制同地主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妥协”，他们妥协的目的，是“巩固对工人、农民的剥削、压迫体系和天皇制、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统治，加强人民对议会的幻想，使一直欺骗人民和行径腐败的垄断资本的统治能在新的

^① 1924年6月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利用人民要求实施普选的运动，推翻了官僚清浦奎吾为首的内阁，组成三派联合内阁。——译者

条件下經由天皇制官僚同資產階級的更緊密的勾結而建立起來”。這種說法不僅適用於普選，還符合成立護憲三派內閣以後確立政党内閣制的情況。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的事，是對於天皇制官僚和軍部的權力未加任何限制，壟斷資本在政權中的霸權也依憑天皇制的國家機構而在制度上確定下來。壟斷資本與國家機器相勾結，使其政策成為政府施策的中心，以後還派他們的代理人直接參加政府。

在這個意義上，護憲三派內閣和繼任的加藤與若槻內閣^①的經濟政策，都是為了在壟斷資本同地主聯盟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財政寡頭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作用。政府把農商務省劃分為農林和商工兩省，更增強了壟斷資本同國家的勾結；在財政金融政策方面，雖然聽任通貨膨脹進行，但又極力收縮信用，促使內容不健全的公司和銀行進行整理。政府還全力壓抑輸入和獎勵輸出、宣傳購用國貨，並於1925年制定重要輸出品工業組合法和輸出組合法等，1926年大大修改了關稅定率法，加強保護貿易。但是多少顧到一些工人、農民權利的工會法和佃耕法，卻因資本家和地主的反對，甚至沒有在議會里提出來，又不能解除成為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的黃金出口禁令。

這個最後的問題牽涉到日本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結合方式，實為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這時由於入超增大，匯兌率從1924年3月起繼續跌落，由同年11月到1925年2月為止跌到38美元；從3月起，卻因政府運出黃金和海外投機者的活動而急漲，呈現極不穩定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訂立先期售貨合同和進行投機性輸入的業者損失很大，經濟活動因海外投機者的播弄而受到阻害，

^① 以加藤高明和若槻禮次郎為首的憲政會單獨內閣。——譯者

因此棉紡資本家等都发出要求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呼声。但因日本资本主义基本上还处于依靠救济性的通货膨胀来支持的状态，所以政府害怕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会使“通货信用急剧紧缩，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生破坏性的冲动”（大藏省大臣濱口雄幸的话，见银行问题研究会：《金輸出禁止史》，1929年版，184页），因此不能毅然实行。又在当时的慢性萧条情况下，虽然进行了相当强有力的资本整理，但在整理过程中有许多掩盖弥合的情况，如银行把不可靠的贷款当作可以收回的贷款，在公司和银行进行合并时把劣等资产当作健全资产，放给固定厂商的银行贷款日益增加，许多制糖、海运、制麻等公司动用资本金来发给股息，减少公司的家底，还有许多内容不健全的公司和银行存在。

二

这个时期的产业情况，就产量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约增长了90%，但就产值来说，在这十年内却差不多陷于停滞。代表性产业依然是以输出为主要目的的轻工业，产业之间靠贸易来联系，产业的发展极不平衡。至于产值之所以显示发展停滞状态，则是因为单位价格全都剧烈下跌的原故。

对于价格的低落，虽然政府禁止黄金输出和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力图阻止，但始终无效，这种情形是世界市场上的价值规律的作用造成的，并且可以显示战后日本经济比提高了生产力的先进各国显著落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生产量在十年内大约增加了一倍；并且不是在大战期间那种投机盛行的情况下，而是在价格低落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显示日本资本主义与英、法等资本主义相较，还是向上走的。这次生产量之所以增加，是由于战后存下来的中小资本企业虽然利润减少，但是只要存

下来了,就能继续生产,又由于在垄断资本推行合理化时开始进行大量生产的原故。

通过这一过程,产业资本巩固了它的基础,在许多部门中建立了优越于商业资本的地位。资本的集中、积聚也继续进行,以产业为基础的垄断资本的统治就确立了。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就经济周期来说,日本在世界经济趋于稳定时始终没有恢复活跃和繁荣局面,一直维持慢性萧条情况。例如产业公司的利润率,按支付资本折算,1921年上期为17.3%,1924年上期为17.1%,1927年上期为14.8%,实系逐年减少。

在这个期间,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相对低落的地位,最能说明这点的是作为连系产业的媒介、具有重要意义的贸易之低落。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商品贸易情况见第41表的(1)、(2)两表。

把这个表同以前的日本贸易统计表相比较,立刻可以看出贸易

第41表(1) 20世纪20年代输出表 (单位:千日元)

年度	总计	生丝	棉纱	棉织品	丝织品	精糖	陶瓷器	煤	杂品
1920	1,948,395	382,222	152,394	335,266	158,416	30,593	31,452	45,290	131,866
1921	1,252,838	416,893	80,568	204,673	89,936	15,799	20,792	37,815	57,340
1922	1,637,452	668,860	114,723	221,952	117,929	19,092	21,211	23,514	67,306
1923	1,447,751	564,783	78,512	234,748	92,319	14,743	23,460	21,541	70,257
1924	1,807,035	683,287	109,611	326,587	125,840	28,864	25,437	22,394	68,276
1925	2,305,590	877,722	123,117	432,850	116,985	32,254	35,273	33,201	86,469
1926	2,044,728	731,993	70,716	416,155	133,071	34,032	38,182	31,032	82,307
1927	1,992,317	741,228	38,794	383,834	139,615	28,917	30,491	25,508	72,515
1928	1,971,955	732,697	25,895	352,218	134,059	38,415	34,643	24,514	71,859
1929	2,148,619	781,040	26,756	412,707	149,955	29,975	36,963	23,215	84,817
1930	1,469,852	416,647	15,033	272,117	65,775	26,735	27,171	21,783	85,098

根据东洋经济新报社,《日本贸易精览》编制。

第41表 (2) 20世紀20年代輸入表 (單位:千日元)

年度	總計	米	小麥	砂	糖	礦	油	皮	棉	羊	毛	豆	餅	鐵	類	機械	類
1920	2,336,175	18,059	26,505	60,212	36,513	720,161	121,629	150,905	264,326	110,571							
1921	1,614,155	28,812	31,551	69,815	31,053	436,561	39,203	94,311	147,538	119,882							
1922	1,890,308	61,276	58,901	63,944	43,357	426,511	55,267	98,522	158,008	114,371							
1923	1,983,281	30,718	47,484	59,632	45,922	512,064	80,012	109,646	123,732	102,241							
1924	2,453,402	70,866	73,897	63,850	60,622	604,493	88,041	103,646	199,958	123,523							
1925	2,572,638	120,499	70,523	75,089	57,597	922,344	121,074	107,414	102,833	88,996							
1926	2,377,484	50,694	93,346	83,672	60,332	725,275	86,024	124,144	127,400	90,470							
1927	2,179,155	78,907	53,929	75,804	66,271	623,920	101,677	98,979	127,868	78,612							
1928	2,196,315	33,673	67,787	64,959	89,935	549,613	111,872	86,829	149,333	92,205							
1929	2,216,238	23,792	70,896	31,169	92,928	572,610	101,816	75,919	159,722	121,095							
1930	1,546,071	19,583	41,509	25,973	89,567	361,715	73,610	66,417	93,608	85,714							

第41表 (3) 20世纪20年代按地区区分的输出表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关东州 ^①	中 国	香 港	印 度	海 峽 殖 民 地	印 尼	菲 律 宾	英	法	美	澳 大 利 亚
1920	113,686	410,270	74,066	192,249	35,750	107,225	34,376	97,797	71,653	565,017	58,115
1923	67,871	272,190	55,318	99,619	20,913	40,591	17,538	40,410	25,656	605,619	32,639
1926	99,607	421,861	52,973	155,951	41,497	7,754	27,821	59,494	42,416	860,881	51,611
1929	124,476	3,6652	61,065	198,057	27,928	87,125	30,597	63,183	44,495	914,084	44,075

第41表 (4) 20世纪20年代按地区区分的输入表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关 东 州	中 国	香 港	印 度	海 峽 殖 民 地	印 尼	英	德	美	澳 大 利 亚
1920	196,861	218,091	2,232	394,930	17,137	68,829	235,352	11,975	873,182	69,459
1923	148,806	204,679	1,654	305,719	25,371	72,955	237,136	120,243	511,977	96,623
1926	157,031	239,410	1,426	391,136	89,872	103,077	170,275	145,221	680,186	128,396
1929	166,322	209,975	608	288,120	41,634	77,346	153,046	157,274	654,053	132,601

① 参見第177頁附注。

易的显著停滞。如将日本貿易与世界貿易的趋势相比较，則如第42表所示，日本比所有的主要国家都要差些。試与世界整个情况来比，从1922年到1929年为止，世界貿易增加到146.5%，美国增加到139.1%，德国增加到210.4%，而日本只增加到123.9%，比英国增加到107.4%稍为多些，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85%弱。如果用大战結束不久的1920年为基准，則世界貿易于1929年增达161.0%，而日本仅达101.9%，其衰退情形更为明显。

第42表 20世紀20年代世界貿易与日本貿易

年 度	世 界 (十亿金法郎)	日 本 (百万日元)	美 国 (百万美元)	英 国 (百万鎊)	德 国 (百万馬克)
1920	154.1	4,284.5	13,212	2,744.4	8,703
1921	153.0	2,867.0	6,782	1,682.0	8,708
1922	170.5	3,527.8	6,811	1,618.9	12,488
1923	174.3	3,430.0	7,806	1,745.0	12,252
1924	197.0	3,260.4	8,015	1,938.5	16,635
1925	210.1	4,878.2	8,954	1,940.1	21,652
1926	212.4	4,422.2	9,046	1,768.9	20,417
1927	233.8	4,171.5	8,837	1,804.5	25,029
1928	240.1	4,168.3	9,023	1,798.9	26,277
1929	249.9	4,364.9	9,472	1,840.4	26,930
1930	229.7	3,015.9	6,780	1,527.9	22,429

日本数字根据第41表的(1)、(2)表、世界数字根据尤金·庫金斯基：《世界經濟史》日譯本，1955年版，第69頁上的表；其他根据瓦尔加編：《世界危机史》日譯本，第2册。

日本貿易衰退的主要原因是輸出减少，那是由于生产力薄弱，所以不能在世界市場上进行竞争。輸出减少又使輸入减少，但还是逐年入超，1920年到1924年的入超达2,182,800,000日元，1925年到1929年的入超达1,078,640,000日元，10年合計3,261,440,000日元。这使日本保有的黄金儲备枯竭，成为汇兌跌落的原因，当然

就需要繼續推行通貨膨脹政策。貿易从 1925 年前后起有所改善，但沒有达到改变逆差的程度。这个差額只是依靠貿易以外的收入超过支出和举借外債才勉强弥补起来。可是在这个期間，貿易品差不多全由日本商人經手，从 1920 年起，日本公司經办了輸出的 70% 和輸入的 90%。

現在从商品来看貿易的趨勢：在輸出方面，生絲还是占主要地位，显示日本貿易受美国經濟情况的影响；棉織品飞跃增加；而棉紗和煤减少。輸入方面，棉花一直占居絕對优势地位，其次是羊毛和豆餅，铁类、机械类和石油的增加也值得注意。如将輸出入的按商品种类区分的結構同按地区区分的結構对照起来看，則如第 41 表的(3)、(4)表所示，美国的优越地位和中国的重要性以及英国的势力范围的意义是显然的。貿易通过对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交易来起日本再生产結構中的媒介作用，名和統一曾将这种关系归納成这样的方程式：“第一个环节，对美貿易：生絲輸出对棉花和机械輸入；第二个环节，对英帝国貿易：棉制品輸出对重工业原料輸入；第三个环节，对滿洲(指我国东北。——譯者)和中国(指我国东北以外的地区。——譯者)的貿易：机械和杂貨輸出对粮食和原料輸入”(名和：《日本棉紡业和原棉問題的研究》，1937 年版，第 463 頁起)，可是生产力水平低落的情形以后很久还没有改变，这种形态的貿易結構就在这个时期內固定化了。壟断資本主义結構的提高是在輕工业占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依靠同美、英等先进国家在半殖民地式的貿易条件下进行交易而补充重工业，并依靠同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进行帝国主义式的掠夺貿易来弥补上項貿易損失。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在这种形态上保持既卑屈又狂暴的性格。

資本家在上述条件下力图恢复，并将最大的力量放在对工人、农民的攻击上。这种情况首先表现为工业雇用人数的停滯，如据

《工厂统计表》所示，雇用职工 5 人以上的工厂中的工人数，1920 年为 1,959,000 人、1925 年 211 万人、1928 年 2,288,000 人、大危机爆发后的 1930 年只有 1,978,000 人，降到 1920 年的水平。而从 1920 年到 1930 年为止，适龄劳动人口从 3,600 万人增至 4,200 万人，同时工业产量增加了 90%，我们从这些简单数字就可以知道对工人的剥削的加强。又在这个期间，农村人口差不多全未增加，可见过剩人口增大了失业队伍，或者沦为雇用 4 人以下的小工场手工业工人、家庭工业从事者、小店员、服务行业雇用人员或土木建筑工人，即被更低级的部门吸收。

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日益加剧，工人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1925 年总同盟的分裂和工会评议会的成立，1926 年劳动农民党的成立和左派势力的再建活动，共同印刷厂、滨松乐器厂和别子铜矿等处的大罢工，新潟县木崎村等处的佃农斗争和同一年进行的日本共产党再建活动，这一切显示日本无产阶级正以豪迈的步伐成长。这时中国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和香港罢工^①，又进行了北伐，即正在进行革命。这些革命运动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旧威势，又鼓舞了日本工人、农民的斗志。日本共产党从 1927 年起公开在人民群众面前出现，走上了大众政党的道路。

三

在壟断资本主义的结构以贸易为基本媒介因素而建立时，最能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是棉纺资本。它不只代表轻工业，而且代表整个日本产业；同时在这个部门中，产业资本已经压倒了原来控制日本资本主义动向的商业资本而占居优势地位。这种产业资本

^① 指 1925—1926 年省港大罢工。——译者

压倒商业資本的趋势，在商业資本很久就控制了生产的生絲和織物中也已出現，又在产业資本发展的基础上，金融机构与产业进行新的結合，帝国主义的資本輸出也采取了正規形态。以下就对棉紡业的发展情况作一較詳的敘述。

棉紡业資本家把在大战期間获得的巨額利潤积下来做龐大的自有資本，特别是大棉紡資本家的秘密公积金，只算东洋、大日本、钟淵和合同四家公司，据說就有 2 亿日元，这笔巨額資本就成为战后发展的基础。在 1920 年經濟危机期間，棉紡业虽然按照約定价格进行約定的棉花交易，但又与棉布商另行协商价格，以救他們之急，以后棉紡业資本同商业資本之間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欧洲大战以前，从明治 40 年(1907)到大正初期，批发行比棉紡业强。……但在欧战以后，批发行却只能对棉紡业唯唯諾諾地低头。像钟淵棉紡公司那样，还向批发行要 3 万到 5 万日元保证金”(谷口：《泉南郡織物发展史》，98 頁)。

棉紡資本家的自有資本的积累，还没有达到使实物資本同巨額货币資本相称的程度，一直到 1919 年能从英国輸入机器設備后才能达到，从此設備就以这样的速度扩展，即如以大战爆发的 1914 年的紡錠数为 100 的話，1919 年为 131，以后 1921 年为 157，1925 年 195，1928 年 244。这种生产能力之扩展成为发生危机后的困难情况下对市場的压力，而生产与市場之間的矛盾之緩和就成为决定战后棉紡业发展的最大关键。特别是由于战后生产的扩大是适应战时輸出市場的扩大而进行的，所以在同英国等欧、美資本进行竞争时，确保海外市場就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問題。

在这一竞争中，拿占棉紗成本八成的棉花來說，日本棉紡业以有利条件购买印棉和美棉，使用便宜原料进行混紡，这使日本棉紡业比只用高級美棉做原料的英、美业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日本

第43表 20世纪20年代棉纺织业的发展

年 度	公 司 数 (家)	資本总额 (千日元)	錠 数 (千錠)	棉紗产量 (千捆)	織机台数 (运转台数)	棉布产量 (千碼)
1921	61	523,398	4,161	1,811	44,109	700,698
1923	70	608,900	4,198	2,171	52,972	1,000,709
1925	64	683,164	5,186	2,437	62,976	1,179,525
1927	64	702,244	5,767	2,531	66,733	1,294,669
1928	70	764,369	6,467	2,452	70,606	1,382,034
1929	70	812,797	6,897	2,793	68,640	1,538,249

根据棉纺织业联合会调查数字编制。

棉纺织业于第一次大战后组织了众所周知的巨大的购买棉花机构，促使大棉商同棉纺资本家结合，并使棉纺资本家处于比大棉商优越的地位。棉商受到信用上的限制，没有力量保持住在产地买到的棉花，棉纺织业就做这笔买卖，大棉纺公司以低于产地行市2、3日元的价格在大阪购买棉花，掌握6个月到9个月的棉花原料，因而确立其地位。它们经由购买棉花的机构和市场活动赚得巨额利润，显示棉纺资本家把主要力量放在追求“棉花交易活动的巨额商业利润”（关桂三：《日本棉业论》，1954年版，100页）上，而不是放在经由生产博取工业利润上。

但是日本棉纺资本家不止在购买棉花原料上博取商业利润，还在生产中力图开展合理化。棉纺织业在推行合理化时，首先致力于机器单位生产量的增加，以取得有利地位，而不是改进纱质；并直接增加劳动强度，以提高生产效率。日本棉纺工人的低工资和长时间的劳动是明治以来日本棉纺织业的主要武器，但是按机器运转单位时间和每一工人的产量计算，却比英、美要差。如据格兰汉·克莱克列举的数字计算，在1912年前后，每锭设备每小时的20支纱产量，英国兰开夏为5匁，美国南部为4.5匁；精纺机操作工人每人每小时产量，大约英国为3千匁，美国4千匁，而日本在

1921年前后的同上产量分别为4.8匁与1,200匁左右。到了1930年前后,英、美的数字大致同1912年前后差不多,而日本則分别增加到5.2匁和2,600匁左右(守屋:《棉紡生产成本分析》,日本評論社1948年版,401頁)。

这种发展是依靠普遍使用电动力、增加精紡机的軸心运轉数和有組織地訓練女工得到的。在使用原来从英美輸入的机器紡制20支紗的場合,运轉以9千次为限,为了在本国制造超过这个限度的机器,必須改进滑环和軸心等部分。但是当时日本的机械工业还不能制造棉紡的成套設備,迅速摆脱这种状态成为棉紡业的急务。于是棉紡业就自己負起責任来援助和促进紡織机械工业的发展。棉紡公司派很多技术人員前往欧美研究外国公司的商品目录和設計图等,自己从事机器設計,供給大战后苦于經濟危机的机器制造公司使用,指导棉紡机的制造。棉紡业中真正展开技术合理化是在大經濟危机^①以后,但在这个时期,已經依靠电力工业的发展和小馬力三相誘导电动机的国产化而完成了发动机电气化的改革,又因国产滑环的性能的确立而增加了軸心的运轉数,这就建立了以后发展的基础。

这时棉紡业迅速进行的合理化措施是加强劳动組織。特別成为这一措施的直接契机的,是构成日本棉紡业基础的深夜操作将从1929年7月起被禁止(因为延緩15年实行工厂法关于禁止深夜操作的規定那时到期),而感到有采取对策的必要。例如随着紡錠的运轉数的增加而規定精紡工人的作业内容、广泛采用挽紗工、划分搬运部門与清扫部門、实施对于工作是否适合的檢查和培养、訓練及作业研究等方法和加强軍隊式的职級制;又因劳动熟练程度

^① 指1929年从美国开始,1930年襲击日本的世界經濟危机。——譯者

提高,使工人的連續出勤月数从大正末期到1930年前后增加一倍。

棉紡資本的这种发展是与弱小紗厂的淘汰和資本集中于大棉紡公司同时进行的。在1920年危机期間实施的第九次减少开工率于1921年12月解除以后,虽然弱小紗厂和商业資本方面經常要求实施减少开工率,可是截至1927年5月信用危机期間开始实施第十次减少开工率为止,在大紡紗公司的主張下,实行了五年半之久的自由减少开工率,这就促进了資本的淘汰与集中。在这个过程中,有40多家公司在1921年到1926年之間被大棉紡資本家合并与收买,或者减少資本;确立了大棉紡公司,特别是东洋、大日本和钟淵等三家公司的霸权。大棉紡資本家又展开多方面經營,特别是兼营織布的业务迅速扩大。兼营紡織的公司所需棉紗量,1913年是278,000捆,1920年增至474,000捆,1923年增至602,000捆,1929年又增至841,000捆,特別在細白布和粗布方面,自己生产三分之二以上,在織布部門中确立了地位。在多面經營中另一值得注意的事是經營人造絲业,从1926年前后起,东洋紡、大日本紡、仓敷紡等很多棉紡公司把人造絲部門分立出来。

大棉紡公司的霸权的确立,是依靠这时在中国大規模进行資本輸出完成的。其进行的速度見第44表。进行这种活动,是由于有了战时积累的大量过剩資本这个基础,并因大战后日本工人地位提高和实行了禁止深夜操作,想利用中国的便宜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如据棉紡业联合会調查,昭和初期紡制一捆20支紗的工厂用費,在日本要42日元(內工資20日元),在中国只要22日元(內工資5日元20錢)。促进这一活动的是中国民族棉紡工业的成长以及与此有关的輸入关税率的提高和抵制日货运动,这些因素使日本棉制品輸出急剧减退,成为日益增大的威胁,因此日本

棉紡資本家就力图压抑中国民族資本。由于这种活动，以后中国成为在华日本紗厂的市場，国内紗厂制品則以南洋和印度为主要市場，而拥有在华紗厂的大棉紡公司就增加了壟断性的超額利潤。

第 44 表 第一次大战后在中国的日本紗厂的发展

年 度	錠 数	同 指 数	織 机 台 数	同 指 数
1913	233,448	100.00	886	100.00
1915	307,048	131.53	1,886	212.87
1922	1,263,344	543.31	3,969	447.07
1923	1,404,848	601.78	?	?
1924	1,553,120	665.30	5,925	668.74
1925	1,636,156	700.87	7,205	813.21

根据宇佐美誠次郎：《中国紡織业的发展和外国資本》，載大日本棉紡业联合会編：《东亚共荣圈和纖維工业》，1941年版，126頁。

在中国进行活动的棉紡业形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主力部队。这同大战期間的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相比，虽然带有較为和平的外表，可是支援产业的資本輸出压迫民族資本的振兴，并使日本資本的力量打进中国經濟的深处，实在是狠毒的侵略行为。这里有着币原外交的意义，它同对“滿蒙”一直进行武力侵略的政策并不矛盾。棉紡业的侵略活动并不单纯依靠經濟力量，还同軍事上的强制力量相結合，1925年的五卅惨案，就是从镇压内外紗厂的罢工开始的；在中国的日本棉紡业同业公会也是在五卅惨案时，在陆战队的刺刀保护下成立的。

四

棉紡业的上述发展情形也可以在其他产业中多少看到。輕工业的生产情况見第 45 表。

第45表 20世紀20年代輕工業生产情况

年 度	小麦粉 (千日元)	砂糖 (千日元)	清 酒 (千日元)	生 絲 (千夏)	棉 紗 (千捆)	棉 紗 (千日元)	棉織品 (千日元)	絲織品 (千日元)	毛織品 (千日元)
1920	70,486	143,485	227,496	5,834	1,817	673,390	591,427	270,617	127,385
1921	48,476	134,576	269,216	6,239	1,811	481,824	533,578	309,181	117,059
1922	55,996	117,416	272,454	6,170	2,228	514,881	735,218	179,973	143,910
1923	74,721	83,719	405,712	6,756	2,171	569,845	511,971	242,138	169,903
1924	117,396	132,229	339,270	7,577	2,073	644,954	633,427	289,058	193,925
1925	135,998	173,819	322,432	8,281	2,437	781,442	703,025	272,573	181,965
1926	134,840	180,886	313,420	9,101	2,608	659,470	617,281	273,336	172,756
1927	118,191	151,870	298,739	9,880	2,531	544,924	579,058	279,196	162,077
1928	132,229	178,737	293,387	10,534	2,452	572,423	622,340	301,826	190,418
1929	136,065	145,938	301,716	11,222	2,793	674,665	637,546	252,595	176,896
1930	94,222	118,149	275,600	11,365	2,595	432,279	416,256	189,690	132,540

根据日本統計研究所：《日本經濟統計集》編制。

生絲价格因經濟危机而惨跌，从1921年前后起，由于美国經濟情况好轉导致生絲輸出增加，所以价格有几分回升，但于1926年后再度下降。可是如第45表所示，战后生絲产量确有增加，如以1920年为100，1925年为142，1929年为194，显示10年内增加了一倍。在这个过程中，器械制絲确立了优势地位，而且这时器械制絲企业中又以使用铁制电动机的大机器工厂为主，即大工厂占有統治地位。誠然，制絲业的生产方法并不是那样复杂的，原料（茧）价格占成本的八成，生产上主要依靠女工的熟练程度，所以从成本来说，坐纜制絲反而比器械制絲便宜，在器械制絲方面，小规模工厂又比大工厂便宜。但是大工厂能用优质茧来制造規格高的絲，絲价上的差别能够超过原料費和生产費的高出部分，因而使制造优等品有利。大資本企业使用以低价购入的大量优质茧，把重点放在清除絲条的斑点上，大规模地制造品质划一的絲。因此对于购入原料的商业机械的控制就成为决定制絲資本地位的因素，片仓、郡是、钟紡等公司所以增强到压倒貿易資本的地位，就是这个原故。这些大資本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下，实行控制优质蚕茧，它們同养蚕的农户結成特約組合，实行蚕茧配給和資金、实物的借貸，以便确实掌握优质原料。据庄司的調查，蚕茧品种已从1918年的245种統一为1926年的75种（庄司吉之助：《养蚕业的发展及其結構》，載农业綜合研究所：《主要地区农业生产力形成史》，1959年版，327頁）。生产方法方面，也在昭和年代发明了多条纜絲机，并逐渐加以推广，使大机器工厂有进一步的发展。

上述制絲业依靠大資本进行发展，并受其控制的情形使养蚕兼制絲的农户倾向于从事一种业务，結果不仅坐纜制絲业衰退，而且尽管蚕茧产量增加，却再不像大战期間那样产生資本主义方式的养蚕业者。但在农业的慢性危机中，农民力求在养蚕方面寻求

商品性农业生产的途径，因此养蚕业从富农推广及于贫农，以中农的副业为中心而普及全国，特别在从关西到九州地区出现了大批养蚕农户。

在这个时期，作为输出产业而大有发展的是棉织业。兼营纺织的工厂在棉织品输出中居于领导地位，但改制输出品的织布专业者也有增加。第46表显示了这种情况，即宽门面的动力织机增加；在织业地区，拥有50台以上织机的机器工厂增加；它们利用半奴隶式的农村劳动力而迅速提高其地位；反之，小规模业者的手织机则迅速减少。但是专营织布的业者并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资本，有力量的批发行已经不像旧式的批发行那样控制家庭工业，它们不仅是商业资本，有的还自己设立和扩充工厂，并致力于控制织布业者，因而在工厂制发展的同时广泛展开了新型的织布委托制度。例如在知多，“工厂共有三百六十多家，其中独立的制造业者只有四十多家，其余三百二十多家全是接受批发行等的订货进行生产，即博取工资，承包织布业务”（农商务省工务局：《关于织物和针织品的调查》，1924年版，88—89页）。控制这个织布地区的是名古屋的大批发行，随着织布业的规模的扩大，地方批发行就只能处于名古屋的批发行的附属部门的地位。名古屋的批发行的发展情形可以用服部商店做例子来说明：它经由托人织布或分包而控制的织机，大正初期为2千台，在大战期间最为繁荣的1919年增加到7千台，战后1927年前后又增至13,000台；在同一时期内，又于1914年以600台织机开始设立自己的工厂，1920年加以扩充，变成以知多织布地区为厂外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1919年还伸展到纺纱方面。

知多的情况是标准的棉织地区情况，在福井则可以看到稍有不同的丝织业的情况。在这方面，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贸易资

第 46 表 20 世紀 20 年代棉織业設備的变化 (单位: 台)

工厂規模	1922 年		手織机	1925 年		手織机
	动力織机			动力織机		
	寬門面	狹門面		寬門面	狹門面	
不滿 10 台	1,919	6,547	140,323	2,460	6,030	114,573
10 台以上 不滿 50 台	17,977	60,676	18,580	23,285	55,448	8,716
50 台以上	76,185	55,157	6,214	103,442	48,334	3,071
合計	96,081	122,380	165,117	129,187	109,812	126,360

棉織业联合会:《我国輸出棉織品的現勢》, 1929 年版, 6 頁。

本成为控制者,与有力量的生产者发生直接的主从关系;与这同时,对于在这个地区广泛存在的小規模業者,則由地方批发行繼續实行租机制度。又在由于战后新創縞三綾^①而从事輸出品制造的远州,持有織机 20 台以下的業者占八成以上,这些業者受到大約 20 家地方批发行控制,經過它們同全国性市場发生关系。至于在战后改制輸出用的縞三綾和五新布的播州,織制業者的規模比远州的强大,而地方批发行弱小,因而直接受神戶貿易商的統治。反之在大战期間以来企业規模迅速扩大的泉州(拥有寬門面动力織机 50 台以上的工厂的織机数,1923 年为 8,704 台,1928 年为 17,754 台),租机方式已經差不多絕迹。織行“如在田附买絲,付不出价款,丧失了信用,就改在岩田去买,又付不出价款,再向竹中去买”(谷口:前引书, 102 頁),表现了較为独立的情况。

織物業发生这种变化的結果,尽管商业資本还保持强有力的控制,却使批发行的旧式控制形态随着生产者朝向机器工厂进展

① 一种斜紋縞的名称。——譯者

而变化。一部分大批发行資本轉化为产业資本,并联合中小企业,同棉紡資本等大資本相对抗,成为日本輸出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1925年制定的重要輸出品工业組合法和輸出組合法把这种做法在法律上确定下来。从棉織业起,工业組合以后成为批发行資本和中小企业的联合組織,进行联合使用設備、联合购买原材料和檢查成品等工作,在生产上也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合理化的作用。

五

虽然經濟結構建立在輸出产业代替重工业地位的基础上,但因壟断体系的結構臻于高度化,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有了底子,所以在这个时期,日本有許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部門在国家保护下打好了发展的基础。誠然,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大战期間已經多少有些发展,但其資本基础弱小,又在战后的經濟危机和蕭条期間受到沉重打击,到底不能同先进各国进行竞争。因此它們的发展并没有充分的市場基础,而是依凭国家同壟断資本的勾結而进行的,所以当时共产国际就指出“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像日本那样接近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体系的”(1927年提綱)。

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这个时期,鋼铁工业和动力工业才不被当作是軍事产业或輸出产业,而确立为日本产业中的基础部門。它們的情况比起外国来还是羸劣和弱小的,特别是反映技术水平的机械工业严重落后,因而限制基础部門的发展,可是这些工业在这个时期作为基础部門的发展还是打下了以后日本产业发展的底子。这一进程又同日本壟断資本体系的发展相关連,并与軍事上的需要相結合,在国家的保护下受到促进,这就显示了今后发展的性格。由于这一发展,壟断資本同国家之間有了进一步的勾結,基础工业的大体确立又使以后軍事

工业得以大步前进。

钢铁业的发展情形见第 47 表。钢材自给率由 1920 年的 36% 增至 1929 年的 77%，同时输入品比率降低。如此表所示，八幡制铁所所占全国产量的成分还是很大，而且到 1925 年前后为止，一直是增加的，以后也还占重要地位。这意味着特别在生铁方面，以八幡为中心的大厂成为承担生产责任的主要力量，而且同许多弱小制铁企业在战后危机过程中没落的情况有连带关系。战后钢铁价格的变迁也能显示这种情形，这方面的价格因停战而剧落，1919 年与上年的高价相较，生铁（釜石骸煤一号）从 406 日元跌至 164 日元，圆钢（直径四分）从 390 日元跌至 230 日元，钢板（宽 4 尺、长 8 尺、厚 1 分）从 834 日元跌至 320 日元，许多弱小企业就垮台了。以后价格还继续跌落，生铁于 1924 年跌至 64 日元，1928 年跌至 57 日元，在同时期内，圆钢分别跌至 115 日元和 107 日元，钢板跌至 135 日元和 114 日元。

第 47 表 20 世纪 20 年代钢铁生产的发展（单位：千吨）

年 度	生 铁		钢 块		钢 材	
	全 国	八 幡	全 国	八 幡	全 国	八 幡
1920	721 (521)	244	845	449	560	297
1923	797 (600)	485	959	633	755	468
1925	921 (635)	586	1,300	863	1,037	653
1928	1,523 (1,093)	832	2,283	1,160	1,970 (1,721)	937

根据矿山局和制铁所的调查，全国栏包括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数字，但在这个时期，殖民地差不多全不生产钢材，括弧内的数字是本国的产量。

世界钢铁生产从战后混乱状态稳定下来的 1922 年前后起迅速恢复，1921 年产量为 5 千万吨，1927 年即超过 1 亿吨，那时日本

还只能自給一半，所以市場上充斥着印度生铁和欧洲鋼材。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政府在护宪三派內閣时期組織了鋼铁制造調查委员会，以后历届內閣的政策都以阻止印度生铁輸入和奖励鋼铁联合企业为目的，以促进鋼铁生产，并采取了修改制铁奖励法、組織鋼铁協議会和成立生铁联合販卖和其他几个卡特尔組織等措施。于是八幡制铁所就以第三期扩充計劃为基础，在1921年和1926年扩充設備，建起大容量的熔矿炉和200吨的克虏伯式平炉；其他公司也致力于增产和合理化，从而促使鋼铁生产迅速发展。

这次鋼铁工业虽然以八幡制铁所为中心而朝着鋼铁联合企业的方向发展，但是一般地說，还没有全部进展到联合企业的地步。在民营鋼铁企业中，最发达的不是生铁生产，而是鋼材生产，結果鋼铁生产的不平衡情形更为扩大，并且是以美国輸入的廢铁，特别是以印度輸入的生铁为主要原料而进行生产的。这是由于除八幡这一国营企业外，当时資本积累的基础还没有达到建立鋼铁联合企业的程度。輸入的印度生铁比国内生铁便宜，其輸入量从1920年的48,000吨增加到1929年的412,000吨。政府之所以奖励鋼铁联合企业，与其說是由于經濟上的必要，不如說是同軍事上的需要相結合，这就是八幡作为唯一的大托辣斯而发展的原因。

鋼铁工业集中在以八幡为中心的大企业上发展的情形促进了动力的电气化和单种多产等合理化措施。但是資本家把这个时期的合理化重点放在开动战时增設的閑下来的設備上，极力加强高热下的重体力劳动，把少数負責职工和大多数“居住条件像牢房”的来自农村和殖民地的簡單体力劳动者結合起来，以图减低生产成本。关于八幡經由合理化措施而减低成本、增加利潤的情形見第48表。其他公司也依靠增产和加强劳动組織的措施来增进作业效率，从而显著降低了成本。但是实际生产量只合生产能力的

第 48 表 八幡制铁所实施事业合理化的成效

	1924年	1928年
固定资产价格(除煤矿、耐火物工厂等 副产品部门外)	110,417,859日元	126,913,800日元
钢材产量(包括出售的钢片)	492,683 吨	937,153 吨
按每吨产品平均摊算的固定资产额	224日元	135日元
一般市场上的品种数	657 种	122 种
按每吨产品平均摊算的职工人数(除煤 矿外)	10.44 人	6.07 人
因公伤病率(每年每 1,000 人中)	101 人	63 人
每吨产品使用的煤	3,583 吨	2,408 吨
制品对原材料数量的比例(钢材对铁 块数量的比例)	75.7 %	80.0 %
按每吨产品摊算的管理费总数(又称 杂费)	约 16.40日元	约 8.80日元
上列费用内的职员薪金和津贴	5.46日元	3.28日元
按每吨产品平均摊算的蒸汽费和电力费 合计	11.17日元	7.15日元
折旧后所存利润	866,772日元	13,572,061日元
按每吨产品平均摊算的利润	1.75日元	14.48日元

根据八幡制铁所：《最近十年的我国钢铁业》，载《日本经济的最近十年》，325
页。

70%到50%，并且只是依靠彻底地向对外订货的价格看齐，才勉强维持住国内市场。

在这个时期，钢铁生产的进行又与殖民地掠夺活动相结合。当作原料的铁矿石越来越依靠中国和朝鲜，就其与中国的关系来说，日本几乎控制了全部中国矿区生产的85%，焦炭也大多依靠中国，到了昭和年代，还进而控制马来亚和其他地方的铁矿石。本溪湖、兼二浦和鞍山制铁所也从发生经济危机后正式投入生产，特别是鞍山于1926年采用还原焙烧法，从而确立贫矿处理技术以后显

示飞跃的发展。这三家制铁所的生铁产量于1930年达到本国生铁总产量的43%，鞍山生铁的输入又在驱逐印度生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中，又一重要项目是作为基础部门的动力产业。在动力产业中，煤业从第一次大战期间以来把主力放在供应工厂使用上，到了这个时期，这种动向就确定下来。同时煤价从1920年经济危机后暴跌，弱小企业的淘汰显著进行。例如九州一种块煤，每吨市价的年平均数，1920年为28日元56钱，1921年跌到18日元70钱，从1922年到1927年为止，跌到16日元上下，1928年也只有17日元10钱。因此产量虽然像第49表所显示的那样趋于增加，而价额减了一半，弱小企业被迅速淘汰，如在1921年本有公司427家，名义资本共达648,000,000日元，在1926年就减到95家，320,000,000日元。生产情况也同以前显著不同，在品种方面，块煤、混合煤减少，煤末、粗煤增加；生产地区方面，九州煤还占总产量的70%，北海道煤产增加，而常盘煤减退。生产上发生这种变化，是由于钢铁业和窑业等所制造的生产资料的市場扩大，使这些部门对便宜的煤末的需要大量增加；北海道煤产的增加，则由于三井、三菱、北煤等于输出市場减退、工厂用途成为中心时走上了开发这个地区的轨道。

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由三井物产公司倡导成立煤矿业联合会，策划限制煤产来维持价格。因此大资本煤矿同中小煤矿发生利害冲突，筑丰、常盘等大矿更加把牺牲转嫁在中小煤矿身上。加之从1923年前后起输入煤量增加，超过了输出煤量，特别是1924年后三井物产经手输入的抚顺煤大为增加，使市場陷于混乱，因而加倍增加了中小煤矿的困难。于是以财阀为中心的大资本家就通过生产和流通来加强对煤矿业的统治。

第 49 表 20 世纪 20 年代煤的生产、输出入和消费情形

(单位:千吨)

年 度	产 量	输 入	输 出	国内消 费总额	船舶用	铁道用	金属、 机械 工业用	化学 工业用	学 业用	职业 维用	工厂用 (加上其 他用途后 的总数)
1920	29,245	810	2,147	24,709	6,016	3,220					14,695
1923	28,949	1,713	1,587	22,534	3,541	3,037					15,206
1926	31,427	2,045	2,611	35,043	9,746		3,894	3,109	4,560		16,667
1929	34,258	3,254	*2,416	37,843	9,863		4,564	3,622	4,821		18,875

根据《日本经济统计集》及其他资料。

* 包括输出及向殖民地移出的数量, 1926年的输出及移出总额为2,968,000吨。

为了增加煤的产量, 多少也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革。例如导入斗形输送机来增进采掘场搬运的效率、增加长壁式采掘场、改用电钻和电镗机以及改善通风设备等。与这同时, 又把采掘场联起来实施“自治采掘场制度”, 结果采掘工的效率迅速提高。1920年每人每年平均采煤量为85.2吨, 1924年增至119.9吨, 1928年又增至142.3吨。由于技术合理化的进展, 灾害次数有了显著减少, 但是把井内劳动的重点放在镗掘和支柱法上, 实行新的重体力劳动; 使用输送机进行搬运又增加了速度, 从而更增加了劳动强度。

在这个时期内, 发展特别迅速的电力工业是电力工业, 作为工业动力, 电力在这个时期完全压倒蒸汽力。电力工业在战时和战后繁荣过程中迅速发展, 由于基本建设需要好几年, 所以大规模设备于战后才陆续完成, 从而供电量就如第50表所显示的那样趋于增加。发电依然以水力为主, 发电站还是以流水式的为多, 但是, 1919年以前只按利用枯水期的水量标准来建设, 此后却经常提高到枯水期水量的2倍以上; 并进行技术改革; 建设自动发电站和水

第 50 表 20 世纪 20 年代电力事业的发展

	发电厂数	发电力(千瓩)			发电量(百万度)		資本总额 (千日元)	其中固 定資 产 (千日元)
		总量	水力	火力	总 量	其中水力		
1920	861	1,378	825	552	3,815③	3,166③	1,204,383	1,041,933
1923	1,115①	2,063	1,308	755	5,035③	4,246③	2,380,097	2,039,721
1926	1,313②	3,203	2,008	1,014	10,553	8,806	3,814,224	3,177,205
1929	1,761	4,144	2,874	1,469	15,123	12,497	5,149,093	4,478,128

根据《日本經濟統計集》，但資本額根据《日本經濟的最近十年》，446—447 頁，資本总额是自有和外来資本的合計数。

① 1922 年 ② 1925 年 ③ 电力工业用，又 1926 年电力工业所用发电量为 9,091 百万度，1929 年为 13,312 百万度。

壩发电站；由于水力方面的枯水时期不固定，为了使电力定时供应起見，又进行建設补充性的火力发电厂。同时陆續建設发电站、发电厂和輸电綫等大规模設備，投下的資本为数极大，并导致电机工业与土木建設等业的发展。就所需货币資本的来源來說，从 1925 年前后起，公司債迅速增加，决定性地增加了財閥的統治力，又自 1923 年东京电灯公司借到 3,000,000 英鎊外債起，許多大笔外資投入这个产业，到 1928 年为止，折成日币，共有长期投資 4 亿日元之多。

电力的供应量虽然有了上述增加，而需要量在战后情况下并未同时增加，因此各电力公司之間展开了激烈竞争，并使电费下降。如以 1919 年数字为 100，截至 1928 年为止，电灯費降至 86.4，电力費則停滯在 102.8 上。特别是流水式发电所具有能在枯水期发出足够电力的設備，平时有大量的过剩电力，因此用这种廉价的过剩电力做原料的电气化学工业迅速兴起。这样电力事业的发展就促进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并使产业之間的联系更加密

切。电力公司的竞争同政党、财阀之间的斗争交織起来,更为加剧,形成五大电力公司的爭霸战。政府也在1927年成立临时电气事业調查会,又經大銀行仲裁以后,决定了互相竞争的东京电灯(关东)、东邦电力(名古屋)等电力公司的壟断供电区域,显著地促进了壟断体系的进展。

六

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上述基础部門的发展上建立其发展基础。但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一直是和軍事需要相結合的,它們的市場大多依靠国家,因此发展极不平衡,例如造船业早在明治末叶就达到世界水平,而棉紡机器到20世紀30年代才能自給。这些工业又不得不在20世紀20年代的裁减軍备时陷入困境。

就全部机械工业的数字来看,是增加的。根据《工厂統計表》,机械工业的生产量由1925年的459,000,000日元增加到1929年的616,000,000日元,但是各部門的发展极不平衡,出現了发展和衰落两极,全般來說,却形成了日后发展的准备时期。其主要数字見第51表。特別是在日本机械工业中素来显示世界水平的造船工业随着大战結束所导致的海运繁荣的終止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它在1919年本已拥有建造100吨以上的輪船634,000吨的能力,但开工率在这个时期减低到10%至20%,而致連續实行封閉工厂和裁减員工,特別是由于1921年后实施海軍裁减而受到致命的打击,如川崎造船所于1927年6月頻于破产,只是依靠海軍的援助才免于垮台。但是掌握許多机械工业部門的大造船公司在这个时期展开多种經營,开辟新的途徑,从而建立日后的重工业基础。如三菱就以造船与其有关事业为基础开始研究制造內燃机、汽車和飞机,1921年又把电机部門从造船公司分立出来;川崎造

船公司則除原有的铁道車輛部門之外又致力于汽車和飞机制造；石川島造船公司也开始生产汽車。可是当时經營这些企业的技术条件和市場条件都很欠缺，因此极感困难，只是由于与軍需相結合，才能勉强維持。

第 51 表 20 世紀 20 年代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情形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蒸汽发动机	电 动 机	船 舶	硫 銨	过磷酸磷
1920	14,309	70,989	438,423	21,586	22,655
1921	15,052	58,288	177,710	18,688	15,042
1922	29,472	32,713	145,738	13,614	9,745
1923	14,243	14,203	72,719	16,912	17,407
1924	13,732	13,534	56,960	18,618	23,103
1925	15,246	29,143	56,426	19,168	29,064
1926	18,988	23,653	62,593	21,036	19,904
1927	16,191	21,288	65,926	20,583	33,983
1928	18,701	20,393	46,054	27,088	34,247
1929	27,995	16,005	41,305	28,064	34,695
1930	29,268	14,758	95,630	22,147	35,549

根据日本統計研究所:《日本經濟統計表》編制。

在这个时期內大体上确立了的机械工业是电机业。电机工业是在大战期間迅速发展起来的。在重电机方面，从1920年到1923年为止，日立制作、三菱电机、富士电机等厂先后創立或从别的厂分立出来，加上三井的芝浦，完成了財閥的統治体系。这些企业随着电气事业一起发展，其中有許多同外国大电机公司合作，依靠国际上的資本結合来建立其地位，它們的技术水平也迅速提高。輕电机部門亦随电气的普及而发展，具有悠久傳統的东京电气公司，自1905年以来即与通用电气公司合作，控制了电灯泡制造（松田牌灯泡），到了昭和年代以后，又成长为巨大的壟断企业。家庭电

气器具方面,則有松下电器公司从1923年前后起迅速发展。

其他产业所需机械的制造业也在这个时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丰田佐吉制成自动織机就是值得注意的成果,但是高精密度和高效率的品种还不及輸入的机器,工作母机的情况最为低劣。由于这个部門主要地要依靠军事工业才能发展,所以在20世紀20年代陷于停滞。这时虽然也出現了池貝工厂制成G型标准車床那种成績,但在需要高精密度和高效率的这个部門,日本制品还絕對不如輸入品,这种情况使日本机械工业长期处于劣势地位。

再說化学工业,战后在世界範圍内进入新的跃进时代,日本政府也在大战期間极力策划扶植化学工业,以应制造炸药和毒气的需要,而其工业化則大多从战后开始。茲就数字来看化学工业的发展情况:碱类制品于1921年生产25,000吨、輸入51,000吨,而在1929年生产130,000吨、輸入149,000吨;合成染料于1921年生产457吨、輸入3,516吨,而在1929年生产7,813吨、輸入2,621吨;甘油于1921年生产260吨、輸入350吨,而在1929年生产4,333吨、輸入1,200吨;人造絲与硫酸工业也在这时打好了大工业的基础。人造絲产量由1921年的250,000磅剧增至1929年的25,000,000磅,帝国人造絲、旭、东洋人造絲等大資本企业都在这个时期成立。战后硫酸业从使用氫氯化鈣制造化成硫酸改为采用氨合成法制造合成硫酸,在廉价的过剩电力的保障下,产量从1922年的94,000吨增至1929年的237,000吨。相反地过磷酸工业从1921年起陷于深刻的衰退,不断进行着大幅度地减低开工率和盲目的竞争,同时以大日本人造肥料公司为中心的集中活动却在这一过程中显著进行。

化学工业虽然有了上述发展,但从国际水平来說,日本的发展还是有限的。这个部門的生产技术多半依靠从外国輸入,其中硫

铵和染料等工业产品须与外货竞争，更须渡过好几年艰难岁月。如就代表当时化学工业的硫酸铵工业来看，日本氮气、昭和肥料、铃木商店、大日本人造肥料等公司所使用的种种制造合成氨的方法，或者是输入的，或者是政府让与的，它们虽然力图发展，但因外国制品的竞争关系和财阀的商业资本在输入外国制品上有利可图，所以未见进展。农村中使用硫酸铵的数量在战时大量增加，战后侵入大豆和豆饼的市场，继续迅速增涨，但国际卡特尔占了国内供应量的半数，三井物产与三菱商事垄断这项贸易，并布下对于地方肥料商的控制网，获得极大的利润。这就是硫酸铵生产之所以不能顺利发展的原因，财阀打商业利益的算盘，就不大关心硫酸铵生产了。但是化学工业在这个时期内打好基础，形成以后发展的出发点，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上述发展是和无产阶级的主力军在这个时期内建立基础这一过程同时进行的。这时成立了工会评议会，发生了几百次罢工，站在最前列的是钢铁工人、制造机械和船舶的工人、印刷工人、电气业工人和交通业工人。他们不是从农村里出来找零活干的劳动者，而是作为阶级而成长起来的工人。特别是由于产业之间的联系益趋紧密，又在这个时期内建立和扩充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名古屋和九州北部等工业地区，这使工人阶级的连带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尽管统治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还是成为推动统一战线的基础。

在建立中的工业地区，最重要的是东京、横滨之间的鹤见、川崎地区。早在1913年，安田善次郎和浅野总一郎即已看出这个地区有希望，开始建设，在1928年建设成为“最精锐的和规格化的设备的密集地点”（山田：《日本资本主义分析》，170页）。这里从芝浦制作所和日本钢管公司为始，浅野造船公司、浅野制铁公司、富

士电机制造公司、淺野水泥公司、旭玻璃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萊金克賽石油公司、日本石油公司、三井重油部、日清制粉公司、东京电灯公司、日本发送电公司、铁道省各火力发电厂、东京瓦斯公司和三井碼頭等新銳工厂林立，在它們的周圍敷設了东海道綫和鶴見临海铁道网，又架設了东京—横濱輸电网，形成日本最大的大工业地区。以这个工业地区为中心，东京、横濱的工人又成为无产階級的最精銳的部队。

交通业也适应着工业而发展。铁道在大部分收归国有以后，虽然战时运输量剧增，但因铁軌及其他資材不足，并没有进行多少建設，因此在战后迅速实施。这一工作从1918年原敬內閣成立后开始，但是大多根据政友会的策略和軍事目的进行，采取所謂“建主改从”政策，不一定是适应产业发展的合理設施。在这种情况下，铁道的利潤还是依靠壟断价格而显著提高，結果自有資本增加；在改良設備上，也采取了增加机車重量和客貨車的容量、改良与增加停車場和調車場以及采用自动連結机等措施。但是显示运输能力增加的客車乘客定額总数和貨車裝載吨位总数赶不上随着資本主义发展而增大的运输量，运输技术也确实落后于国际水平。1924年后成立的护宪三派內閣根本改变了政友会的随便花錢政策，把支出重点放在改良設備經費上，改为“改主建从”政策，这是和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尽管采用这种方針，却因实施緊縮政策的关系，改良費用的絕對数額反而比过去少些，因此更增加了运输上的困难。确切表現这种情况的事实是国内铁道还是保持狹軌和国有铁道綫的87%依然是单軌。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只是依凭增加工人的負担，才实现“冠于世界的准时运输”。而且改良費用多半花在运输密度和利潤率高的城市近郊路綫上。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又使国有铁道和金融資本之間的結合更加紧密。

第 52 表 大正年代铁道的发展

年 度	营业线(公里)	客 运 (百万人公里)	货 运 (百万吨公里)	国有铁道资本 总额(千日元)
1912	8,930	5,835	4,401	* 973,091
1917	10,136	8,857	8,230	1,189,913
1920	10,913	13,490	9,691	1,542,381
1923	12,491	17,207	10,451	2,149,783
1926	13,516	19,303	11,879	
1927	14,804	21,346	12,577	

根据《日本经济统计集》，但国有铁道资本总额根据岛恭彦：《日本资本主义和国有铁道》，1950年版，195—196页。

* 为1913年数字。

此外汽车在这个时期成为重要的运输工具，其促进因素是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世界石油竞争，特别是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而迅速发展。但是这一发展是以日本作为承销美国制品的市场之扩展为基础的，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个市场还没有扩展到促进日本汽车工业发展的程度。

第八章

总危机的加深

1. 信用危机与大经济危机

一

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从1928年前后起进入了新的阶段。共产国际在这一年举行第六届大会，在大会制定的纲领中指出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第三期，并规定这个新时期的特征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反苏战争、反抗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干涉行动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个新时期是同资本主义体制对立的力量加强的时期，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体系的进展以及同苏联的发展相呼应的帝国主义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结成的统一战线扩大沉重地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在经济方面，世界资本主义也在这个时期受到震撼。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相对稳定局面因大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分裂，被封锁性的集团分别统治。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对立加剧，并由经济竞争变成政治对立，终于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战争的各国人民日益团结，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展开斗争，并进一步加强了国际上的联系。

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大战后接连发生经

济危机和萧条，原有的结构上的矛盾照样存留，同时在垄断资本力图称霸的目的下强行改组资本主义体系，致使萧条景象长期化，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日益加剧，中国和朝鲜的民族斗争显著发展，结果资本主义几乎没有经过相对稳定的过程，就比各国先发生严重的危机。

我们在1927年就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机第三期。那年日本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又在那年开始侵略中国。

信用危机的爆发同大战后基于通货膨胀而推行的不健全的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靠通货膨胀来阻止国内物价跌落的办法使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偏高，从而在竞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并成为萧条长期化的原因。因此当垄断资本体系经由所谓“经济整理”而逐渐稳固时，资本家的希望就变成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和消灭不正当的贸易限制，俾能以正常的形态重新回到世界市场去。

但是在“大正”末期虽然进行了相当强有力的资本整理，而不健全的企业还存下来不少，很多银行把贷款固定给几家户头，在这些银行中，连台湾银行和第十五银行那样的大银行，也只是依靠政府和日本银行的援助或借入短期拆息贷款才能勉强弥补其经营中的破绽。特别是作为救济大地震的措施而发行的所谓震灾票据，连同乘机加进去的1920年经济危机以来拖下来的不健全的贷款，共达4亿日元之巨，到了1927年还有2亿日元以上未经整理，被人们称为经济界的癌。为了实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整理这些不健全的因素实有绝对必要。正是因为这点，所以政府于1927年1月向议会提出有关处理震灾票据的两个法案。

在这两个法案提交议会进行讨论时，不健全的银行的内容大为暴露，信用危机就以此为契机而爆发。这次危机从审议这两个

法案的3月14日所发生的所谓藏相片岡直温的失言问题发端，各銀行在15日到22日之間发生挤兑，还有渡边、中井、左右田、第八十四、村井等銀行歇业。但因这时日本銀行放出322,000,000日元进行紧急救济，議會又在23日通过关于震災票据的两个法案，局势才暂时平靜下来。可是在这个动乱过程中，銀行貸款的整理，特别是手头震災票据最多的台灣銀行的整理成了問題，同时与台銀关系最深的鈴木商店的破綻暴露，从4月5日起停止一切交易。一旦人們发现台銀与鈴木的关系，就紛紛向台銀索取短期拆息貸款。4月8日，与鈴木关系密切的神戶第六十五銀行歇业，台銀也感到經營困难，使政府不得不在4月14日提出挽救台銀的紧急敕令。政府同樞密院^①在審議这个敕令案时发生冲突，樞密院于17日否决此案，若槻內閣总辞职，結果从18日起全国发生挤兑風潮，从台銀、近江等一級銀行起，全国各地銀行陸續歇业，并扩展到棉紗、棉布和針織品等停止交易的程度。这种情勢于田中政友会內閣^②成立后繼續发展，21日第十五銀行歇业。22日政府于提交樞密院通过后以紧急敕令方式发布停止提存三星期的命令，又令全国銀行从22日起歇业三天，并准备通过日本銀行对銀行进行彻底救济。由于这一系列的措施，各地在5月13日停止提存令滿期时平靜下来，信用危机就告一段落。

由于这次危机，从3月26日到4月21日为止，提出的存款超过6亿日元，歇业的銀行达32家之多，日本銀行放出未还的貸款，从3月14日的179,000,000日元增加到4月25日的2,057,000,000日

① 根据帝国宪法設立的供天皇諮詢的机关。法律案經過議會通过后还須經過这个机关審議和天皇批准，才能成为法律，在議會停会期間頒布敕令时也須經過它審議，成为限制議會立法权力的、維護专制主义統治的工具。——譯者

② 以长州系軍閥头子田中义一(1863—1929)为首的內閣。——譯者

元，紙幣發行額則在同一時期由 1,090,000,000 日元增加到 2,660,000,000 日元。遭受打擊的不止是銀行，同台銀、第十五銀行等關係密切的鈴木商店、川崎造船、國際輪船等大企業也被迫進行整理，各地依靠地方銀行通融的中小企業所受的打擊也很大。特別是銀行陸續歇業使中小機械業和以輸出為目的的雜貨工業感到資金困難，而致到處發生付不出工資、遲付工資和減低工資等現象。

信用危機雖以停止提存令為轉折點而平靜下來，但是並沒有消除導致危機加劇發展的矛盾，下面的事實就能表明這點：即以後從織物業起，棉紡、制粉、水泥、肥料和造紙等部門中還是有許多企業歇業、減低開工率和限制生產；生絲方面，曾於 1927 年 10 月成立帝國蠶絲公司（第三次）；蕭條景象於 1927 年下期更趨深刻。當時世界經濟正處於繁榮階段，而日本還是繼續陷於蕭條，是因為壟斷資本在原有的經濟結構上建立其體系，並顯示當時日本經濟上的矛盾之根深蒂固。儘管壟斷資本體系有所進展，但在世界市場上來衡量，底子還是薄弱的，同時歷來代表日本經濟的產業的基礎是同隨便花錢的軍事財政或農業和中小企業在結構上相聯結的，這個矛盾因信用危機而進一步擴大。這時國際收支已經陷入危機狀態，現金儲備亦感到枯竭。在這種情況下，壟斷資本體系在信用危機中的進展，不是經由在世界市場上活動，而是在國內市場採取殘酷的弱肉強食的形態實現的。

上述情況使階級鬥爭更為加劇。在京濱、大阪、神戶、小樽、撫養、三重、筑豐等地發生了長期的和大規模的鬥爭，工人不顧警察、憲兵和軍隊的鎮壓，經由工廠代表會議和工廠職工大會等鬥爭組織展開了全產業或全地區的統一鬥爭。在神戶、小樽、筑豐等很多地方，這些鬥爭還同地方政治鬥爭相結合，工人是更加向左前進了。

二

信用危机使弱小銀行不断遭到淘汰,銀行集中显著进行,从而使財閥系統銀行的統治达到完成阶段。原来銀行集中是以过去的县行合并与联合的方式进行,随着壟断資本体系的进展,过去建立在郡或村鎮的地域产业或地主經濟上的小地方銀行当然就丧失其存在的基础。特别是在1920年經濟危机后的慢性蕭条中,銀行調整的速度增加,加上政府采取促进合并的政策,就使銀行家数从1922年后迅速减少,每家的規模却扩大了。这种情形由于信用危机而有进一步的发展(見第53表)。1927年3月制定銀行法,在法律上規定了銀行的最低規模,强制資格不合的790家銀行在五年緩期执行期間进行整理,这更促进了上述趋势。

第53表 20世紀20年代銀行行业的发展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銀 行 数	每 行 平 均		
		繳 納 資 本 与 公 积 金	存 款	貸 款
1920	1,322	917	4,407	4,465
1922	1,794	1,069	4,348	4,374
1925	1,534	1,379	5,688	5,764
1928	1,028	1,911	9,076	7,339
1929	878	2,252	10,583	8,253
1931	680	2,613	12,160	9,697

根据加藤俊彦:《我國銀行史論》,278頁。

信用危机的結果,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大銀行的势力显著增长。特别是龐大的危机救济資金并没有注入中小銀行,而系流入大銀行和邮政儲金部門,因此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等財閥銀行的統治力更为增大。現在用几个数字來說明:1926年以上5家銀行約占全国普通銀行存款总額的24%,1931年6月超过38%;在

同期間內，貸款由 20% 增至 30%；有价証券持有額由 25% 增至 40% 以上。这时这些大銀行把建立在农村經濟上的地方銀行的合并一事看成果贅，避免干与。因此財閥系統銀行的称霸就在經過集中以后的地方銀行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完成。这种銀行集中的方式就是日本銀行壟断体系的基本形态。

大財閥銀行的上述发展增强了它們經由有价証券投資和借款所进行的对产业的統治，許多財閥在这个时期以銀行为主力而完成了康采恩組織。三井在合名公司之下，拥有直系公司 6 家，加上子公司和旁系公司，一共控制 39 家公司，名义資本超过 10 亿日元。这时三井除銀行占优越地位外，物产公司也組織了自己的系統，其交易总额年达 15 亿日元，只就經办的对外貿易額來說，就占了日本輸出的 19% 和輸入的 14%，因而依凭金融和商业而建立其强大地位。三菱有直系公司 10 家，加上子公司和旁系公司，共有 34 家，名义資本达 764,000,000 日元；并以銀行为中心，后来成为事业核心的重工业在当时还不发达。住友的采矿业趋于衰退，而銀行业显著发展；它有直系公司 13 家，加上子公司和旁系公司，共有 24 家，控制資金 259,000,000 日元。安田以銀行为基本力量，拥有直系公司 12 家，加上子公司和旁系公司，共有 38 家，控制的資金达 4 亿日元。

以財閥为中心的壟断体系的进展，在产业方面表现为卡特尔的結合和加强活动。以下列举新成立的卡特尔：大正末期有过磷酸同业会、煤矿业联合会、水泥联合会等，进入昭和年代以后到 1929 年前后为止，又有生铁联合販卖和鋼材卡特尔、人造絲、絲紡、羊毛、苧麻等联合会和氮肥、砂糖等卡特尔。关于卡特尔的減縮开工和联合販卖等活动已經在上面說过了。在棉紡、制麻、水泥、造紙、制糖、面粉等方面，都由最大的两三家公司确立了統治权，这些企

业多与財閥相結合，建立了壟斷資本体系。但是尽管壟斷体系有所发展，而中小企业在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大，这显示壟斷資本还带有近代前期的因素。

金融資本的这种发展显著地增加了壟斷資本在政权里面的統治力量。樞密院搞垮若槻內閣一举虽然显示壟斷資本的弱点，但不是由于专制主义对壟斷資本处于优势，而只是由于壟斷資本变更政策。他們所以变更政策，則是因为危机加深、中国革命进展和国内阶级斗争加剧，使他們倾向于进一步勾結专制主义的軍事力量，以图用武力来解决危机。若槻內閣与田中內閣的交替，不是意味着經濟政策的变更，而是意味着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的改变。三菱系壟斷資本在民政党内閣中占居优势，而資本前期的性格留存較多的三井和安田系壟斷資本支持政友会內閣。

可以认为日本的总危机第三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田中內閣对外政策的实权操在森恪^①手里，在南京政府向北进攻时两次出兵山东，加以妨害；又召开东方会议，制定恶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在国内則对1927年日本共产党的再建活动横加镇压，于1928年3月15日实行大规模逮捕，以后阶级斗争就呈现阴惨的状态。

但是田中的侵略政策完全不能打开局面。反而在信用危机以后的蕭条中出现事业活动停滞和資金需要日趋减退的情况，1928年游資充斥，特别是有力量的大銀行手中出现过剩的存款。利息从1月以来異常低落，虽然在金融市場上发生剧烈的放款竞争，而情况未見好轉，并且汇兌行市激烈变动，使做生意的人陷于困境。

在这种蕭条过程中，希望把游資用在安全的对外投资上的大

^① 森恪(1882-1932)，当时任外务省(外交部)政务次官，勾結軍部推行侵略政策。——譯者

銀行提出了要求实施因信用危机而延緩下来的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主張。当时世界經濟还处于相对稳定的残局中，并自1925年前后起恢复活跃情况，1928年后美国竟高唱永远繁荣，真是过于狂热。人們感到禁止黄金出口似乎隔断了世界繁荣和国内經濟，連一直认为汇兌率下跌有利的蚕絲业也作出要求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決議。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也不利于日本的汇兌价格，这时中国已經大体上被蔣介石政权所統一，田中的帝国主义政策引起了全中国的抵制日貨运动，致使对中国的貿易显著减低，因此极其不得人心。

1929年7月，田中內閣以炸死張作霖案件为主因而下台，繼起的濱口^①民政党内閣担负着金融資本所付托的責任。在井上准之助就任大藏大臣的同时着手准备实施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井上长年担任日本銀行總裁或藏相，成为財政金融界的中心人物，对于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素来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他虽然是正統派財政家，但是这次所以成为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中心人物，却不是为了实现健全的財政，而是代表金融資本的意旨。政府于編制1929年度实行預算时力图实施緊縮財政和增加海外的黄金儲备，又在国内推行全国規模的消費節約和奖励儲蓄运动，并于1929年11月公布定于1930年1月11日实施解除黄金出口禁令。过去金融資本的主要力量鉴于日本經濟結構薄弱，一直对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一举心怀躊躇，但是經過10年来的慢性蕭条的經驗，深知如果不在世界經濟中进行“改善体质”，其壟断体系就沒有发展的希望。同时又表明壟断資本已經有了即使不靠通貨膨脹，也能依凭自己的力量在世界經濟中进行角逐的信心。

^① 濱口雄幸(1870—1930)为首的內閣。——譯者

三

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剧，以1929年10月美国股票惨跌为起点的大危机终于震撼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基础。这不止是在总危机的矛盾上发展起来的大危机，还以高度发展的壟断资本的錯綜复杂的矛盾为基础，又引起了世界规模的农业危机，遂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以后三年中陷入混乱的深渊。

危机从美国开始后不久就侵袭日本。首先是依靠美国的繁荣才勉强恢复的蚕絲业立刻墜入漩渦，絲价从1929年的平均数1,350日元起，1930年3月跌至1,058日元，4月后继续下跌，7月跌到600日元左右，9月跌到500日元左右，以后一直到1935年为止，价格几乎没有上漲。危机接着袭击棉业，棉紗价格从1929年9月的215日元72錢跌到1930年3月的168日元24錢，7月又跌到119日元35錢，而且棉紡織厂相继减少开工率和关闭。这时物价全面下跌，特别是国际商品普遍跌价。主要商品的跌价情形見第54表。

这次危机的特征是深刻和长期化。現将其过程簡述如次：危机于1930年1月已表現在生絲方面，3月以后迅速蔓延到全部商品，物价和股票价格开始惨跌，一直延續到7月。8月下旬后世界危机加剧，立刻就波及日本，在9月到10月之間，股票价格显著降低，黄金不断外流，从巨額債務起，到房租和賒欠的另售商品价款为止，一般都不能清偿。后来从12月到1931年7月曾暂时緩和，但自4月以来，美国股票危机再起，欧洲情勢也趋于恶化，虽然胡佛于6月倡导停付賠款和战債，而在中欧发生信用危机，9月間英国停止金本位制，这一切使世界危机更为深刻。在这种情勢下，日本物价和股票价格从8月前后起进一步下跌；銀根告紧；人們預料又会禁止黄金出口，爭购美元，致使黄金外流；倒閉的企业不計其数；对工

第54表 大經濟危机所造成的主要商品的价格变动

(单位: 日元)

	大阪棉紗先期货		横滨生絲先期货		大阪砂糖先期货		东京米先期货		物价指数 (日本 銀行制)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1928年3-7月	259.80	222.70	142.60	120.60	13.43	11.18	32.10	28.39	226.9
1929年 8月	220.50	211.70	131.60	125.90	12.63	11.75	27.57	26.30	213.4
1929年 11月	198.50	189.50	125.50	118.10	11.99	11.56	30.76	28.83	211.1
1930年 1月	193.00	185.70	118.00	112.20	11.60	10.98	28.10	27.25	201.4
3月	176.30	161.20	112.40	105.80	11.44	11.11	28.23	26.60	195.9
5月	162.90	148.00	103.50	88.20	11.18	10.51	28.29	26.40	189.4
7月	128.40	108.20	76.50	62.60	9.73	9.17	30.30	26.81	176.6
10月	125.30	118.00	62.90	56.10	8.40	7.84	18.64	14.00	161.6
1931年 1月	126.80	114.50	75.90	68.90	9.40	8.61	17.61	15.91	158.5
4月	135.00	121.10	66.50	58.50	9.28	8.95	19.84	18.13	157.9
7月	140.50	121.10	70.50	59.30	9.42	9.21	23.61	20.50	152.3
10月	107.90	92.80	59.80	56.60	7.80	7.40	20.19	18.35	146.9
12月	141.90	99.40	67.50	57.60	8.63	7.75	24.00	20.51	151.0

根据高桥龟吉:《大正昭和經濟变动史》(中), 1955年版, 1051页。

人的剝削加剧；农民和失业者的穷困則令人不忍卒睹。

在这种情势下，濱口雄幸首相于1930年11月被暗杀，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12月若槻內閣下台，由犬养政友会內閣^①继任，立即重新禁止黄金輸出。重禁黄金出口使日本汇兌行市一下子就跌了20%，因此股票价格和物价一时暴漲，但是危机并未終熄，1932年3月后生絲、棉紗价格再度慘跌，繼續入超，人們爭先拋出各种股票，而致出現低于再禁黄金出口以前的价格。5月发生五一五事件^②，犬养內閣下台，成立了斋藤內閣^③。危机于1932年6月达到最低点，从7月以后总算轉入蕭条阶段。

在这次危机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情况同美国不同，在这里并没有先出現一个活跃和繁荣的阶段，而是經由十年的慢性蕭条，然后出現深刻的危机。这就使日本在世界經濟中暴露其經濟結構的弱点，并說明这次危机不止是經濟周期的变动，而且震撼了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由于这次危机不是从繁荣阶段急轉直下的，所以物价的跌势不如1920年危机时期之猛，但因力能抗拒危机的資本积累的基础，除大財閥壟断資本以外，一般企业本已薄弱，所以危机的慘状非以前可比。就物价下跌來說，由于过去禁止黄金出口和通貨膨脹，物价在国际上偏高，要經由危机来改变，所以跌势是全面的和深刻的。如据东洋經濟新报社調查，以1913年为100的总物价指数，日本于1929年12月为159.6、1930年12月为126.7、1931年12月为86.5；而在同一期間，美国为122.5、100.5和81.7；英国

① 以犬养毅(1855—1932)为首的內閣。——譯者

② 1932年5月15日，一部分海軍青年軍官和陸軍士官学校学生以及右翼团体“愛乡塾”會員发动武装政变，他們襲击了首相官邸、政友会本部、日本銀行等处，打死犬养毅，但政变立即平息，軍部却乘此反对政党組閣，增强了政治上的发言权。——譯者

③ 以海軍大将斋藤实(1848—1936)为首的內閣。——譯者

为 130.2、101.3 和 67.3，可见日本物价的跌落是激烈的。

在这种情况下，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使日本经济直接与世界经济相联结，增加了物价下落的作用；又打开了黄金外流的途径，到 1930 年底为止，共计运出黄金 360,000,000 日元之多，对危机的加剧起了很大的作用。濱口内閣所以在要求重新禁止黄金出口的呼声逐渐提高时坚持解禁两年之久，是代表了金融资本的这种看法，即“如果不乘此机会毅然决然地调整经济，日本的产业就不行了”（池田成彬：《财界回顾》，1949 年版，152 页）。因此尽管危机继续进展，而政府不像过去危机时期那样立刻采取大规模的救济政策，让基础薄弱的企业在危机中淘汰，结果许多趋于没落，使危机更为深刻。

政府在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救济措施，是在 1930 年 3 月制定生丝价安定贷款补偿法，放出贷款 105,000,000 日元，以阻止生丝这一主要输出品的价格暴跌之势。在危机加深，企业情况恶化到严重程度的 1930 年 9 月，又以兴业银行为中心对指定的最危险的大企业投放救济贷款约 7 千万日元。但是这种救济措施，如以生丝为例，其重点是救济对制丝业进行贷款的银行。以兴业银行为中心的救济性贷款的对象则系大川、根津、松方等中级财阀，接着银行又在政府的奖励下推动联合贷放活动，结果加强了银行对产业的统治，使金融资本体系有进一步的发展。

政府对于危机的态度就是这样一贯的，结果财政寡头制在这个过程中显著进展。可是危机十分严重，关于产业活动的衰退情形见第 55 表。贸易数额，1930 年为 30 亿日元、1931 年为 24 亿日元、1932 年为 28 亿日元，同时国际收支日趋恶化。产业方面，钢铁、水泥、化学、纤维等部门的生产都显著低落，开工减缩率达到 40% 到 50% 之多。金融方面，因为刚在信用危机时经过调整，所以没有

发生大规模的危机。但因企业陷于困境，贷款难于收回，而致地方银行情况恶化。在1931年3月底时，全国774家普通银行中有40家歇业、18家停止业务，还有七、八十家处于开门休业和所谓睡眠状态。

第55表 大危机时期生产活动情况

	生产量指数(1913年=100)				企业活动指数		劳动人员 总指数 (1926年 =100)	库 存 物 指 数
	总平均	铁	煤	棉布	平均	铁 道 货 运		
1929年7月	360	230	156	356	104.2	103.0	91.4	89.9
1930年7月	306	147	147	280	90.5	87.9	80.5	69.0
1931年7月	263	120	158	296	85.6	76.5	74.5	55.1

根据高桥龟吉：《大正昭和經濟变动史》(中)，1140頁，原表载东洋經濟新报社：《經濟年鉴》，1933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危机对策着眼在适应产业合理化政策所导致的壟断体制的高度发展来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但是放在有利于壟断資本的生产关系改变上的力量比放在提高生产力上的力量多。在政府的指导下，实行了促进企业的合并与联合、裁汰中小企业、加强劳动統制、大批解雇工人、减低工資和在技术上增加机器运转速度等措施，特别致力于以調整过剩设备为主的强制性的企业統制，显著推进了資本集中。1931年又制定或修改了重要产业統制法、工业組合法和輸出組合法，在法律上确定了壟断資本的統制。在危机过程中，从海运、电力、輸出棉織品和磷肥起，将近50类产业組織了卡特尔，訂立了限制生产、議定价格等各种协定，东洋紡、松竹、京阪电气等大資本企业又进行大规模的合并活动，从而增强了財閥資本的統治。

危机誠然是影响了全部資本，但中小資本以下的阶层受害最惨。这一方面是由于卡特尔价格和非卡特尔价格的跌落之間有成

倍的距离，又因中小资本面临的信用紧缩和销路停滞情况更加严重，它们在资本积累上完全没有抵御的余力，又差不多得不到任何救济。结果到处出现工厂主夜间逃走和付不出工资的情况，特别以丝厂和煤矿为甚。据内务省调查，从1931年到1932年4月为止，有805家工厂付不出工资，受影响的职工总数达100,090人；在这些工厂中，据说有丝厂768家，其他部门37家。

没有达到中小企业程度的零星企业受害更加严重。据美浓部推计，1930年雇用职工不满5人的零星企业数，除土木建筑业以外，计有小工业1,375,000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95%，在这些零星企业里劳动的有2,441,000人，占工人总数的57%（美浓部亮吉：《解散财阀及其意义》，载《世界文化》，1946年5月号，33页）。这些企业业主是同中小企业业主范畴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大多受到贸易行和商业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统治，以小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的方式从事织物、铸物、玩具、家具及其他杂货的生产，而且多数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服务行业和小卖商也处于同样的境遇。举例来说，当时东京市内到浴池去洗澡的人减少一半、饮食店的营业减少四、五成、进当铺的人增加三成弱、当出的钱减少二成强，贖不起的东西增加三成强，在拿出来当的东西里面，甚至木匠和泥瓦匠使用的工具也大为增加。

危机还袭击了农业，使农业危机迅速加剧。茧价随着丝价惨跌而暴落，1929年春茧价格为7日元57钱，1930年跌到平均3日元75钱，在同时期内，夏秋茧由6日元53钱跌至2日元4钱，这使养蚕农户和中农大批没落。米价也波动起来，震撼了地主制的基础，并使壟断资本家同地主在输入殖民地米的问题上发生利害冲突。除危机的影响外，又加上1930年大丰收，结果米价从1月的26日元99钱降到12月的17日元77钱；经济作物也进一步迅速跌

价，旱地作物的价款甚至抵不上运费。1931年严重歉收，特别是东北地方出现饥荒状态，但米价继续下降，佃租和债务的负担使农村奄奄一息。农产物价格的跌势比工业商品大得多，农业工资跌到工业工资一半以下，农业以外的收入剧减，在危机的3年中，农村债务由40亿日元增加到60亿日元。这种情况意味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规模农耕制度下的农业已经成为工业发展的结构上的障碍物。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攻势，只有依靠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的支持，才能维持和扩大。失业者成群结队回农村，农业工人的低微工资影响城市工人的工资，把后者往下拉。这种情况又使农民的境遇更加恶化，为了争夺小小的土地，中小地主同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发生流血斗争；儿童缺乏食料和出卖女孩子成为经常发生的事；在大地主中，抛棄土地，想走资本家道路的人更为增加。

农业危机到1932年还没有终结。养蚕地区发生了不还债的群众运动，政府为了对付东北地方的严重歉收，不得不在一年里召开两次临时议会，用时局匡救费的名目，定出一笔连续支付三年的预算，共计6亿日元；又在1932年大规模地组织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和产业组合运动，来应付加剧的农业危机。但是所谓经济更生运动，只是借自力更生的名义，强迫农民从事更多的劳役和忍受更低的生活。产业组合运动促进农产物商品化的结果，不仅使贩卖和购买组织化，而且促使地主收回出租土地和自营农业，加深了壟断资本和地主的剥削。

最大的负担还是落在工人身上。无论在大企业或中小企业，从减低工资两三成到延付工资或付不出工资都成为普遍现象；失业者多达200万至250万人。政府从1931年起对有关的中央和地方经费给予补助，以举办失业救济事业，如道路、桥梁、港湾、河川

等修建工程。但是在这些事业中，不仅进行着极端的低工資和長時間劳动，而且一个人在四、五天里只有一次从事劳动的机会。

以上就是壟断資本为了使結構高度化而进行的“改善体质”工作的內容。階級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益趋激烈，勞資爭議次数逐年增加，东京市電車公司、钟淵紡織公司、洋毯公司、岸和田紡織公司、仓敷紡織公司、大島制鋼公司、地下铁道公司、通用机器公司、筑丰煤矿等企业都发生大規模的爭議，并扩展到一切产业。日本共产党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爆发的当天就发表反对声明，許多地方的人民在抗拒瘋狂鎮压的同时坚持了反战斗爭。佃农也在秋田县前田村、新潟县王蕃田村和山梨县奥野田村等处展开了爭取耕作权的深刻斗争。这时人民群众日益左傾，日本共产党的重建和其他活动最有进展，在工人、知識分子、兵士、学生、农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基。

2. 軍需通貨膨脹和准战时体系

—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从此日本就在15年内处于准战时和战时体制之下。同年12月若槻內閣下台，犬养內閣成立，当天即由藏相高桥是清經手实施再禁黄金出口，以后日本就停止金本位制，改用管理通貨制度。接着在1932年5月发生五一五事件，斋藤內閣成立，以后政党内閣衰灭，軍部的力量迅速成长，終于建立了天皇制法西斯体系。这些情况意味着日本資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已經达到不能听任資本主义規律发生作用的程度，而須由壟断資本同国家权力勾結起来，用暴力来打开僵局。这样壟断資本主义的危机就更为加深，走向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趨勢也从这时起

逐渐显著。

1932年6月，日本的危机已经达到最低点，而欧美各国的危机还在继续进行，它们的危机还要等到1933年中叶才大体告终。日本之所以比别的国家先转入萧条阶段，其主要原因，可以认为是在危机之前没有繁荣阶段，在第一次大战以来的危机和慢性萧条中即已进行了弱小资本的整理，垄断资本体系也有所发展，再经过大经济危机，就大体上恢复了常态。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人为的政策也发挥了效力。这样尽管以不正常的形态出现，日本总算在其他各国还苦于危机时走向复苏。

这时垄断资本在危机中进一步加强，它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具有的主导性质也更为明确。例如在1931年上期，地方银行陆续停业关闭，中小企业苦于资金周转不灵，而财阀大银行却在处理游资上感到困难，后来还有充分的资金来购买美元^①，这显示垄断资本已经达到比非垄断资本和与后者密切结合的地主更为优越的地位。但是这样成立起来的垄断体系，为了进行积累，还是要利用特别广泛的中小资本，虽然同它们常常发生对立，却依然要带着它们一起走。垄断资本为了维持其体系起见，又还须与地主制相结合，借它的力量来进行对工人的攻势、维持低微工资和处理失业问题。此后日本资本主义在世界上首先点起帝国主义战争的烽火，并在垄断资本处于优势地位的情形下加强狂暴的军事体系，也是以上述情况为根源的。

当时大经济危机虽已大体上达到最低点，但中小企业依然困苦，工人的境遇更加恶化，农业危机继续存在，阶级斗争则极为剧

^① 从1931年9月下旬起，三井、住友等财阀预料再禁黄金出口会引起日元汇兑价格跌落，就大量买进美元，犬养内閣成立后果然宣布禁止黄金出口，这些资本家因此获得巨利。——译者

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激使中国人民加紧进行抗日斗争，各国对日本的谴责也日益加甚，日本终于在1933年3月退出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资本主义所走的道路，就是采用更加强暴的手段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重整壟断体系。于是政党内閣被廢止，軍部和新官僚在政治上出头大肆活动，经济发展方面，則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把中心放在建立准备大战争的軍事结构上。当时重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所以为了建立軍事结构，首先要迅速打好以制造近代化兵器为目的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基础；为了促进其迅速发展，又必須采用推行通貨膨脹、开支浩繁的财政政策。

政府的軍事财政政策使公債发行額迅速增大，国債在1936年底超过100亿日元，大部分由日本銀行承购，造成跛行的通貨膨脹繁荣局面，并配合这种政策而改組了信用制度。为了应付由此发生的通貨膨脹恶化的局面，1932年修改了日本銀行制度，把保证准备金扩充到10亿日元，还从那年起实施日本銀行承购公債的制度；1935年又修改公司担保債券信托法，采用了公开抵押借款制，并加强兴业銀行的活动。这些“松弛政策”造成从未有过的低息，防止了局势的恶化。在国家財政中，軍事預算逐年增加，其趋势見第56表。特别是同民营企业关系密切的陆海軍軍备改善費在1931年到1935年之間增加到938,000,000日元。这笔龐大军費的用途，如以1936年为例，可以从第57表中看到。当然其中最大的部分流入壟断資本之手，另一部分則以訂购教育用品和把軍事經費分散到地方上去的名义，促使中小企业在壟断資本統治下重新編組。

壟断資本体系在其上述强行进展的过程中，为了輸入必要的資材原料，就致力于扩大原有的以輸出为目的的产业；为了确立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又必須防止有竞争关系的外国商品的輸入。并因具有禁止黄金出口所导致的低汇兌率这一强有力的武器，所以

第 56 表 九一八事变军事费支出的增加

年 度	项 目	一般会计岁出总额 (A) 百万日元	军 事 费 (B) 百万日元	B/A %
1930		1,557	442	28.4
1931		1,476	454	30.8
1932		1,950	686	35.2
1933		2,254	872	38.7
1934		2,163	941	43.5
1935		2,206	1,032	46.8
1936		2,282	1,078	47.2
1937		4,743	3,271	69.0

根据《日本兴业银行 50 年史》，263 页。

第 57 表 1936 年度军事费用的用途 (单位: 千日元)

军事费内容	陆 军 兵工厂	生 产 制 絨 所	陆 军 用 总 数	海 军 工 厂	海 军 火 药 厂	海 军 燃 料 厂	海 军 用 总 数	陆 海 军 用 总 数
用在官办工厂的 (A)	99,591	6,084	105,603	86,234	7,640	25,431	119,305	224,908
用在企业上的总 军事费(B)	—	—	229,669	—	—	—	459,336	689,005
用在民营企业的 (C)	—	—	124,066	—	—	—	340,031	464,097
官办工厂的原料 费(D)	30,216	2,908	33,124	85,442	4,372	13,425	103,239	136,363
用在民间的军事 费(C+D)	—	—	157,190	—	—	—	443,270	590,460

见《经济学者》，1936年5月1日号，34页，根据1936年度预算算出。表中(A)、(D)是从特别会计中摘出的、(B)是从陆海军预算中挑出来的用在企业上的军事费。

能够进行发展。

在实行再禁黄金出口的1932年12月，日元对美金的汇兑率由49美元又 $\frac{3}{8}$ 一下子降到34美元又 $\frac{1}{2}$ ，从此开始，1932年五一

五事件后繼續跌落，8月的最低数为21美元又 $\frac{3}{4}$ ，11月又暴跌到19美元又 $\frac{3}{4}$ 。政府于这次汇率低落时策划把对美汇兌率維持在20美元上下，1932年6月公布資本逃避防止法，1933年3月公布汇兌管理法，到了1933年下期以后，才稳定在二十八、九美元上下。

但是国内的物价和工資并没有随着汇兌率暴跌而增长，因此日本輸出品的国际价格显著低廉。如按美元物价指数来看，据东洋經濟新报社調查，日本商品价格在危机中的1931年9月时还是116.19，而在1932年12月降到66.9，以后虽然有些上漲，但是迄至1935年中期为止，經常停滞在100以下。結果輸出飞跃增加，从1931年的1,150,000,000日元起，1933年增至1,860,000,000日元，1934年2,170,000,000日元，1935年25亿日元，1936年2,690,000,000日元。汇率的低落又使輸入的外国商品价昂，因而提高对国内商品的需要，硫銨、輕金屬合金、汽車和产业机械等許多工业过去受到外国大資本竞争的阻害，不能在國內发展，这时才成为自立的产业。

这次禁止黄金出口和停止兌換黄金的情况同第一次大战后禁止黄金出口不同，而是在世界各国从金本位制改用管理通貨制时实行的，由于日本汇兌率的跌势比別的国家猛烈，对日本貿易起了有利的作用，所以能够获得上述成就。各国放棄金本位制，都是为了降低汇兌率，以便傾銷，因此破坏了世界市場上的自然的相互关系和統一性，朝向人为的貿易限制和經濟集团化轉变，而日本汇兌率的低落却能一面防止別国輸入，一面在世界市場的集团化中打破別国的妨害而扩大輸出。因此以英国为中心，各国都加紧进行排斥日貨运动，来抵制日本商品的輸出。1932年7月渥太华會議決定提高英帝国的关税；1933年4月印度发表廢除对日通商条約宣言，以后又差別性地提高关税，并采取限制輸入和实施輸入許可

制等办法，来防阻日本的輸出。日本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竞争，终于发展为武力侵略。

二

朝向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议会的地位衰落和軍部与新官僚的势力迅速伸展的过程中进行的，但是当时还没有达到急剧改組政府机构的地步。政府通过原有的机构制定财政膨胀和经济統制的法律来发挥指导作用，重要的法律，关于促进卡特尔方面，有重要产业統制法、工业組合法和輸出組合法，并修改了商法；企业方面，有日本銀行法、石油业法和汽車制造法等；貿易方面，有汇兌管理法和通商維護法；农业方面，修改了米谷統制法、米谷自治管理法和产业組合法。国家資本对这一发展的积极参加則表现在这些事实上：即加强日本銀行、兴业銀行和产业組合中央金庫等机构，以增强金融方面的官僚統制、发展与充实国有铁道、朝鮮铁道和中国东北的铁道以及建立日本铁道公司、南滿铁道公司、东北振兴电力公司和帝国燃料公司等半官半民的托辣斯組織。

在这个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是經常同軍事上的需要相結合。第58表显示了国有铁道和其他铁道的发展情形，而其中心在于国内动员和对苏战争的战略配置。从这点出发，完成了日本和朝鮮的日本海沿岸路綫，修通了上越、高山、伯备和姬津等路綫，建成了三吳綫，还进行了清水隧道、丹那隧道等大工程。同时又筑成与朝鮮的雄基、罗津、清津等港相对峙的伏木和新潟港。特别是南滿铁道公司的发展十分显著，它接收了让給日本的中东铁道、完成了吉会铁道，并在中国东北北部和热河大事修建铁道。南滿铁道公司不仅一手經办上述工作，同时又是根据“滿洲”的五年計划开始建立軍事基地的中心力量，因此在1933年把資本增加到8亿日元之

互,負責兴办鋼铁、人造石油、电气、制鋁、化学、铁道、移民等軍事企业,形成壟断性的国家康采恩。以后全东北的铁道都委托滿铁經營,滿铁的资金大部分固定在铁道事业上,致使兴办重工业感到困难,这个責任就在七七事变后由鮎川的滿洲重工业公司担負起来。但是滿铁的重要性以后毫未减少,而且进而指导中国其他地区的铁道經營。

第 58 表 九一八事变前后铁道的发展

年 度	營 业 綫 (公 里)	客 运 (百万人公里)	貨 运 (百万吨公里)
1928	14,347	21,583	12,770
1931	15,310	19,122	10,601
1934	18,366	22,572	13,347
1937	17,934	29,216	18,254

根据《日本經濟統計集》。人公里和吨公里是通过車站之間的旅客人数和貨物吨数乘車站之間的距离(公里)的得数。

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龐大財政资金的散布和日本銀行控制力的加强,在这个基础上,以兴业銀行为首的特殊銀行和財閥系統的大銀行有了进一步发展。兴銀从大經濟危机以来即已积极参加推行債券的工作,在 1936 年的有担保公司债券全国总额 1,704,000,000 日元中,兴銀单独承銷的有 601,000,000 日元,兴銀和其他銀行联合承銷的有 117,000,000 日元,特别是成为供应大陆政策所需資金的中心机构,占居对企业投資的主要地位。財閥系統的大銀行也有所发展,由于政府放出的巨額資金集中于这些大銀行,增强了它們对产业的控制力量,就使金融資本的霸权更加确立。这时金融力量集中五大銀行的情形見第 59 表,五大銀行或加上三和銀行后的六大銀行控制了全国銀行的半数。它們不止致力于銀行資本的集中,而且同国家相勾結,形成軍事侵略的基础,这

就是这个时期的特征。关于银行的集中情形，根据银行法所进行的银行合并于1933年底结束，1933年后实行扶植军需产业和保障承销公债，又有力地促进了地域性的银行合并。在1936年到1937年之间，从兵库的神户银行开始，京都、栃木、富山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合并。劝业银行也在这个时期合并了十几家农业银行。

第59表 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集中情形

		5大銀行 (百万日元)	全国普通銀行 (百万日元)	5大銀行所占比率 %
1927年 11月	存款	2,817	9,027	31.21
	貸出款項	1,954	8,181	23.89
	有价証券	999	2,591	38.59
1931年 6月	存款	3,310	8,650	38.28
	貸出款項	1,940	6,562	29.56
	有价証券	1,377	3,133	43.97
1935年 12月	存款	4,215	9,874	42.79
	貸出款項	2,295	6,121	37.49
	有价証券	1,845	4,222	43.70

根据大内兵卫：《日本财政論——公債篇》，1932年版和1936年4月18日《东洋經濟新报》編制。

资本主义虽然依靠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加强而有所进展，但是原有的以半封建的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反因壟断资本力图凭借其结构的特质来摆脱经济危机和加强自己的体系而在这过程中加紧控制中小资本和加强剥削工人，并加深他们的贫困。同时被壟断资本集中地轉嫁損失的农村的情况也未見改善，农业危机一直拖到1935年，农民的地位更加恶化。

但是在军需通货膨胀急剧进行时，资本不平衡发展的情形更为增加，结果产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显著的变化。固然为了

輸入日益增加的大量軍需原料和資材，从依靠輸出在海外获得資金的必要上来看，作为輸出产业的輕工业在这个时期的意义还是大的，加之国内市場狹隘，亟需获取輕工业品的海外市場，因而加强了依凭战争来进行擴張的动机。但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結果如以消費資料生产部門的主导力量棉紡业的产值和足以代表生产資料生产部門的金属工业和机械工业的产值合計数相比較，1931年为19亿日元对9亿日元，1935年为3,350,000,000日元对3,340,000,000日元，1936年后就出現同过去相反的关系，其內容見第60表。但如此表所示，同生产量的增加相較，繳納資本的增加額却要少些，其原因是生产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消除了过去的設備开工率減縮或停歇現象，各产业极力避免投資于固定資產；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增加劳动强度和利用分包工厂上。与这同时，大工厂有了显著发展，这里以合理化为名而实行的剝削相对剩余价值的办法最为盛行。

这次提高产业結構的工作当然是以提高資本的生产力基础为目的而进行的。因为在第一次大战以后，特別在經過解除禁金出口后的大危机期間，壟断資本把提高体系的重点放在促使投入世界市場竞争的第一部类自立上，經常致力于提高生产力的基础。濱口內閣发动产业合理化运动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这一运动同旨在摆脱大經濟危机的生产限制相結合，只有能够廢棄残余的低旧技术的壟断資本和国家資本才能由此获利。依凭这一运动，壟断資本在依靠低工資和加强劳动来增加絕對剩余价值的同时极力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又用国产机器来代替輸入机器，以节省固定投資，并任意增加机器的運轉速度，使劳动强度更为提高。到了这个时期，紡織机器、化学机器、矿山机器等多数产业机器制造工业才自立起来，产业之間的联系也有所增进，这种情况具有极重大的

第 60 表 九一八事变后产业的发展

产业 部門	年度	全 体					使用 500 人以上的工厂			
		产量 (百万 日元)	繳納 資本 (百万 日元)	工厂数	工人数 (千人)	开工电 机实际 馬力数 (千 馬力)	产量 (百万 日元)	工厂数	工人数 (千人)	开工电 机实际 馬力数 (千 馬力)
棉紡	1931	1,927	768	20,965	899	805	831	322	305	525
	1935	3,353	866	25,562	1,007	872	1,665	346	352	570
金屬	1931	431	268	4,133	84	292	139	15	16	129
	1935	1,882	694	7,318	218	846	1,108	46	76	625
机器 工具	1931	493	459	5,850	153	505	196	44	57	355
	1935	1,463	735	10,352	367	483	779	98	156	346
窑业	1931	145	189	3,167	57	300	25	6	5	129
	1935	283	245	3,896	93	317	33	13	11	115
化学	1931	817	662	3,389	122	611	165	25	30	240
	1935	1,814	1,014	4,644	229	982	578	59	93	496
食品	1931	838	466	12,567	134	152	24	4	2	3
	1935	1,168	521	13,684	158	171	43	4	5	9
总数	1931	5,174	5,201	64,436	1,662	2,940	1,420	424	428	1,394
	1935	10,837	6,704	85,174	2,369	4,038	4,284	580	709	2,083

根据《工厂统计表》和《公司统计表》。但是关于繳納資本的数字，由于手头的资料关系，只好用 1932 年来代替 1931 年。在金屬与化学等方面，则从 1934 年起，八幡制铁所因日本制铁公司成立而载入《工厂统计表》。就这两点来说，这个表在对比上是不完整的。

意义。

但是当时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是依靠军事性质的国家保护来促进的，因此确有进展的，只限于由国家保障特别高的利潤的部門，或者是不需高度技术，能够使用原有的低微技术结构来进行大量生产的部門。結果并没有提高生产力基础，却还是利用旧的关系；合理化运动也以对工人实行所谓“严密防范統轄”（山田：《日本資本

主义分析》，168頁）那种增加劳动强度的措施为中心。又如宇佐美所指出的，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方面，并不是經營合理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只是增加产量，因此并不去排除潜在于企业本身中的价值規律起作用以前的生产关系和商业与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关系，却尽量加以利用。“結果重工业的发展本身，是經由利用旧有的把头身分关系的劳动組織来扩大包工、再包工的系統和改組与加强对中小工业的批发行式的控制而进行的，因此只是在上面和在形式上实现了产业結構的高度化”（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危机中日本資本主义的結構》，1951年版，137頁）。

三

日本資本主义从大經濟危机发生到七七事变前夕为止的进展情形，如从經濟周期的变动来看，可閱第61表。如这个表所示，鋼材和电气銅等与軍需有关的物品和棉布等与輸出有关的物品早在1933年初就已經恢复原有价格，以后也能繼續維持。可是生絲于1932年下期一度高漲后再度下跌；米、煤則于1934年底至1935年初之間恢复原来的价格。

各种商品的价格变动这样不平衡，是由于市場条件同以前显著不同。由于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进展和管理通貨制的实施，使世界市場的体系发生变化，大經濟危机又破坏了旧的市場关系和信用关系，因此資本主义各国就在这个新的基础上进行竞争。

首先，在这个期間，鋼铁被当作生产資料和兵器的基本資材而受到强力扶植，其发展情形見第62表。这次鋼铁生产量的增加提高了国内自給率，1934年生铁自給率为76%，鋼材自給率为101%，1935年分別增至69%和105%，可見鋼材已經确能自給了。政府

第 61 表 1932 年到 1936 年物价的变动

	日本 銀行 物价 指数	先期米 月平均 价格 (日元)	月底小 麦价 (日元)	先期生 絲月平 均价格 (日元)	先期棉 花月平 均价格 (日元)	先期棉 紗月平 均价格 (日元)	直徑 5 分的圓 鋼月底 价 (日元)	电解銅 月底价 (日元)	煤 (九州) 月底价 (日元)
1931年10月至 11月最低	146.9	18.35	3.90	566.0	20.15	92.80	5.70	46.00	13.50
1932年1月至 2月最高	161.4	27.00	5.70	719.0	39.85	163.90	6.20	63.00	14.00
1932年3月至 5月最低	150.3	21.95	5.20	439.0	29.75	124.60	5.85	54.40	14.00
1932年7月	147.7	23.20	5.50	518.0	34.63	135.34	5.50	57.00	13.80
11月	177.3	23.17	7.00	930.0	53.76	196.88	9.00	82.00	13.80
1933年3月	177.4	23.87	6.55	660.0	50.88	178.49	11.30	74.00	14.30
1933年7月	182.1	23.18	6.45	893.0	58.61	198.13	9.50	86.00	14.30
11月	178.7	24.51	6.30	590.0	52.14	202.91	9.10	82.00	15.30
1934年3月	176.9	24.28	6.55	575.0	62.38	198.44	8.80	77.00	15.50
7月	174.1	26.84	6.25	481.0	66.44	214.10	9.70	72.00	15.50
1934年11月	181.1	30.63	8.20	564.0	66.80	202.65	11.00	70.50	15.50
1935年3月	183.5	29.80	7.10	589.0	63.97	208.81	10.30	73.60	17.00
7月	180.2	30.37	6.55	601.0	60.80	202.34	8.10	76.00	17.00
11月	193.6	31.62	8.30	916.5	63.47	206.76	8.30	85.00	17.00
1936年3月	190.7	31.61	8.30	731.0	59.67	191.48	9.70	85.50	17.00
7月	197.4	33.55	9.25	720.0	64.83	204.51	9.40	86.70	17.00

根据高桥龟吉：《大正昭和經濟变动史》，(下卷)，1955年版，1654頁。

根据 1935 年制定的日本制铁法，以八幡制铁所为中心，并在釜石和輪西(三井)、兼二浦(三菱)、富士(濠澤)、九铁(安川)等公司的参加下，为着推行钢铁联合作业和加强国家統制，成立了日本制铁托辣斯，这就成为此次发展的基础。又在并入日铁时，曾把属于財閥的工厂設備的价格多評了五成到十成，俾使財閥从中获利。此后集中于日铁的生产量所占生产总额的比率，生铁为 96%、鋼块为 53%、鋼材为 44%。但是产量增加的原因在于九一八事变后軍

第 62 表 九一八事变后钢铁工业的发展 (单位: 千吨)

年 度	生 铁		鋼 材	
	总 額	日铁(八幡)	总 額	日铁(八幡)
1931	917.3	840.5	1,862.8	591.6
1935	2,110.9	2,001.0	3,863.5	1,620.9

根据《制铁事业参考資料》和《日本制铁参考資料》。

事訂貨增加和 1932 年大量提高生铁关税所造成的鋼铁市价之迅速回升, 所以尽管政府采取日铁中心主义的鋼铁政策, 而在鋼材方面, 日本鋼管等日铁以外的强大公司还是与它进行竞争。

这些鋼材的原料多半依靠輸入的生铁和廢铁, 就其数量来说, 1931 年生铁为 98 万吨、廢铁为 105 万吨, 1935 年分别增至 208 万吨和 298 万吨, 特别是大部分廢铁依靠从美国輸入。大量依靠廢铁的原因是鋼铁工业的資本有机构成高和原料費用占得多, 而致使用廢铁比使用生铁远为有利。如据丰崎計算, 1931 年使用廢铁制煉鋼块的成本为每吨 40 日元 50 錢, 而混合使用廢铁和矿石制煉的成本为 48 日元另 3 錢(丰崎稔:《日本机械工业的基本构造》, 1941 年版, 346 頁)。但是对鋼铁的需要由于軍事上的必要而有进一步的增加, 致使生铁輸入趋于增大, 加之中国东北生铁的輸入量因昭和制鋼(鞍山)建立平炉、开始鋼铁联合作业而逐年减少, 所以曾在大經濟危机中一度减少的印度生铁輸入再度迅速增加, 因此有必要来放棄日铁中心主义, 而致力于建立生铁自給制度。于是在 1936 年全面許可日铁以外的鋼铁厂建立高炉, 1937 年制定制铁事业法, 以图克服铁、鋼生产的不平衡状况。但是并没有达到铁、鋼生产平行发展的目的, 还是依靠廢铁来煉鋼。

在这个期間, 由于合金铁和特殊鋼等的发展和需要的增加, 增

設了很多生产軍需高級鋼的电炉；同时完全杜絕了錳矿、硅铁和鉻铁等的輸入；又在馬口铁板、鋼管和铁軌材料等方面确实实现自給。八幡首先建立1千吨的炉子，接着广畑也开始建筑，并經由鋼铁联合作业而实施技术上的合理化。例如八幡生产1吨鋼材所用的煤，1923年为3.7吨，1933年激減至1.58吨。但是这一发展依然是建立在低工資和高热、重体力劳动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动强度和工伤事故率。例如八幡的工伤事故情况，1931年死伤10,471人，其中死亡者17人，工伤事故率为万分之14.8，1933年增加到死伤17,230人，其中死亡者29人，工伤事故率則为万分之16.6（日铁八幡制作所：《八幡制作所劳动情况調查》，載《社会政策时报》，1936年10月号，337頁）。

鋼铁工业的这种发展促使以鋼铁生产为中心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地区形成，增进了产业之間的联系，从而增加其軍事意义。圍繞着八幡的九州北部重工业、化学工业地区，以八幡制铁所这一占地100万坪的大型鋼铁和化学联合企业为中心，对面是日本最大的軍事工厂——小仓陸軍工厂，周圍是东海鋼业、国产工业等鋼厂和三菱重工业、淺野重工业、戶畑鑄物、神戶制鋼、淺野水泥、旭玻璃等大工厂，还拥有筑丰大煤田，又与宇部、德山的山口地区相連接，依凭剝削福岡、熊本、大分等县的为穷苦所迫而出来找活干的工人和朝鮮工人而发展，并凭临中国、南洋的原料地带和中国东北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作战地带，成为集中使用煤、铁的軍事工业的結合地点。与原有的与阪神地区相連接的广畑，在鶴見，川崎地区的日鋼和淺野以及連接鞍山、本溪湖和撫順，在其間建立工厂的奉天铁西地区也出現同样的发展。

其次讓我們来考察同鋼铁工业并駕齐驅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业——动力工业。这些部門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情况見第63表。如

第 63 表 20 世紀 30 年代动力工业的发展

年 度	煤		石 油		电 力	
	生产量 (千吨)	輸入量 (千吨)	生产量 (千吨)	輸入量 (千吨)	发电厂发 出电力 (千瓩)	其中水力 (千瓩)
1931	24,519	2,593	21,444	34,538	4,657	3,057
1935	23,753	4,049	38,528	57,344	5,758	3,383
1936	35,524	4,188	46,292	59,243	6,543	3,726

根据《煤矿时报》、《内外石油统计》、《电气事业要览》编制。

此表所示，各部門的供应量都显著增加。

煤产量从昭和初期以来即已过剩，由于大經濟危机而跌落的价格，迄至 1933 年初还差不多全未恢复。在这种情况下，煤矿资本家极力增加劳动强度和实施合理化，以图减低采煤成本，并实行集中采掘、采用单井长壁法和推广电钻。結果从 1926 年到 1933 年，工人数由 235,000 人减至 138,000 人，而每人采煤量则由 123.2 吨增至 226.5 吨。但是煤价还是没有恢复，加之同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有关系的南满铁道把撫順煤輸入日本，更使財閥系統的煤矿和中小煤矿之間的斗争于危机中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1932 年 11 月設立了采取公司組織的卡特尔——昭和煤业，其目的在于分配販卖額和調整竞争；从 1934 年下期起，又由中小煤矿方面的协商組織（互助会）同大煤矿方面（煤矿业联合会）訂立关于供煤量的协定，于是在煤业界才出現具有全面拘束力的卡特尔，并且还带有軍事統制意义。

从 1933 年前后起，对煤的需要随着經濟情况好轉而上升，化学、煤气、鋼铁、电力等工业的煤需要量成倍增加，价格也迅速恢复，因此从 1936 年起生产也相应增加。但是这次增产的主要途徑是增加劳动强度，如提高开工率、扩大包掘矿井面积和提高突击生

产率等，而劳动生产率从1933年起并未提高，反而逐年减少，如1938年的每人采掘量即为184.7吨。以后这种情况在战时和战后都没有改变。

电力也在昭和初年生产过剩，经过大经济危机的过程后，五大电力公司继续进行争霸战。电力企业深受由于再禁黄金出口而增加的外债压力之苦，成绩显著低下。在这种情况下，经由政府与大银行的斡旋，五大电力公司于1932年4月成立了电力联盟。这时从干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起，到过问企业的内容为止，大银行的代表都有强大的发言权，统制也加强了。

1933年前后起，从钢铁、化学等工业开始，各方面对电力的需要迅速增加。当时输电系统还有很多是重复的，流水式的水力发电装置受到水位低落的限制，加之电机工业尚未成熟，所以发展是有限的。为了打破这些限制，并适应战时体制起见，早在1936年就把电力国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同时又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策划电力的一元统制，着手实施或完成以长津江、宁越、鸭绿江、松花江等为中心的规划。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时起开始建设大规模的发电厂，如尼崎关西共同火力（14万千瓦）、赴战江（19万千瓦）、长津江（25万千瓦）等。电机工业方面，也曾致力于提高三相诱导小型电动机的效率与可靠程度和推行单独运转，电力作为工业动力的地位就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这个时期的重要事件是石油工业开始成为重要动力工业。石油从明治中叶起被用来点灯，这种需要因电灯普及而低落，但从昭和初年起被用为交通工具的动力，特别是由于用在军需上而增加了重要性。先就重油的用途来说，第一次大战后轮船用的内燃机（使用重油）发展，这种机件从中型船逐渐推广到大型船，并因渔船的内燃机化而更为普及，军需方面，则有潜水艇使用，这就增加了

重油的重要性；又除潜水艇外，海軍的全部舰艇虽然不用內燃机，而是用蒸汽透平机，但是所用燃料并不是煤，而自第一次大战期間起全部改用重油。其次，对汽油的需要由于昭和年代后汽車迅速发展而增加，更因飞机发展而增大了必要性，从而迅速成为軍事上难以代替的重要物資。

在明治年間，国产油是石油生产的主要原料，但自第一次大战后主要地依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原油，因此在太平洋岸陸續建立精炼工厂。同时又輸入外国炼制的石油，从昭和年代起，日本石油、小仓石油、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美孚和萊金克賽等公司进行了激烈竞争，致使石油价格下跌和外国石油横行国内市場。1932年8月上述六家公司訂立协定，实行限制贩卖，价格也有所上漲，但松方于1933年輸入巴庫油，竞争重复加剧。为了对付这种情勢，政府于1934年制定石油业法，实施軍事統制，把輸入石油的半数貯藏起来，并采用輸入业和精炼业許可制，强力保护国内企业；又于1936年成立石油联合贩卖公司。但是加强軍事統制还是不能消除石油资源的不足，所以在技术上采用了提炼人造石油的对策，可是这个問題后来竟发展为扩大战争的最大原因。

四

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这个时期飞跃发展。先看机械工业，其进展情形見第64表。机械工业的发展首先是依靠軍需，其技术基础也在軍事当局的指导和保护下有所提高。但也不止是軍需工业，为了发展軍需工业，还必须全面发展机械工业，因此随着軍需的增大，供应一般民需的电机、紡机、化学、机械等工业也有发展。可是在这个部門中，原来在軍部或国家統轄下的工厂和铁道工厂以及大財閥控制的造船厂和电机工厂等大企业同一般小企业之間

存在着极不平衡的状态，这一工业的跃进就是以这种情况为基础进行的，因此获得发展的主要的是军部统辖的和大财阀控制的大工厂。但因这些大工厂的发展也多半在非再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它们考虑到将来军事订货或有断绝之虞，都尽量避免机械制品的专业化，并大量利用分包工厂，因此中小机械工厂大量发生，参加了机械工业的行列。

第 64 表 20 世纪 30 年代机械工业的跃进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工作母机	蒸汽发动机	电动机	汽 车	船 舶	織 机
1930	4,103	29,268	14,758	38,530	95,630	6,431
1931	3,137	20,195	10,326	34,676	27,545	5,188
1932	7,162	22,605	9,797	30,977	44,202	5,864
1933	14,015	26,207	21,485	47,183	37,209	8,532
1934	22,144	27,624	34,750	85,064	47,679	15,449
1935	28,223	40,473	43,405	82,708	81,733	13,744
1936	33,539	42,547	45,024	100,342	94,087	14,118
1937	69,615	54,711	50,749	146,712	200,146	19,200

根据《日本经济统计表》。

如就这个时期内最发展的汽车工业来看，由造船公司等 20 世纪 20 年代创办的汽车制造业，由于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制品侵入而差不多完全失败。到了 30 年代，才算是建立了大量生产体系和打好了企业基础。1933 年石川岛和达得公司联合组成汽车工业公司，这个公司又在 1937 年联合东京瓦斯电气公司组织东京汽车工业公司；1934 年日产汽车公司从户畑铸物公司分立出来；1937 年又成立丰田汽车公司，它们都采用大量生产方式。汽车工业的这一发展，首先是依靠军部带头加强抵制外国汽车；又得益于 1936 年汽车制造事业法所规定的这些办法，即对企业采取政府许可制；

并以借款方式把龐大的政府有关資金注入这些企业，充实它們的資金基础。但是这样強力培植起来的国产汽車工业最为广泛地利用了分包制度，它們的制品后来在大陆上老出故障，这是直接有关的軍部所承认的。

同样的情况又可以从在这个时期內以軍用飞机为中心而开始生产的飞机工业中看到。三菱重工业、川崎和中島等公司早就着手制造飞机。海軍于1932年開設飞机厂，自行設計。此外軍方又奖励国产飞机，把全部制造业务委交民营公司，以图加以培植。但是当时的产量还是微不足道的。差不多占全部产量30%的三菱重工业在1933年度也只生产191架，卖出制品的价額只有1,300万日元。

在各种机械工业部門中，大工厂的技术水平也在这个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如在工作母机方面，1932年已开始制造H型池貝式超高速車床，同时扩大制造和使用以主軸每分钟旋轉750次为指标的高級工作母机，并以錳碳与鈷的合金为指标而进行制造兵器所需特殊鋼車刀。电机方面，則提高了小型电动机的工效和可靠程度，从而普及了单独運轉；又开始生产大型水輪发电机，并制造5万到10万馬力的大型法兰西斯水輪机。但如与外国机械工业相較，就可以知道这种发展还是低微的，特别是显示基本技术的工作母机最为落后。試将日本和外国的工作母机相比較，罗威公司的車床，床面以上的摆度为400耗，主軸旋轉数为每分钟235到3,750次；最小移动范圍为0.01耗；而日本最高水平的池貝H型車床，床面以上的摆度为360耗，主軸旋轉数为每分钟124到1,500次，最小移动范圍为0.03到0.9耗，在精度上有显著的差別（佐藤和夫：《最近日本工作母机的发展》，載《唯物論研究》，1937年7月号，77頁）。而且机械工业中技术上有进展的只是拥有外国制造的机械設備的企业，一般企业的設備很不一致，并在資材上受到限制，精

密度还是很差。大工厂也多半依靠增加劳动强度来提高技术，例如吴港工厂采用标准作业制，把安装車刀作业从 0.853 分縮小到 0.472 分；铁道省大宫工厂也把小炎管再用作业从 1.19 分减少到 0.84 分（日本工业协会：《作业研究》，1936 年，61 頁起）。

由于这方面还是經由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時間来提高生产力，所以这个时期的特征是“职工每人每年劳动時間增加，而工資减少”（丰崎：《日本机械工业的基本构造》，151 頁）。大机械厂又广泛利用分包工厂来生产配件，并于 1937 年修改工业組合法，采用强制設立制，以加强对分包工厂的統制；分包工厂又进行轉包，一直动員到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业。因此机械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把重点放在机械的量上，而不是质上，而且确实缺乏必要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員。机械工业使用了大量从农村里出来找活干的不熟练工人和临时工、女工等，以致在使用精密度高的机械上感到困难，还到处可以看到在相当大的工厂中使用万能工作母机来从事一般作业的情况。

机械工业以軍事訂貨为中心而发展的情形显著促进了相应的工业地区的建設，又建立了无产階級团結的基础。典型的例子是名古屋。这里以名古屋兵工厂为中心，它和三菱重工业、爱知钟表相比邻，又与丰田汽車相連接，周圍还有无数的中小工厂，实以兵工厂为中心而集中了产业动員的能力。至于当时无产階級的团結，則因受到鎮压的影响，还没有发展成为主导力量，但是已經从那时起打好客观的基础。

其次，化学工业在第一次大战后依靠过剩电力而建立发展的基础，但因受到外国資本以及同它們在商业利益上有勾結的財閥商务部門的打击，而致长期陷于困境。可是化学工业作为生产炸药和毒气的部門，在軍事上有自立的必要，因此就在軍部的指导下

策划发展，并以再禁黄金出口和設定高关税率为契机而迅速实现（見第 65 表）。

第 65 表 20 世紀 30 年代化学工业的发展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总 产 值	碱 灰	矿物物质 与配合肥料	硫 铵	合成染料	橡 胶
1931	816,559	8,109	123,524	25,317	10,220	68,647
1935	1,813,878	48,718	254,170	56,760	57,738	136,787

根据《工厂統計表》編制。

在化学工业中，最重要的是以硫酸这一化学工业的关键性資材为主要原料的化学肥料工业。这方面的主要部門是过磷酸和硫铵制造业。过磷酸于战后长期不振，1931 年在政府干与下成立磷酸肥料工业組合后竞争还是激烈，也沒有摆脱困境。这是由于这个工业只須将磷矿石的粉末在硫酸中分解处理，設備費便宜，而問題重点在于各公司在农村中的銷售能力。但因共需用硫酸，所以大日本人造肥料和住友化学等公司就同政府勾結起来，逐渐施加压力和加强統制，到了 1936 年以后才算是摆脱了生产过剩。

迄至 1930 年藤原和包休締結秘密协定^①，体现着財閥的商业部門同外国資本互相勾結为止，硫铵工业一直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个协定由于遭到希望新兴資本家和硫铵工业自立的軍部反对而廢止，再經過 1931 年制定硫铵輸出入許可規則和 1932 年成立硫铵配給組合，又因日元价格的暴跌使国产硫铵比輸入硫铵便宜，这个工业就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曾用电解法生产合

① 日本硫铵卡特尔代表藤原銀次郎同掌握世界硫铵生产能力 80% 的国际卡特尔代表海門·包休簽定的协定，規定日本不輸出硫铵和輸入硫铵的數額与价格，并規定由三井、三菱經办此項輸入。——譯者

成铵的日本氮气和昭和电工公司以延岡、川崎等处的主要工厂为中心,利用电力来扩充多种经营,建立了新兴康采恩的基础。特别是日本氮气在朝鲜兴南建立的朝鲜氮气是规模达到世界水平的电气化学联合企业。它拥有运用赴战江和长津江的巨大发电量、占地100万坪、年产量达50万吨、在世界位列第五的硫酸工厂;还依凭壟断使用咸北的煤、金华的硫化铁和朝鲜北部的鳧油的特权,并利用各种廢品,实行化学上的綜合制造,計自硫酸、碳化鈣、硫酸起,到鎂、甘油、鋁以至于調味品止,一共制造十余种产品。

財閥資本也从这时起开始经营硫酸生产,住友化学、东洋高压和三菱化成分别于1931年、1933年和1936年創立,它們利用煤和焦炭来生产合成铵,即采用煤气法。这是因为电力国营的声浪很高,又加强了对电力的統制,使电解法的好处消失,所以財閥企业改用煤气法,后来还依凭这项措施来建立煤炭化学联合企业的基础。

苛性碱是同硫酸一样重要的化学工业的关键性資材。这个工业也在大战后长期陷于不振,从1932年前后起,才依凭人造絲业的飞跃发展和汇兌与关税政策而迅速发展。但是因为发展太快,不久就生产过剩,加上英国实行傾銷,竟于1936年发生卖不出成本的情况。为此在那年經由碱业悬談会和輸出悬談会而組成卡特尔,其中的主力是使用电解法的日本制碱公司、使用铵制法的日本制碱工业公司(德山制碱)和旭玻璃等公司。特别是日本制碱公司同軍部勾結,又得到兴业銀行的援助,就作为以电力为中心的新兴康采恩,在当时迅速发展。

其他重要化学工业是制造毒气需用的、因而占有特殊地位的合成染料工业。这个工业在再禁黄金出口以后长期受到政府保护,总算在当时确立,其中心为后来归并于住友化学的日本染料公司。用作火药原料、軍事上很重要的甘油工业也随着扩軍繁荣而

跃进，其代表为日本油脂公司(日产系)。此外同化学工业关系密切的造纸业也在这个时期显示跃进。在这个部门中，王子造纸公司于1933年合并樺工、富士两公司，建立了资金130,000,000(后来增加到3亿日元)的日本最大的托辣斯。

化学工业的技术也随着发展。这个部门的技术多半以输入或模仿外国的为基础，因此自始就被大资本家控制，财阀以外的野口(日本氮气)、森(昭和电工)、中野(日本制碱)等资本家比财阀先跨进这个领域，他们大多与军部紧密勾结，迅速进行扩充，由于这些人活跃非常，所以当时被称为新兴康采恩。但是一旦财阀资本也伸入这些部门，则除日本氮气外大多不能维持，只好在财阀前屈膝。那时日本化学工业的生产效能同外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化学机械被外国专利品所压倒，没有什么独创的东西；在1936至1937年后才提出化学同机械相结合的主张，因而造出许多经济上不合理的机械，对于热能反应的研究更是特别落后。由于财阀是在化学工业大体上确立基础以后才插足于这个部门的，所以能够采用更新锐的技术，加上资本强大，就占居了有利地位。此外资本家对于化学工业中防治有毒的气体和排水等办法采取轻视态度，听任工人遭受牺牲。

五

日本输出因汇率低落而增加，并依靠这点来确保发展军需产业所需原料、资材的输入，已如前述。这个时期的主要贸易情形见第66表的(1)、(2)、(3)、(4)表。

如第66表所示，同过去相比，日本的贸易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输出方面，生丝在1934年后丧失了长期占据的首位，被棉织品代替，同时人造丝织品、杂货和机械类迅

第 66 表 (1) 20 世纪 30 年代主要商品輸出表

(单位: 千日元)

年度	总 額	生 絲	棉織品	絲織品	人造絲 織 品	杂 貨	机械类
1930	1,469,852	416,647	272,117	65,775	34,935	85,098	13,956
1931	1,146,981	355,394	198,732	43,053	33,713	66,455	13,641
1932	1,409,992	382,366	288,713	50,288	60,540	89,710	10,943
1933	1,861,046	390,901	383,215	63,545	77,382	141,173	25,857
1934	2,171,925	286,793	492,351	77,487	113,484	165,273	57,777
1935	2,499,073	387,032	496,097	77,444	126,260	144,103	63,856
1936	2,692,976	392,809	483,591	68,027	149,170	161,768	82,054
1937	3,175,418	407,118	573,065	72,286	154,860	203,675	109,881

根据《日本貿易精覽》和东洋經濟新报社:《經濟年鑑》1935 年版和 1938 年版。

第 66 表 (2) 20 世纪 30 年代主要商品輸入表

(单位: 千日元)

年度	总 額	矿 油	皮 棉	羊 毛	铁 类	机械类	豆 餅
1930	1,546,071	89,567	361,715	73,610	93,608	85,714	66,417
1931	1,235,673	85,788	296,116	86,146	48,027	50,910	44,349
1932	1,431,461	98,588	447,131	87,559	65,075	60,573	34,599
1933	1,917,220	108,839	604,468	164,192	136,641	72,658	41,806
1934	2,282,302	124,027	730,936	186,382	171,563	93,022	42,052
1935	2,472,236	152,647	713,682	191,761	207,159	105,008	38,678
1936	2,763,381	182,769	849,648	200,898	192,040	91,184	35,790
1937	3,783,177	849,749	298,404	158,092	45,310

根据同上。.....是指从統計表內删去的数字。

速增加;輸入方面,皮棉的地位依然沒有改变,而羊毛、铁类、矿油等軍需原料有所增加。再就地区来看,輸出方面,中国东北大为扩展,印尼、印度、海峽殖民地和澳洲等地也有增进;輸入方面,美国占居极重要的地位,印度、印尼、德国等也有增加。这一貿易上的

(单位: 千日元)

第 66 表 (3) 20 世纪 30 年代按地区区分的输出表

年 度	中国东 北地区	中国其 他地区	香 港	印 度	海 峽 殖民地	印 尼	英	法	美	埃 及	澳 洲
1931	77,416	143,877	36,754	110,367	19,120	63,450	53,166	16,100	425,330	22,830	18,406
1933	303,140	108,253	23,419	205,155	46,133	157,488	87,849	38,736	492,238	55,808	51,416
1935	425,315	148,783	49,732	287,524	50,949	143,041	119,458	42,468	535,515	53,800	95,493
1937	612,008	173,251	49,150	318,023	71,299	200,051	168,297	47,208	639,428	32,772	106,463

根据同上。1935 年后海峽殖民地包括英屬馬來亞。

(单位: 千日元)

第 66 表 (4) 20 世纪 30 年代按地区区分的输入表

年 度	中国东 北地区	中国其 他地区	香 港	印 度	海 峽 殖民地	印 尼	英	德	美	埃 及	澳 洲
1931	132,113	103,749	499	133,165	21,858	46,081	63,335	73,251	342,290	13,563	113,337
1933	168,059	113,357	2,092	204,738	38,772	55,710	82,549	95,798	620,789	26,456	204,586
1935	216,522	133,818	2,836	305,646	69,143	78,187	82,160	120,328	809,645	51,305	235,128
1937	294,269	143,636	5,332	449,486	115,591	153,450	105,772	175,362	1,269,542	74,118	165,252

根据同上。1935 年后海峽殖民地包括英屬馬來亞。

进展使日本商品大量输出到原系英国主要市场的国家，侵害英帝国经济集团，从而加深日英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军需资材大多依赖美国，美国的废铁、原油、机械等在日本军需产业的建立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至于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输出增加，却不止是为了经营“满洲国”，并且是为了以这里为根据地，向冀东、华北进行走私，即进一步把贸易当作侵略中国的手段。

占居输出工业中心地位的纤维工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情形见第 67 表。

第 67 表 20 世纪 30 年代纤维工业的发展

年度	生 絲 (千貫)	棉 紗 (千捆)	人造絲 (千吨)	毛 織 (千吨)	棉織品 (百万 日元)	人造絲 織品 (百万 日元)	絲織品 (百万 日元)	毛織品 (百万 日元)
1930	11,365	2,594	17	19	416	45	190	133
1931	11,683	2,567	21	24	376	48	177	120
1932	11,091	2,810	31	31	434	75	183	128
1933	11,243	3,100	43	41	609	106	201	155
1934	12,065	3,472	70	42	685	149	214	181
1935	11,643	3,581	103	45	687	159	232	203
1936	11,287	3,607	151	55	716	235	204	227
1937	11,167	3,966	223	55	877	285	208	219

根据《日本经济统计集》。

从第 67 表可以看出，生丝生产从经济危机时期以来一直陷于停顿，差不多全未伸展。这是因为人造丝在美国的用途扩大，在宽门面的匹头等方面同生丝相竞争；而且丝价跌到危机前的三分之一。结果弱小企业遭到淘汰，1930 年有器械制丝厂 3,759 家，1936 年只有 2,468 家；在同时期内，器械设备由 324,000 台减至 171,000 台，即差不多减了一半。为了挽救丝价低落，曾采取减少生产量和经由再禁黄金出口来降低汇率等措施，但建立在低水平技术

上的制絲业已經不能恢复原有地位了。在减少生絲产量时，負担最大的是工人和养蚕农民。工人每人生产量从1930年的25.7貫增加到1936年的40.6貫。特别是大資本家为了統治占制絲成本八成的蚕茧起見，竟直接控制养蚕农民，加强养蚕农民的劳动，使蚕茧的生产費用减少一半。在这个过程中，和关东的生茧买卖手續不同，关西普遍施行了特約組合办法；又如钟紡的事例所示，还在养蚕方面实行佃租办法，即由大資本家直接对农民进行半封建的剝夺。

与生絲的停滞不同，棉业、人造絲和羊毛业等有飞跃的发展。先就棉业來說，1935年日本棉紗和棉織品的产量分別占世界总产量的13.1%和15.1%，仅次于分別占21.8%和28.9%的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超过了分別占11.3%和11.0%的英国以及分別占9.5%和10.7%的印度。1935年的日本棉織品輸出数量为2,725,000,000方碼，超过英国的1,949,000,000方碼，占居世界首位；輸出金額則英国为3,950万鎊，而日本为2,910万鎊，位列第二。1936年还是維持了这种地位，虽然比上一年稍为少些，但在輸出数量上仍达2,710,000,000方碼，超过英国的1,917,000,000方碼，还是世界第一。

这一发展是依凭低微成本和利用低汇兌率进行傾銷这些武器，向印度、印尼、非洲和南美等世界各地扩大市場而实现的。对于中国市場，大棉紡資本在中国开办的紗厂从1935年起又开始迅速展开掠奪活动，在激烈竞争用实力压倒中国人办的紗厂，并配合軍事侵略行动而建立其地位。日本棉紡业者讓他們在中国办的紗厂控制中国市場，沒有把多少国内制品銷到那里去，第66表就沒有列入此数。总之当时日本的棉紡业，包括国内的和在中国办的紗厂在內，确实站在日本产业进行海外扩张的前列。这一扩张加剧了日英对立，激起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情緒，針对着这

种情况，日本的帝国主义本性越来越显露。

低微成本是这一进展的一个基础，这时在原有的低工资上，又加上技术上的合理化，因而更加显著。同过去一样，这个时期的技术合理化还是以增加劳动强度为根本措施，又普遍推行电动机的单独运转，在国产纺机上使用大牵伸机构和单缸、用女工代替男工以及减少工人数目等。由此而减少成本的情形，据今村奇男的调查，在装置 3 万锭设备的工厂里，使用原来的机器时需用 258 人，用了大牵伸机构时减至 156 人，加用单缸时又减至 143 人。节约的工资数额，只用大牵伸机构时为 96 日元 40 钱，加用单缸时为 107 日元 45 钱（守屋：《棉纺生产成本分析》，1953 年版，61 页）。又在纺机和织机方面，一般都使用了国产机器，织机方面还增加了自动化机器。

适应棉业的这一发展，设备也从 1929 年的 6,114,000 锭增加到 1933 年的 8,093,000 锭，1937 年又增至 12,018,000 锭，增长是迅速的。工厂规模也有所扩大，在 1928 年前后时每厂平均设备为 25,000 锭，1934 年增至 35,000 锭，1936 年又增至 43,000 锭。相反地每厂平均职工数在昭和初年为 700 人，1931 年后却减至 500 人。在这个过程中，以三大棉纺公司为首、集结于棉纺业联合会的垄断棉纺资本的统治力日益增大；在大棉纺公司中，大纱厂都兼营织布，并输出其制品的 70%。

在棉业的这一发展期间，专营棉织的工厂也以输出为目的而进行扩展。如就大部分用于输出的宽门面布匹的织制部门来看，在 1934 年，雇用 5 人以上的工厂中有 78% 拥有织机 50 台以上，内 38% 是兼营纺织的工厂，40% 是织布专业者。至于棉织品的种类，兼营工厂的主要产品是细白布和粗布，而专业者多半生产天竺布和斜纹布等，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工关系，但是随着致

力于輸出品制造的专业者逐渐增多，它們的对立也日益加深。在1934年前后的輸出棉織品中，兼营工厂生产55%，专业者生产45%。专业者結成日本棉織物組合联合会，同掌握輸出織品檢查权的棉紡业联合会进行对抗。但是专业者在資本积累上大多基础薄弱，并因依靠棉紡业供給棉紗原料而受其操纵，結果被棉紡业压倒，逐渐确定为它們的厂外生产部分。

人造絲工业在这个时期获得惊人的发展，其产量于1936年超过美国，占据世界首位。这是因为絲織品是高价的奢侈品，而人造絲制品是价廉的大众用品，所以代替了絲織品和扩展了市場。在国内，原来的絲織业地区大多立刻把人造絲当做主要原料，在輸出方面，則从1933年前后起完全超过絲織品。日本人造絲織品輸出之所以飞跃发展，是依靠基于低工資的低微成本。如据1933年的調查，每100磅人造絲的生产成本，美国为155日元40錢，英国为148日元30錢，而日本只有60日元（厚木胜基：《談談最近人造絲、人造棉和人造絲漿的进步》，1936年版，198頁），因此日本人造絲織品就能与棉織品一起闊步于輸出市場。又在提高技术方面，这个产业也和棉紡业一样致力于产量的增大，在制絲工序中則以增加汽罐旋轉数为技术合理化的中心。这个产业同别的纖維工业不同之处在于資本的有机构成高，所以自始就由大資本企业导入外国技术，并作为大工业而发展。但是随着人造絲业的跃进，新办的和扩充的工厂显著增加，早在1936年前后就出現了生产过剩的征象。人造絲业又从这个时候起陸續开始生产人造棉，可是当时的技术和出产的人造棉的品质还低，所以作为紡紗原料，还是靠不住的。

随着人造絲业的发展，原来的絲織业者陸續改制人造絲織品和人造絲同絲的混織品，特别是福井这一傳統的絲織品主要产地

完全变成人造絲織业地区。在这同时,新开办的人造絲織厂极多,从1929年到1934年,新成立的人造絲織厂达1,467家,比新成立的棉織厂(1,297家)还多,超过了其他各部門,在创办工厂数目这点上居第一位。这些企业过去大多受地方批发行控制,但在大經濟危机后多数摆脱了地方批发行的牵制,实行装置联合設備和統制生产,并与全国性的大批发行資本发生直接关系。

六

工业危机虽于1932年中期达到最低点,而农业危机却拖延到1935年初前后。这不是由于农业危机同工业危机是互不关連的,而是由于工业的一切負担都轉嫁在农业上,所以农业危机就作为局部的危机而拖延下去。

工业制品价格在米价和茧价繼續低落时回升,加大了剪刀差,这就如实地显示农业危机的繼續。就其中的米来說,在当时国内米产量約6千万石中,出卖的約有3,200万石,其中地主出卖的为1,200万石,生产者出卖2千万石。地主出卖的是剝削得来的佃租米,所以米价跌落只使他們的利益相对减少,而农民出卖的米的价格从1930年以来远远抵不上生产成本,到1936年才大体上收支相抵,致使农民一直陷于困境,农民为穷苦所迫,急于拿到現款,只好甘受損失而卖米,并越来越依靠农业以外的收入。在农业危机中,竟有全部农户的40%(1931年为2,272,000戶)須买进口粮,同时农民的分化急剧进行;就是在危机大体結束,米价上升以后,地主同农民和农民的上层同下层之間所受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农民的階級分化在农业危机中更有发展,从1929年到1935年,佃耕地所占耕地总数的比率由46%一下子增加到48%左右,地主戶数則由1930年的951,000戶增至1935年的1,055,000戶,

同时自耕农和自耕兼佃耕农户数减少，佃耕农由 139 万户增至 142 万户。现在就农业生产力不同的东北和近畿地区来看这种关系，东北的自耕农户减少和佃耕农户数增加的数目特别大，計自耕农由 177,000 户减至 171,000 户，而佃耕农由 184,000 户增至 212,000 户；近畿則自耕农和佃耕农同时减少，自耕地面积却有所增加，这显示两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再从經營規模来看，在东北地区，不满 1 町的农家从 327,000 户增至 354,000 户，3 町以上的从 35,000 户减至 33,000 户；而近畿則不满 1 町的从 483,000 户减至 465,000 户，3 町以上的也从 1,066,000 户减至 802,000 户；总之从东北到关西地区，經營規模都迅速縮小。这时在东北地区，三町以上的农民的沒落表现为 1 町至 3 町的阶层增大，并有越来越多的下层农民固定在不滿 5 反和不滿 1 町的零星規模上；而在近畿則 1 町至 2 町的农民增加最快，結果自耕和佃耕的标准規模就限于这个阶层，不满 1 町的零星土地耕作者反而减少，而轉化为雇佣工人和半无产阶级。又就土地所有的規模来看，东北地区是 5 反到 1 町和不滿 5 反的阶层增加，近畿地区是 5 反到 1 町的阶层增加，其余阶层在两个地区都趋于减少。

这时农民在应付农业危机和力图从事商品生产的努力中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可以说是在拚了命干的。虽然购买资金不足，而肥料的消费量还是逐年增加；同时进行了耕地整理、土地改良和推广牛馬耕种；并固定使用“农林系”和“旭系”等改良品种、迅速推广石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等农业机械；岡山儿島灣和福岡三潞等地区还自 1931 年前后起使用小型拖拉机。在这种情况下，自耕和佃耕的标准經營規模逐渐减少到 1 至 2 町，經由集約劳动而增加生产力，只就这点来说，是打破了地主制的束縛。这种情况可以从山田胜次郎过去根据帝国农会出版的《关于昭和十一年米生产成本的

調查》(1937年版)所編制的統計表里看出来(第 68 表)。如这个表所示,在东北地区,3町以上的大規模經營的每石生产成本和每反收获量都比 1 至 2 町的中規模經營差些;在近畿地区,則出現以 1 至 2 町經營为中心和符合价值規律的进步形态;佐賀的情况則更为进步。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力的中心是家庭成員劳动,依靠拚命干活来提高生产力。至于耕地的規模,在近畿地区,从 1930 年到 1935 年为止,3 町以上的經營者减少最为显著,此外 3 至 5 町的减少 26%,5 町以上的减少 17%。东北地区沒有减少得这样厉害,但因大規模經營所依靠的农业工人流向城市,所以情况比中等規模經營差些。关西地区的多种經營最为发达,富农式的經營在畿

第 68 表 耕地規模和米生产效率的内部联系

按府县和 阶层区分	調查戶数 (戶)	每戶平均 耕地面积 (亩)	每戶平均 水田面积 (亩)	每反平均 糙米收获 (石)	每石平均 生产成本 (日元)	每反平均 劳动日数 (日)
岩手上层	3	382.13	296.22	2.100	18.57	10.01
岩手中层	7	226.06	136.22	2.378	16.48	10.31
茨城上层	7	310.08	189.03	2.294	19.06	9.45
茨城中层	20	209.12	112.20	2.443	17.90	9.25
栃木上层	10	354.11	273.23	2.088	17.93	7.76
栃木中层	15	203.09	133.29	2.220	17.61	8.24
奈良中层	10	139.15	117.15	2.900	12.91	4.95
大阪中层	6	132.16	116.00	2.717	15.45	6.00
香川中层	4	130.26	74.09	2.833	15.49	7.76
香川下层	10	68.12	66.06	2.686	17.97	7.97
兵庫中层	39	148.05	123.15	2.584	16.36	8.96
兵庫下层	10	83.25	70.22	2.506	17.64	7.27
佐賀上层	5	248.28	239.13	3.000	13.20	4.83
佐賀中层	11	151.18	130.05	2.709	15.33	6.95

根据山田胜次郎:《米和苗的經濟构造》,1942年版,附表 2(米)。

橘、梨子和葡萄等方面都有迅速发展。

政府对农村的政策还是以地主富农的利益为基础，同时也加强了保护农民扩大商品经济这种社会政策的一面。为了加强米价统制，1933年制定了米谷统制法，规定最高和最低米价，以求调和壟断资本、地主和米谷商人的利益。结果地主和米谷商人获利最大，同时在稳定米价上起了有力的作用。1933年又订立产业组合五年计划，促使产业组合运动在农村中迅速推广，并使农民同城市资本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信用组合扩充以后，就代替劝业银行和农民银行而迅速成为农村金融的主体，更便于金融机关通过地主和富农向农民进行活动。购买组合也有发展，它们在1934年经售了农村所用肥料的31%，从而使肥料资本家同农民直接来往。贩卖组合扩充的结果，于1934年经手贩卖了出售谷米的28%，使米的流通更加便利。产业组合的发展损害了肥料商和其他中间商人的利益，激使他们在1933年到1934年发动反对产业组合的运动。

农民在这个期间继续没落，离村找零活干的人和农业工人显著增加，佃农斗争则围绕地主收回出租地这点而在全国范围内加剧。在不与农村以外的地区发生关系就无法在农村中进行再生产的美西地区，农民转化为雇佣工人的最多，例如当时各道府县离村找零活干的人所占本府县人口的比例，最大的是广岛，其次是岛根，这显示即使是工业发展落后的县，其农村再生产结构也被包括到近畿和濑户内海地区那样的类型里去了。广岛县日雇工数，1929年为128,000人，1931年增加到147,000人。这时为了对付佃农斗争，有越来越多的地主以地主组合为基础而设立土地公司，如在美西地区，就有不少像冈山县仓敷劝农土地公司那样的组织。这种办法的目的是把个别地主的土地集中在土地公司手里，以加强地主制，同时却使地主更不关心农业，成为地主进一步朝资本家

轉化的因素。

至于基本上在农村内部进行再生产的东北地区，则岩手、青森、秋田、山形等县都为了入会权^①而发生糾紛，卖青苗的情况也在这些地方空前扩大加深，特别是由于这里工业素不发达，没有多少企业能够把因为經濟危机而沒落的农民吸收进来做雇 佣工人，因此更加悲惨。例如东北六县出县找活干的人数，1928年为906,000人，1932年还是906,000人，大半充当漁业工人。因此淪为公娼、私娼的歉收地区的女孩随着危机的拖延而显著增加。在1934年8月，东北六县被出卖的人口共达20,839人，其中艺妓2,566人、娼妓5,229人、酒店女侍8,648人、女僕4,396人。缺食儿童和体格不好的成年人也大为增加。

这种集中表現在东北的农业危机的特殊形态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政府特别致力于这个地区的救济，在农林省中創設东北局，从恢复封建时代的乡仓制度起，到設立东北兴业和东北振兴电力公司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特别是试图从上面来导入资本主义，以改組这个地区的經濟，即开发电力，誘致工业，并策划农村家庭工业的电气化，以图使东北地区关西化。但是几乎完全没有发生什么效果，对农村的救济措施也没有起任何本质上的作用。

农业危机不止在日本扩展，还在朝鮮和台湾等殖民地进行。日本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把朝鮮当作侵略大陆的重要兵站基地，极力在这里发展工矿业，从野口的朝鮮氮气起，钟紡、东洋紡、王子造紙等公司都侵入朝鮮，貿易額也随着增加。但主要产品还是农业品，运入日本的朝鮮米更为增加，其情况見第69表。农业生产的增大，

^① 日本农民本有一种“入会权”即在全村共有的原野山林上共同采伐柴草，但于明治維新后逐渐被划为區有地或被地主霸占，因而激起农民斗争。——譯者

是在以1930年霸占土地124,000町的东洋拓殖公司为首的日本大地主的統治下, 扩充耕地、通过农地令調整佃耕关系和强制推行优良品种而实现的, 因而只是殘酷剝夺朝鮮人民的結果。所以尽管米的产量增加, 而农业生产力却停滞或退步, 农民苦于半封建的高昂佃租、租稅和商业、高利貸資本的剝削, 进行阶级分化, 火田民^①从1928年到1937年为止剧增至8倍以上, 流浪到海外去的人也进一步大量增加。

第69表(1) 20世紀30年代朝鮮和台灣的貿易(輸出移出)^②

(单位: 千日元)

年 度	朝 鮮				台 灣			
	輸 出	移 出	米	大豆	輸 出	移 出	米	砂糖
1930	25,852	240,695	109,507	17,489	22,808	218,633	38,695	141,865
1933	52,773	315,854	152,693	19,261	17,666	230,747	64,628	118,614
1936	75,266	372,445	244,736	23,461	29,054	358,895	124,250	162,930

第69表(2) 20世紀30年代朝鮮和台灣的貿易(輸入移入)^③

(单位: 千日元)

年 度	朝 鮮			台 灣		
	輸 入	移 入	棉織品	輸 入	移 入	布 匹
1930	86,855	278,194	31,422	45,131	123,127	20,571
1933	64,368	339,817	43,785	35,477	149,912	24,636
1936	114,499	735,414	32,118	48,854	243,832	26,625

根据东洋經濟新报社:《日本貿易精覽》和同社:《經濟年鑑》,1938年版。商品是移出入数。

台灣的农业危机打击了砂糖和米, 砂糖生产在昭和初年到

① 朝鮮农民被剝夺了土地和一切生計, 只好到山里去燒山耕种, 簡直是恢复原始生活, 他們被称为火田民。——譯者

②、③ 移出入指对(从)日本的輸出入, 輸出入指对日本以外各国。——譯者

1936年的十年之間一直陷于停滞，而米的生产則从昭和初年到1936年为止增加了50%。但是台灣农民大部分从事零星規模的农耕，苦于高昂的佃租，而且被制糖公司用先期借款束縛起来，成为高利貸者(土壟間)的牺牲品，因此农业生产力未能发展。

殖民地移入日本的米年达1千万石以上，如在1934年，朝鮮米移入895万石，台灣米移入512万石，几达日本贩卖米总額的50%，成为压迫日本米价的重要因素。但因这种移入本来是根据壟断資本的利益和軍事上的粮食計劃进行的，所以政府在促进台灣米增产上所采取的措施虽然多少受到阻碍，但不能禁止其移入。移入业务，朝鮮米由三菱商事包办，台灣米由三井物产独占，它們都由此获得巨利。

七

在財閥將其主要力量逐漸移在发展軍需工业上的时候，他們的統治力也更为增大。

財閥为了获得最高利潤，历来在經營方針中存留很多商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因素，將它們的主要力量放在商业、銀行和矿山方面。早就致力于重工业的三菱和住友，其經營中心是同軍部有关的企业，依靠国家的保护进行，因此在大战后感到好处不大。从日本全局來說，有利可图的工业是資本有机构成低、最能依靠低工資劳动的輕工业，而不是重工业。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軍需通貨膨脹开始时，首先勾結軍部，带头办軍需工业的不是旧財閥資本家，而是把命运完全寄托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上的所謂新兴康采恩。旧財閥在受到新兴康采恩迅速振兴的刺激和看准軍需通貨膨脹会持續下去时才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猛进。財閥控制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这个时期的利潤增加情形見第70表。依靠軍需工

第70表 九一八事变前后財閥系統的重工業
和化學工業利潤的增加

(單位: 千日元)

公司名稱		1927—31年 5年間的利潤	1932—36年 5年間的利潤	增加	增加率(%)
三井	日本制鋼所	5,192	10,313	5,121	98
	芝浦制作所	— 972	11,618	12,590	—
三菱	三菱重工業	12,473	22,572	11,099*	89.0
	三菱電機	— 391	7,792	11,183	—
	日本光學	1,108	2,982	2,974**	169.1
住友	住友金屬	6,032	23,715	17,683	293.3
	日本樂器	1,026	3,895	2,849	272.4
第十 五 銀 行	川崎造船	— 48,445	15,954	64,399	—

見梅井義雄:《戰爭、財閥、軍需工業》,126頁。

* 應為10,099; ** 應為1,874。——譯者

業增加利潤這點就成為財閥和軍部加深勾結的重要因素。

人們原來只把二二六事件看成軍人內部的皇道派和統制派之爭^①, 其實應該看成是軍部從勾結新興康采恩轉為勾結正統財閥的決定性轉折點。池田成彬和結城丰太郎^② 那種財閥的代表人物在這時公然站在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的前列。芝浦、三菱重工業和住友金屬等成為財閥企業的中心。財閥為了適應這種體系, 從1936年到1938年為止, 改變了家族統治形態, 實行公開出售股票和把康采恩的中樞機構改組為股份公司。

鮎川義介的日本產業公司在這個時期發展成為新的大資本体

① 1931年後陸軍內部逐漸形成的派別, 皇道派主張經由政變推翻統治陣營中的上層分子, 在天皇“親政”下實現軍部獨裁和對外侵略; 統制派認為不經政變, 可以通過同統治陣營中的上層集團勾結來實現軍部獨裁和侵略。——譯者

② 池田成彬代表三井, 結城丰太郎代表安田, 但他們又代表一般財閥利益。——譯者

系，这个体系依凭资本 225,000,000 日元（繳納資本 198,000,000 日元）的控制股份的公司，以金字塔形式控制日本矿业公司、日立制作所、日产汽车公司、日产化学工业公司、日产油脂公司和日产水产等与军需有关的产业，益趋强大。后来日产又和军部勾结起来，进行改组，由“满洲国”出资半数，接办满铁让出来的各种企业，发展为资本 450,000,000 日元的满洲重工业公司，继野口的朝鲜氮气而成为大规模侵入殖民地的重工业资本的主力。财阀资本也从 1934 年起侵入中国东北，设立了满洲石油、满洲小野田水泥、日满钢管和满洲轻金属等大公司。

劳动力的结构也随着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而发生变化。即女工的比重减少，男工增加，又重新吸收了大经济危机时排挤出来的失业工人，并从 1934 年起逐渐吸收农村的潜在过剩人口，于 1937 年前后达到饱和点。

这时工人的情况见第 71 表。如此表所示，劳动生产率从 1932 年后迅速提高，技术合理化也适应电力使用量的增加而显示一定程度的进展。可是工资指数一直下降，同 1931 年后零售物价接连上涨形成两个极端相反的趋势。劳动强度的增加表现为工伤事故件数和事故频繁率的增大，尤其是在特别工厂（金属精炼、电气、煤气）、机械工厂、化学工厂中达到惊人的数字。

当时日本工人的工资低微，在输出产业方面，曾被指为社会倾销，受到各国攻击，但在军需工厂，工资低微也是一般现象。特别是以临时工的名义雇用了 30 万到 50 万工人，付给他们的工资只合正式工的三分之二，解雇时又得不到退职金。在一方面重新吸收失业工人的同时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资本家利用农业危机造成的农村疲惫情形，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获得求职的青年。这时工人日趋穷困，虽然政府的镇压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为壟

第 71 表 20 世紀 30 年代前期的工人情况

年 度	工資指数	零售物价 指 数	劳 动 时 間		产 量 (百万日元)	电力使用量 (百万度)
			总 数	按产額 1 日 元摊算(时)		
1929	483.2	85.5	5,362	0.695	7,717	5,363
1930	449.8	70.0	4,972	0.834	5,963	5,840
1931	409.2	59.1	4,702	0.909	5,175	6,314
1932	395.3	64.6	4,795	0.802	5,982	7,154
1933	392.1	76.1	5,398	0.686	7,871	8,644
1934	392.7	76.8	6,305	0.671	9,390	10,324
1935	397.6	77.7	6,999	0.646	10,837	—

根据《工資統計日报》、《零售物价日报》、《工厂統計表》編制。

断資本效劳的活动使工人的直接反抗斗争从 1934 年后趋于低落，但还是显著阻碍了軍部要求的軍事生产力的提高。

由于工人、农民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大經濟危机后阶级斗争更为加剧。处于非法状态的日本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但是党虽然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却没有能够把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广泛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还犯了宗派主义和偏重非法活动等缺点。就是在 1932 年党最为活跃时，日趋贫穷的农民曾发动要求召开救农議會的大規模政治运动，迫使政府召集两次临时議會，但是这一运动是与党无关的，因此镇压日益加强，密探活动越来越厉害，加上佐野、鍋山等叛变^①，党的力量就迅速削弱，并于 1935 年初一时陷于潰灭状态。

共产党的潰灭意味着对抗壟断資本体系的主导力量的消失，因此以后壟断資本体系的軍事法西斯就一往直前地发展。虽然以后工人爭議和佃农爭議还有所增加，并且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当选

^① 曾窃据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佐野学与鍋山贞亲于 1932 年 6 月在獄中声明“脱党”，以后还出現很多脱党分子。——譯者

人曾在1936年总选举中由5名增至24名，显示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和法西斯运动的斗争还是坚决的，但是在国内已经不能成立强有力的反抗统治体系的组织。这种组织却在外国成长起来，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而进行团结，并发展为制日本帝国主义死命的力量。

在垄断资本经由勾结强大军事力量而增强其体系的过程中，军部在统治阶级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又因世界分裂成一些经济和政治集团，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就勾结德、意，迅速走向军事法西斯的道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新成立的广田内閣^①在政綱中提出这样四项：(1)充实国防，(2)实行增税和增加收入的财政经济政策，(3)振兴产业、发展贸易，(4)安定国民生活。也就是明示以建立“准战时体制”为其使命。陆军一面经由“肃军”来加强统一，一面把“弥合性的装备”方针改为“正式充实军备计划”，实行以下列四点为纲要的新计划，即(1)增强空军，(2)增强在中国东北的兵力，(3)适应以上二项的补充、教育、动员、补给等军政设施之扩充，(4)充实作战器材；海军也开始实施无条约时代^②的新补充计划。在财政政策方面，藏相马场^③完全抛弃一面凑合军事预算、一面逐渐减少公债的高桥财政方针^④，而采用所谓“量出为入”的方针，结果在岁出方面，1936年列入实行预算的为2,311,000,000日元，内军事费用1,059,000,000日元，同过去相差不大，而在1937年度预算中一跃而为3,040,000,000日元，内军事费用达14亿日元；在继任的林内

① 以广田弘毅(1878—1948)为首的内閣。——译者

② 指华盛顿条约等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都被撕毁的时期。——译者

③ 马场铤一(1879—1937)。——译者

④ 这种方针是历任财相等职的高桥是清(1854—1936)所主张的，所以被称为高桥方针。——译者

閣^①时期虽然有些改变，但仍有 2,769,000,000 日元，內軍事費用 1,364,000,000 日元。藏相結城^②竟在議會讲坛上公然高唱依凭金融資本同軍部“抱在一起”的政策来扩展生产力。

这样以財閥为中心的壟斷資本的主流就一直奔向战争道路，而国内法西斯的囂張又促进了对外侵略。日本勾結德、意，撕毀了华盛顿条約等裁减軍备的条約；又在內蒙古和冀东建立傀儡政府；并于 1936 年 11 月締結日德防共协定。日本軍隊得寸进尺地扩展对中国北部的武力侵略活动，同时兴中公司、棉紡企业和其他壟斷資本家也向中国东北和华北开始大規模掠夺活动。日本侵略者以冀东和关东州为根据地，經由武力行动、走私和各种阴谋在中国北部及其他地区进行活动，使全中国陷入惊人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旁若无人似的在大陆施逞暴行。

① 以陆軍大将林銑十郎(1876—1943)为首的內閣。——譯者

② 結城丰太郎(1877—1951)。——譯者

第九章

战时经济

1. 中日战争期间战时经济的发展

一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并吞全中国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开始了。这是日本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准备和实行的对中国侵略的新发展，又意味着中国人民挽救国家危亡的反帝和争取独立的抗战。在此前后，日本在世界上的蛮横活动引起各国的强烈反感，垄断资本开始急急地勾结军部来建立日“满”中集团。

这时中国由于遭受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和经济侵略，以致整个民族经济不断走向崩溃。在日本棉纺资本的压迫下，中国棉纺业几乎陷于停业状态，如在1935年，上海的113家纱厂中只有23家能够维持营业，浙江和河北等处的纱厂大多停业，破产的纱厂被日本资本廉价收买，反而变成日本的侵略工具。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既与日本竞争而又极力侵略中国的美、英、德等帝国主义相勾结，疯狂地掠夺中国人民。结果不仅发生工业危机，农业也在全国范围内陷入危机，农产品减少，水、旱、虫、雹等灾害年年发生，使中国经济完全处于破产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成千成万的工人、农

民和市民失业和丧失土地家产，贫困已极，死于饥寒者不计其数。民族资产阶级也濒临崩溃的深渊。

面临这种民族危机，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高涨。工人、学生、兵士、市民和农民等全国多数人民反对蒋介石背叛民族利益，热烈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救国的主张，经过许多斗争以后，于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以这个事变为契机，中国的局势有了很大的历史性转变，迫使国民党在1937年8月的三中全会上议决同共产党合作，于是国民党也随着共产党参加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线，而自九一八事变后不断扩大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同全中国为敌了。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选择这个时候来燃起炮火，是因为相信世界局势正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英国在中国的投資最多，但须对抗德、意的露骨扩张政策，所以几乎完全没有应付远东局势的余力。美国也受到对付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集团的影响，非但不能充分支援中国，反而十分珍视依靠战争扩大对日贸易的重要性。同时苏联于那年4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世界第二的工业力量，准备从社会主义建设过渡到共产主义，因此美、英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利益出发，有时还打算同日本接近，特别是不反对日本在大陆上建立更加强大的侵略苏联的根据地。加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趋扩大，更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有迅速实现其侵略计划的必要。

战争一爆发，日本立刻动员大军，到1937年12月为止，占领了河北和山西，攻取了上海、杭州和南京，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战争初期的丰硕战果使军部在国内确实成为主导力量，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确立了战时体系。在那年6月成立的以近卫文麿为首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公然成为领导战争的内阁，于9

月召开临时議會，通过 2,075,000,000 日元的临时軍事費，制定輸出入临时措施法、临时資金調整法等战时法規，又于 10 月成立企画院，11 月制定大本营令，巩固了战争体系。政府还在 1938 年 1 月发表所謂近卫声明，宣称“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并制定总动员法等一系列的强制性战时法規，走向扩大战争的道路。

战局在 1938 年还是进展。5 月徐州陷落，日軍南北会师，接着于 8 月开始进攻武汉。10 月占領广州和武汉。这时日本政府策划改变近卫声明所宣布的方針和战争政策，以图在仇視苏联和拉攏英、美的基础上分裂抗日战綫和提早解决战争，蔣介石和美、英也进行了同一傾向的活动。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貪欲依然很大，同时中国人民坚持抗拒侵略，战争就趋于长期化。

在战争过程中，美、英壟断資本得自日本的利益反而比同蔣介石的共同利益多些。美国石油托辣斯仅在 1937 年下半年就供应日本 3,500 万桶石油，那年美国和英国还向日本輸出 200 万吨廢铁，美国又将价值 150,000,000 日元以上的工作母机和机器卖給日本。1938 年美国卖給日本的石油、廢铁、机器、工作母机、汽車、飞机、鉛、銅等物資比上一年还要多；到了 1939 年，美国对日輸出的战略資材和战略設備更为增加，其数額超过 232,000,000 美元。英国除出售战略物資外，还在 1937 年提供日本把軍队和軍需物資运往中国所用船舶的 40%，1938 年租給日本的船舶也大致相同。相反地，美、英实质上拒絕了对中国的援助，对中国的輸出只相当于对日輸出的 15% 上下，有时甚至希望中国对日屈服。但自近卫于 1938 年 11 月发表“东亚新秩序”宣言后，美、英反对日本采取的专橫的擴張政策，1939 年 7 月通告廢棄日美通商条約，1940 年又禁止工作母机对日輸出。可是美、英对日本的基本政策还是妥协性质的，它們的打算是一方面尽量把日本的手脚束縛在中国，一方面极力使日本

把侵略的矛头指向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领导者們在武昌淪陷后极为动摇，党內的妥协投降空气日益濃厚，但是战局还是进入相持阶段，看不到終結的征象，那是因为以毛澤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团结在党的周圍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緒高涨，坚决反抗日本侵略的原故。蔣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终于不能脱离抗战行列，而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却于1938年12月响应近卫的“东亚新秩序”声明，走出重庆，投降日本，建立了不抗战和反共的傀儡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相继发动广大人民武装，展开强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据地。自从战局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在国民党战场主要采取政治攻势，战争的中心轉移到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样战局就成为长期性质，日本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受到很大的消耗，近卫丧失了收拾时局的自信心，就于1939年1月去职。随着战局的长期化，同陆軍勾結的亲德派同包括海軍上层分子在內的英美派的对立日益加剧。平沼內閣^①成立以后，陆軍于5月在諾門坎进攻苏联軍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8月德苏两国締結互不侵犯条約，內閣就总辞职了。继任的阿部、米內等內閣^②都采取英美派的政策。恰好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成立的阿部內閣竟曾声明不参加欧洲战争，而专门致力于解决侵华战局，但是圍繞着这个方針的对立还是发展，主張联合德国的亲德派势力依然主張繼續进行战争。

由于1940年5月德軍侵入比利时与荷兰，击潰了英法軍，接着法国无条件投降，日本的上述紛爭就最后定局。主張急进的帝国

① 以平沼騏一郎(1867—1952)为首的內閣。——譯者

② 分別由陆軍大将阿部信行和海軍大将米內光政任总理的內閣。——譯者

主义者掌握了压倒的优势，政治野心家們同軍部相勾結，政党陸續自行解散，爭先恐后地走上組織納粹式的新党，以建立新体制的道路。近卫領头推进新体制运动，7月成立第二次近卫內閣，揭示建設“东亚共荣圈”、完成国防国家体系和經濟統制一元化等政綱。9月締結日德意三国軍事同盟，并侵入越南北部。美国于同月声明对日本禁运廢铁和鋼铁，并决定增加对中国的借款，以示报复，但仍希望日本北进，不放棄对日妥协政策，1941年輸往日本的廢铁和鋼铁竟达1940年的四、五倍。近卫也想利用这种情势来同美国妥协，但終于未能实现。到了1941年6月德国侵略苏联以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已經只是時間問題了。

二

从战争的爆发到长期化，战时經濟体系大为进展，其重点也随着世界情势的变化而变动。战时經濟的杠杆是国家的財政政策，但因当时国内已經沒有閑置未用的設備，所以开始策划資金与物資供应的調整，从1938年編制預算以来，就要求各省在提出資金預算的同时提出“物資預算”。可是經費是逐年增加的，把战争爆发后立即設立的临时軍事費和一般会計算在一起，每年的軍事費，1937年为3,270,000,000日元、1938年为5,960,000,000日元、1939年为6,160,000,000日元、1940年为6,810,000,000日元，都占岁出總額的70%上下。

为了支付日益膨脹的預算費用，就靠增稅和发行公債来增加岁入。在租稅方面，曾于1937年实行临时增稅和創設华北事件特別稅，1938年創設中国事变特別稅，1939年修改上述特別稅，1940年又大規模修改中央和地方稅制，对收入低微的人民大众也征收所得稅。

可是更重要的是公債和日本銀行借款，实际上岁入的大部分是依靠这两項。計1937年为2,050,000,000日元、1938年4,360,000,000日元、1939年52亿日元、1940年6,330,000,000日元，每年都差不多和軍事費相匹敌，实占各年岁入的60%。政府为了压抑不断增加公債所引起的迅速加剧的通貨膨脹，曾作过減縮公債的种种努力，但是通貨膨脹还是逐年扩大。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軍需通貨膨脹时代，还有許多游資和过剩生产設備，使減縮公債和扩大生产比較容易实行。但是要在这个阶段依靠財政政策来迅速增加軍需生产，却不能不对国家的生产和供应实行强力統制。政府为了扩充战时經濟，发表了扩充生产力、平衡国际收支、調整物資供应等三項原則，集中一切力量来迅速发展軍需产业。为此首先制定临时資金調整法和輸出入临时措施法等，实行資金和物資統制，而統制之所以限于这些措施，是因为当时預料战局会早日結束，国内还有物資儲备，国际貿易也保持正常关系之故。但自1938年初南京陷落以后，战局的前途已經很难看准，政府就在3月制定国家总动員法，即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在金融、产业和国民生活等一切方面强制建立总动員体系。加上以后制定的事业法、补助法、劳务統制和物价統制等許多法令，就全面加强战时体系。

政府是建立战时經濟体系的樞紐，因此政府各机关首先改組，新成立企画院和厚生省，改組商工省、大藏省、日本銀行和兴业銀行，并变更其机能。商工省改組以后，不仅成为生产、供应、消費、物价方面的纵的一元統制机关，而且陆海軍派代表常駐，实质上是朝着軍需省轉化。日本銀行的改組是适应减少現金儲备、扩充限額以外的担保发行額和改用管理通貨制等措施进行的，特别是經由这次改組，日本銀行就負責实施基于临时資金調整等法令的事

业资金与流动资金统制，变成执行政府金融政策的最高机关。改组兴业银行的目的是使其成为筹措军需产业资金的中心机关，为此提高了兴银发行债券的限额，并于1940年把资本额从5千万日元增加到2亿日元。1939年又曾颁发公司红利分配与资金通融令，规定可以用命令来指挥兴银放款，从那年令兴银向中岛飞机公司放款起，每年运用国家信用向军事产业投放的资金数额都很大。基于1940年制定的银行等资本运用令，用命令来指挥放款的办法还能施行于普通银行，从1939年以来，银行用联合放款方式来通融军需产业资金的活动日益增加，而其中心则为兴银。

产业统制也适应着政府统制机构而进行，特别是加强了配给方面的统制，各产业分别以中央统制机关为中心，实行高度组织化，并采用凭票配给等办法。为了实现振兴输出这一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起见，又从1938年6月起对羊毛、棉、人造丝等输出纺织品和杂货实行连锁制，策划经由自由竞争而促其发展。政府为了加强配给统制政策，还主要地通过工业组合来实行资材配给，于1937年和1939年两次修改工业组合法，把这种组合当作统制机关，增强其作用，并加以保护扶植。因此工业组合的经济意义就同过去不同，在军需产业的各部门中迅速成立，并在把中小企业编为垄断资本的分包单位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依靠政府的这种扶植，军需产业保证能够获得巨额利润，因此就有了迅速的发展。政府的扶植行为，不止是订购庞大的军需物资，而且订货额超过生产能力好几倍，1938年后还从临时军事费中先付价款，而且先期付款迅速增加；又在统制体系下优先供应资金、物资和劳动力，并付给补助费、津贴等，真是从各方面予以无微不至的保护。如据三菱经济研究所调查，8家钢铁公司的平均利润率(以使用的资本总额为基数)，1938年上期为11.5%，1939年上

期为 9.3%；而 11 家棉纺公司的同一平均数字为 6.7% 和 6.5%，成为鲜明的对比。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就迅速改营军需工业。

军需工业的这种利润率，是为了增加军需生产和扩充军需生产能力而造成的人为利润率，因此一般产业就被加上“和平产业”的名目，其发展受到显著的抑制。但因一般人对“和平产业”的产品需要很高，所以往往逃避配给统制，按黑市价格买卖，当然这些资本家的利润率和公布的不同。而军需工业的利润率中超过实际率数的一部分是由国家保障的，因此也不知道正确数字。据上杉正一郎所调查的纺织工业和工作母机工业的利润率，1939 年分别为 10.6% 和 45.4%，1940 年为 12.1% 和 56.2%，1942 年为 16.1% 和 69.7%（引自井上、宇佐美：《危机中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132 页），如果这些数字正确的話，工作母机工业的利润率就真是惊人了。过去我也曾计算过棉纺业的利润。根据我的计算，与使用的总资本额相较，1934 年的利润率为 15.69%，而 1940 年为 19.02%，即在战争期间还有所增加。这特别是由于 1938 年实行连锁制以来分配原料较松和 1939 年 8 月后成为制度的公定价格的计算方法有利之故（守屋：《棉纺生产成本分析》，213、232 页）。

总之在战时经济之下，资本利润超过平时的最高额，特别是军需产业利润的高涨有如幻梦。因此在企业内部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又有庞大的外部资金作为股票、公司债和借款而涌向军需产业，其情况见第 72 表。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借款和各种债务比股金增加得快，这些资金是在国家的统制和保障下动员兴业银行和普通银行贷放的。从七七事变爆发到 1940 年 3 月为止，贷给各种军需工业的资金在贷给工业的资金总额中所占比率，工作母机工业为 30.1%、电气及煤气工业为 25.1%、金属工业为 20.8%、化学

第72表 中日战争期间产业资本供应情况 (单位: 百万日元)

年 度	外 部 资 金				内 部 资 金			合 計	
	股 票	公 司 債	贷 款	小 計	资产折旧	留存公 司内部			
						小 計	小 計		
1932—1936合計	3,356	678	97	4,079	2,880	1,180	4,060	49.9(%)	8,139
1937	2,087	105	1,754	3,946	841	626	1,467	27.2	5,413
1938	2,308	588	1,955	4,851	1,020	570	1,590	24.7	6,441
1939	2,308	1,866	3,650	8,024	1,290	640	1,930	19.4	9,954
1940	2,970	1,823	4,104	8,897	1,331	1,921	2,552	22.3	11,449
1941	3,561	2,729	3,293	9,583	1,547	1,781	3,328	25.8	12,911
1937—1941合計	13,234	7,111	14,956	35,301	6,029	4,838	10,867	23.5	46,168
1942	3,988	9,667	5,926	11,881	1,710	2,176	3,886	24.7	15,767
1943	3,780	2,338	6,860	12,987	1,934	2,519	4,453	25.6	17,440
1944	2,696	3,349	14,824	20,869	2,102	2,986	5,088	19.6	25,957
1945	2,855	2,717	46,998	52,570	—	—
1942—1945合計	13,328	11,071	73,904	98,307	(22.7)	...

根据《日本兴业银行五十年史》，1957年版，392—393页，532—533页。

工业为10.7%、武器及配件制造业为5.7%，共达92.4%之多（日本銀行：《滿洲事变后的财政金融史》，1948年版，316頁）。

結果如第73表所示，产业结构中的重工业、化学工业与輕工业之間的比率就同过去处于顛倒的位置，同时銀行与重工业、化学工业的結合更为加深，国家与金融資本的勾結則有了划时代的加强。特别是重工业、化学工业中的資本集中与积聚十分显著，如自1937年到1941年为止，从昭和电气工业公司、日立制作所、理研工业公司、东京芝浦制作所等大规模企业开始，很多公司进行合并，被大企业吸收的公司，1940年有535家，計資金1,081,000,000日元；1941年有949家，計資金1,383,000,000日元。

財閥站在壟断資本发展的前列，他們經由銀行与产业的結合而进一步膨胀。三井于1940年把三井物产和三井合名合并組成資本3亿日元的新三井物产，还一举而筹集了在中国投资和扩充所屬企业的資金450,000,000日元，并統轄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大日本賽璐珞公司、东洋高压公司、日滿制鋁公司、丰田汽車公司、日本制鋼公司等企业。三菱也在1940年增加一倍資金，并公开出售股票，拥有大軍需企业三菱重工业和三菱电机、日本光学、日本电池等公司，在軍需产业方面大肆活跃。住友則經營了住友金屬工业公司、住友电綫制造所、住友化学工业公司、住友制鋁公司等企业，把命运寄托在軍需产业上。这些財閥又經由投放資金而与中島(三井)、日本氮气(三菱)、森、淺野(安田)等軍需壟断資本发生密切的关系。国家的統制起了为这些財閥和壟断資本謀取最大限度利潤的从屬作用，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也由于起这种作用而更加发展。

近卫的新体制意味着天皇制法西斯的完成，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在这个新体制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0年11月决定“日‘滿’

第73表 中日战争期间按产业区分的生产情况 (单位: 百万日元)

年度	金属	机械器具	化学	重工业、化学工业合计		纺织	食品	其他	轻工业合计	合计	调整数字
					%						
1931	431	498	813	1,742	33.7	1,926	837	669	3,432	5,174	
1936	2,209	1,716	2,111	6,036	49.2	3,655	1,360	1,307	6,222	12,238	11,831
1937	3,502	2,557	2,900	8,959	54.8	4,939	1,474	1,683	7,396	16,356	13,001
1938	4,687	3,821	3,460	11,969	60.9	3,984	1,786	1,927	7,697	19,667	14,820
1939	5,580	5,591	4,275	15,448	62.1	4,813	2,334	2,267	9,414	24,862	16,958
1940	5,572	6,772	4,734	17,079	62.9	4,874	2,465	2,734	10,073	27,153	16,546
1941	6,065	9,053	4,997	20,116	65.9	4,840	2,502	3,079	10,421	30,537	17,370
1942	6,626	8,964	5,455	21,046	70.1	3,559	2,430	2,992	8,981	30,027	

根据《日本兴业银行五十年史》, 420—422页, 564—565页; 合计的调整数字是按东京另售物价指数调整的。

中经济建设要纲”，明白宣示在产业、劳动、军事、交通等部门实行军事动员。又决定“勤劳新体制确立要纲”，加强了对本国和殖民地人民的法西斯剥削体系。政府还在1940年12月决定“经济新体制确立要纲”，并于1941年8月据以公布重要产业团体令，建立了垄断资本运用统制会实施强迫统治的体系。在金融方面，1941年7月发表了“财政金融基本方策要纲”，就动员国民资金、财政军事化和以日本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组织化等项作了规定。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殖民地更加强有力地发展，财阀和垄断资本家的最大限度利润因掠夺殖民地而成倍增加。鲇川的满洲重工业公司从战争开始后把国内资本陆续投入中国东北，其数额从1938年11月的250,000,000日元增加到1941年4月的1,498,000,000日元。日本氮气公司又扩充了朝鲜北部的庞大电气化学工业体系，1937年同“满洲国”在鸭绿江边联合修建水丰、丰满等具有国际水平的水力发电站。日军侵入中国以后^①，垄断资本家争先跟着军队到中国去活动。1938年国家资本和垄断资本联合成立华北开发和华中振兴两公司，以垄断的方式统治了铁、煤和盐业。南满铁道、三菱重工业、钟渊纺织、大日本纺织、东洋高压、王子造纸、旭玻璃、浅野水泥等很多公司也疯狂似的抢夺中国人办的工厂，或者借委托经营敌产的名义进行夺占。

由于人民的抵抗，在中国其他地区不能像满洲重工业公司在东北那样大肆活动，可是素来在中国活动的日本资本家却因加上新的掠夺而获得随心所欲的利润。例如棉纺资本家就假借日元同中国货币等价交换和用上海经济维持庞大军费的名义，公然在军队的庇护下把棉布走私到非占领区去，加上利用通货膨胀，而获

^① 此处系指七七事变后，日军进一步侵入中国。——译者

得巨利。日本还在财政、金融方面进行经济统治，不仅军队对占领地区的财政实行控制，还于1938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①1940年在上海成立“中央储备银行”。^②这些银行都发行纸币，但系毫无储备的不兑现的纸币，只凭军事的需要乱发，致使中国经济陷入通货膨胀的漩涡，中国人民受到更加残酷的剥夺。

三

这样产业就以军需产业为中心而向前发展。其进度见第74表。

第74表 中日战争期间重工业的发展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生 铁	普通鋼、 材	船 舶	汽 車	发 动 机	工 作 机	电 动 机
1937	106,797	883,959	208,821	146,712	111,992	72,641	50,951
1938	159,303	1,037,094	222,633	144,907	171,324	195,431	97,576
1939	227,151	1,109,987	195,588	157,876	182,959	345,522	112,183
1940	302,975	993,179	252,156	140,493	131,361	387,372	121,620
1941	388,346	937,590	231,084	123,679	175,760	404,308	133,779

根据《日本经济统计集》，但系生产数量已经判明和没有判明的各部门产值的合计数。

先就钢铁工业来说，政府于二二六事件后缓和了以日本制铁公司为中心的政策，准许所有日铁以外的钢铁厂建立高炉，以1941年为目标，制订了依凭钢铁联合作业的增产五年计划。七七事变后扩大了这个方针，并且明确地写在1937年9月制定的制

① 在华北沦陷区成立的敌伪银行。——译者

② 在大汉奸汪精卫伪政权区域内成立的敌伪银行。——译者

铁事业法上，建立了正式的自立体制。于是各钢铁企业纷纷建立高炉，如八幡的两座1千吨高炉、广畑的两座1千吨高炉、釜石和翰西的7百吨高炉和日本钢管的6百吨高炉等，此外还有日本钢管建立托马斯转炉，八幡建立带钢轧机。战争期间钢铁生产设备能力的增加见第75表。

第75表 战争期间钢铁生产设备能力 (单位: 千吨)

年 度	高 炉	平 炉	电 炉	压 延
1937 年底	2,460	3,905	720	6,117
1941 年底	5,249	5,836	1,539	7,841
1944 年底	5,558	7,156	3,337	8,939

根据广畑治哉、市川弘胜：《日本钢铁业的历史发展和技术上的进步》，载有澤編：《现代日本产业讲座》，Ⅱ，1959年版，58页。

如第75表所示，冶炼生铁的设备能力已经接近平炉，但是只靠钢铁联合作业还是不够，战时需要的增加使钢铁不足的情况无法消除，因此平炉工厂还是使用输入的生铁和废铁进行增产，钢产量竟达生铁的两倍半。由于上述依赖废铁的情况，所以美国禁运废铁一举就给钢铁生产以沉重打击，以后极力设法改用矿石冶炼，可是这时资材、原料、技术条件全都不利，所以未能成功。战时把钢铁需要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军部特别注意大治和海南岛等地的占领，又十分重视铁矿石和焦炭运输。

对于铁以外的金属，如金、铜、铅、亚铅等的需要也在战时增加，并因外国限制对日输出而奖励增产和加强统制。1937年制定产金法^①，1938年颁布重要矿产物增产法和用铜限制规则，1939年又设立帝国矿业开发公司，以便筹措增产资金。从三井矿山、三

^① 1937年8月制定的奖励生产黄金的法令。——译者

菱矿业起，各矿的生产量都有显著增加。

特别重要的是铝这项制造飞机机身的原材料的生产。1934年昭和电工首先用国产原料生产了588吨，以后又成立了几个公司，迅速发展，从1937年前后起大多改用铁矾土和拜耳法制造^①，生产量也从1937年的11,000吨剧增至1939年的22,000吨和1941年的5万吨。1939年制定轻金属制造事业法，古河和东京电灯公司还联合成立了具备年产氧化铝10万吨和铝5万吨的能力的日本轻金属公司。铁矾土的一部分得自南洋委任统治地，大部分从印尼、马来等地输入；政府为了防备将来输入断绝，又拿出许多辅助费来扶植用矾土岩等代用原料制铝的企业。

在动力产业方面，也加强了统制和增加了生产。就煤来说，为了应付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涨，曾订立五年计划，以图增产，并成立燃料局，开展与煤有关的广泛行政事宜，1940年又制定煤的配给统制法，以日本煤公司为中心，实行配给统制。为了贯彻增产政策，还按照成本规定购买能率低的煤矿产品的价格，并用辅助费来弥补购买价格与出卖价格之间的差距。于是煤产量就从1937年的4,500万吨提高到1940年的5,700万吨。但是煤矿经营却因此而松弛，采掘机构不再推行合理化，煤质低落，1940年后煤产量也趋于减少。

在石油部门，扩大了对国内试掘和开发的保护扶植。1938年制定石油资源开发法；又奖励从煤里提炼，于1937年制定人造石油制造事业法和帝国燃料兴业公司法，并订定七年计划，以图增产。但是这个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结果石油储备日益缺少，竟成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因素，这是大家知道的。

^① 从铁矾土提炼氧化铝的方法(Bayer法)。——译者

又在电力方面，国营政策于二二六事件后有了进展，随着战时统制的实施，就“在国政一新的气氛中首先提出”这个政策。1938年成立了日本发电送电公司，以图对没有开发的水力发电、重要输电线路和火力发电站实行国营。战争期间发电量有所增加，于1939年和1940年达到60万千瓦。但是1939年受到水力和煤量不足的影响，不得不限制电力供应。为此1941年又把水力发电设备划归日本发电送电公司经营，以加强统制。配电业务，也在那年并归九家公司经营，这就完成了国家统制。

作为军需产业的机械工业发展特别迅速。如第76表所示，兵器需要的剧增促进了这一工业的发展。兵器生产已经不能专靠兵工厂，连军舰和枪枝也有一半以上向私营企业订货，战车、汽车、飞机等则百分之百依靠私营企业。

汽车工业在这个时期作为兵器工业而迅速发展。从1936年制定汽车制造事业法后，这个部门大规模地进行了工厂的新建和扩充，如丰田的举母厂、日产的横滨厂、东京汽车工业（内燃机汽车工业）的川崎（五十铃）厂、三菱重工的下丸子（扶桑）厂等。政府又在1938年11月制定的生产力扩充四年计划中，把汽车放在第一位，计划到1941年止把设备提高到1938年的5倍多，实行这个计划时也在物资动员上给汽车以优先权，结果在1940年和1941年生产了将近4万4千辆。但因这次增产是在不具备充分发展的材料工业、工作母机工业和刀具工业这种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汽车的性能很差；又从1939年起，汽车生产大部分限于军用货车、战车等军用車，民用車的生产则迅速减少。

至于飞机工业，在战争开始以前，海军已经制出九六式海军战斗机，陆军也制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其性能都达到了世界水平，成为中日战争的主力。在这个基础上，1938年制定了飞机制造事

第76表 中日战争以来主要兵器生产情况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軍 舰	枪 枝	火 炮	战 車 等 輛	汽 車	炸 药 类
1935	175,810	5,900	62,700	27,150	23,470	72,110
1937	116,900	10,620	23,800	25,300	42,800	171,330
1939	292,540	52,700	40,900	66,000	143,850	654,930
1941	380,540	110,450	97,000	243,000	215,000	590,000
1943	—	186,000	159,000	198,000	186,000	840,000

根据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第1卷,1950年版,488,567页。

业法,对飞机制造业给予极大的保护,结果产量迅速增加,三菱重工业还在1939年试制成零式战斗机。但是飞机工业的急剧发展尚有待于太平洋战争以后,1940年还只制出4,768架飞机,设备也还差。

造船工业经历了长时期的萧条过程,从1932年前后起,才依靠政府实行船舶改善补助计划等保护政策而复苏,年产量由1932年的53,000总吨增加到1936年的217,000总吨。战争期间更有进展,1937年订立了优秀船舶建造四年计划,增加订造数量;那年的产量达到399,000总吨,以后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太平洋战争发生为止。在造船业中,三菱重工业占全国造船能力的三成以上,1938年在长崎开始建造武藏号战舰,1939年和1940年又承造了后来改成航空母舰的一万几千吨的阿根廷丸和新田丸等最优秀的船只,此外川崎和三井的玉造船公司也占全国造船能力的一成,很是活跃。1941年吴港工厂开建大和号战舰,武藏号的完成则在1942年。

电机工业也有所发展,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充,产量从1935年的210,000,000日元增至1941年的620,000,000日元,并能制造各种电机,其中包括达到世界水平的鸭绿江水丰发电站的10万千瓦

安水力发电机和关西电力公司的 93,750 千伏安的透平发电机。这时电机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充, 芝浦于 1939 年同东京电气合并组成东京芝浦电气公司, 成长为综合的电机康采恩。日立制作所也吸收并吞许多企业, 成长为大资本企业, 此外三菱、富士等进行多种经营, 大事发展。

适应机械工业的上述发展, 素来落后的工作母机部门也迅速膨胀。政府于 1938 年 3 月制定工作母机事业法, 对持有 200 台机器以上的企业实行许可制, 保护奖励其发展, 因此历来同这个部门无关的三井、三菱、日立等财阀资本也插足进来。就产值来说, 1935 年只有 1,900 万日元, 而 1938 年达 204,000,000 日元, 1941 年达 318,000,000 日元,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还有增加。可是这个部门中的中小企业很多, 政府于 1938 年制定工作母机供应限制规则, 以图加强统制, 但中小企业还是陆续出现, 其制品大多性能低劣, 并在 1940 年前后呈现生产过剩状态。政府为了对付这种情况, 并增强作战力量起见, 曾采取一些提高工作母机技术水平的措施, 如公开 S 型标准工作母机、支付高级机械试制奖励金等。但因日本主要地还是使用一般性的工作母机, 就使机械和制品的恶劣程度更加严重, 而且切削机床、铣床、刨床等高级工作母机还是依赖外国制品, 国内自给率很低, 这就与低级工作母机过剩的同时成为兵器生产的重大困难。

四

輸入貿易在原料、資材、設備方面保障了軍需工業的上述迅速發展。為了獲得這些輸入物資, 戰爭初期輸出工業的擴充又在戰時經濟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現在先來看看第 77 表的(1)至(4)表所示貿易情況。

第77表(1) 中日战争期间的输出表 (单位:千日元)

年 度	总 計	生 絲	棉 織 品	人 造 絲 品	机 械	杂 貨
1937	3,175,418	407,118	573,065	154,860	109,881	203,676
1938	2,689,677	364,124	404,240	115,762	156,475	170,778
1939	3,576,370	506,845	403,946	137,358	209,206 (59,736)	264,051
1940	3,655,849	446,060	399,137	116,612	(57,135)	—
1941	2,650,865	215,706	284,180	60,459	(61,710)	—

机械栏内括弧里的数字是紡織机和电机的合計数。

第77表(2) 同 期 輸 入 表

年 度	总 計	豆 类	皮 棉	羊 毛	机 械	豆 餅	煤
1937	3,783,177	92,547	849,749	298,404	159,183	45,310	59,224
1938	2,663,337	102,176	436,323	94,426	236,354	60,112	67,217
1939	2,917,666	123,576 (114,805)	461,627	72,590	249,896	104,639	78,364
1940	3,452,724	(95,581)	503,595	105,251	—	—	—
1941	2,898,565	(105,656)	391,783	124,066	—	—	—

豆类栏内括弧里的数字是大豆、小豆的合計数。

如第77表所示,1937年入超6亿日元,是空前未有的纪录,为了在战时对付这种情况,战争开始不久就制定輸出入临时措施法,施行强力統制,并图实现貿易平衡。結果1938年的貿易量有所减少,即因棉花和其他輸出品原料輸入受到抑制,輸出也随之减少,从而扩充生产能力所需輸入物資也趋于减少。因此政府又策划振兴对美、英地区的輸出,从1938年6月起实施輸出入連鎖制,大約一年以后,对美、英地区的貿易有所扩大。但因輸出品单价連續下跌,貿易收支改善得很有有限。其后1939年7月日美通商航海条約被廢止,9月第二次大战爆发,輸出又陷于梗塞。

第77表(3) 同期間按地区区分輸出表

年度	“滿洲国”	“关东州”	中国	印度	印度	英	法	美	澳洲
1937	216,092	395,916	179,251	299,367	200,051	168,297	47,208	639,428	72,080
1939	535,681	755,913	455,479	210,995	137,802	132,085	25,934	641,509	72,101
1941	558,108	471,254	629,650	153,162	161,007	3,667	27	278,388	20,873

第77表(4) 同期間按地区区分的輸入表

年度	“滿洲国”	“关东州”	中国	印度	印度	英	德	美	加拿大	澳洲
1937	249,071	45,198	143,626	449,486	153,460	105,772	176,363	1,269,542	104,692	165,252
1939	403,561	61,750	215,662	182,263	71,629	24,426	141,003	1,002,381	126,022	71,026
1941	376,780	45,362	433,264	117,203	153,704	5,006	70,003	672,143	19,928	78,008

根据东洋經濟新报社:《經濟年鑑》,1941年版及《昭和产业史》,第3卷編制。

譯者按:“滿洲国”和“关东州”两栏合指对中国东北的輸出,“中国”栏指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輸出。

又自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以来,对美、英地区的貿易益趋困难,为了对付这种局势,就加强了貿易統制,策划成立日本貿易振兴公司来統籌制造輸出品所需原料的輸入,并經由輸出振兴公司或輸出振兴組合来增强輸出机构;又于1941年5月頒布貿易統制令,实行貿易的全面計划化。但因那年7月日軍侵駐越南南部,美、英对日实行资产冻结,致使美、英地区的貿易完全断絕,貿易就只限于日元集团地区了。

在这种情况下,輸出工业也随着貿易情势的变化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先就生产方面来看,关于占輸出工业主要地位的紡織工业的生产情况見第78表。

第78表 中日战争期間紡織工业的生产情形

年度	生絲 (千貫)	棉紗 (千捆)	人造絲 (千吨)	毛織 (千吨)	棉織品 (百万 日元)	人造 絲織品 (百万 日元)	絲織品 (百万 日元)	毛織品 (百万 日元)
1937	11,167	3,966	223	55	877	285	208	219
1938	11,507	3,268	256	43	643	231	274	220
1939	11,093	3,048	136	41	443	249	533	223
1940	11,405	2,451	103	31	430	172	605	199
1941	10,479	1,915	79	28	456	183	797	196

根据《日本經濟統計集》等,各項織品栏中的是价額数字,由于通貨膨脹,同产量数字是有相当距离的。

如第78表所示,到1940年前后为止,生絲产量差不多保持同样的水平,而工厂数則从1936年的2,468家减至1940年的1,773家,1941年又减至1,027家,但設備却差不多全未减少,这是把它們集中在优秀工厂里,以图实行合理化的結果。但日本生絲对美輸出量逐年减少,1937年有401,000俵^①,1940年只有265,000俵。政府

① 日本包装单位,輸出时合16貫(每貫合3.759公斤),在国内装运时合10—16貫。——譯者

曾于1936年修改蚕絲业組合法和制定蚕茧处理統制法,以图促进輸出。但在1941年对美关系更加紧张以后,情势完全不同,把輸出絲改为供应国内使用的絲,并在这个基础上改組蚕絲业就成为重要問題,为此政府在那年制定蚕絲业統制法,并成立实施这项法令的日本蚕絲統制公司,以便訂立以供应国内需要为重点的生产計划。但制絲业却从此一直走向衰落。

制絲业的原料是国内供应的,而棉业、人造絲业和羊毛业的原料全部或大部分依靠国外,資本有机构成也比制絲业高得多,所以在强力扩充軍需产业的情况下,很早就受到严格的統制,特別在設备資金和原料輸入上被当作“和平工业”而受到显著的限制,从而生产量就随着手头原料的缺乏而趋于减退。但是为了保证軍需資材的輸入,又不允許这些工业过于衰退,因此又研究过种种对策。其中棉业和羊毛业由于原料(棉花、羊毛)全賴輸入,从国际收支来讲,反而是入超的;人造絲业的原料浆有80%以上依靠輸入,由于原料浆所占成本費的比重較少,所以还是出超。对于棉花、羊毛和原料浆等原料輸入的統制是同振兴輸出相关連的,因此經過种种过程以后,終于都实行了連鎖制。实施連鎖制的主要目的固然是調整輸出入,但壟断資本家却借此在法律上确立了优势地位,結果紡織工业就显著地被編組起来。如在棉业部門,由于頒布了适应連鎖制的限制棉制品制造、加工和販卖的規則,又在制造供应国内使用的棉制品方面禁止使用棉花,实现了全部使用人造棉,所以棉紡业完全成为輸出工业。与这同时,織布业者在織制輸出布方面被強制改組为棉紡公司的加工厂,在法制上确定了一家紡紗厂控制一家織布厂或一家紗厂控制一家出租織机的行家的編制,使棉业机构起了变化。人造絲方面也因实施連鎖制而增强了人造絲壟断資本的統制力,他們对这方面的染、織业者的控制有了显著的进展。

連鎖制一直維持到1940年前后,但輸出价格逐年低落,特别是从1940年初以来,反映着国际形势,輸出梗塞,价格暴跌,其所受損失,則由按1939年后設定的公定价格在國內出售产品所获利益来弥补。这时連鎖制已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归于崩潰,但国家保证了壟断資本的利益,經由輸出振兴組合买进它們手头的滯銷貨品,后来却成为龐大的超額利潤的源泉。从1940年起又随着局勢的发展而改变了历来采取的以振兴对美、英輸出为主旨的統制方針,把紡織工业这一傳統的輸出工业改为基本上供应國內需要的工业,并从这点出发来加强統制,把企业改組成拥有达到一定标准的設備的单位,实行合并和联合。1940年11月后,織物業开始在商工省指导下进行合并;从同一月起,棉紡业者从原有的76家公司合并成14个单位;人造絲和羊毛等业也分別进行合并。但因原料輸入困难,作为輸出工业的前途暗淡,这些工业的生产也迅速低落。这时还曾实行开发中国棉花和发展本国人造絲浆,但是都沒有获得很好的成績。

五

产业的上述发展提高了壟断資本的利潤,并使其統治力量益趋增大。而构成日本产业构造的底层的中小企业却随着战时統制的加强而受到打击。在战争发生一年后的1938年9月,据兴业銀行調查,中小企业已經平均减产24%,特别是織物工业减产40%,印刷业减产67%,只有金屬机械器具工业微微地增加了1.7%。同时即使根据政府发表的数字,当时需要救济的中小企业就有39万家。政府筹划的对策,則为促使它們联合改組为适应时局的企业、貸放轉业資金、奖励它們替兴旺部門的大企业包工和归农等。

在中小企业中,与輸出工业或“和平工业”的厂家减少相反,軍需工业的厂家却在以后迅速增加,并形成地区的或各种产业的集

团,或成为大工厂的分包工厂,显示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即使在“和平工业”的场合,也因为国内需要随着物资不足而增加,以致迄至1940年前后为止,如纺织品所迅速表现的,黑市价格越来越比公定价格高,中小企业就在统制的空隙中维持它们的地位,大资本家也利用这种情况,停止进行包买那种商业资本活动,直接把中小企业编成自己的厂外部分。但自近卫新体制建立,国际形势更加紧张后,又改变了原来的统制方式,把强迫中小企业进行合并当作国策,致使中小企业的地位更为低落。1940年11月政府对纤维业发布调整纲要,接着于12月对机械工业和橡胶工业等发布同样的纲要,并以命令方式施行。结果纤维业者组成拥有一定设备规模以上的企业单位,机械工业中的中小企业被分别指定为专属某一大工厂的分包工厂,因而在法律上强使中小企业充当垄断资本的厂外部分。

工人阶级承担的战争负担最大。不仅陆海军在动员中拉走了大量生产劳动者,又因资本家过去专门依靠临时工,怠于培养熟练工人,所以在生产力扩大时感到急需大量劳动力。为此战争开始后首先施行劳动力配备的统制,在军需优先的原则下,于1938年4月修改职业介绍法,由国家来办介绍所,从1939年起每年订立劳务动员计划,并根据总动员法颁布学校毕业生使用限制令、职工使用限制令、国民征用令、国民就业能力申告令、职工移动防止令等,以加强统制。结果原有的募集机构消亡,在警察的控制下,勤劳动员署、小学校和衙署变成募集的中心机构,形成了战后职业安定所那种雇用刚从学校毕业的新劳动力的机构的类型。与这同时,工资因各方面争夺劳动力而上升。为了防止利润率由此降低,于1939年3月制定工资统制令,又制定工资临时措施令,以图从工资方面来压抑物价上涨。1940年10月把这些法令统一为修正工资统制令,对全部产业强制推行最低工资、最高起码工资和平均计时工资。

結果工人的工資被压低到比劳动力的价值少得多的水平，如第79表所示，实际工資逐年减少，壟断資本家利用工人对于生活的不安心情，随心所欲地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又普遍实行所謂敌前作业的战时型强制劳动，金屬工业和机械工业竟迫使工人連續工作36小时，让資本家加倍剝削剩余价值。可是这些措施却在扩充生产力时造成劳动生产率低落、工伤事故剧增和工厂中肺結核流行等情形，反而影响資本家的利益，因此政府不得不在1939年3月制定工厂就业时间限制令。政府对工人加强了警察式的管理，并采用納粹型的办法，于1939年11月在政府指导下成立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产报)，以图把工人的全部生活都放在壟断資本家的控制之下。

第79表 第二次大战期間工資的变动

年 度	定額工資指 数 (A)	零售物价指 数 (B)	实际工資指 数 (A/B)	实际零售 物价指数 (C)	实际工資的 調整指数 (A/C)
1937	82.4	174.3	47.2	112.9	73.0
1938	85.4	199.7	42.8	125.1	68.1
1939	93.3	223.6	41.7	140.2	66.5
1940	100.6	259.7	38.8	182.0	55.3
1941	106.2	262.9	40.5	212.3	50.1
1942	111.3	270.5	41.2	280.2	39.7
1943	118.6	287.0	41.2	324.8	36.4

定額工資指数根据昭和同人会：《我国完全雇佣的意义和对策》，第4部，統計，1957年版，165頁；零售物价指数和实际零售物价指数根据《日本經濟統計集》，260頁。零售物价指数是日本銀行按統制品的公定价格計算出来的；而实际零售物价指数則系以森田优三的估計为基础，考虑到黑市价格而計算出来的。据这本书的解說指出，实际上漲率比表列数字还要高些。

在近卫的新体制下，对工人的統制更为加强。政府于1940年11月决定“勤劳新体制确立要綱”，并修改国民征用令和实施青年

国民登記，1941年3月又公布国民劳动手册法。这样工人就在法律上被资本家束縛，而且不能阻止资本家任意收走劳动手册。这种統制随着局势进展而加强，把原来的移动統制改为劳动重点配备統制，扩充和加强了国民劳务总动员体系，特别是妇女劳务动员。1941年9月又把职工移动防止令和青少年雇用限制令合并起来，制定劳务調整令，并修改国民就业能力申告令，使之适用于妇女，还发布国民勤劳报国队令、主要事业場所劳务管理令等，使納粹型的劳役管理更加发展。

农民也被迫蒙受很大的牺牲。军队动员和生产力扩充所造成的工厂职工的增加大量吸取了农村的劳动力，連农家的戶主或基本劳动力也成为职工，致使兼业农户中产生“兼充职工的农家”这一范畴。这使素来依靠极端浪费劳动力来維持生产的农村受到沉重的打击，妇女、儿童、老人成为生产的主力，并使农业就业人口的构造发生变化，这对于战后发生的这种现象，即刚从学校毕业的新劳动力的就业場所由农业大規模轉向工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与这同时，可以說是历来維持农业生产的唯一資材的肥料，却因化肥工厂改制炸药而开始发生绝对不足的现象，致使农业生产力迅速由停滞轉向低落。政府只好奖励增产自給肥料，并頒布临时肥料配給統制法和硫酸增产及配給統制法等，以資对付。可是这些办法在增加壟断資本的利潤和地主的权力上是起了作用，而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却没有什么好处。

战时确保粮食是必要的，政府就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而加强农业統制，其統制方針是建立把高佃租率、低米价和低工資統一起来的体系。政府在原有的米谷統制法之外，于1937年制定米谷应急措施法，建立了收买和发卖米谷的体系；1938年又制定土地調整法，以图从上面来調整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并于1939年制定米谷配

給統制法来加强米谷配給体系。基于这些法令，为了在米谷統制法所規定的最高和最低价格的范围内維持米价，不仅对米谷商人，必要时政府还可以对生产者 and 消費者发布关于配給的命令，另外設立了日本米谷公司，作为統一的米市場，以便进行市价控制活动。但是 1939 年日本西部和朝鮮发生大旱災，农业生产力的低落和投机性的搶购使米的黑市买卖橫行，这又使佃租和田地买卖价格高騰，結果使地主致富。于是政府于 1939 年 11 月訂定公布白米价格，接着頒布佃租統制令，虽对地主利益有所限制，但主要的目的是确保粮食。

自 1940 年 6 月以来，在近卫的新体制下，从頒布米谷管理規則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农作物的配給統制，建立了主食征收制度，因此从实施統制的目的出发，也需要用货币和代金来交納佃租。但因农业生产力繼續低落，1940 年和 1941 年的收成不好，助长了掠夺生产的傾向，迫使政府采取这种根本改革，以維持战时经济。即于 1941 年 8 月規定对征收的米給予每石 5 日元的生产奖金，而把地主出售米的价格固定下来，建立双重价格制。主食征收制度虽以地主对村落的統治为不可少的依据，但是双重价格制的采用却减少了名义上的佃租率，又打开了在地主保有米这部分以外用货币支付佃租的道路，严重地影响地主制的命运。但是政府对农村的統制，还是在地主制的基础上作为加强官僚統制而进行的。1941 年 9 月，政府依据农会法发动統制令，通过村落农业团体来加强联合作业和集团劳动轉移、統制作物以及强制实行联合利用农具和牲畜等；接着在 10 月頒布土地耕作統制規則，規定确保原有种粮食的面积和迫使原种受限制的作物的农户改种等，即对农民的生活实施强迫管理和統制。但是随着統制的进展，壟断資本的利益越来越比地主居于优先地位，壟断資本的低米价、低工資原則就通过

国家而直接强加在农民头上。

2.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

—

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12月爆发。日本海軍的航空队在夏威夷击毁了美国舰队的大部分舰只，接着在马来海峽歼灭英国舰队的主力；日軍于12月内侵入菲律宾、马来亚、婆罗洲、苏拉威西和太平洋各島，迄至1942年3月，攻取了新加坡、苏門答腊、爪哇和仰光，到5月为止，又全部占领了从菲律宾到緬甸的地区。

当时德国正以席卷全欧的大軍侵入苏联，与苏联进行殊死的激战；但在日本对美、英宣战以后，德、意也立刻对美国宣战，于是第二次大战就发展成为蔓延全球的民主陣营同法西斯陣营之間的战争。可是英国时刻害怕和全心提防德軍登陆，无暇他顾；美国也丧失了全部舰队，作战体制尚未完成，致使法西斯轴心国家的气焰因日、德进攻而十分高涨。但是苏联軍队和人民的英勇抗战一手扯住了德国的大軍，使之无力向别处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又阻住了蔣介石的叛变行为，坚决守住了民族的大旗。这种英雄的抗战行为鼓起了受法西斯軍队蹂躪的各国人民进行抵抗的勇气，占领地区的人民到处組織起游击战争，使美、英获得了挽回初战时的頹势的时间。

战争初期是有利的时期，对由于同中国作战而日益陷于困难混乱的日本战时經濟来说，又是大敌当前，急需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时期。在战争开始的前夕，近卫于1941年10月辞职，由东条英机組成軍事內閣，統治階級就在东条的强力独裁下把权力统一起来。在战争开始的同时，天皇制法西斯統治从全部政治、經濟領域贯彻到

国民生活的最低层，壟断资本家把国家壟断资本主义推进到最高度，并以壟断资本家的利益为中心而建立大规模的战时经济体系。

首先，对于产业这一战时经济的基础的统制，是从根据重要产业团体令设立统制会开始的。1941年12月第一次指定钢铁、煤、精密机器、汽车等12部门为重要产业，1942年8月又指定棉、人造棉、丝、人造丝、化学、轻金属等十部门，在这些部门中按照纳粹的办法成立统制会，分别任命壟断资本的代表充任统制会的负责人，把各部门的原料配给和生产限制等广泛的统制权限由政府通过统制会移给壟断资本。为了实行产业的战时编制，又策划把原来的输出工业改成军需工业，于1941年12月设立产业设备营团，负责进行未加使用的设备的接收、保管和调用；1942年2月设立重要物资管理营团，对重要物资的储藏和利用实行全盘统制；还任命壟断资本的代表充任这些机构的直接领导人。政府还在1942年5月公布企业整飭令，令棉纺和人造丝等输出工业交出未加使用的机器，在全部产业中强迫实行合并和工厂、商店的调整，并迫使中小企业大规模地进行转业和停业。

金融方面，则以日本银行为中心而充实扩大战时体系，于1942年2月颁布了日本银行法。根据这个法令，日本银行成为完全隶属政府的统制机关，负有无限限制地提供财政资金的义务，因而使经由管理通货来推进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度化，并把日本银行规定为“东亚共荣圈”的中央银行。又于4月制定金融统制团体令，5月设立金融统制会和普通银行、地方银行、人寿保险公司等九种部门的统制会；另于3月成立南方开发金库，4月成立战时金融金库。南方开发金库是配合军队的就地征发而在占领地区进行大规模掠夺的机关；战时金融金库则系适应太平洋战争的阶段，在要求通融资金时不顾盈亏的原则下，以代替兴业银行来直接投放国家资本为目

的而设立的。

对于劳动力，则依据1941年制定的劳务供需调整令和重要事业场所劳务管理令，实行直接的军事、警察统制，使工人的饮食睡眠时间等全部生活都受资本家的管制。又制定征用令，强迫征用人民从事劳役，以补救劳动力的缺乏，征用人数，1941年为26万、1942年为31万、1943年为70万；另外强迫征用的朝鲜人数目，则1941年为5万，1942年增至11万，1943年又增至12万。

对于农业的统制，也同战时粮食问题相结合，从战争一开始就实行加强。1941年12月颁布了农业生产统制令，经由农会订立生产计划和实施对于农民离村的统制，1942年2月又制定粮食管理法，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粮食营团。此外还采取了以下措施：即进一步加强征收粮食制度；实行学生、儿童的劳动动员，以补救劳动力的不足；推行联合耕作；为了增产粮食，在裁减桑园和其他经济作物的耕地和改种粮食的同时施行米的双重价格制，使实际上的佃租率更为减少。对于农业团体，则于1943年3月制定农业团体法，把农会和产业组合等农业团体统一为农业会，另外设立了全国农业经济会和农林中央金库。

但是尽管加强了战时经济体制，而战争指导者们并没有同强大的敌人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们沉醉于初战的胜利，差不多全不考虑困难得惊人的战争的前途，垄断资本家则领先赶到南洋去分夺赃物。诚然，由于占领南洋，日本是获得了巨大的赃物。特别在战争开始时，石油储存量为4,300万桶，预料大约可以用两年，而在南洋的占领地区，1942年生产2,600万桶，1943年生产5千万桶，把三分之一运往日本，因而使石油问题有所改善。同时铁矾土的1941年12月储存量为25万吨，只能使用9个月或6个月，1942年7月又减至173,000吨，而从南洋占领地的输入，1942年为45

万吨, 1943 年达 821,000 吨。

可是日本的战争指导者只打短期作战的算盘, 没有从长期消耗战这方面来考虑日本的经济能力。他们没有订出全盘提高生产水平的计划, “深信为了进行战争本身, 只须具有差不多能在一年以内达成最初的征服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就行了”(美利坚合众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 日译本, 1950年版, 33页)。当然军需品的产量是增长的, 如自1941年至1942年, 船舶从21万吨增至26万吨、飞机从5千架增至8,861架, 大炮产值从9,700万日元增至124,000,000日元。但是并没有采取在最大限度上供应基本物资的措施, 军需品产量虽有增加, 而在1942年所占生产总额的比重也只增加5%, 与战争的规模相较, 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是贫弱的。

二

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是战局的转折点; 从8月起, 在瓜达尔卡纳尔进行了半年激战以后, 战局的主导权就从1943年2月起转入敌方之手。在欧洲战场上, 33万德军于1943年2月在斯大林格勒被歼, 苏联在1943年一年内收复国土的四分之三; 美英联军也在那年于非洲和西西里登陆; 9月意大利又退出战争。

到了1944年, 太平洋战局更为吃紧, 特路克岛基地失守, 新几内亚完全被对方占领, 6月马利亚纳群岛失陷, 缅甸战线也从8月前后起陷于崩溃状态。在欧洲战场, 美、英军于6月在诺曼底登陆, 9月收复法国; 东战场的德军到9月止丧失了120个师团, 红军从苏联领土向巴尔干进击。

面临战局的这种转变, 统治阶级和政府才十分惊慌, 并以飞机和船舶为中心而迅速增强军需生产。增产的杠杆是以临时军事费

为主的庞大财政开支,其数额如第80表所示,是迅速增加的。与此同时,又从1942年起大规模地增加了67亿日元以上的租税,计自1937到1944年为止,租税收入由15亿日元增至116亿日元。但是以军事费用为中心的岁出的膨胀差不多全靠公债和借款来支付,如第80表所示,其数额从1942年起共达1,455亿日元。关于公债的发行,从1943年起取消了发行限额,并通过强制国民储蓄和摊派公债来追销。日本银行纸币发行额也随着增加,计自1941年底到1945年6月为止,由59亿日元增至262亿日元,因而使通货膨胀加剧。

经济统制也进一步加强。1943年6月制定“战力增强企业整飭要纲”,1944年1月制定“第二种工业部门企业整飭要纲”,并以此为根据,大规模地迫使许多企业并入或转营军需工业。不少纺织工业和日用品工业的工厂被封闭,金属品被接收,设备、资材、劳动力等被强迫转用在飞机制造上。至于裁并情形,1942年一共进行了410次,设备资材值29亿日元,1943年又增至570次和78亿日元。

如第81表所示,纺织工业早已趋于衰退,其中棉纺公司并为10家,人造丝公司也减少到5家。对其他产业也强迫实行企业集中,如据柯亨调查,到战争结束为止,涂料工厂由300家减至60家、水泥公司由20家减至6家、玻璃工厂由800家减至90家、船舶公司由234家减至10家、制革工厂由700家减至28家。此外停闭的小卖业,据说还有米谷商43,262家、糖果铺8,030家、石油贩卖业1,428家(柯亨:《战时战后的日本经济》,上卷,日译本,1950年版,148页)。进行上述裁并所得的资金、工厂、金属和职工一起转用于军需工厂,结果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所占生产总额的比重,1942年为70.1%,1945年又增至75.9%。

针对着劳动力的缺乏,政府于1943年5月发表“勤劳报国队

第 80 表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军事费和公债

年 度	岁出总额 (千日元)	临时军事费 (百万日元)	战费总额 (百万日元)	按1953年价格 水平折算的战 费总额 (百万日元)	公债和借款 (百万日元)
1941	8,133,891	9,487	13,212	2,655,612	9,283
1942	8,276,475	18,753	19,854	3,674,840	12,345
1943	12,551,813	29,818	32,635	5,654,505	24,722
1944	19,871,947	73,493	77,422	11,845,566	63,423
1945	21,496,189	6,448	546,305	55,176,805	44,455

根据大藏省与日本银行合编：《财政经济统计年报》，1948年版；宇佐美诚次郎：《临时军事费》（《昭和财政史》第4卷），1955年版，386、389页编制。战费总额是临时军事费和一般会计中的战费等项的合计数，1945年战费的大部分是外资金库损失额，计524,681百万日元。

第 81 表 太平洋战争期间制丝业和棉业的衰退

年 度	制 丝 业			棉 业			
	工厂数 (家)	设备台数 (台)	产 量 (千贯)	纺锭数 (千锭)	织 机 总台数 (台)	棉纱、人 造棉纱 产量合计 (捆)	棉织品 产 量 (百万磅)
1941	1,027	150,845	9,038	11,435	393,291	1,922,858	1,329
1942	540	66,841	6,342	8,646	358,895	1,053,362	1,349
1943	389	46,377	2,561	4,166	203,840	713,129	1,083
1944	196	23,762	3,861	3,592	148,785	437,623	180
1945	160	21,800	1,373	2,713	136,071	165,574	55

制丝业据马场启之助编：《蚕丝业的经济分析》，1950年版，95—96页；棉业据守屋：《棉纺生产成本分析》，1953年版，216页。

整飭要綱”，6月設立大日本报国会，进一步加强征用。还在同月內頒布工厂法战时特例，廢止工厂就业时间的限制；并制定“学徒战时体制确立要綱”，組織妇女勤劳报国队，9月又修改劳务調整令，禁止男子在17种指定的职业中就业，由女队员填补。到了1944年，則于1月发表“紧急国民勤劳动員方策要綱”，扩大国民登記

制；接着把妇女勤劳队改为妇女挺身队，更行加强；又决定对中学生实行勤劳动员。在强征朝鲜人服劳役方面，则进一步使用暴力，甚至不经征用手续，即由警察和地区委员在朝鲜各村落中用运货汽车搜劫青壮年，送往日本。因此1941年居留日本的朝鲜人数为150万人，而在日本战败时增加到200万至240万人，他们大部分在宪兵、特别高等警察和密探组织的监视下从事奴隶般的劳役。

政府组织也有所加强，特别是在1943年4月制定战时行政特例法，在东条之下统一了增强钢铁、煤、轻金属、船舶、飞机这5大重点产业生产所必需的最高行政权。同时东条又在经济方面的首脑人物中任命7名内阁顾问，同各省大臣一起组成战时最高经济会议；并公布行政监察规定；还在6月制定地方行政协议会令，使总理大臣可以不经过各省而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对其战时政策，特别是经济统制进行指导。那年又废止商工省和企画院，11月创设军需省，实行一元化的军需统制，由东条兼任第一任军需相。同时制定军需公司法，给与根据这个法律指定的军需公司以特定的义务和特权，建立了五大重点产业，特别是飞机和船舶的飞跃增产体系。1944年1月，第一次根据军需公司法和以有关飞机制造的公司为中心，指定了150家军需公司，以后又在金属、煤、电力等部门中指定了几次，到战争结束为止，一共指定了706家公司。

结果日本战争经济虽然包含许多矛盾，还是迅速达到了高潮，关于重要军需品的产量见第82表。

飞机生产增加得特别迅速，从1942年的8,900架起，1943年增至16,693架，1944年增至28,180架；如第83表所示，飞机工业的资本，只算其机器设备，就很有发展。而且不止主要的工厂发展，还利用了大批分包工厂，并依靠征用制和剥削兼充职工的农家成员从事半封建的强制劳动来获得必要的劳动力。如以中岛飞机公

第 82 表 太平洋战争期间军需品产量

(单位: 百万日元)

会计年度	商船	军舰	海軍兵器	陆軍兵器	汽車	飞机	总计
1941	402.5	1,014.0	972.4	956.5	691.4	1,080.6	5,117.4
1942	544.8	1,112.4	1,539.7	1,261.9	426.6	1,842.7	6,728.1
1943	1,411.2	1,476.4	2,550.6	1,586.0	308.8	3,686.8	11,019.8
1944	1,665.6	2,098.5	4,638.0	2,107.0	269.7	5,024.1	15,802.9
1945	165.3	404.2	1,130.4	454.8	36.0	1,216.6	3,407.3

根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译本,1950年版,283页。
价格是1945年的。年是会计年度,即当年4月到翌年3月,1945年只有4月到7月这四个月的数字。

司为例,它“以太田、小泉、宇都宫、半田(以上制造机身)、武藏、大宫、滨松、大谷(以上制造发动机)、荻洼(制造工具和补助器)、三岛(制造兵器)等制造厂和三鹰研究所为中心,组织了2,500家以上的分包工厂,只算吞龙、田沼、伊势崎第一、半田、岩宫、滨松等厂,就直接剥削大约21万余工人,加上受其间接剥削的,即在分包和再分包工厂从事雇佣劳动的人和挺身队员、报国队员与其他临时工人,简直有百万人上下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为中岛一家干活”(丰原一郎:《关于财阀解散》,载《前卫》,1946年5月号,16页)。同时向这些工厂提供劳动力的群馬县的兼业农户占居全国首位。为了增加飞机生产,还在1945年5月采取关于工作母机的紧急措施,奖励生产具备专门机能的工作母机,从1944年2月起,甚至根据“设备机械动员实施要纲”,把不算急需的产业正在使用的工作母机动员到飞机工业去。可是生产出来的飞机性能很坏,而且越到后来越坏,竟达三架中有一架不能飞的程度。

此外如前列第75表所示,钢铁生产能力也在1941年后有所增大,特别是致力于增设电炉,以图增产特种钢;又在海运力量减退

第 83 表 飞机机身工厂的发展

	年 度	三 菱	中 島	川 西	川 崎
工 厂 面 积 (坪)	1938	66,000	40,311
	1939	59,300	44,900
	1940	117,012	75,300
	1941	150,012	94,550	50,958	53,400
	1943	221,202	190,590	208,681	184,000
	1945	341,256	252,025	359,575	292,944
工 作 母 机 台 数 (台)	1938	720	195
	1940	1,589
	1941	1,765	702
	1943	2,834	3,688	974
	1945	5,526	4,694	4,791	1,634

(1)根据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第1卷,616页。

(2)译者按:坪为日本面积单位,合3.3058平方米。

时支付巨额补助费和采取补偿金制度来保障生铁、钢材和特种钢等的生产,重量不重质,力求增产。造船方面,也自1942年起按照海军的计划开始大量建造战时标准型的船只,造船数量,1943年为294艘,80万总吨、1944年为762艘,173万总吨。关于太平洋战争期间重要基本资材的产量见第84表。

在这一增加生产过程中,必须在本国的势力范围内求取所需原料资材。政府于1942年12月决定“贸易业整飭要纲”,推行贸易业的集中,又于1943年7月设立交易营团,把贸易业者当作承办机关,在一元统制下实行整个势力范围的对外计划贸易。但是贸易额随着战局加剧而逐年减少,而且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的贸易占七成到九成,对南洋各国的贸易几乎微不足道。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大原因是敌国实行海上封锁和船舶的丧失。船舶的持有量,就500总吨以上的钢铁船来说,在投入战争时有592万吨,战时建

第 84 表 太平洋战争期间基本物资的生产情况

(单位: 千吨)

年 度	生 铁	钢 材	氧 化 铝	铝	煤
1941	4,982	5,120	152	72	55,602
1942	5,184 (4,306)	5,166	226	103	54,178
1943	4,947 (3,813)	5,609	318	141	55,538
1944	3,655 (2,713)	4,320	225	110	49,335

根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的附表编制。生铁栏内包含输入数量,括弧内的是日本国内产量。

造、捕获和捞上来的有 410 万吨,而在这些船只中,迄至战争结束为止,沉没的达 862 万吨,特别是从 1943 年起迅速减少。因此战时经济虽然在 1944 年达到最高点,但是随着海上交通断绝,石油、焦炭、铁矿石、铁矾土等输入减退,飞机、火药、粮食等一切物资的生产也趋于减退。

可是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资本力量显著增强;财阀和垄断资本家的统治力量也更为增大。据持股整理委员会的计算,在 1946 年 9 月,直属三井的公司有 66 家,缴纳资本为 2,452,000,000 日元,旁系公司有 212 家,缴纳资本为 3,061,000,000 日元;直属三菱的公司有 32 家,缴纳资本 2,054,000,000 日元,旁系公司有 157 家,缴纳资本 2,704,000,000 日元;直属住友的公司有 24 家,缴纳资本 1,074,000,000 日元,旁系公司 119 家,缴纳资本 1,667,000,000 日元(持股整理委员会:《日本财阀及其解散》,1951 年版,95、113、132 页)。它们的规模都比战前扩充了几十倍。财阀把主要力量完全放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上,就缴纳资本来看这两部门所占比重,则三井为 72.6%,三菱为 71.5%,住友为 79.9%。又

在战争结束时拥有名义资本1亿日元以上的大公司中,大部分机械制造公司属于财阀资本,它们从三菱重工业公司(资本10亿日元)、东京芝浦电气公司(622,000,000日元)、扶桑(住友)金属工业公司(419,000,000日元)、日立制作所(7亿日元)、川崎重工业公司(6亿日元)起,都是在战时迅速扩大的。这些公司在国家保障下获得庞大的资金帮助。例如拥有资本5千万日元的中岛飞机公司从兴业银行借得20亿日元,三菱重工业从三菱银行借得15亿日元,这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些产业同大银行的结合。

这种资金上的帮助,除经由命令金融机关贷放资金等原有办法外,又随着军需公司法的公布,采用了指定军需资金通融机关的制度,因而使军需金融更加扩大。指定金融机关负有在战时金融金库和日本银行帮助下对它所担负的军需公司进行适时、迅速和妥当的贷款的义务;被指定的银行按照1943年9月底为止的过去5年经营成绩决定,结果兴业、帝国、三菱、住友、安田、三和这六家银行贷放了军需资金的大部分,在战争结束时的军需资金贷放总额262亿日元中,由以上六行贷出的达254亿日元以上,这样大银行同大军需企业的结合就更加紧密。基于这种情况,银行合并有了划时代的进展,1943年4月,三井同第一银行合并成为帝国银行,三菱银行合并了川崎第百银行,安田银行合并了日本昼夜银行。在这同时,地方银行随着历来同它们有来往的商业部门和地方中小企业的没落而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就在政府的指导下按照一县一行的原则统一起来,农工银行也在1944年9月最后并入劝业银行。这些合并行动又进一步促使地方银行成为承购公债的机关,并使财阀银行把主要力量放在军需资金通融上。

三

这样以財閥为首的壟断資本家就壟断了国家經濟，攫取了幻夢般的巨額利潤。在龐大的軍事費中，兵士的薪餉很少，只作为“人件費”而占9%的微小部分，84%是“物件費”，其中大部分进入壟断資本家的荷包。特别是財閥的壟断企业通过企业裁并和强制性的集中、积聚过程而掌握了产业的大部分，因而获得战时利潤的一大半。

这时多数軍需工业的資本有机构成高，周轉期长，且須同时进行产业重新編組和扩大生产力，所以必須由国家来保障特別高的利潤率，这种利潤的取得不仅是通过商业行为，而且由国家用補助費和补偿金等名义无限制地提供。特別突出的是根据會計法战时特例扩大先期付款，在飞机、造船、机械等企业的使用总資本中，先期付款竟占五成至七成，各企业所接受的軍需品訂貨远远超过它們的生产能力。这里面发生許多不正当的行为，以下从會計檢查院于1947年发表的“临时軍事費檢查报告”所揭发的案件中抽出几件来看：东洋人造絲公司于1943年7月从海軍航空本部取得作为定制聚酰胺合成树脂的先期付款2,672万日元，但只交出值115万日元的成品；从1945年初起，尼崎金屬工业和川崎重工业等六家公司根本沒有必要的設備，就同海軍艦务本部的人員通謀，用H金屬品和S金屬品的价款的名义盜取101,690,000日元，在战后被揭露；还有兴东特殊工业和其他三家公司虽然沒有制造各种汽車的能力，而軍需省航空兵器局却从1943年前后起向他們定做这类制品，获得1,406万日元的巨額先期付款（大藏省昭和財政史編輯室編：《昭和財政史》，第4卷所載宇佐美誠次郎：《临时軍事費》，附录，418、421、426頁）。

不仅军需产业获得上述利润，即使在进行企业裁汰时受到牺牲的产业中，裁汰措施却使壟断资本因竞争者的减少而加强了壟断体系，又因国家按照将来使用的价格收买剩余的固定资产而博得巨利。例如到战争结束为止，棉纺织业进行裁汰的结果，纺机 1,378 万锭中有 1,019 万锭、织机 407,500 台中有 258,700 台被毁，所得的铁共达 488,000 吨，棉业资本家不仅由此卖得比机器大几倍的价款，而且用有利的代价把不需用的厂房和宿舍建筑与传动带、电气设备等物件分别出售或出租，获得 30 亿日元以上的巨利（守屋：《棉纺生产成本分析》，218 页）。

战争就是这样给壟断资本带来惊人的财富，壟断资本家的腐化也越来越迅速和加深。而在壟断资本横行的同时，大部分人民为壟断资本家和军部服役，其生活极为悲惨。存在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已经不是契约关系，而变成囚徒劳动，又如前列的第 79 表所示，实际工资已经下降到 1937 年水平的一半，工厂就业时间令早已未加实施，或者事实上遭到无视，迫使工人以“符咒”的精神从事耗尽体力的劳动。可是工人的数目却趋于增加，如工业总劳动力所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率即由 1930 年的 21.1% 提高到 1940 年的 26.8%，1944 年又提高到 32.5%，特别是金属和机械等工业的工人的比重提高得快。政府在许多熟练工人被动员入伍的条件下，从所有阶层的人里强制征用劳动力，如女工代替男工、征用勤劳报国队员、动员学徒、征用朝鲜人、役使俘虏等，大量使用不熟练的工人。工人在宪兵的监视下从事奴隶般的劳动，但还是进行自发的反抗，即使根据政府的统计，从 1941 年到 1944 年为止，工人争议就有 1,303 件，参加者 53,000 人。

在农村中，农业劳动力因征兵和征用工人而激减，肥料、农业机器和农具以及农药生产资料等也极感缺乏，但还是加强征粮制度。

1943年5月发表战时粮食自给对策，定出村落交粮责任制；1944年4月又制定谷米增产及交粮奖励特别措施，实行事前摊派和超额奖励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甚至使贫苦佃农交出答应退还给他们的口粮，在恶劣的生产条件下忍受着被称为“穿上木屐”^①的沉重负担，相反地摊在地主和村里有势力的人身上的征米负担却很轻，因此他们能够留下不少黑市米，并获得很多管理米^②和奖金。地主依然不问年成好坏，向佃农剥夺实物佃租，并在村落交粮责任制的名义下督促贫农交粮，收回佃租地的情形也趋于增加。同时农业生产力低落，耕地显著荒蕪，每反平均产量和耕作面积都逐年减少。这一切激使农民加强反抗，虽在特高警察的严格监视下，佃农争议依然增加，如1940年全年只有2,160件，而1945年上半年就有4,427件。

特别是粮食问题使人民生活陷入悲惨境地。自从外米输入发生困难以后，1941年起就在六大城市实行粮食配给制，1942年后又普遍施行，由粮食营团统一办理。在配给制度下，作为配给标准的主食量从一开始起就压低在每个消费单位每天2至3合的低水平上；起先只配给米，后来逐渐配给麦、芋和杂粮等。到了战争末期，虽然名为主食配给，却把范围扩大到用芋叶和柿叶制成的粉末等所谓未经利用的资源，因此人民迅速陷于营养不足状态，1944年每人每日平均热量只有1,900卡路里，1945年配给标准量又减少到2.1合。并因优先配给军用米和劳务加配米，而且在实行优先配给时经常发生弊端，所以更加重了一般人民的困难。官僚依凭邻组制度，^③

① 事前摊派征粮数额时，不管土地好坏，按土地面积确定，致使持有坏田的贫农负担加重。所谓“穿上木屐”，是指脚背穿了木屐而高于地面之意。——译者

② 在村落交粮责任制下，地主负责办理征粮，获得管理米。——译者

③ 根据1940年内务省令成立的压制人民的组织，由近邻十户左右的居民组成，政府通过这个制度，利用各村落和街道上的恶霸对人民进行监视、统治和动员。——译者

将其统治伸展到人民生活的最低层，宪兵、警察监视着人民的一举一动。同时强迫人民交出金属品和改食代用品，而且黑市横行，衣料也很缺乏，连修修补补都感到困难。

壟断资本家和军队在殖民地和占领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掠夺。这里且不叙述后来在东京军事法庭揭露的抢劫、强奸、杀人、集体屠杀和各种见不得人的劫夺行为，如夺取被褥里的棉花做纺纱原料、偷运鸦片、绑票、海盗行为等。至于公开的“经济措施”本身也是掠夺，特别是一开始就采取了军用物资的就地征发和各地自给方针，同时发行毫无担保的银行纸币和军票等，计自1941年至战争结束时止，台湾银行纸币由250,000,000日元增至23亿日元、朝鲜银行纸币由7亿日元增至80亿日元、“满洲中央银行”纸币由12亿日元增至88亿日元、“蒙古银行”纸币由1亿日元增至36亿日元、“联合准备银行”纸币由9亿日元增至1,326亿日元、中国事变军用票由2亿日元增至25亿日元、“储备银行”^①纸币由2亿元增至26,972亿元、南方开发金库^②券由3千万日元增至194亿日元(宇佐美，《临时军事费》，337—338页)。这使殖民地和占领区也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所袭击，以1941年为基准，到1944年为止，物价涨了100倍到1千倍或2千倍，剥夺了居民的生活物资，同时没有价值的纸币横行。

但在国内外人民受到上述苦难的同时，争取建立新民主体制的力量也在成长。在残酷的镇压下，虽然没有在国内发展为有组织的运动，可是随着战败的迫近，人民迅速丧失斗志，厌恶战争，不

① 上述“满洲中央银行”、“蒙古银行”、“联合准备银行”、“储备银行”均系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内蒙、华北和其他沦陷区设立的伪银行。——译者

② 南方开发金库系日本在1942年到1945年期间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占领区设立的金融机构。——译者

願为战争出力。这时大批工人实行缺勤和怠工，农民不願交粮，人民对軍部和官僚的譴責也日益普遍。

殖民地和占領区各国人民自己拿起枪来进行抗日战争。他們通过抗战体会到人民民主力量的国际共同責任，自觉地发揚民族独立和民主精神，中国共产党还向日本军队进行了工作，发动日本兵士献身于反帝斗争。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殘暴的瘋狂行为中，自己在国内外造成了强大的反对力量迅速成长的条件。

四

1944年中期以后，战争的前途已經成为定局。馬利亚納群島失陷后，东条內閣于7月垮台，10月联合艦队在雷伊泰灣海战中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1945年1月美軍于菲律宾登陆。在欧洲，苏联紅軍于2月解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并使匈牙利摆脱战禍，接着于4月攻克柏林。在西战场上，盟軍于3月越过莱茵河，4月苏、美两軍于易北河边会师，德国被迫在5月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軍从3月起开始全力轰炸日本本土，全国主要城市大半燒毀，6月美軍占領冲绳。

日本作战力量的毁灭又是經濟力量迅速毁灭的过程。随着战局的恶化，日本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弱点就在各方面暴露出来，維系經濟结构的連鎖到处被切断，使日本經濟陷于不可收拾的局面。壟断资本主义同地主制的矛盾使粮食情况演变到最严重的程度，大部分人民营养不足，半奴隶式的强迫劳动又使工人不願进行生产。同时軍事性的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使贪污行为一般化，盜取国家財富成为公开的行动；而且“军队公然做黑市，民間秘密做黑市”，結果人民的家财和必需品都被军队和壟断資本夺去。敌国的軍事攻击扩大和暴露了这些弱点，终于使日本的軍事、經濟和政

治力量陷于无法支持的状况。

敌方的军事攻击集中于破坏日本的运输力量。日本船舶的85%被击沉，剩下的也大半受到严重损伤，以致不堪再用，在战争结束时，能用的只有56万吨，并且都是低速和小型的。船舶的丧失使日本同大陆与南洋之间的运输停顿，铁矿石、焦炭、石油、铁矾土、盐、粮食和橡胶等必需的原料和资材都无法到手，所以在空袭以前，日本经济的基本支柱已被打垮。随着战争逼近本土，沿岸航线也发生危险，由于在港湾和沿岸海面布满水雷，特别是从1945年初起在关门海峡散布水雷，就使破损待修的船舶显著增加，从而使煤和其他重要物资的运输更为困难。这时有越来越多的沿岸水运被陆上运输代替，而铁道是唯一存留的运输工具，汽车运输因可用车辆和石油的缺乏而迅速受到限制。同时铁道亦因负担日益加重，和失于维修而致能率低下，又因青森至函馆和关门至釜山的連絡船差不多全被击沉，致使本州岛陷于孤立。

飞机生产因空袭和疏散而大为减低，在战争结束时，发动机产量每月为600台，机身产量每月为500台，与空袭开始前的1944年10月相较，只分别合到16%和21%。而且柯亨指出，假如生产水平稍为提高一点，就会把存铝用尽，又因缺乏特殊钢，所以在生产发动机方面实已束手无策，即便有了发动机，飞行用的汽油也差不多使完了（柯亨：前引《战时战后的日本经济》，159页）。石油和铝的生产由于原油和铁矾土的输入断绝而几乎陷于停顿，在1945年7月时，石油精炼量竟不到1943年的15%，原铝则仅相当于1944年出现的最高产量的9%。

电力和煤的消费量也于1945年7月减低到1944年出现的最高点的50%。电力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需要降低，而不是生产减退，煤减少的主要原因则为由北海道和九州启运的国内海运衰退，

而铁道无力加以弥补。又因煤矿在战争期间依靠200亿日元以上的补助费滥行采掘,无视改进技术和补修矿井,并大批役使殖民地的劳动力和俘虏等,而致矿井显著荒蕪,生产效率也大为减低,如每人平均采掘量即由1941年的13.7吨减至1945年6月的8.9吨。最严重的是钢铁生产的减低,由于铁矿石和焦炭的输入断绝,只好极力在国内收买和令工厂交出存余的废铁,到了1945年,废铁供应量剧减,结果1945年第一季度的产量只相当于1943年出现的最高产量的32%,钢块和钢材制造厂的开工率只合设备的21%。这种开工率低落和资材不足的情况使生产能力激减和制品质量降低,特别是特殊钢的生产不足成为重兵器和船舶生产的严重障碍。

到了这个时期,壟断资本家又以更大的规模来侵吞国家财富和掠夺占领区人民。例如由于轰炸而丧失机能、成为空架子的中岛和川西等飞机公司从1945年4月起表面上作价移归国营,此后改作第一军需工厂的中岛飞机公司在战败前5个月内花了29亿余日元,对于这种浪费情形,只说是“帐簿文件丧失,无法全盘追究”而一笔勾销。改成第二军需厂的川西飞机公司的腐败行为也不相上下。

在占领区各国,军队和派駐机关变成了公开的掠夺组织。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在1945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用日元和按公定兑换率把占领区通货折成的日元编制的临时军费预算显著膨胀,光用原来的银行纸币和军用票进行掠夺已经感到不够。因而在1945年2月制定外资金库法,改用以外资金库调整金为担保的资金证书来支付占领区陆海军的经费,迄至战争结束为止的半年之间,一共发行了5,555亿日元资金证书。据规定这种证书可以在日本胜局确定后加以调整整理,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纸片,日本帝国主义却在战败前短短期间凭此向占领区人民夺取了值55兆日

元的物资。

于是日本就走向败北。对此起决定性作用的是8月9日的苏联宣战。苏军一出兵就立刻席卷中国东北,迫使天皇于8月15日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大战就结束了。日本所受的战争损害,人的方面,死亡和失踪的有四百几十万,受到损害的有900万;物资方面,一共损失1千亿余日元,个人财产的损失达200亿日元。可是日本统治者始终力争的投降条件,却不是人民的和平生活,而是保持天皇制。

第十章

第二次大战后占領下的經濟

1. 战后經濟的混乱和 美国的占領体系

世界法西斯势力在第二次大战中潰敗，使世界历史車輪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苏联在大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提高了威信，許多国家从資本主义发展道路轉向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大为扩展，社会主义体系由一个苏联发展成为世界体系，資本主义統治的地域比过去縮小了一半。

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发展，使社会主义阵营在两个体系的共处和竞争中日趋有利，加剧了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資本主义总危机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在社会主义体系获得胜利的鼓舞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由中国到印度尼西亚，由印度到非洲，威胁了帝国主义的后方。帝国主义的内部也发生动摇，德、日、意在軍事上潰灭，法国衰退，英国也削弱，在这些国家里面，饥饿和阶级斗争都加剧了。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沒有受到損害，它实行露骨的扩张政策，妄图統治世界，并作为世界反动势力的支柱，进行軍事扩张。

美国依靠各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斗争，才能在本意在于同日本

爭夺中国和太平洋市場霸权的戰爭中获胜，因此美国参加战争一举虽然算是站在世界民主力量这边，在打倒法西斯軸心力量上起了一点作用，但是美国統治者一看到自己賴以获胜的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力量强大起来，会妨碍他們的战后帝国主义政策，就感到十分憎恨，因此在战局确定对他們有利的战争时期，已經着手准备同这些力量斗争。美国政府在中国帮助蔣介石反动集团，把赫尔利派去，执行露骨的反共政策；在菲律宾，美軍在协同人民抗日武装扫蕩日軍告一段落后，立刻掉轉矛头对人民軍进行鎮压；在对日战争上，一方面恳求苏联参战，另一方面又在苏联参战前在广島投下原子彈。

美軍假借世界民主联合軍代表的名义单独占領日本，美国占領政策的基本打算，从占領初期起就充滿了帝国主义野心。但因日本帝国主义曾同美国在太平洋爭霸 40 年之久，美国打了 4 年大仗才击败这个敌人，所以美国的先决问题是首先給这个大敌以彻底打击，使它成为順从自己意志的僕从。由于日本还没有强大的民主力量，致使美国这个政策易于实施。因此美国最初的措施就是借着民主的招牌来打破日本的旧帝国主义体系。

在世界民主力量的帮助下，美国占領軍在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体系上采取了极强硬的措施。美軍在 9 月登陸时解散了日本軍隊，停止了宪兵的机能，并使警察的权力不能施行，又控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专制主义政权的中樞，迅速用自己的軍隊完成了軍事占領。10 月发布关于“取消对于政治、宗教信仰和人权自由的限制”的命令，撤銷旧的有关劳动和鎮压的法令和机关，釋放政治犯。接着发布以保障日本人民的基本人权与政治自由为目的的包括五項内容（妇女解放、工人团结权、教育自由主义化、取消专制政治、經濟民主化）的命令。以后还像連珠箭似的发布許多所謂“民

主化”的命令。其中包括关于解散财阀、赔偿、冻结皇家财产、设立战时利得税和财产税、冻结战时补偿费和土地改革等命令，又逮捕东条等战犯、不许包括经济界主脑人员在内的范围广泛的军国主义分子就任公职（整肃）、解散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并把国家同神道拆开^①。其中与后来恢复垄断体制关系最深的是征收财产税，当初的计划是要征收个人财产税 500 亿日元、法人财产税 200 亿日元、个人财产增加税 250 亿日元、法人战时利得税 50 亿日元，合计 1 千亿日元。占领军总司令部于 12 月 21 日宣布关于日本民主化的基本命令之发布已告一段落，28 日声明支持天皇制统治的基础已经丧失。

针对着这种措施，日本统治阶级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把自己的牺牲减到最低限度和保存实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北意味着这点：即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中，作为资本主义最弱一环的日本，其国内外的矛盾更加积累和扩大，终于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陷于站不起来的崩溃状态。军队被解散，就堵绝了过去那种帝国主义的扩展道路。这个强大的帝国主义之崩溃，又使东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摆脱它的压迫，朝鲜、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全部东亚地区都掀起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潮。日本原有的接近中国等弱小邻国的地理条件，这时却变成鼓励日本国内民主运动发展的条件了。

在这种情况下，替日本统治阶级留下的唯一道路，只是以保持国体为名，同战时一样地把全国人民集结在他们的绝对统治之下，

^① 神道教企图使人相信天皇是“万神之神”的后裔，而神又创造日本民族，因此日本是优越于各国的“神国”，明治维新后天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定神道教为“国教”，把政治和神道教混在一起，力图利用这种宗教来迷惑人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经盟军下令把政教分开。——译者

迅速巩固自己的力量。但是所謂护持国体，实际上意味着維持一个凭借天皇专制政权的壟断資本主义的腐敗、掠夺和奴隶劳动的龐大体系，結果只能使陷入貧困深淵的全国人民更加疲憊和貧苦。事实上政府在极力叫嚷护持国体和一亿人总懺悔时，于8月14日即已发布处理和隱藏軍隊保有的物資的命令，壟断資本家和軍隊上层人員借此公然开始大規模侵吞公有物資，又要壟断資本家于战后提出虛伪报告，据以大量散发临时軍事費，其數額于8月达97亿日元，9月达46亿日元，致使通貨膨脹以空前速度和龐大規模进行，进一步大規模地剝夺广大人民群众。資本家有意地进行生产怠工，并侵吞国有財產和从事黑市买卖，以图建立其复活基础，对于人民的苦难則絲毫不顧。地主也乘着停战时的混乱状况大事收回租出的土地，并掌握村政和农会的实权、隱瞞配給品、侵吞公物、任意規定征米配額，又与城市中的黑市商人和地方官僚勾結，力求自飽私囊。

在統治階級瘋狂地进行上述大規模掠夺时，人民的情况更为悲惨。工人大批失业，只算1945年12月登記的明显的失业者，全国就有男子178万，女子155万，合計333万，如果加上潜在失业者，实际数目恐达上数的四、五倍，連厚生省也曾发表1945年底的失业者推定数字为1,300万人。就业工人的生活也因惊人的住宅不足和粮食困难而非常困窘，甚至影响了劳动能力，而且把大部分工資用来做伙食費还是不够。农民亦无力购买肥料、农具等必要物資，土地生产力因而降低，又被强迫交出粮食，还要接待城市疏散人口与复員軍人，因此处境越来越坏。結果生产停頓、粮食緊張、在炸成焦土的城市里挤滿遭受战争災受害者、失业者和复員兵士，同时流浪者和餓死的人日益增加。这时人們都感到不能希望旧的統治階級来恢复經濟，旧統治者的威信迅速降低，日本經濟迅

速走向崩溃。

这时奋起支撑趋于崩溃的日本经济的，是受到世界民主力量支援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群众。从1945年秋天起，读卖新闻、京成电车和三井美呗等公司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生产管理斗争，本着人民要复兴经济的决心起来奋斗，这种斗争方式迅速为全国工人所采用。工会组织从1946年1月起飞跃发展。1945年底全国有工会508个，1946年6月有12,006个，增至24倍；在同时期内，全国工会会员数由379,631人增至3,679,971人，即增加到10倍。各产业的统一工会组织，从1946年2月到5月间扩展到所有的产业，建立了广泛的联合斗争组织，8月间这些工人又组成产业别工会会议（产别）。他们又在粮食问题上团结起来，同一般市民的斗争相结合，在东京、大阪等地成立了市民粮食管理委员会。农民也在各地展开解放土地、成立农民委员会等新农村机构等运动，并于1946年2月组成日本农民组合，组合成员人数，4月为28万，6月为60万，1947年又以倍加之势而扩展。日本国内垄断资本与劳动人民的力量对比在1945年秋到1946年整年之间发生迅速变化。可以认为，当时如果不是美帝国主义横加干涉和进行露骨镇压，劳动人民就会担负起日本经济的责任，建立崭新的体系。

国内矛盾以上述形态展开和发展，实在不是美国占领者和日本统治阶级所乐意的。美国占领军早在1946年初就丢掉了民主的假面具，急图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日本统治阶级也转趋与占领者步调一致。由于世界民主力量的压力，1945年12月成立了远东委员会^①，但在这个组织开始活动以前，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抢先迫令日本制定便于美国单独占领的宪法。这个宪法保存了天皇

^① 根据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在华盛顿成立了由中、苏、美、英等13国代表组成的决定对日占领政策的最高机关。——译者

制,企图将来在美国武器的基础上复活日本軍国主义,同时为了遮掩其野心,把世界民主力量的攻击减少到最低限度起見,又訂入放棄战争的条款和許多民主的規定。因此宪法中含有和平和民主的条款,并不是美国的意旨,而是由于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压力。

日本統治階級面临国内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漲和世界民主力量的攻击,只好勉强接受了这个宪法。他們虽然憎恶民主运动的发展,但因在国内外都陷于孤立,本身已經丧失卷土重来的力量,就决定屈从占领日本的美帝国主义,凭借它的力量,听从它的命令,在民主的假面具下制服国内的敌对势力。他們认为自己最大的任务是:即使牺牲本国的主权,也要和向往社会主义和进步社会的人民群众进行斗争,以恢复崩溃了的壟断资本主义体系。

美国的占领制度得到日本統治階級的积极协助,在1946年初迅速建立。在占领当局的支持下,日本政府于1946年2月发表了关于镇压工人爭議的四相声明^①,接着麦克阿瑟发表关于镇压工人爭議的意見,在同一个月內,为了救济金融体系的崩溃和确保粮食的强制征收制,又頒布了金融紧急措施令和粮食紧急措施令。美国下令改变旧国家机构,創立或改設适应占领制度的国家机关,以便根本改变行政制度,由它来掌握警察权、司法权和預算編制权,并限制国会的立法权,規定了頒布波茨坦敕令的办法^②。这些措施在1946年上半年大致完成,結果美国完全掌握了貿易和金融的权限,在产业方面也有强大的統制权;日本政府就适应这种措施而成立貿易厅、煤炭厅、物价厅、經濟安定本部等政府机关。另外成立

① 1946年2月1日,內务、司法、厚生、商工四相联合发表声明,說是要“断然取締暴行、胁迫和侵害所有权的違法行为”,即公开声言要镇压工人进行的生产管理等斗争。——譯者

② 不經過立法手續,由日本政府遵照美軍指示頒布法令。——譯者

了产业复兴公团和封闭机关管理委员会等政府机关，解散统制会等旧统制机关。现在就贸易方面来看占领军同日本国家机关的关系：贸易受到严密的管制，占领军当局成为贸易当事者，贸易厅是国内的附属管理机关，又断绝日元与外汇的关系，日本政府的贸易资金特别会计的运用完全与美元贸易收支无关。

对抗美国占领体系的主要力量，早已不是日本统治阶级，而是在世界民主力量支援下迅速展开斗争的日本劳动人民。他们的生活由于失业、通货膨胀和粮食不足而日趋穷困，同时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斗争已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1946年5月举行战后第一次劳动节纪念示威时，全国有200万群众参加，同月在东京举行的粮食劳动节^①示威，有80万群众参加，竟使吉田一时放弃组阁的念头，即可想见其强大声势。美国占领者从粮食劳动节起公然对工人运动实施镇压，工人就发动贩卖新闻社斗争、10月斗争^②和二一罢工^③来进行对抗。紧接着二一罢工，工人又成立了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全劳联）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组织。

麦克阿瑟用武力来实施镇压，以后总司令部就和政府一起镇压工人运动，强迫工人劳动，又强迫农民交出粮食。美国的占领体系后来还进展到利用天皇制来组成忠实于自己的官僚制度。1947

① 1946年5月19日东京市民30万人举行“突破粮食危机人民大会”，要求吉田茂停止组阁，建立能保障粮食、职业和土地的人民政府，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这次群众运动被称为“粮食劳动节”。——译者

② 1946年10月，电力、煤矿、机械等工业的工人相继发动罢工等斗争，反对解雇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取得团体交涉权，参加斗争人数曾达50余万人，大体上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译者

③ 紧接着10月斗争，以国有铁道工会、全国邮电工会为中心的全国官厅和公营企业职工工会和一些私营企业工会组成“共同斗争委员会”，于1947年1月决定举行二一总罢工，但麦克阿瑟下令禁止，未能举行。——译者

年制定內閣法、行政官厅法、財政法和會計法等，并制定地方自治法等有关地方制度的法律和各地公安条例。又公布国家公務員法，把旧官吏服务条例加上美国外衣而保存下来。

二

壟断資本因战敗而受到严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作为竞争中的胜利者而君临日本，并着手解散竞争对方的最危險的部分，即所謂解散財閥。

美国认为日本財閥是具有“其他任何資本主义国家无可比拟的广大統治力量”（1946年10月发表的《美国陆軍部和国务院联合調查代表团报告》）的壟断集团，由于他們的高度集中机能，所以能与美国竞争。但是美国既要从別国的壟断資本寻找其世界政策的支柱，就不可能否定壟断資本本身，这就規定了解散財閥的方向和局限性。因此采用的方法，不是解散壟断資本本身，而只是解散控制股票的財閥机构的最高統治部門，即切断受限制的財閥公司同附屬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的关系、处分其持有的股票、禁止个人兼职、禁止訂立限制买卖中的自由竞争的契約，又将鮎川、淺野、古河、岩崎、三井、中島、野村、大仓、住友、安田等十大財閥的全部资产与其家族所持有的股票和财产折成十年內禁止出讓的国債，发給他們。据占領第二年的总司令部公告，被指定的整理对象，为控制股份的公司67家，股票150,800,000万張，共約值63亿日元，另外从同样的立場出发，制定了禁止壟断法和禁止經濟力量过度集中法。

即使是这种限制办法，如果认真执行，也会使日本壟断資本瀕于瓦解，大大妨害美国对日本的統治。在美国的占領当局中，也有像鲍莱那样的人，认为財閥是日本的“最大的战争潜力”，如果不

解散財閥，还是让日本人受財閥的統治，他們就沒有作为自由的人而自己管理自己的希望，但是这不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希望。关于解散和限制壟断資本統治的政策，起先似乎是雷厉風行，但是不久就在实质上經由日本政府所轄的控制股份整理委员会和公正交易委员会等机关执行，而这些机关的工作却是有意怠工和請求緩和。因此只解散了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大商业壟断机构，不久就按照美国占领者的意志，采取极端妥协的态度，許多限制財閥統治的办法很快就緩和下来，或者取消，因而留下了迅速复活的基础。

壟断資本的再建工作，由于战敗后丧失了原有基础，只好从改变战时經濟为平时經濟开始。战敗后日本丧失了广大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包括武器在內，战争損失占国家財富总额的 41.5%，而工业設備能力和手头存有的原材料却还在战前的 1935 年数量以上。但是在美国占领下的当时情况，要想經由变战时經濟为平时經濟而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潤是无望的，因此壟断資本首先干的勾当，是侵吞国家财物和掠取临时軍費，并通过大規模的通貨膨脹，再来有組織地进行对人民的大規模剝夺。

到 1945 年 10 月为止，通貨膨脹的最大原因是临时軍費的支付，經总司令部下令禁止后，通貨膨脹改以日本銀行向普通銀行放款的形式进行。通貨发行額，由停战时的 303 亿日元增至 1946 年 2 月的 618 亿日元，在同时期内物价增加 1.29 倍。但是通貨膨脹进行得这样快，不全是由資本家的政策造成，也带有壟断資本从战时起孕藏的矛盾爆发起来的性质，因此資本主义陷于混乱、銀行信用降低、生活費高漲，而致人們进行物物交換和大量提出存款，一般对政治和經濟局势抱着不安的心情。

为了应付这种局势，政府于 2 月发布金融紧急措施令，决定实行封鎖存款和封鎖放款，又发布日本銀行紙币存入令，强迫人民把

旧日币存入銀行，并限定人民从存款中所能提取的生活費为 500 日元，把旧日币改成新日币，即以銀行存款的方式封鎖了大部分通貨。这样日本銀行紙币的发行額就在三月降低到 152 亿日元。由于政府的政策是以救济战败后地位不断恶化的大銀行为第一义，避免采取取消虚拟資本和增加生产等成为壟断資本負担的方法，所以采取这种救济銀行危机的措施。可是通貨膨脹不久就重新发生，而且以倍加之势进行。日本銀行紙币的发行額于 9 月突破 600 亿日元，恢复了 2 月的情况，到了 1947 年 1 月就超过了 1,000 亿日元，物价也在同期間內增加 2.36 倍。其直接原因是 1946 年 3 月增达 1,191 亿日元的財政支出和在 8 月修改金融緊急措施令后取消了通融資本的限制以及实施第二次封鎖时增发日本銀行紙币 900 亿日元。这时財政收支方面亏空 606 亿日元，主要的收入是公債和借款，而支出的三分之一是与軍事費性质相同的停战处理費。

这一通貨膨脹是由政府有意推进的(石桥財政)^①。针对这点，在对日理事会^②的压力下，总司令部曾令日本政府停付战时补偿金和征收财产稅，而政府延緩实施这些命令，并力图通过通貨膨脹来降低貨幣价值，以減輕其作用。通貨膨脹从那年 10 月前后起更加恶化，而大銀行却依靠通貨膨脹而巩固其地位，又因銀行当作事业資金放出大量日本銀行紙币而显著提高了銀行对貨幣資本的控制力。政府于 1946 年 8 月发布金融經理应急措施法，以便在停付战时补偿金时保证銀行不受損失；10 月制定金融机关再建整飭法，按照新的核算办法，保护强有力的資本家；又为补偿銀行所受的損

① 石桥濤山任大藏省大臣时推行助长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一般称之为石桥財政。——譯者

② 根据 1945 年 12 月莫斯科會議的決定，在日本成立的由苏、中、美、英四国代表組成的机构，它有权向盟軍最高統帥提出建議，并供其諮詢。——譯者

失起見，特在 1946 年度預算中列入此項用費 210 亿日元，1947 年度預算中列入 170 亿日元。1948 年 7 月就正式把金融机关从禁止經濟力量过度集中法中剔出去了。

但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在通貨膨脹下更加困苦，因此尽管美国占领軍和受其鼓励的吉田內閣拚命施行鎮压，而工人还是繼續展开十月斗争、二一罢工等攻势。与这同时，通貨膨脹造成的生产停滞又推迟了壟断資本的再建，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俾使一切好处不是由一般資本家分享，而由壟断資本独占。

这个任务就加在二一罢工后于 1947 年 6 月成立的片山內閣^① 肩上，但在吉田內閣时代已經开始做准备工作，即于 1946 年 12 月采用了“傾斜生产”方式^②，在国家資本的参与下重点地复兴煤、铁业，以图从这方面来突破經濟危机；同时成立經濟安定本部和复兴金融金庫；1947 年又采取了公布金融机关通融准則和成立控制股份公司整理委员会等措施。片山內閣的政策，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在美国的援助下继承重点生产方式，依凭高度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来重新編組壟断体系。这种政策的基础在于 7 月发表的新物价体系，即以 1934 至 1936 年的平均数为基准，以其 27 倍，即 1,800 日元为工資水平，又以同一基年的数字的 65 倍为物价水平；对主要物資規定生产者价格与消費者价格，按差額发給价格調整補助費；对于粮食和农产品，則采用“平准計算”方式强加压低^③，这样就构

① 以社会党首領片山哲为首的內閣。——譯者

② 有重点地发展生产，由于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称为“傾斜生产”方式，以后譯重点生产。——譯者

③ 所謂“平准計算” (parity) 方式是根据一个折算标准，按一般物价来計算农产品价格，实际上只計入生产成本中的配給物資的公定价額部分，完全不顧农民的劳动价值和配給以外的物資购买价款，因此是对农民极为不利的低价。——譯者

成低工資、低米价的保证壟断資本利潤的体系。政府又組織許多公团^①，以图确立流通秩序；并計劃由国家来經營煤这一最重要的基础物資、增加人民大众負担的稅收和强迫农民交出米麦。

1948年3月取代片山內閣的芦田^②內閣继承了上述政策，其主要任务是依靠輸入外国資本来进一步巩固片山內閣建立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体系。日本方面預料可以恢复以前的亚洲市場，所以輸入外資計劃是以加工貿易方式为中心而訂立的。管制貿易虽仍繼續維持，但于1948年8月取消外国公司派人入境的限制，建立民間貿易業者买卖双方直接訂立輸出契約的制度，并采用商品复数汇兌率，打开了日币与外币发生联系的道路，这个內閣在6月重新建立了低工資、低米价的物价体系，把工資水平訂为基年的38倍(3,600日元)，物价水平訂为基年的110倍。

尽管这样，通貨膨脹在1947、1948年还是加剧，成为壟断資本积累的最大基础。1947年后的通貨膨脹，是由2月間設立的复兴金融金庫大量放款和1947、1948年的龐大財政亏空造成的。日本銀行紙币发行額由1947年1月的1,000亿日元增至1948年1月的2,180亿日元，1949年1月又增至3,416亿日元，在同一期間，物价漲至3.66倍和8.16倍。1947年后的通貨膨脹与过去不同之处，在于統治者曾加抑制，可是規模却比过去为大，人民大众也更加穷困。

設立复兴金融金庫(簡称复金)这一措施是作为重点生产方式之一环而进行的，由日本銀行承受政府交付的資金与复金的債券，再由复金重点地进行放款。但从1947年7月前后起，复金的放款竟达每月50亿日元上下，与全国銀行貸出款項相匹敌，有时候还

① 官營的統制物資配給的組織。——譯者

② 以民主党的芦田均为首的內閣。——譯者

超过,而其資金来源大部分仰賴日本銀行承受的复金債券,因此这种經營方式就成为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复金把貸款重点放在煤、鋼鉄、肥料、电力等部門上,又在1948年底时,按貸款多少的次序排列,位列前矛的194件只占貸款件数的2.4%,但占全部貸款的81.9%,可見大部分貸款是放給少数大資本家的。从1947年4月到1949年3月,貸款的純增加額为1,259亿日元,相当于全国銀行貸款增加額的46%。这种貸款本应以設備費为对象,但是放給壟断資本企业的貸款中有許多是收不回的,因此发生不少貪污行为,后来在复金貪污案^①中發現了一部分。利用复金貸款获利的不仅是壟断資本的产业,大銀行也从中取利,他們充任复金貸款的介紹人,用酬劳介紹的名义,要借到貸款的产业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来偿付战时欠他們的呆債,从而巩固大銀行的地位。

通貨膨脹的另一原因是强力推进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所造成的財政膨脹。1947年預算額达2,142亿日元,1948年达4,731亿日元。一般会計的預算是收支平衡的,但在粮食管理、国有铁道、通訊事业等方面另編有龐大的特別會計預算,而且都是亏損的,結果1947年有732亿日元、1948年有846亿日元是靠公債和借款弥补的。在財政支出中,三分之一是占領軍經費,其中大部分流入土木建筑業主手里,20%是价格調整費等補助費,10%是撥給地方的經費。

价格補助費是重点生产方式的一环,成为1947年以来的重要資本积累基础。在1946年,包括粮食和煤等貨物在內的这种補助費有119亿日元,而在1947年,从232亿日元的价格調整費起,共达463亿日元,1948年包括625亿日元价格調整費和414亿日元

^① 壟断資本企业为了获得复金貸款,曾极力向政府高級官員和政党負責人行賄活动,其中有一部分于1948年被人举发。——譯者

政府事业再建費(大半补助国有铁道)等在內, 共計 1,183 亿日元。价格調整費中絕大部分是給与鋼铁、煤和肥料等部門的补助費, 其数額相当于生产者价格的 70% 到 40%, 为这些資本家保证了巨大的利潤。

这些通貨膨脹政策是为了重建以壟断集团为中心的資本主义而有意推行的。壟断資本依靠通貨膨脹造成的手頭資材漲价和实际工資低落而增加財富、用复金貸款和价格調整費等办法侵吞国家財產, 又經由貨幣价值的下跌而減輕財產稅与其他負擔。但是通貨膨脹的迅速进行使工人和其他人民大众生活陷于穷困, 从而促使工人的斗争高涨。1947 年全国官厅和公营企业工会发动年底斗争, 震撼了片山內閣的基础, 1948 年又发生三月斗争^① 和东宝电影公司爭議^② 等許多斗争, 更加深了社会动荡。同时尽管政府力图重建壟断資本体系, 而投机和黑市活动极为普遍, 使生产陷于停滞, 并成为經濟混乱的推动力。又在壟断資本以銀行为中心进行重新編組时, 所以实行通貨膨脹政策至三年之久, 不仅是由于这是最容易直接剝夺人民大众的方法, 而且是由于有国家做后盾, 可以在大众承当財政負擔的情况下进行重建。

但是通貨膨脹的进行首先損害信用关系, 这对銀行來說, 表现在存款的减少、存款的流动性大和儲蓄性质的存款比重減低上。流动性存款同固定性存款的比率, 战前是 3 比 7, 1947 年左右变成 8 比 2。并且尽管常常推行救国儲蓄运动, 而在 1947 年 9 月的

-
- ① 全国邮电工会等官厅和公营企业工会和电力、煤矿等私营企业工会于 3 月下旬发动反对低工資标准和职級制的斗争, 参加罢工人員曾达 80 万以上, 后經美軍下令禁止, 但一部分邮电工人还是坚持了斗争。——譯者
- ② 1948 年 5 月, 东宝电影公司的职工为反对公司大量解雇职工而发动罢工, 坚持到 8 月, 美軍竟出动陆空軍掩护两千名日本警察施加鎮压。——譯者

日本銀行紙幣 1,506 亿日元中，自动存入銀行的只有 757 亿日元，其余 749 亿日元都沒有存儲起来，差不多全用在黑市上，同时金融黑市活动盛行。这种不信任通货与信用的情形威胁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在壟断資本的积累基础大体上巩固以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改变政策就成为必然的了。

日本經濟老是不安定，对于把日本当做战利品的美国也是不能忍耐的。特別从 1947 年后，为了应付两个陣营对立，尤其是中国革命迅速进展的局面，美国对日政策倾向于迅速恢复作为远东堡垒的日本壟断資本主义以来，稳定日本的經濟就成为美国占领者的迫切問題。他們在 1947 年 3 月已經准許民商从事貿易，8 月又批准 5 亿美元的輸出入周轉基金借款。1948 年春美国国务卿和陸軍部长分別派遣代表团来日，这些代表团都在报告中主張美国采取片面行动来重建日本經濟，并減輕賠償、抑制通貨膨脹和提高工业水平与輸出能力。以这些报告为基础，賠償拆迁由 1946 年 1 月的鮑萊方案改成 1948 年 3 月的斯揣萊克方案，又改成同年 5 月的强斯頓方案，日趋緩和；經濟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則因在 1948 年到 1949 年期間陸續剔除被指定的施行对象，几乎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至于对日借款，从 1948 年 6 月到 9 月，就成立了棉花周轉基金 6,000 万美元、一般周轉基金 125,000,000 美元、救济援助資金 4 亿美元和經濟复兴援助資金 1 亿美元等笔，并开始准备和洽办私营企业的外資輸入，到 1949 年 6 月止，援助資金額达 1,294,000,000 美元。經濟复兴援助資金的主要用途是輸入棉花、铁矿石、焦炭等工业原料，对于以后工业原料依賴美国这点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上述政策的改变，牺牲最大的是工人階級，美国还正式出面对这个階級施行鎮压。馬貴特^①在三月斗爭时发表迫令中止罢工的声明，接着下令加强警察制度，7 月又发出麦克阿瑟签署的禁

止公務員參加爭議的信，令日本政府发布 201 号政令^②，8 月下令停止发电部門工人罢工，9 月干涉全国邮电工会和电产工会发动的爭議，11 月干涉煤矿工人爭議，12 月又令进行年底爭議的煤、电产、海員、全国紡織和私营铁道等业的工会停止罢工。

美国占領者責令日本政府收縮通貨膨脹和实施强有力的經濟安定方案，政府于 1948 年 7 月决定經濟安定十原則^③，但因强力实行这些原則将会一时加剧經濟的混亂，依靠当时日本政府的力量是不容易办到的。于是美国占領軍和美国政府就自己出面来付諸实施，他們在 11 月規定停止对亏损企业放款、禁止增加工資和限制发給補助費等工資三原則，12 月发布經濟安定九原則^④，强迫实行稳定壟断体系的方針。

三

战后的生产因战时經濟的崩潰而陷于瓦解，从 1946 年到 1947

-
- ① 美国駐日占領軍总司令部經濟科学局局长。——譯者
- ② 麦克阿瑟于 7 月 22 日致函芦田，令內閣修改国家公務員法，剝夺公務員的集体談判权与爭議权，政府即于 7 月 31 日据以頒布 201 号政令，并即日付諸实施。这是美日反动派鎮压日本民主运动的重大罪行。——譯者
- ③ 芦田內閣根据美国指示而决定的經濟綱領，主要目的在于安定和增强壟断資本体系，并进一步从屬于美国。——譯者
- ④ 九原則和其实质內容是：（1）平衡預算（稳定壟断資本体系，保证外債与外国資本安全）、（2）加强稅收（向人民大众增稅）、（3）严格限制貸放資金（专給壟断資本用）、（4）“稳定”工資（維持低工資）、（5）統制物价（压低米价和原料价格，保证美日壟断資本制造业获取高利潤）、（6）加强对外貿易和外汇管理（加强美国对日本貿易的管制）、（7）改善物資分配制度，以便增加出口（集中資材，增加有利于美日壟断資本的輸出）、（8）增加重要国产原料和制成品的生产（加强剝削劳动人民，以增加生产）、（9）改善征粮（对农民加强征购粮食）。——譯者

年，許多工业的开工率沒有达到設備能力的10%，达到30%的就是特別好的情况。战时十分膨脹的虚拟資本同实际資本之間有差距，由于1946年8月取消战时补偿与在外资产补偿办法，并責令企业进行整頓，估計企业所受損失，公司企业为750亿日元、金融机关为270亿日元。另外被指定提供赔偿拆迁的工厂約有1千家。資本家都不从事生产資料的生产，而集中力量于周轉快和当时需要大的消費資料的生产，又因追逐通貨膨脹的利潤而导致无計劃地用尽庫存原材料的情形。在大工厂不能迅速适应环境进行轉換时，无数中小型的和零星的工厂丛生，他們生产消費資料，大賺黑市錢。

重点生产方針虽于1946年12月决定，而在1947年中还没有显示多大的成效。在劇烈的通貨膨脹下，抑制資金使金融黑市产生；整頓流通秩序又使黑市經濟普遍化；同时强制执行重点生产造成庫存物資枯竭和一般生产低落，把工資水平固定在1,800日元上又降低工人的生产情緒。战后产生的中小与零星企业也因通貨膨脹而感到資金和資材难以到手，因而日趨困苦，起落非常之大。

但是到了1948年，重点生产的效果就开始表现出来。生产恢复的情形見85表。这是因为以美国改变对日政策为背景，禁止經濟力量过度集中和赔偿等措施的前途已經明确起来，对于大企业所提供的复兴金融金庫貸款等資金援助也已見效，而且原料輸入增加，动力产业又已恢复的原故。

电力工业是动力工业中意义最为重要的。它在战争结束后立刻恢复了活动，是因为发电厂的78%运用水力，多数是小規模的和分散的，所以受到战争損害較少。不仅如此，战时电力的一半用在冶炼飞机材料的鋁上，战后这门生产停頓，因此战败后电力需要竟曾一度减少到战时中的32%，1946年还是供过于求，1947年

第 85 表 第二次大战后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主要生产指数

年度	钢铁	化学	窑业	纺织	工业平均	煤	矿、工业	电力和煤、气
1945	27.3	33.7	29.0	4.8	15.5		25.9	109.0
1946	13.5	69.2	26.4	9.9	16.7	68.3	25.6	133.0
1947	22.9	113.7	36.2	17.7	28.2	91.7	38.7	153.4
6月	24.6	125.5	37.7	21.2	31.7	86.3	40.6	
12月	27.4	110.6	44.2	15.4	28.4	119.3	43.2	
1948	55.5	149.6	52.3	25.6	43.0	114.0	54.7	172.1
6月	50.6	145.7	48.0	25.9	41.8	113.2	53.1	
12月	81.2	163.2	75.7	27.2	51.5	129.6	64.4	
1949	108.5	202.2	93.7	33.8	65.3		75.9	195.0

《东洋经济新报》编制的生产指数，1931—1933 年为 100。

以后才感到电力供应不足。这是由于战后热力的原料缺乏，工矿业和家庭对热力来源的需要迅速增加；而且原材料的质量降低和生产方式改变，所以电力的使用量增加。1947 年 5 月达到战时最高的需要量，9 月感到严重的电力不足，发生求过于供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电力设备却因战时过分使用而非常窳朽，水力发电站的水道大部分需要修理，火力发电厂亦因设备陈朽和煤不够用而效率减低。因此从 1947 年前后起迅速展开复旧工作，并于 1948 年制订电力设备修补五年计划。依靠这个计划，电力工业才能恢复起来，到 1949 年 9 月底为止，新建设备有水力发电站 31 处，共计 20 万千瓦，火力发电厂两处，共计 54,000 瓦，同时修复了原有设备，所以火力发电量增至 75 万千瓦，而且 1948 年的发电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平。

与电力同为动力产业的核心的煤业，战后情况最坏。其原因是战时矿井荒蕪、战时成为主要劳动力的朝鲜人、中国人等回国和原有的劳动机构瓦解。煤的生产率只有每人四、五吨的程度，产量于 1946 年降至 2,200 万吨，除去占领军和铁道的消耗量以外，能

够拨给工业用的只有 900 万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占领军把增产煤当作最大的急务，从 1945 年 11 月起，他们依凭权势，采取近乎征用的强制措施，吸收有采煤经验的、离职的、复员的和受到战争灾害的人到煤矿去从事劳动，来代替送回去的殖民地劳动力。又于 1946 年 12 月决定重点生产方针后，采用发给价格差额补助费和重点配给资金、器材等措施，以促进其复兴。补助费数额，1946 年为 25 亿日元、1947 年 99 亿日元、1948 年 241 亿日元、1949 年达 217 亿日元。复兴金融国库贷款亦以煤为第一对象，1948 年年底未清还的贷款额为 464 亿日元。在这个过程中，垄断企业恢复了地位，煤产量也从 1947 年的 2,900 万吨增加到 1948 年的 3,500 万吨。

动力产业虽然是这样趋于恢复，而作为产业基础的电力的价格却被压在低水平上，片山内閣的新物价体系也把电力价格定为战前水平的十二、三倍，特别是对大戶的倍率低，因此这个企业一直是亏累的。由于这种低廉的电力价格，硫酸工业和其他需要电力多的垄断资本的产业就得以恢复和获取超额利润，而电力工业的亏损，则除用国家资金加以填补外，又把大部牺牲转嫁在工人身上。针对着这种情形，电力工业工人于 1946 年成立电产工会，成为 10 月斗争的核心，曾促成著名的电产型工资体系^①，并迫使电力事业经营者的团体发表以实现人民民主为目的而施行电力社会化的联合声明，即致力于电力事业的民主改革。电力工业工人同占领者进行对抗，三月斗争以后，电产工会与全国官厅和国营企业工会互相呼应，组织了强大的斗争，在民营企业的工人中率先活动。

^① 电产工会迫使资方同意的工资体系，要点在于不受政府规定的每月向银行支取新日元(生活费)数 500 日元的限制，而按实际生活与能力来决定基本工资，并加发额外劳动、特殊劳动等工资。——译者

煤的增产也是通过全面依靠国家和增加工人劳动强度达成的。而劳动强度之所以会增加,是由于工会被公司巧妙地籠絡,甚至有帮同公司当局推行的。战后煤矿工人以北海道煤矿为中心組成全国煤矿工会,发动生产管理斗争,震动了煤矿资本家,可是不久又成立了以九州矿工为主力的总同盟^①系的日本煤矿工会,提倡救国生产运动,把工人的势力分裂成两部分。不仅如此,由于当时的煤矿荒蕪达于极点,在开始施行重点生产时,連产业別工会系統的工会也被拖进增产运动,和资本家一起参加煤业复兴會議,搞增产运动。1947年后煤矿工人分裂为全国煤矿工会和煤矿工会两个組織,但全煤于1949年3月解散,参加煤工,以后煤矿工人就以团結起来的力量,又展开了战斗性的斗争。社会党内閣当作增产煤的办法而提出的国家管理煤矿方案,是与工人参加管理不相干的。这个方案让公司保留指揮权,不承认工人参加經營,又規定动用国家經費来恢复、充实生产設備和强迫工人劳动的办法,无非是为了保护壟断资本罢了。

运输事业作为国民經济的大动脉,战后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成为恢复經济的主力軍。特別在海运因战禍而陷入潰灭状态后,铁道的意义更为重大,再因这部門的战争損失較少,所以从停止战争那天起就开始恢复。国有铁道作为唯一的重要交通机关,运输量不断增加。客运方面忙于輸送出門采购日用必需品的人、做黑市的单帮客、复員軍人和占領軍,极为拥挤。貨运方面承受了汽車和船舶运输的减少部分,1946年就打破战时最高紀錄,1947年竟达战前的250%。但因战时使用过分,使設備和車輛陈旧朽坏,不易复原。举例來說,由于設備和車輛发生故障而造成的行車事

^① 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控制的工会全国性組織。——譯者

故，按行車 1 百万公里平均計算，战前的 1936 年为 21.23 件，战时最高数为 1944 年的 108.10 件，而 1946 年为 226.53 件，1947 年为 188.38 件，1948 年为 175.26 件。至于超过使用年限的陈朽車輛数，則在 1948 年时，有蒸汽机車 1,962 辆、客車 1,957 辆、电車 707 辆、貨車 20,762 辆。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铁道专靠增加劳动强度来完成运输任务，为了資金不足，曾多次提高运费，又靠公債、借款和一般會計撥款弥补，其数額于 1946 年为 93 亿日元、1947 年为 426 亿日元，1948 年为 936 亿日元，但仍逐年亏损，按資本額折算，每年損失率超过 26% 至 30%。这种設備、車輛朽坏和經營亏损所造成的負担主要地都加在工人头上，結果素来被当做天皇政府的公務員，被迫服从命令的国铁工人也在战后迅速觉悟，1946 年在国铁当局暗中指导下組成的拥有会员 53 万人的国铁工会，成立后不久就显示迅速的成長，他們站在 10 月斗争的前列，担任了二一罢工的骨干。1947 年后，国铁工会又与全国邮电工会一起成为全国官厅与公营企业工会的核心，在那年秋天发动离开車間的斗争，并于 1948 年連續展开英勇斗争，如三月斗争和 8 月間反对第 201 号政令的民族独立行动队斗争等。

尽管动力工业有所恢复，而工业的恢复还是不容易的。特别是鋼铁工业丧失了战时超額利潤的基础，下降到极低的水平，实在不易恢复，一直到 1948 年以后才算是走上恢复的道路，但是那年的开工率，高炉还只有設備能力的 15.2%、平炉 21.2%、鋼材 17%。鋼铁市場由于沒有了軍需而遭到致命打击，生产条件也因缺煤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1948 年后恢复的原因，是新产生了占领軍和恢复经济的需要、重点生产方針增加了对煤和鋼铁产品的需要，以及 1948 年起开始輸出，看到了新的市場基础。另一同样

重要的原因是进行輸入和重点生产后能够确保铁矿石和焦炭的供应。国家提供了大量補助費来恢复鋼铁工业，由1946年8月到1950年3月为止，共达76,528,000,000日元。此外經由复兴金融金庫貸放的款項，从1946年度到1948年度共达35亿日元。日本鋼铁工业在这一恢复生产过程中，开始使用从美国輸入的制鋼所需重油、铁矿石和焦炭等原料，以后就树立了依賴美国的原料基础。

第86表 第二次大战后的鋼铁产量 (单位: 千吨)

年 度	生 铁	鋼 錠	鋼 材
1945	977	1,272	1,154
1946	208	557	426
1947	344	952	636
1948	808	1,715	1,201

根据《制铁业参考資料》。

其次，机械工业也因战后国家需要的减少和撑持其生产机构的軍事权力瓦解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个部門所受战争損失最大，指定提供賠償的厂子最多，加以資材不足，致使許多企业瀕于解体。为了摆脱其困境，“什么东西都做”的企业就显著增加。当时沒有人更換和新建固定資本，一般的定貨都是修理性质的，甚至許多大厂都靠生产鍋釜这种消費資料来救一时之急。特別在工作母机方面，鮑萊方案在75万台設備中規定60万台提供賠償，使生产能力降到10%以下。产业机械方面，除制铁設備、窑业用炉、发动机、起重机等由国家負担的产品的生产有几分恢复外，差不多完全沒有出于产业需要的定貨。与以上企业相較，电机和車輛工业是要好得多，但因資材不足，这个部門的高級机械生产也退步了。战时最为扩展的飞机和汽車工业則被禁止生产或受到严格的

限制。造船工业也受占领军的严格监督，从1947年10月到1949年，一共被批准造船四次，但原则上限于制造总吨数5千吨以下、速度15海涅以下的和烧煤的船只。

第87表 战败后20世纪40年代的机械工业生产

年 度	工作母机(吨)	电机(千日元)	蒸汽机车(辆)
1945	11,328	145,476	102.3
1946	4,291	80,553	165.4
1947	3,235	98,620	90.0
1948	4,332	146,931	82.6
1949	4,465	168,930	69.7

根据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第一卷编制。电机是根据1935年的价格折算的生产额，蒸汽机车是折算成D51型的数字。

在重工业尚未充分恢复时，政府却以对付严重的粮食危机为目的而迅速策划化学肥料，特别是硫酸工业的复兴。由于准许战时的甲醇、人造石油等工厂和陆海军的燃料工厂改成硫酸工厂，所以保证了这方面的工厂数量，又能从农林中央金库和复兴金融金库等处获得贷款，并且得到煤等原料器材的重点配给。复金的贷款集中供应昭和电工、东洋高压、日新化学等垄断企业，这种无限制的资金通融就是昭电事件^①的起因。上述措施促使硫酸月产量从1946年5月前后起超过4万吨，接着于1947年3月后达到6万吨，1948年4月后又超过战前水平，增加到8万至10万吨。在这次增产过程中，由于电力价格极其便宜，就使电解法硫酸工厂打好发展的基础。

^① 复新资本企业昭和电工公司向民主党的芦田均(被举发时任首相)和社会党的西尾末广(副首相)、民主自由党的大野伴睦等行使巨贿，获得复金贷款30亿日元以上，1948年5月被举发，因牵涉芦田内阁关系甚多，内阁因此下台。——译者

硫銨的价格是从高訂定的,从1946年到1947年,政府有意使这项公定价格同米价发生剪刀差,以便壟断資本吸收农村資金,1948年后在生产者价格与消費者价格之間造成很大的差距,并向壟断資本提供龐大的補助費。关于肥料的配給,从1947年成立肥料配給公团以后,施行了貫徹到基层的有組織的統治,对农民进行高利貸性质的剝夺。但是迄至1947年前后为止,肥料配給还是不足,1948年后农村銀根吃紧时,就发生农民不要配給的肥料和暗盘出售的現象,而致黑市肥料橫行。这样壟断資本和黑市商人所掌握的黑市肥料和地主所控制的山林青肥等自給肥料就成为农民的沉重負担,只有能够出卖黑市米的上层农民才能购买黑市肥料,上层与下层农民的产量和实收量的差别非常显著,成为促进农民階級分化的契机。

在重建战后壟断体系的过程中,大家最希望紡織工业能成为依靠自己的力量复兴的模范。因此在蚕絲业方面,政府于1946年訂立以輸出生絲30万俵、种植桑园30万町步为目标的蚕絲五年計劃,策划对美輸出。但因战时发展起来的尼龙很普及,高价的生絲銷路很坏,致使生产量未能超过10万到15万俵的水平。

与生絲不同,由于衣料缺乏,使棉紗等大众衣料品的需要增加,引起黑市价格飞漲,例如每捆棉紗价格,1946年秋为6万日元,1947年初为10万日元,夏天漲到20万日元,1948年初达40万日元。如以配給原料总额的1%用于黑市,每年可以获得相当于1万捆产品的利潤,因而建立壟断棉紗企业的超額利潤的基础。織布业也获得同样的黑市利潤,以致产生“机声一响,成千上万”的流行話。从壟断棉紡企业起,到織布地区的业者止,确实賺足了黑市利潤。

除生絲以外,許多紡織工业的原料仰賴海外輸入,战后手头的

原料几乎用光，当然生产一定会降低。美国原来打算要日本卖了生丝来抵还“援助”费，但因生丝销路不好，就决定以棉织品来代替的方针，即将美国战时持有的销不出去的旧棉花输入日本，用日本的闲置棉业设备加工，再行输出，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基于美国的这个方针，从1946年7月起开始输入美国政府持有的棉花，使棉纺织业的开工率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又在国有棉制度下，壟断棉纺企业不需交纳棉花原料价款，就能依靠黑市和输出进行积累。1947年2月准许将棉纺设备恢复到400万锭，又从8月起开始由民商输入棉花。

到1947年前后为止，其他纺织工业也感到原料缺少之苦。人造丝业到1947年为止，靠国产丝浆勉强维持生产，羊毛业则依靠收回的毯子等品。这些纺织工业从1948年起都从海外输入原料，开工率有显著的增大。尽管国内衣料不足，纺织工业制品还是被列为优先输出品，其输出额占当时输出总额的半数。在管制贸易下，纺织工业生产受到听从占领军意旨的政府的严格统制，设备的增加也在美国的严格许可制下进行。

第88表 战败后纺织工业的复活

年 度	生 丝 (千俵)	棉 纱 (千捆)	人造丝线 (千箱)	棉 织 品 (百万平方碼)	人造丝织品 (百万平方碼)
1946	118	320	40	242	42
1947	110	666	163	662	46
1948	133	683	357	924	41
1949	162	864	667	985	102

根据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第2卷，1950年版编制。棉纱每捆按400磅计算，人造丝线每箱按100磅计算。

四

1945年12月开始实施土地改革，从1946年10月发布第二次

土地改革令起正式推行。改革令规定将佃耕地面积的85%以上改为自耕地和用現金繳納佃租，使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趋于瓦解，并使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这一改革所解放的改革前（1945年11月23日）的佃耕地面积共計 2,209,865 町步（不包括北海道則为 1,608,116 町步），将其中 98.2%（不包括北海道則为 98%）卖给了农民。土地改革虽然全未触动大地主阶级的龐大山林的所有权，留下了半封建統治的残余，但其土地所有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农村情况为之一变。可是农业经营的規模却比以前更小，如在 1950年 2 月，不包括北海道在內，按经营規模来区分的农户的百分率是：经营土地不滿三反的为 24.1%、3 至 5 反的 17.4%、5 反至 1 町的 32.9%、1 町至 1 町半的 15.9%、1 町半到 2 町的 6.1%、2 町到 3 町的 3%。

土地改革是美国在世界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实施的，它的实现意味着世界民主力量的胜利。但是美国的目的是想利用农村民主改革来增加农业生产力，以便扩大市場和取得廉价的农产品，并由下面迅速掀起的民主高潮中加强“保守的农民”（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①）。日本統治阶级也抱有和美国同样的目的，即利用土地改革来筑起“保守农民”的堡垒。这种意图已經在 1946年底举行的全国市、鎮、村土地委員选举中表现出来。在地主和富农的策划下，土地委員的 45.2% 是未經投票手續产生的，又在土地委員中，属于地主和自耕农成分，并兼任村里有体面的职务，如市、鎮、村长、助理、市、鎮、村会議員、农业会长和理事的占 26.5%（27 县調查数字平均）；至于土地委员会会长的成分，則地主占 38.1%、自耕农 35.5%、佃农 24.1%、成分未确定的 4.2%。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18 頁。

土地改革削弱了寄生大地主的地位,而在这个阶段中,还没有显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当时在村经营农业的地主的地位大为提高,他们企图乘着土地改革来重新构筑地主经营的生产关系,因而收回耕地的事件达数十万件之多,并收回黑市佃租权和山林利用权,公然阻碍和削弱土地委员会的工作,以图维持其地主地位。针对着这种活动,想要推动改革的农民就以日本农民组合为中心扩大农民组合的组织,并在基层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在长野、新潟、富山等地,日农会员占了县土地委员的半数,又在长野县盐尻村等农民力量强大的地方,已出现了农民用民主方式联合管理和经营土地的情况。新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以改革为中心而在农村展开了。

当时与农业关系最深的问题是在严重的粮食缺少情况下的粮食紧急政策。关于战后的粮食供应情况: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由于1944年米的生产 and 征收量较多,又放出了军队保有的粮食,所以大体上能够度过。到了1946年度,米麦实收量都只有平时年成的一半(米39,178,000石),加之征收不顺利,因而很感困难,在“粮食劳动节”和6月以后,不能如期配给已成全国现象,只是依靠联合军^①准许输入粮食370万石(60万吨),才勉强度过去。在1947年度,由于上年丰收,米产量号称6,500万石,所以把基本配给量提高到2合5勺。^②但是不久大城市就不能按期配给,5月以后竟由政府决定有计划地减少配给的政策。战后与战前的一户人家每月米消费量相比较,战前1937至1939年的平均数为43.9公斤,1946年为24公斤,1947年只有22.3公斤,以后虽然多少有些好转,而1948年还只有28.8公斤,1949年只有28.7公斤,停滞在战前数量的三分之二上。

^① 即美国驻日占领军。——译者

^② 10日勺为1日合,10日合为1日升,1日升合1.806公升。——译者

政府于1947年3月规定了特别奖金、肥料特别配给、农业机器和农具特别配给等促进农民交米的办法，同时又下令强迫征收，根据粮食紧急措施法和粮食管理法等加强施行罚则，美国占领军还亲自出动强征（被称为“吉普征收”）。但是基于“平准”方式算出的征米价格，1946年度每石只有550日元，与农民所要求的1,200日元相差很大，致使生产成本极难弥补，又因周转资材不足，特别是必要的肥料差不多非靠黑市购入不可，因此这种强征办法使中农、贫农的地位更加恶化。

从1947年度起设立了征米价格追加制度，规定价格为1,756日元，距农民要求的2,500日元很远；1948年规定的征米价格为3,646日元，而农民的要求为4,500日元。在供米农户中，提供1俵或1至5俵^①的零碎供米阶层于1948年占43%，这些阶层中很多人甚至把自己保存的口粮也交出来，农民中能够完全保存口粮的人家比战时少，还不到全部农户的半数。向农民征收的主食配给量，1947年为547万石，1948年达610万石。而地主、富农和上层中农能够片面摊派供米数量，多搞奖金和奖励物资，并照旧出售黑市米，增加了利润。

除这些上层农民外，一般农业生产力都不足以使战时的荒蕪轻易地恢复，但因战争末期农村中通货膨胀横行和在黑市出卖农作物，所以农村里的现金和存款激增，据说1946年农村里的新日币竟达全数的52%，这就加强了富农阶层的经济基础。但是政府于1947年开始向农民进攻，即将上层农民的黑市收入平均摊算在一般农民身上，征收农业所得税，结果中农以下的农户为了交税，竟有缺乏春耕用费的；同时提取存款的越来越多，农村里的新日币

^① 米的包装单位，每俵16贯，合60公斤。——译者

降低到全数的 28.5%，并且开始出现放棄耕作的人。被他們放棄的田地，1948 年有 2,561 町步，其中 991 町步归于荒蕪。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改革非但没有提高农业生产力，却反而把农业推向危机。

农民以反抗征税和征米为中心而进行斗争，日农的组织日益扩充，会员数于 1947 年 6 月突破 110 万。但因各项土地改革法令之实施，使政府能利用农民对土地的幻想进行欺騙，又对反对征米和征税的斗争进行镇压，加上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阴谋破坏，致使日农的活动趋于衰退。农民运动随着土地改革的实施而变成办土地委员会的事务工作，到了 1947 年后半期，日农即开始迅速削弱。虽然大多数农民的地位以后还没有提高，但是土地问题大体上得到解决，因此他们开始丧失斗争的目标。

2. 壟断資本体系的复活

—

在美国的統治下，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 1948、1949 年前后大体上得到恢复。美国从 1945 年 7 月起至 1948 年底为止，给予各国的贈款、借款、投资和馬歇尔计划撥款等合計 320 亿美元，在防止资本主义崩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生产的基础上，美元成为唯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貨，各国通貨都同美元連結起来，进行調整。1949 年 9 月，英国实行英鎊贬值，法国也立刻将法郎贬值。美国在世界各国駐兵或設置基地，美国政府干涉各国内政，并帮同維持其統治。由于各国美元不足，更提高了美国的优越地位。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虽然没有依凭成为世界货币的黄金而形成統一市場，而分立的集团却被美元統一

起来，从而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成一体，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础。1948、1949年在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尚在恢复途中，没有招致生产过剩，因而没有发展成为全面的世界危机，但却成为统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起点。

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对峙的，是巨人般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都在1948年前后恢复战前水平，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向前发展。在远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打稳基础，同时中国人民把蒋介石集团逐出大陆，于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从1945年以来给与蒋介石的数达60亿美元的援助全归泡影，只好后退，而日本作为它的新的前进基地，其重要性却大大地显著起来。

美国政府强制推行经济安定九原则的目的，是针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进行，使日本迅速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起来，成为反共的同盟者和美国远东政策的最大据点。1948年日本的生产所以能够恢复到战前水平的58.5%，是由于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战前水平的25.3%，加以剥削，和得到美国的援助和大量补助费与其他国家资金的原故。为了使日本成为依靠自己的力量同盟者，并使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更加健全的形态上恢复起见，必须把援助和补助费这种“竹马的脚”（道奇^①的话）切断，并根据比较长远的计划，进行强力的转变。因此美国在日本垄断资本还在盗取国家财产，未臻稳定的情况下，就把它当做远东战略的重要一环，亲手来构筑日本垄断体系。

1949年2月，美国派底特律（Detroit）银行总经理道奇为总司令部顾问来日，根据九原则进行强力的政治指导，开始把日本经济

^① 美国派往日本的经济顾问，见下段。——译者

按照所謂道奇路綫重新編組。上年10月成立的吉田內閣担負实际执行的責任,于3月間毅然停止复兴金融金庫貸款,4月把亏损財政改成綜合平衡預算,并整理補助費、偿还国家債務和成立新的美国对日援助对等基金,5月又設立1美元合360日元的单一汇兌率。同年9月,为了适应平衡預算,索甫^①提出了第一次稅制建議;10月間又乘着英国实行英鎊貶值,发表了罗根建議^②,把貿易政策也納入新的軌道。

这一毅然决然的改革巩固了战后日本壟断体系的結構,并成为今后日本經濟进展的出发点。現将其內容簡述如次:

1949年度財政預算額为7,410亿日元,虽比上年度增加2,578亿日元,但包含物价騰貴因素,而且許多項目在預算收支双方互相抵銷,所以不成什么大問題。这个預算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特征,是包括一般會計、特別會計、新成立的政府机关預算以及地方財政在內,綜合起来保持收支完全平衡,并且岁入額有所超过。1950年度預算还是保持这个原則,而且預算額为6,646亿日元,成为比上年度更为緊縮的平衡預算。

在1949年預算中,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价格調整費1,167亿日元,一共列了1,790亿日元,比上年度預算額多60%。从緊縮原則看来,这点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補助費素来不显示在預算上,現在却明摆出来,明示政府的責任,实系不久将予消除的措施。另一原因就是恐怕减少得太突然会打击依靠補助費来建立积累基础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壟断資本。但在1949年度預算中,对于已趋

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經濟学教授,于1949年5月率“稅制代表团”赴日,提出关于日本稅制的建議,經日本政府据以修改稅制。——譯者

② 罗根原系美国派駐西德的貿易管理机构負責人,1949年10月应麦克阿瑟邀請来日,对日本貿易方針提出建議,主要内容見本节后段。——譯者

穩定的部門的補助費，已經取消黑色金屬和煤兩項，並大量削減鋼鐵、肥料等項。到了1950年度，價格調整費只剩640億日元，實減1,152億日元，取消了对銅和肥料等業的補助費，从1951年度起，補助費就完全消失了。

其次，在这次預算中列入了大量償還國家債務的經費。償還公債、借款、短期證券和復興金融金庫債務等項金額，1949年度為1,441億日元，1950年度為1,286億日元。這種償還國家債務的措施對產業獲取資金是有利的，但是增加資本積累的方法，不是過去那樣經由公債或復興金融金庫貸款來提供產業資金，而是用稅金直接向銀行償還國家債務，再由銀行把資金撥給產業，這樣就更加加強了銀行對產業的統治。又因在償還過程中，金融機關須將所得到的資金中的一大部分償還日本銀行借款，而且在償還的國家債務中有相當多的數額是屬於日本銀行和大藏省存款部的，這就使產業于1949年前半期感到資金緊迫，發生通貨緊縮現象，而致以後有採取新政策的必要。

在這個預算中新設美國對日援助對等資金特別會計。原來把美國援助資金用來彌補低價出賣輸入物資和進行高價輸出之間的差額。低價供應輸入的物資，對商品輸出入關係來說，實質上是一種補助。這時改變辦法，將對日援助費列入這項特別會計，用一般會計中的價格調整費來發給輸入補助費。總司令部對對等資金的運用嚴加管理，在1949年度的運用總額1,141億日元中，以一半償還復興金融金庫債務以圖收縮通貨膨脹，又在1949年度和1950年度，結合着美國的軍事目的，向國有鐵道、電訊等國營企業和電力、海運等壟斷企業進行大量投資。

這樣一來，原來促進通貨膨脹的虧損預算、補助費、國家債務和復興金融金庫貸款等因素全不存在，通貨膨脹就在這種強力措

施下迅速收缩。日本银行纸币的发行额本来每月有 70 亿日元，多时达 170 亿日元，以后开始收缩，1949 年 1 月的流通额为 3,416 亿日元，到 3 月为止，一共减少 328 亿日元，7 月降至 3,000 亿日元以下，秋天有些回升，但不久即告平稳，1950 年 1 月为 3,204 亿日元，5 月为 3,104 亿日元。物价也开始下落，从 1949 年 5 月到 1950 年 5 月，生产资料的公定价格虽然提高 18%，但消费资料的公定价格差不多维持了原有水平；而自由和黑市价格却大为降低，其中生产资料降低 34.5%，消费资料降低 41.5%；自由和黑市价格相当于公定价格的倍数，生产资料为 1.2 倍，消费资料为 1.4 倍，都比过去减少了。

在国内经济方面，通货膨胀是这样收缩了。但是为了维持作为依靠本身力量的美国同盟者的日本垄断体系起见，必须使日本经济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中来，恢复能从世界市场输入必要的原料和粮食等物资的体系。因此根据道奇路线制定单一汇兑率和订立旨在扩大东南亚贸易的罗根计划。制定单一汇兑率，是取消过去这种措施，即按不同的商品订定汇兑率，使垄断资本进行低价输入和高价输出，在外汇方面予以保护，并切断国内物价同国际物价的关系；同时把日元和美元联系起来，以图在美元基础上稳定日元。这样国内通货膨胀的进行就被局限在 1 美元对 360 日元的界限以内，又强力收缩了国内物价同国际物价之间的差额。罗根计划的目的是，在世界市场中，让美国商品在日本扩大市场，再要日本充当美国输出的马前卒，侵入英国市场范围，借以支付美国的输入品，从而把日本和美国在经济上结合起来。

这一贸易政策的转变是在采取严格的汇兑管理方式的国家统制下进行的。1949 年 11 月制定外汇与对外贸易管理法，政府设立外汇资金特别会计，集中了大部分外汇，按照政府的外汇预算和外

汇資金分配量使用。占領軍实施的貿易管理，从恢复民間貿易后对輸出方面已相当緩和，由于这次政策的改变，又解除了占領軍对輸入的管理，1950年1月允許民商輸入原料。但从1950年12月发布的全面禁止对中国貿易的命令可以看出，管理实权还是在美國手里，并指导着政府的外汇管理。

上述經濟政策的急剧改变的目的，是結合美國的远东战略，来强行复活作为当时美國的同盟者的日本壟斷体系。这一改变并不着眼于恢复国内消費生活，而以建立美国向日本进行商品及資本輸出的基础为第一义。因此强迫日本牺牲国内人民生活而进行輸出，要求力能参加世界市場竞争的企业实行合理化。这首先是策划牺牲工人、农民和中小企业来复活壟斷体系，不但繼續施行低工資和低米价方針，而且以企业合理化为目的而要求大量解雇工人，又随着平衡預算而增加以大众为对象的稅收，这就是索甫稅制的主要着眼点。政府为了巩固壟斷体系企业的基础，还在1949年9月决定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办法，12月設立产业合理化審議會，强力推行設備近代化和以煤矿、鋼铁、电纜、造船为重点等方針。

但是单一汇兌率的制定和補助費的限制却沉重地打击了原来依靠美国援助和国家保护才勉强重新站起来的壟斷資本。这些措施使日本經濟以落后的生产水平投入世界市場，而致危机迅速地一般化。加之当时世界市場，特别是美国正处于經濟危机的深淵，英国也实行了英鎊贬值，日本經濟沒有充分准备，就投入这个漩渦里，所以更使危机加剧。滯貨堆积、企业进行紧縮、中小企业发生破綻，这一切都大規模地繼續进展。因此連資本家方面也发出了緩和道奇路綫的呼声。經濟危机集中表現在日本銀行紙币收縮所造成的货币資本不足上，使人們感到这是通貨紧縮的危机。

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政府于6月修改日本銀行法，設立日本

銀行政策委员会，力求对壟断資本实行緩和信用的方針。并采取了放寬高息适用制度、偿还公司債、收购証券和放寬貸款限制等信用方面的措施，在日本銀行的援助下，还筹划增加普通銀行的貸款。政府想用这个所謂抑制通貨膨脹政策来調和道奇路綫和壟断資本的利益。于是銀行放出的貸款逐月增加，但是貸款多系用以解救貨物滯銷的困难，用在复兴生产上的是不多的。又在这个过程中，銀行进行选择貸款对象，資金日益集中于一部分有力量的公司，因而加深了大銀行和有联系的产业的結合。

从美国的政策來說，还有必要向日本投入更强大的資本，并給予技术援助，以便在迅速构筑日本壟断体系的同时亲手确保重要的战略企业。美国在頒布九原則后立刻决定准备对日投資。1949年1月，总司令部发表对日投資确认准則，以此为根据，日本政府于3月制定关于保护外人财产的51号政令，接着陸續公布关于輸入外資的政令。这时美国对日本提出的关于輸入外資的主要要求，是减低法人稅、自由汇款和削弱工会的力量。美国又依凭占领法規，下令强迫重要企业进行紧縮，为此从东京芝浦电气公司把43个工厂刷減至17个工厂和国有铁道解雇职工12万人开始；大量进行了閉厂、分厂和解雇职工。外資輸入則从2月間美孚石油公司与东亚燃料公司訂立取得其股票的51%的合作契約起，陸續进行；結果石油、橡胶等許多工业都日益受制于美国資本，化学、电机、輕金屬等工业也为美国資本所覬覦。1950年5月頒布了集有关外資政令大成的外資法，到那时为止，輸入外資有130笔，合計216,000,000日元。

由于准許輸入外資，日本产业就有了改善技术、实行合理化和建立在世界市場进行竞争的基礎的可能。但是在那个时候，包括壟断企业在內，許多企业設備陈朽，还难于迅速革新，因此把合理

化的主要措施放在加强对工人的剝削上。政府率先对工人进攻，它在2月間决定实施包括解雇几十万职工的行政紧縮，4月公布团体等規制令，5月修改工会法等有关劳資关系的法規，并制定东京都公安条例和行政机关職員定額法等关于镇压和解雇职工的法令，6月向总司令部要求增加警察和加强机关枪、铁甲車等机动武装設備。

工人必須主动地拿出自卫的办法来对付美国和壟斷資本的攻势。他們組織保卫产业的斗争，反对閉厂、保卫中小企业和反对大量解雇职工。共产党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东京芝浦、东京交通、日本制鋼、常盘煤矿、国有铁道和全国邮电等部門的斗争极为激烈。美国占領軍公然对工人斗争进行干涉和镇压，7月发生下山事件^①和三鷹事件^②，8月发生松川事件^③。美国占領軍和日本政府使用镇压、挑撥和誣害等手段，达到了解雇国有铁道（解雇12万人）、全国邮电、全国农林和国税厅等全国官厅和公营企业的大批职工的目的。从机械工业起，許多民营企业也大規模进行解雇工

① 1949年7月5日，正当国有铁道宣布大批解雇职工，国铁工会准备进行反抗时，国铁总裁下山忽然死去，据后来有新聞記者透露，很可能是由于下山沒有把有些共产党员列入解雇名单，遭到美軍和日本政府高級当局斥責，因而自杀的，也可能是被当局杀害的，但政府却放出下山被国铁工会会员杀害的空气，借此实行镇压并强制进行解雇职工。——譯者

② 7月13日国铁宣布第二次大批解雇职工計劃，国铁工会于15日向国铁提出警告，同夜在中央綫的三鷹車站发生无人駕駛的电車冲出車庫事件，警察立刻出动清场現場，翌晨逮捕一批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毫无证据，就誣指是他們所为，处以重刑，同时强制执行解雇职工。——譯者

③ 从7月下旬起，国铁工会和东京芝浦等工会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解雇职工的斗争，美軍和政府又在8月17日把一列火車在东北綫松川站附近顛复，造成伤亡，并借此逮捕国铁和芝浦的工会会员，进行审訊，本案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慨，对政府展开了长期斗争。——譯者

人、紧缩、减少工资和迟发工资。按照九原则进行的企业紧缩的件数，根据政府所发表的，从那年2月到12月，就有8,814件，被解雇的员工达435,000名，据说实际人数要比这个数字多1倍以上。此外又发表迟发工资的有13,741件，共计8,574,000,000日元。

美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一攻势是国际反革命活动的一环，以对付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局势，特别是为了准备侵略朝鲜的战争而进行的。国有铁道工人曾对这一镇压行为进行了三次反击，但因三次诬害事件^①，一开始就受到挫折，并经由解雇大批职工而清除国铁工会中的左翼势力，致使工会被美国扶植的民同^②控制。国铁的失败又使产别工会会议受到很大的打击，日本通运、化学、占领军部日本职工等工会从9月起陆续退出产别会议，另组受美国指导和庇护的新产别会议。在这种情势下，从10月起，海员、日本教员、全国矿工等工会也相继退出世界工会联合会，参加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美国还派执掌工人事务的官吏沙利文来日，全力指导分裂工会和使工会向右转的工作。

尽管工会的干部实行背叛，而工人由于在道奇路线下日益贫困，还是坚持了斗争。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了年关斗争，1950年1月松浦煤矿工人罢工，2月国铁工会、3月煤矿工会和电产工会罢工，罢工斗争在全国连续发生。为了对付这种局势，占领军于3月间拼凑国铁和总同盟等右翼工会，组成与产别相对抗的工会总评议会（总评），并下令禁止电产工会、煤矿工会和全国矿业工会罢工，但是工人斗争在4月以后还没有停止。电产猪苗代分会不顾占领军的中止命令，坚持罢工，日立制作所的工人一致掀起连续80

① 即上道下山、三鹰和松川事件。——译者

② “民主化同盟”的简称，这是受到美军和日本反动派支持的反共和力图分裂工人运动的组织。——译者

天的大規模斗争，5月30日，东京人民在占领军的镇压下举行了奋起大会，6月间27万金属业工人举行了六三总罢工。占领军于6月对共产党施加镇压，禁止党干部担任公职，禁止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不久以后，美帝国主义就点起了侵略朝鲜的战火。

二

1950年6月开始的朝鲜战争使美国走上不弱于二次大战期间的大规模的军事经济道路，并使已经从经济危机逐步复苏的世界经济局面一变，由于美国要求各国大量增加军事开支和各国提高对军需产业的投资，又因世界各国预料民需物资会发生缺乏，进行大量抢购，就使经济情况迅速好转。

在道奇路线下连续苦于危机的日本经济，由于有了美军军事订货(特需)，又因西欧各国进行军备扩张，必需物资难于购买，使日本向后进国家的输出增加，就从1950年下期起迅速好转。滞销货物消失、物价接近海外的暗盘价格，迅速上涨。而且输入不能同输出和特需相抵，使外汇会计的日元支出急增，加剧了国内通货的不平衡状况，产生了通货膨胀的空隙。这时生产扩展，特别是与特需和输出有关的产业异常活跃，1950年底的矿工业产量比1934至1936年的战前水平增加了2.5%，1953年初又比1950年增长80%以上。随着生产的增加，资金需要也因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以及事业收入的增大而得到充分供应。

给日本经济带来新活力的是特需和输出的增加。包括特需在内的美军有关方面对日美元支出，1950年度为278,000,000美元，以后逐步上升，1951年度为676,000,000美元、1952年度为801,000,000美元、1953年度为761,000,000美元。就其内容来说，对金属和机械部门的订货额很多，从1951年起，加上美国在日购

买的给与亚洲各国的援助物资，1952年后又把美国军人和军属等个人消费支出计算在内。输出方面，虽然在1950年12月全面禁止中日贸易，但还是这样增长：即1950年820,000,000美元、1951年1,355,000,000美元、1952年1,273,000,000美元，其中纺织、金属、机械等制品有了成倍增加。输入也有所增加，同时“救济援助”和“经济复兴援助”两项资金于1950年度减为278,000,000美元、1951年度减为1亿美元，终于在1951年7月取消，国际收支情况是显著改善了。贸易的进展情况见第89表。由于输出扩大，输出的先期贷款也随着增加，并适用于特需，还创设了种种输出保险制度。1952年制定输出交易法，1953年改为输出入交易法，恢复了贸易方面的卡特尔制度。

第89表 占领时期的输出入表

(单位：百万日元，“折合美元”栏为千美元)

年 度	输 出		输 入			
	总 额	折合美元	总 额	折 合 美 元		
				合 计	美 援	贸 易
1945年9月 至46年12月	--	103,292	—	305,611	192,893	112,717
1947	10,148	173,568	20,265	523,542	404,434	119,108
1948	52,022	258,271	60,287	684,220	461,005	223,216
1949	169,841	509,700	284,455	904,845	534,750	370,095
1950	298,033	820,055	348,196	974,339	361,293	613,046
1951	488,775	1,354,520	736,394	1,995,039		
1952	458,243	1,272,915	730,352	2,028,193		

根据东洋经济新报社：《经济统计年鉴》，1952年版及1955年版编制。

日本经济依靠特需和输出增加而迅速恢复。当时成为特需和输出的对象的，不止是过去的输出工业——轻工业的制品，重工业制品也占很大的比重。在战争繁荣期间，首先取消对棉纺织业和人

造絲业增加设备的限制，棉紡业不断推行增錠计划，对等资金则大量注入造船和电力工业。于是闲置未用的设备大批开始运转、劳动时间延长、临时工被大批雇用，使资本家得以攫取巨大的利润。这样日本壟斷资本就对同美国远东政策相勾结这点有了确实的信心，从而确定了恢复壟斷体系的方向。

经济情势的上述变化加强了国家壟斷资本主义，从而导致财政和金融上的基本方针的变化。政府虽然维持紧缩财政，但又采取了通货膨胀的基本方针，特别是大量增加包括直接建设投资 and 资金供应在内的财政资金投放额。与1949年度的1,283亿日元相较，1950年度为2,376亿日元、1951年度为3,333亿日元，1952年度又增至5,335亿日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投放在公共事业、国有铁道、电讯和对等资金投资上。

由于财政投资的扩大，产业就得到了新的发展基础。从1951年度起，投资以进行近代化改革为中心，1952年度废止对等基金后，开发银行贷款的地位日形重要，通过这个机构向电力、海运、钢铁和煤矿等业进行了重点投资。迄至编制1952年度预算草案为止，财政投资是被局限在税收和邮政储金的增加额这个范围以内的，后来感到这个资金来源不足，就动用过去积累的资金，采用出卖国债和短期证券等方法来进行。又因由一般会计拨款填补外汇会计和粮食管理会计这种调剂办法已被废止，就采用日本银行承受短期证券的方法来填补这些特别会计的亏额，因而又扩大了通货膨胀的因素。

金融方面，针对战时的繁荣，日本银行虽然采取了加强抑制通货膨胀的方针，但因对资金的需要增大，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同时扩大了金融活动。例如日本银行于战争开始不久，即适应特需资金的需要而实行盖戳票据制^①，并为输入资金的需要而实

施日本銀行外汇有期貨放制，特别是日本銀行的貸出款項随着普通銀行放款的增加而大量增加，并因銀行信用的扩大又靠发行日本銀行紙币来支持，而致日銀紙币发行額从1950年秋前后起开始增加，計1950年底为4,221亿日元，1951年底增至5,064亿日元，1952年底又增至5,764亿日元。

普通銀行放款結存額，由1950年6月的7,956亿日元起不断增加，1951年6月达12,127亿日元，1952年6月达17,823亿日元。其中大部分是提供产业使用的資金，主要的增加項目是輸入原材料等业务运轉上所需資金，同时設備投資所需資金也有增加。其數額从1949年的1,399亿日元起，1950年达2,180亿日元，1951年达4,540亿日元，增加极为迅速。

銀行迅速增加对产业的貸款，是因为产业的积累还没有充分的基础，货币資本非常缺乏的原故。例如在1953年，产业的自有資本只占35.2%，外来資本却占64.8%，这显示产业主要地依靠增加借款来扩大資本积累。从銀行方面来看，則如第90表所示，这就成为相当于存款的90%上下的包括支票貼現在內的超額貸款。在放款中，50%是貸給制造工业的，加上对矿业、电力、运输等部門的貸款，就超过60%至65%，銀行增加对产业的貸款是靠日本銀行增加放款来支持的，这就使銀行同产业結合显著加深。

对設備投資的貸放是长期和不稳定的，因此最需要国家的援助。政府为了促进电力、煤、鋼铁、化学等业的設備近代化，就策划充实长期金融体制。首先于1950年11月与道奇商定用存款部的資金来兌购金融債券的方針，即承兌金融債券和承购普通銀行持有的金融債券，以充实兴业銀行和普通銀行的資金。1951年4月把

① 由日本銀行在与特需有关的票据上盖戳，保证随时兌現的优待办法。——譯者

第 90 表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的超額貸款 (单位: 亿日元)

年 度	存 款(A)	貸放款項(B)	B/A(%)	有 价 证 券
1949	7,114	5,797	81.4	984
1950	9,285	8,251	88.8	1,236
1951	13,291	12,462	93.7	1,601
1952	19,391	17,386	89.6	2,128
1953	23,908	23,908	91.7	3,170

根据日本銀行統計局:《我国經濟統計》,1958年版編制。貸放款項一栏是支票貼現、借款、輸入票據、結存貸款等項的合計數。引自生川榮治:《現代銀行論》,1960年版,276頁。

大藏省存款部改組为資金运用部,将其資金投放在相当于銀行設備資金放款純增額的半数以上的金融債券上。政府为了通融輸出資金,又于1951年2月設立日本輸出銀行,并于1952年4月改組为日本輸出入銀行。1951年4月設立了日本开发銀行,继承复兴金融金庫和对等資金的宗旨,成为对重点产业調度設備資金的主力軍。

國家銀行的长期金融政策充实了銀行对产业資金的通融力量,特别是对于周轉率高的運轉資金和貿易資金的貸放成为普通銀行的主要业务。其中兴业、三井、三菱、住友、富士、第一、三和等以本系統的大产业为投資中心的特大銀行占居絕對优势地位。就其集中程度來說,只算財閥系統的銀行,即超过全國銀行資金的40%,成为同一系統的企业の結合中心,推动了財閥的复活。財閥系銀行对同一系統的公司の通融額,在1950年上半年前后已經超过全部放款的15%至20%。特别是从1951年起加强選擇放款后,同一系統の結合迅速加强,財閥銀行和同一系統的企业之間的結合关系,就通过人員交流、互相持有股票和承购公司債券等方式而更为进展。

日本垄断体系就在这个基础上迅速复活，工业生产也急剧增加。对此力加援助和指导的是美国，并越来越加紧进行培植日本为从属于自己的军事同盟者。1951年1月，杜勒斯对吉田首相明示对日和约的基本观点，迅速开始准备缔结和约。同年4月，麦克阿瑟被免除总司令职务，由李奇微继任，他准许重新审议波茨坦政令，并开始审查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处分和修改禁止垄断法与劳动关系法等。接着陆续把几百家公司从被指定的控制股份公司和受限制的公司名单中剔除，又相继解除大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处分。1952年还允许再用财阀的牌号。1951年5月，总司令部发表日美经济合作计划，提示新的特需要建筑在商务基础上和物价必须降低，并鼓励日本侵入东南亚。

从此美国资本的活动更为加甚。以参加经营为条件而投放于石油企业的资本迅速增加；战前同大电机公司缔结的合作契约重新恢复；1951年4月，国家大宗运输公司（National Bulk Carrier Company）向吴港工厂提供借款；12月缔结了日美加（加拿大）临时渔业条约；1952年4月准许恢复武器和飞机生产，从而打开美国侵入飞机工业的途径；5月间日本轻金属公司与加拿大制铝有限公司建立以参加经营为条件的合作关系；1953年成立了开发水力电源的借款，并由中部、关西、九州三电力公司缔结火力发电借款合同。当时特别引人注目的输入外资方式是输入技术，电机、化学、造船、金属、纺织等工业为了克服战后日本工业的落后状态，争先缔结导入外国技术的契约，到1953年底为止，共达346件，其中70%是美国公司；以参加经营为代价的，在机械、化学等部门即达10%至20%。1953年4月缔结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规定缔约国人得自由进入和居留对方国内，以便经营和指挥贸易、商业与投资事业，并在从事事业活动上受到与对方国本国人同等的待遇。

誠然，在这个期間，經濟情況是有起落的。戰爭繁榮在1951年春達到最高峰，并于6月間馬立克提出和談建議後進入調整期。美國和西歐各國恢復了向海外進行輸出的余力，美國停止收購海外原料又使暗盤市場消失。由於國際物價的跌落，使1950年底到1951年初被當作大規模投機性購買對象的橡皮、皮革、油脂（合稱為“新三品”）和纖維品大受打擊；輸出價格也大為跌落，迫使制絲、人造絲和棉紡業于1951年夏到1952年之間大大縮減開工率。纖維品的不振又導致碱、染料、紡織等有關產業的衰退，從1951年夏到1952年為止，鋼鐵和其他金屬部門也發生生產過剩。

儘管這樣，朝鮮戰爭還是使壟斷資本的積累增大，提供了1951年後近代化投資的現實基礎，決定了勾結美國來確立壟斷體系的方向，以後日本壟斷資本就作為美國遠東戰略體系的一環，迅速走向復活道路。把這一方針明文確定下來的，是1951年9月締結的舊金山條約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從此日美之間就開始有了新的主從性的同盟關係。

三

壟斷資本體系的迅速復活，不止是由於外部的優越條件，又是依憑有組織地對工人進行攻擊和進一步加強剝削，才能實現。隨着戰爭的爆發，美國占領軍和壟斷資本加緊對工人進行攻擊和鎮壓，他們首先在報紙、廣播和電力企業方面進行“清除赤色分子”，並擴展到煤、鋼鐵、化學、政府機關等一切方面。接着解散全勞連和清除裏面的幹部，解雇了12,200名富於戰鬥性的工人，使產別工會會議迅速削弱。由於清除了共產主義者，工會就被民同的幹部控制，因而壟斷資本的地位就從美國方面得到保障，建立了易于壓迫工人的基礎，大大地打開了合理化和輸入外資的道路。這時共

产党正在发生不幸的派别之争，社会党、总评、新产别和总同盟等都采取反共的立场，力求自保。在这种情势下，群众还是掀起了拒绝装卸和运输武器、实行怠工和举行抗议罢工等反战斗争，但在资方的有组织的攻势前面，力量还是微弱的。

在工厂中，虽然设备的利用率有所提高，但是并没有新添工人，只是加强职务等级制，延长劳动时间，使加班加点经常化和急剧地提高劳动强度。如因生产增加而不得不添人时，又不雇用正式工人，只雇用临时工，就在这时候确立了临时工制度。战后一度消灭的利用中小企业进行包工的办法也从这时起恢复，垄断资本把中小企业当作自己的外业部，编入自己的系统，以充攫取超额利润的基础。这就是垄断资本在工人的力量被削弱后才能实行的企业合理化措施。在这个基础上，垄断资本对于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进行设备近代化一举也有了信心。

从这个时期起，作为经营合理化的一个方式，把中小企业编入自己的系统，要它们承包一部分生产的办法迅速扩展，这说明垄断资本的迅速确立及其技术革新的进展。日本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是依靠工人的低廉工资支持的，城市和农村中潜在的和明显的大批失业者以及新制中学的毕业生等构成的劳动力，战后还是这些企业的基础所在。这些企业在战后的混乱期间摆脱了战时的严格控制，乘着垄断资本的生产一时中断或缩小时大量出现，并在战后的通货膨胀过程中大为成长。道奇路线强力压抑这种发展，在道奇危机^①中，许多中小企业趋于没落。但因低廉工资的基础还是存在，所以中小企业者的停业数与开业数互相抵销，以后经过多次萧条和危机，总数却增加了。在这些中小企业中，像索尼公司和

^① 日本于实施道奇路线后不久即发生经济危机，因此人们称之为“道奇危机”。——译者

日本煤气工业公司那样,后来竟有迅速成长为大资本企业的;有的虽然没有发展到那样大的程度,而在输出用的织物和鱼网、汽车和轮船的配件以及平炉制造业等部门中,也有许多优秀的企业,在生产和销售上都有所发展。壟斷資本在其与其他壟斷資本或与中小企业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对中小企业进行选择,加以组织,并用供应原料、技术和资本等方法,把它们编入自己统治的系统。

至于设备的近代化,则从美军特需的数量和质量来说、从参加世界市场上的贸易竞争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由于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中技术研究处于空白状态,使日本的工业技术远远落后,致使日本资本自己缺乏追上世界水平的能力和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或唯一的改变落后状态的办法就是导入外国技术。而从外国方面来说,只需一张蓝图,就可以获得庞大的专利费和日本市场,甚至于攫取经营管理权,真是最上算的买卖了。

从1951年前后起,许多壟斷企业依靠导入外国技术来推行设备近代化。政府也在税制上采取很多措施,并多次规定重新评估资产的办法,又于1952年3月制定企业合理化促进法,来保护资本积累的扩大和设备的近代化。于是许多企业在这个时期大规模地开始采用新技术和制造新产品,如造船工业进行电气熔接和分段生产、钢铁工业实施自动和连续压延作业以及增加带钢轧机、煤矿依凭金属横梁采煤法而推行机械化、棉纺织业使用高性能精纺机、制浆业采用半化学处理法,同时又开始制造尼龙、维尼龙、氯化乙炔基、有机农药、电气计测器和微波通信装置等。

新技术的导入固然还是局部的和不平衡的,但是许多产业部门中的壟斷企业却显著提高了生产性能。由于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序缩短和机械化,使主要业种的单位生产所需时间减少一

半，原料的使用效率也有所增加，同时单位生产成本减少，产品质量提高，并开始制造过去不能制造的新品种。大企业还作为合理化的一个方式，输入近代的經營技术^①，如动作時間标准法(WF法)等作业制度、监工訓練(TWI)、管理員訓練(MTP)等企业内部监督人员教育办法、对工人实施“人情关系管理”方法^②和科学贩卖制度等，都从这时起开始推广。企业合理化因设备近代化而更加有效，从而更加强了对工人的剝削。这些发展的成果就成为1954年后以特大企业为中心而增加积累的物资基础。

但是工人的情况却因近代化和合理化措施而更加变坏。如第91表所示，他們的地位是迅速降低的。特别是近代化的措施，由于在战争导致特需增加的情况下，首先注重增加产量，所以还是与旧的生产方法相结合而局部地、不平衡地进行的，因而对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的剝削也同时加强。工资在这个过程中大致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是依凭工人的斗争，才从丰富的利潤中获得的，但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显著的低微。而且工人的情况，又因企业规模、产业种类、职級、男女和正式工、临时工之别而有显著的差距，所谓工资的双重结构就在这时候固定下来，工资已经不按过去那种业种平均方式计算，而是按照职級计算了。

美军的刺刀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为资本家效劳的活动显著地促进了这个时期内工人地位的降低。特别是与美军有关的工厂中的劳动强度之增加是十分可怕的。例如被称为远东第一战车修理工厂的被美军征用的日鋼赤羽厂，受到美国兵的直接监督和密探的监视，又实行职务等級制，听任安全设备残缺，却施行流水

① 美国式的苛刻细致的劳动管理方法。——译者

② 企图利用“人情关系”(ヒューマン・リレーションズ即 human relations)来缓和工人的反抗情绪，以便加强剝削的办法。——译者

作业,不断加强奴隶般的劳动;日产汽车公司横滨工厂的厂地一半被美军补给工厂占用,在狭窄的厂房中迅速进行扩大生产,这个厂还是使用陈朽的机器,只是加快作业线的速度,加强职级制的监视作用,并雇用临时工和课余挣钱的学生来实现其目的。在煤矿方面,还是把推行合理化的重点放在实施包工付值和赏罚制度上来增加劳动强度;采用金属矿柱进行采掘时,则实行提高标准作业量和减低包工工资;又把机械化的重点主要地放在搬运上,而不是放在采掘上。为了反抗这种搞法,煤矿工人于1951年春秋两季和1952年的六三斗争中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斗争,当时以总评会长武藤武雄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勾结政府和资本家,对这些斗争拼命进行破坏。

第91表 第二次大战后工人相对地位的变迁

年 度	名义 工资	消费者 物价指 数	实际 工资 A	实际 工资 B	生产 指数	雇用 指数	劳动 生产率 C	工人的 相对地 位A/C
1934--1936	1.0	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47	98.7	126.1	21.2	30.2	35.1	137.8	28.4	76.4
1948	74.1	218.6	33.9	48.6	52.5	139.3	42.0	80.7
1949	124.8	273.3	45.6	66.3	68.9	141.2	54.4	83.8
1950	149.3	254.3	58.7	85.4	82.0	133.9	68.3	83.0
1951	188.8	295.4	63.9	92.1	115.1	142.2	90.3	70.6
1952	219.7	307.8	71.4	102.3	128.2	141.0	101.3	70.4
1953	254.4	330.8	76.9	107.3	159.7	142.5	124.9	61.5
1954				108.0	173.8	143.3	133.7	(58.2)
1955				107.8	183.6	140.6	147.5	(52.6)

根据吉村正澄:《日本贸易政策》,1956年版,268页。数字中名义工资、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实际工资A是劳动经济研究会试算出来的,其他数字是劳动省的。括弧内的数字,是劳经研所无,由吉村参照劳动省的数字与劳经研同劳动省数字之间的距离而推算的。

设备的近代化是在工人展开斗争的同时推行的。工人不能长期甘心受美国和垄断资本的进攻，1950年秋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军的壮举又鼓舞了日本工人。从1951年2月至3月之间以全国规模展开的煤矿工人罢工增加了全体工人的战斗信心；电产、港湾等工人接着发动了斗争。在1951年1月举行的社会党大会上，由于基层群众的压力，通过了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和反对重新武装等和平四原则，总评也从一个反共工会开始转变，在3月的大会上通过和平四原则，并将全体参加国际自由工会的议案加以保留。受民同控制最严的国有铁道工会亦于6月的大会上粉碎民同右派的阴谋，通过了和平四原则。

1951年秋天以后，和约的缔结与经济危机的扩展再一步加剧了阶级斗争。垄断资本依凭合理化措施而加强剥削，美国和政府加紧实施镇压，与此相对抗的工人就加强了斗争。如煤矿、电产、全国汽车工会掀起秋季斗争，私有铁道、钢铁和全国纤维工会发动车关斗争，京都市电车工人和松坂公共职业安定所的求职人员等还使用实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从1951年底到1952年为止的反对镇压法规的斗争扩大了以总评为中心的工人统一战线，在1952年4月到6月之间举行的5次反对防止破坏法的政治性罢工中一起动员了270万群众参加斗争。4月28日和约生效，紧接着的五一节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五一节，在6月和7月间，被美军征用的工厂中的工人和在美军服役的日本职工工会先后发动罢工，9月间煤矿工人坚持63天的大规模争议，电产工会发电部门的工人也从9月起到12月止进行多次罢工。1953年制定罢工规制法，就是垄断资本为了对付这次煤矿和电产工人的斗争而发动的攻势。

以后设备近代化还是垄断资本同工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并且力求扩大其规模。例如在煤矿业方面，资方于六三罢工以后迅速

推行金屬橫梁采礦法。原來當作增產的方法，採掘工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上都有所增加，但自金屬橫梁采礦法普及後，相對和絕對數字都趨於減少。電力工業方面，也自1952年罷工後增強設備，火力發電業大量採用自動制御裝置，水力發電業使用容量大的設備和推行運轉的自動化，送電方面則採用超高壓和自動化設備，結果發電量迅速增加，而人員卻反趨減少，電產工會也迅速削弱。汽車工業則採用流水作業來加強連續作業，一部分還採用高度自動化裝置。又自1953年日產汽車公司工人罷工後進行編組完整的承造配件的中小企業系統。

日本產業就是這樣在和約生效後進一步推動近代化，完成了所謂“改善體質”^①。但是這不是正當的旨在提高生產性能的技术革新，而是當作提高壟斷資本的超額利潤和打擊工人反抗的武器而實行的。美國和日本壟斷資本在和約生效前已經打好了這種措施的基础，所以在和約生效以後，日本經濟就進入新的階段。1953年8月修改了禁止壟斷法，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除了對於壟斷資本的卡特尔活動的禁律。

四

作為美國遠東戰略的一環，依靠特需和政府保護而迅速恢復的日本產業，其結構同戰前有顯著的區別。最大的變化是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和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之間的比重。如第92表所示，1951年後已呈現三分之二比三分之一的關係。另外一點，工礦業生產指數與戰前1934年到1936年的平均水平相比，1950年為93，1951年為118，1952年為130，1953年為161，已經恢復。而在

^① 意指改善產業結構的素質。——譯者

貿易方面，与战前同期間的水平相比，輸出陷于停滯，1950年为30，1953年为35；輸入則1950年为33，1953年增至74，还需要好几年才能赶上战前水平。就輸出商品来看，生絲衰落，棉織品于战后还是主要項目，但其比重逐年降低，而铁和船舶等重工业、化学工业制品則有所增加。輸入大宗为棉花和米等原料和粮食，随着原油和机械类制品輸入的增加，棉花等纖維品輸入就减低下来。再就貿易国家来看，美国占輸出入的首位，特别是占輸入的50%以上，

第92表 國內市場的規模和結構

年 度	在國內銷售的 貨物價額 (國內市場)	在國內銷售的 消費品價額 (消費品市場)	在國內銷售的 生產資料價額 (生產資料市場)
1934-1936	19,770 (100)	8,295 (41.9)	11,475 (58.1)
1946	3,603 (100)	2,869 (79.6)	734 (20.4)
1947	9,330 (100)	7,212 (77.3)	2,118 (22.7)
1948	19,401 (100)	13,834 (71.3)	5,567 (28.7)
1949	30,952 (100)	17,955 (58.0)	12,997 (42.0)
1950	43,472 (100)	19,043 (43.8)	24,429 (56.2)
1951	67,291 (100)	22,326 (33.2)	44,965 (66.8)
1952	81,970 (100)	27,844 (34.0)	54,126 (66.0)
1953	100,380 (100)	32,206 (32.1)	68,174 (67.9)

根据农村市場問題研究会編《日本的农村市場》，1957年版，36頁。数字是川上正道就《國民收入統計》所示市場价格加工制成的。至于单位，1934至1936年度为百万日元，1946年度以后为亿日元。这个表虽然只有國內市場部分，但輸出在1950年只占总生产額的7%以下，1953年占5%以下，所以这个表显示的生产資料製造部門和消費資料部門之間的比率是大致不差的。

壟斷了日本貿易；輸出方面則占 20% 上下。其他輸出地區的比重每年改變，如英國、香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泰國等都在很大的程度上起落變動。

上述情形說明戰後日本經濟結構同戰前有顯著的區別。但是我們不能由此簡單地得出產業結構重工業化和經濟結構健全化的結論。相反地輸出的減縮却意味着國外市場的相應喪失，並且證實市場的不穩定性。特別是棉織品市場的縮小顯示中國和印尼等戰前大市場的喪失，成為決定貿易結構性格的因素，只好極力推行輕工業品和重工業品的飢餓輸出，才能勉強維持輸出市場。輸出的減縮當然妨礙輸入的增加，從而妨礙生產的擴大；如果生產擴大，又會增加原材料和機器的輸入，以致 1953 年、1957 年常常發生外匯危機，從而增加美國借款，以後對美國的依賴性還是繼續加強。至於把輸入的大部分局限在糧食和原料上，實際上成為在外匯管理下阻止重工業製品輸入，以促進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發展的措施，但是要使重工業和化學工業製品像棉織品那樣利用低廉工資做武器來進行海外市場的競爭是有困難的，所以如連接造船輸出與砂糖輸入的制度所示，只有依靠國家的保障來進行傾銷，才能開辟海外市場。可是無論如何，在這個時期內，是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設備投資，同時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以異常的成長率擴大了國內市場。雖然這種發展是從崩潰狀態開始的，因而只是數字上的魔術，但經濟規模總是擴大了，生產也增加了，並且規定了戰後的生產結構。可是設備投資的擴大並沒有同時具備可靠的無限發展的市場，重工業製品的市場主要地局限在國內，有一定的規模和限度，這使壟斷資本立刻就想迅速復活帝國主義，並加緊勾結美國，作為其遠東的爪牙而進行發展。

正是在這個時期，顯示了戰後日本經濟的性格，打好了今後發

展的基础，并成为其出发点。现将这个时期的主要产业动向叙述如次：

先讲铁的生产，从1949年起进入正式重建过程，特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特需和一般市场扩大，促使生产从1950年10月起迅速进展，1951年比1949年加一倍，超过了战前水平。过去钢铁生产的主要困难是原料的获得，但自实行道奇路线，取消了补助费和进行财政紧缩后，经营上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在美国援助下进行合理化，特别是从1951年起开始执行第一次合理化计划，致力于设备的更新和近代化。这个第一次合理化计划本来定为3年，后因计划扩大，延至1955年大体完成，总计投资1,293亿日元，其中50%投入压延部门，并输入了带钢轧机等外国的最新技术。在实行第一次合理化时，三分之一的资金是自有资本，外来资金的一半借自普通银行，其余得自公司债券、外汇和开发银行。

在钢铁工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由于对中国的贸易遭到禁止，大部分的铁矿石、焦炭和废铁等原料都从美国及其势力范围输入，从设备起，到原料止，全同美国相结合。市场则以特需为中心而扩大，并因设备投资的增加和输出的发展而推广了钢铁的需要。钢铁部门的垄断企业，由于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于1950年4月实施于钢铁业而分为八幡与富士两家，加上日本钢管，这三家联合企业一共占生铁总产量的80%以上和钢材产量的50%以上，这三家垄断公司在竞争加剧时所建立的生铁和钢材价格都有统治力量。垄断企业又在1951和1952年中的进展缓慢时期策划把外面的平炉企业和轧钢企业编入原材料供应系统，后即迅速进行钢铁工业系统的编组。于是钢铁业的结构和它在整个产业的地位就在这个时期大致确定，并打好了以后发展的基础。

其次谈动力工业。继1948年电力供给量增加以后，1949年又

第 93 表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鋼鐵业的发展 (单位: 千吨)

年 度	生 铁	鋼 錠	鋼 材
1949	1,548	3,111	2,993
1950	2,232	4,838	3,754
1951	3,126	6,502	5,148
1952	3,474	6,988	5,298

根据日本鋼鐵联盟:《鋼鐵年鉴》。

有增进, 但为減輕需要的压力起見, 从那年起还是进行开发电力, 即以对等資金为主要財源, 着手建立水力发电站 28 处, 发电量 456,000 瓩, 火力发电厂 7 处, 发电量 201,000 瓩。但是 1949 年 5 月发生电力事业重新編組問題, 这时由于对等資金停止貸放, 致使开发銀行在 1950 年也几乎停止活动, 但总司令部于 1951 年 4 月下令强制执行电力事业的重新編組, 解散日本发送电公司(簡称日发), 成立 9 个电力公司。以后这些公司都以充分供应本地区的电力为目的, 全力进行开发电源, 到了 1951 年, 各公司的扩建工程就大半完成了。

由于有几千亿日元資金注入电源开发事业, 利益极大, 致使政府同壟斷資本发生暗斗。政府于 1952 年制定电源开发促进法, 成立电源开发公司, 接着在同年内从开发佐久間水閘开始, 推行为期 5 年的长期开发計劃。至于这个期間的电力供給情况, 1950 年由于火力发电的增强, 达到了战前水平的 1.8 倍, 1951 年則因水源很缺和火力发电設備修补不足, 所以从秋天以后产生电力不足的情况, 自由党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强行制定电源开发促进法的。解散日发又是企图削弱电产工会的措施, 这种情形在 1952 年电产工会发动的斗争結束后就显示出来。又在 1951、1952 年开始开发电源以后, 电力工业通过设备的迅速扩充, 展开了水平很高的新技术,

增大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对工人的攻势也以此为契机而更为加剧,这种情况已经说过了。

第 94 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动力产业的发展

年 度	1949	1950	1951	1952
煤(千吨)	37,972	38,459	43,311	43,358
电力(百万度)	36,386	40,437	40,150	42,916

根据资源厅和公益事业委员会的调查。

其次,煤产量在 1949 年差不多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道奇路线的实施给这个产业的打击最大。那年 4 月停止复兴金融国库贷款,9 月废止配煤公团,这使煤业资本在设备资金和运转资金的调度上发生困难,弱小煤矿就被淘汰。1949 年下期的产量比上年同期减少,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需要减退又使煤的储存量迅速增加,9 月间滞销额达到 5,678,000 吨这一从未有过的高度,相当于产量的 40%,以后这种情况虽然多少有些变化,而基本上持续到 1950 年 5 月。

朝鲜战争的爆发显著提高了煤的需要量,其影响首先表现在滞销品的减少上,1951 年 3 月储煤量减至 150 万吨,比正常储存量少 100 万吨。产量也随着需要增加,但主要是依靠加强工人的重体力劳动实现的,因此劳动生产率有所增加,如在 1950 年,矿井内每人每月生产量为 14.2 吨,1953 年增加到 17.4 吨。这种工人情况恶化的情形终于在 1952 年 10 月激发六三罢工,以后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还围绕着重理化的大规模实施而更为加剧,发展到 1953 年,三井矿山工会坚持了 113 天的争议。在煤业资本家的活动中,还有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在取消统制以后,大煤矿和需要量大的企业结成直接买卖关系,加强了供应煤的控制系统。而中小煤

矿还是依靠批发行，批发行的地位比战前显著降低，中小煤矿的地位也随着降低。

另一重要动力工业是石油，自从1949年准许复业以来，外资集中投放在这个部门上。在1951年1月，太平洋岸的9家制油厂中有5家开始运转，石油精炼业则以中东的原油为基础，受到美孚和壳牌等巨大外国资本的控制。其后产量逐年上升，1952年原油处理的全年能力为674万千公升，比1937年的能力增加一倍。在石油中，由于当时的汽车数目还少，所以挥发油需要未见增加，而工业中重油的使用量却迅速扩大，侵入煤的市场，与热量大的高级煤进行竞争。因此，在1953年以后，煤与石油的竞争开始成为煤业者面临的严重问题。

造船业与铁、煤和电力业并列为这个期间的四大重点产业，在国家的全面保护下迅速发展。在按照计划进行的造船方面，1949年的第五次造船计划规定建造278,000吨，实为第四次造船数量的5倍，平均船型和速力都有增加，并开始装置内燃机，正式建造外航大型船舶。接着于1950年决定第六次造船243,000吨，1951年决定第七次造船373,000吨，1952年决定第八次造船291,000吨，1953年决定第九次造船372,000吨，并着手建造。这次造船业的发展是依靠国家的保障，和海运业一起进行的。

在战败以后几年中，海运业不但因战争而丧失船舶，而且受到船舶运营会一手统制，阻碍了海外航行的进展，1950年后刚恢复民营时依然不振，未加使用的船舶达100万吨，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才迅速摆脱这种情况。由于战争发生后世界船舶立告不足，未加使用的船舶就迅速消失；又因1950年8月后允许日本船只出入海外各港口，11月后就从重开南美航线起，陆续恢复海外定期航线，结果船舶渐感缺乏，因而有实施第六次和以后各次造船计划的

必要。但因海运业的积累显著低落，所以造船全靠借款进行，借款中国家资本和普通银行贷款各占半数，其巨额利息增加了海运业的负担。

造船业的能力在朝鲜战争期间显著扩大，战后还是保持原状，所以除实行造船计划来供应国内市场外，还有多余的能力，因此致力于输出就成为急务。1951年建造的輸出船只只相当于计划造船的43%，而1952年后超过30%，1954后达50%至80%。于是造船数量就在1956年超过英国，占居世界第一位，显示这门工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为了应付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又推行了设备的近代化，把从外国导入的技术和日本建立海军以来积累的傳統造船技术结合起来，特别是导入了以熔接工作法为中心的新技术，加上增加劳动强度和扩大外厂分包制度，结果使生产成本减少一半。国家为了发展造船输出，从各方面给予保护，如1953年到1955年实施的砂糖输入与造船输出的連鎖制度就是一个象征，因此能够进行傾銷船舶，使其成为仅次于棉織品和鋼鉄的最重要的輸出商品。国家对海运和造船业的无限制保护曾于1954年引起造船貪污案，佐藤荣作^①因受贿而被起訴，但是吉田首相令法务相指示司法当局中止进行审理，腐敗达于极点。

造船以外的机械工业在依凭道奇路綫解雇大批工人和朝鲜战争导致特需增加后建立了发展的基础。机械工业的发展情形見95表。

电机工业在战敗以后几年間只生产低級收音机、普通灯泡和电热器等家庭电器以及电动机、变压器等小型重电机和电话机，老沒有树立再建的目标。随着道奇路綫的实施，才以工人为牺牲而强

^① 时任执政的自由党的干事长。——譯者

第 95 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机械工业的发展

(单位: 百万日元)

年 度	工作母机	发 动 机	电 动 机	織 机	汽 车	船 舶
1950	913	7,762	4,341	3,833	15,133	24,885
1951	1,712	15,263	9,149	6,847	13,765	42,692
1952	2,840	26,939	12,889	4,933	19,460	69,309
1953	3,521	28,251	15,612	4,903	31,749	91,797
1954	5,367	31,853	20,688	5,974	28,726	58,781

根据《日本經濟統計集》。

行恢复。首先是大量解雇工人，如东京芝浦电气公司解雇 6,268 名、日立制作所 5,555 名、日本电气公司 3,600 名、冲电气工业公司 2,800 名、三菱电机公司 1,800 名；加上强制减低工资、裁并差弱工厂和改换配置等，在国家资金援助下迅速推行合理化。这个部门在战争期间技术落后最甚，机器设备的陈朽也极为惊人，因此最急于导入外国技术来从事复兴。到 1952 年 11 月底为止，机械工业方面洽定的技术合作一共有 100 件，其中电机工业达 26 件。电机工业的发展以朝鲜战争发生后工矿业生产扩大所导致的产业用强电机的需要增加为出发点，并因开发电源而扩充了市场，又因 1953 年前后起家庭电气化盛行而显著进展。日立、东芝、松下等壟断企业就在这时候压倒其他企业而变得十分强大。

汽车工业也是由于朝鲜战争发生后依靠特需获得巨大利润才恢复的。1951 年后，日产、丰田、五十铃等公司都用自己的资金和国家资金扩充设备和提高生产性能，并在与美国的半旧车进行竞争中生产货车、公共汽车和小型汽车等，扩大市场。但是这门工业距离国际水平还远，技术水平还没有发展到适用高度自动化装置的程度，只靠用流水作业来加强劳动和把大量工序分包出去来扩

充市場。至于汽车工业大量生产轎車，則在 1956 和 1957 年以后。

可是工作母机制造业的恢复还是很慢。恢复貿易后外国机器的大量輸入压抑高級机械的发展。但自 1952 年后，这門产业也在国家的補助下推行設備近代化和建立制造高級工作母机的基础，并在 1956 年后大为見效。

其次，化学肥料工业依靠国家的优厚保护，大多数部門都在 1949 年恢复到赶上战前水平的程度，其生产力已經超过国内市場的范围。到了 1950 年 8 月，由于取消了对肥料的价格、配給和产量分配的統制，又廢止了肥料配給公团，各公司为了应付国际竞争，都致力于設備近代化和企业合理化。結果 1951 年底氮肥制造业的設備能力，硫銨增至战前最高水平的 1.6 倍，石灰氮肥增至 2.1 倍，二者的生产能力一共超过 300 万吨，远远多于国内需要的 200 万吨。至于市場条件，則因战争繁荣使农村购买力提高，輸出市場上的需要亦以东南亚为中心而增加，所以生产量就趋于增进。与 1949 年相比，在 1952 年，硫銨增至 150%，石灰氮肥增至 142%，到了 1952 年底，已經发生了傾銷海外的問題。

在企业合理化过程中发生的新变化，是从这时起，硫銨工业由于电力价格上涨，煤价轉低，所以其主要生产方法从电解改为用煤气大量制造。而美国和意大利的硫銨工业从那时起轉向煤气生产，到了 1953 年以后，这就成为重大的問題，石油化学工业一跃而为主要化学工业，而硫銨却处于从屬地位。此外化学肥料工业又力求发展为多种經營的綜合企业，从 1948 年起，东洋高压公司开始生产尿素，制碱的壟断企业也开始制造氯化銨。

有机合成化学工业从这时起开始迅速发展。許多企业以参加經營为条件导入外国技术，并进行生产氯化乙炔基、聚乙烯等合成塑料和乙丙酰胺与碳化物等合成纖維原料的生产。政府从培植合

成纖維产业起,极力振兴合成化学工业,又在1953年至1955年之間扶植石油化学工业。东洋人造絲公司和仓敷人造絲公司等纖維資本企业也从这时起开始大量制造尼龙和維尼龙等合成纖維品,东洋人造絲并于1951年同杜邦公司締結关于尼龙的技术合作協定。日本瓦斯化学公司則从1952年起开始在新瀉利用天然煤气制造甲醇。

朝鮮战争开始后,紡織工业也通过扩大輸出而获得巨額利潤。只就10家棉紡公司公布的利潤来看,1950年下期为10,086,000,000日元,与資本相較,平均利潤率为263%,1951年上期为29,630,000,000日元,利潤率达772%,即能显示这点。棉紗的黑市价格,1950年8月为28万日元,1951年3月为25万日元。1950年6月总司令部取消了棉紡設備400万錠的限制,此后棉紡設備的添設、新厂的創建和产量的增加都进行得很快,其情形見第96表。美国将其棉花輸出量的四分之一划給日本,在英国因原棉不足,以致开工率只有25%时帮助日本棉紡业达到95%的开工率。棉紡业以利潤和普通銀行借款为基础,大規模地进行設備的扩充和近代化,即在专门依靠美棉为原料的前提下导入美国技术,各厂使用高性能精紡机和梳棉后装入大型容器加工等方法,經由每人管理机器台数和工作量的增加,显著减少了每捆棉紗所需生产人数。

棉紡业的繁荣景象从1951年秋天起下降,輸出减少,棉紗价格下落,如1951年10月紗价为14万日元,1952年3月即降至8万日元,一直到1953年止,益趋不振。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棉紡資本从1952年3月起减少开工率和增加劳动强度,并大批解雇工人,据說竟在6万人中解雇了2万人。“对剩下来的工人,增加劳动强度20%到30%,并减少平均工资”(島津千利世:《女工》,1953年版,

第 96 表 (1) 第二次大战后棉纺织业设备的发展

年 度	棉 纺 业 者				织布专业者
	公司数(家)	工厂数(家)	锭数(千锭)	机 机(台)	机 机(台)
1935	60	263	10,330	89,664	236,582
1946	10	59	2,632	30,482	103,549
1948	19	122	3,457	42,532	146,336
1949	35	121	3,736	49,646	163,870
1950	51	146	4,340	51,585	178,298
1951	92	197	6,367	65,431	217,916
1952	122	213	7,452	70,251	237,687

第 96 表 (2) 网上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年 度	生 产			输 入	输 出	
	棉 纱 (百万磅)	兼营纺织的企业出产棉布 (百万平方碼)	专营织布的企业出产棉布 (百万平方碼)	棉 花 (百万磅)	棉 纱 (百万磅)	棉 布 (百万平方碼)
1935	1,424	1,843	2,269	1,638	39	2,725
1946	128	145	97	350	3	2
1948	273	418	503	240	9	422
1949	346	515	467	430	22	747
1950	518	761	757	765	25	1,103
1951	711	922	1,156	852	28	1,095
1952	749	879	1,279	952	30	762

根据关桂三：《日本棉业论》，1954年版，447页，东洋棉纺公司调查。

59页)。旧有的棉纱业中原来只进行简单的物理操作，在这个期间增设的新的和更新的纺纱厂对工人的役使更为酷烈，以致威胁起十大棉纺公司来。十大棉纺公司就运用输出连锁制来加强棉花原料的配给制，并制造新品种和把中小织布业者编入自己的系统，以维持其地位。

五

在朝鮮战争发生后工业实现上述发展的同时，农业也开始呈现新的发展形态。战前保持在 550 万户左右的农民户数，于 1950 年增加到 617 万户。由于道奇路线对农业减少财政投资、增加税收负担和进一步降低农产物价格，使农家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米麦的黑市价格从 1949 年年中到 1950 年年中迅速降落，美国过剩农产品输入的增加更加剧了这种跌势。放棄耕种的农民日益增加，1949 年有 4 万户农家放棄了 8,502 町步农地，其中 1,905 町步淪于荒蕪。政府认为土地改革沒有前途，在 1948 年到 1949 年之間策划停止土地改革和恢复旧制度，但被总司令部下令中止。可是政府并没有把土地改革的成果推进到改革农业经营的意思，听任地主富农夺回土地，进行黑市买卖和扩展黑市佃租关系。

朝鮮战争爆发导致了经济情况的好轉和壟斷体系基础的确立，又使农村情况发生变化，政府的政策則倾向于确立“保守的农民”。在战争繁荣时期修改了为了恢复壟斷体系而过分增重农村负担的索甫税制，对农民的所得税有所減輕，就是一个表现。而最重要的措施却是提高米的公定价格，这是为了准备朝鮮战争的扩大，从 1951 年度以来正式推行的粮食增产政策中的重要一环。政府将米的 1950 年度公定价格定为 5,420 日元，这虽然低于农民所要求的 5,800 日元，但比农林省調查的生产成本 4,014 日元高 35%，以后的公定价格还是維持这种水平，至少对经营面积在 1 町 5 反以上的农户来说，公定价格是多于生产成本的。城市对农产品的需要之增加把农产品价格从低落中挽救出来，米的黑市价格也停止下跌，迄至 1953 年秋因歉收而一度高涨为止，一般是保持稳定的。

农业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提高，广泛进行了增施肥料和

多种经营，并采用了普及农药与增用农业机械等从未见过的新生产方法。政府执行了以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土地开发政策，为此投下的财政资金，1949年为133亿日元，1951年331亿日元、1952年494亿日元、1953年678亿日元；运用这些经费大规模地进行了耕地开垦和排水填地，农村道路的改修和耕地的集团化也在这时广泛推行。每反的米产量，迄至1954年前后为止，还是停留在2石强的水平，到了1955年以后，2石5斗上下就成为标准，使原来的丰收年变成经常年成，这也是上述发展的继续。特别在东北的千町步地主地区，每反产量达三石上下，在这里农业机械的扩展等因素导致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农家的情况也远远胜过近畿地区。农家的现金收入率，到1951年前后止，还是50%左右，1952年后增至60%左右，并逐年增加，经营1町5反以上的阶层已达到70—80%。在农业部门中，种米的收入占农家收入的半数，其次是畜牧、种菜和制造工艺品的收入，养蚕则趋于衰落。

上述情况意味着农村作为国内市场的地位提高，如据栗原调查的农村购买额的绝对数字，1950年为6,862亿日元，1953年为12,161亿日元，即在4年中加了一倍（栗原源太郎：《农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土地制度史学》，1960年4月号，75页）。农民与商品生产的联系，虽由因贫穷而被迫出卖产品的耕种小片土地的农民构成底层，但推动的中心力量是中农以上的阶层，再普及于全体农民。以他们为对象、向农村销售的商品是肥料、农药、农业机器、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纤维品等消费资料。可是农村作为市场的相对比重随着工业的积累增大和生产资料市场的意义日益重要而降低，计1950年为16.4%，1953年降至12.5%，1957年后就不到10%了。这说明尽管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但不能改变国内市场的狭隘基础，农村依然是低工资的根据。可是农村市场的扩大总

給有关产业提供市場基础, 农业的商业化也有进一步发展。

但是簡單說来, 尽管提高了米的公定价格, 致使1955年后出現 1 万日元的米价, 但从壟斷資本的立場来看, 并不算什么高米价, 还是貫徹了低米价的基本路綫。看了我从前发表过的第97表就容易了解这点。我对这个表曾作如次的說明:

第 97 表 战前战后以米为中心的农业收支

	战前(1930—35年)	战后(1955—57年)
农家户数	540万户	610万户
生产量	6,000万石	7,000万石
現金支出	6.3亿日元	3,860亿日元
販賣米	3,000万石	4,000万石
收入	5.6亿日元	4,000亿日元
盈亏	-0.7亿日元	+140亿日元
农民保有米	2,600万石	3,000万石
农民必需米	3,100万石	3,800万石
不足米	-500万石	-800万石
購入米价格	-1.4亿日元	-800亿日元
經營米的农家盈亏	-2.1亿日元	-660亿日元
折成战后价格的上項数字	-740亿日元	-660亿日元

农家户数和产量根据农林省調查; 販賣米和保有米根据粮食厅調查, 并根据农林省: 《农家經濟調查》等資料編制; 現金支出, 战前以帝国农会数字为基础, 每石按自耕农 15 日元 30 錢(內經營費 7 日元 80 錢、租稅及土地資本利息 7 日元 50 錢)、佃农 5 日元 20 錢(只計經營費), 并按自耕农 3,300 万石和佃耕农 2,700 万石平均計算, 得出 10 日元 50 錢; 战后根据《农家經濟調查》, 按各阶层平均計算, 得出 5,500 日元; 农民必需米定为 1 人 1 石。

“战前, 农家有 540 万户, 每年生产米 6 千万石, 农民現金支出約为 630,000,000 日元。而在售出的3,200万石米中, 屬於地主的为1,200万石, 屬於农民的为 2 千万石, 按每石 28 日元計算, 农民

收入为560,000,000 日元,結果約亏 7,000 万日元。农民保有米为 2,600 万石,如按当时农民数 3,100 万人,每人每年需要 1 石計算,則不足之米为 500 万石,购入价格达 140,000,000 日元。因此經營米的农民的亏损为 210,000,000 日元,其中八成是貧穷的佃农負担的。

战后农家有 610 万户,每年生产米 7 千万石,农民的現金支出約为 3,860 亿日元,而販卖的米为 4 千万石,按每石 1 万日元計算,农民在这方面盈余 140 亿日元。但是农民保有米为 3,000 万石,若按現在农民数 3,800 万人,每人每年需米 1 石計算,則不足之米为 800 万石,购入价格达 800 亿日元,这方面农民要亏 660 亿日元。从战后階級分化情况來說,前面的 140 亿日元的盈余应屬於富农,而后述 800 亿日元亏损則为經營田地一町以下的,特别是 5 反以下的貧农的負担。

現將战前的亏损折成战后价格,如將倍率定为 360 倍,則战前亏损折合为 740 亿日元,差不多同战后数字不相上下。若是战后經營的收益总数只算 80 亿日元左右,那只是富农阶层得到的好处,占农户 70% 以上的貧农的情况却差不多全未改善。而战前地主收取佃租米 1,400 万石,出賣其中 1,200 万石,按战后价格計算,共值 1,200 亿日元。換句話說,在农村中,战前是地主收入現金 1,200 亿日元和农民亏损 740 亿日元,而战后是富农获得現金收益 140 亿日元和貧农亏空 800 亿日元,二者之間的差額 1,120 亿日元反映米价比战前更为低下,成为农村对城市資本主义的直接貢納,起了减低壟断資本的可变資本的作用。这里可以看出土地改革的最大意义之一” (守屋:《战后的壟断資本主义》,載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日本历史讲座》,第 7 卷,1957 年版,171—173 頁)。

这种农业发展使 1950 年后的农民階級分化情形起了变化。耕地的零星化在 1950 年前后中止,此后以經營 1 町至 2 町的农民为

第98表 农民阶级分化的变化情形
(1950—1960年)

	不 滿 三 反	3—5 反	5 反—1 町	1—1.5 町	1.5—2 町	2—3 町	3—5 町	5 町以上
1950年农 户数(%)	1,471,872 (100)	1,050,469 (100)	1,972,925 (100)	960,958 (100)	378,578 (100)	207,845 (100)	76,928 (100)	48,442 (100)
1960年增 加数(%)	5,768 (3.9)	9,374 (0.9)	14,944 (0.7)	57,205 (5.9)	39,558 (10.4)	24,916 (11.9)	14,600 (20.6)	11,682 (24.0)
1960年减 少数(%)	183,123 (12.5)	54,631 (5.2)	70,778 (2.9)	6,416 (0.7)	2,831 (0.7)	369 (0.0)	353 (0.0)	71 (0.0)

根据田中定：《日本的农民——农民阶级分化》，载《经济评论》，1961年2月号，5页。显示1950年到1960年全国各阶

层农民的变化量及比率。

中心,出现了中农、富农增加的趋势。1950年后10年间农民阶级分化的变化情形见98表。中农和富农阶级趋于扩大,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得自农产品的收入增加,使他们扩充耕地的原故,这显示战后农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与这同时,由原来的自耕兼佃耕农和佃农出身的力图向上爬的富农代替了以过去的积累为基础、于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經營农耕的地主,而居于优势地位。旧地主为了对付这种新的情势,也实行要求加付收买土地价格和收回佃耕地,乃至联合几个村、郡或县的地主搞收回佃耕地和要求补贴收买价格等运动。可是他们想要挽回土地改革导致的后果是已经不成了。政府于1952年制定土地法,以图在和约生效后维持土地改革的成果。

中农、富农以1至2町步的规模为中心而扩充耕地的动态是与战前出现的自耕兼佃耕农逐渐成为标准中农的情况不同的。如据梶田胜所编制的1951年到1958年之间按耕作规模区分的每年土地买卖和收回佃耕地比重分析表所示(梶田胜:《农民阶级分化与土地政策》,载《土地制度史学》,第8号,1960年7月,8页),购买土地的阶层从1952年起逐年移向上层,即能说明这点。经由土地改革,农民以中农为分歧点,开始向上层和下层进行分化,呈现正常的分化状态,下层农民则如第98表的不满3反和不满5反栏中所示,大量减少,并走上脱离农业和无产阶级化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1950年后的农业是开始朝着同战前不同的方向前进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中农以上的农民的话,从事农业已经不够本了。因此中农以下的农民开始积极脱离农业,并使中农在此后的农业动向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山田盛太郎从持有土地的规模出发,规定中农为1.25到2.75町步的阶层(山田:《日本农业生产力的结构》,119页),但又如山田所指出,重要的是不能依据

持有土地的規模而將中農固定下來，還要考慮農業收入和農家生活費，並因農家經濟的維持益趨困難，分化的分歧點也逐漸提高。這意味着劃分農民的階層，不僅要根據持有的土地，還須與商品經濟相結合，根據收入與支出的盈虧關係來確定，並顯示階級分化還適應商品生產的程度而進行。

農戶數從1950年後開始減少，從1950年到1955年為止，減少了13萬戶，即由617萬戶減至604萬戶。從人口上來看，同期間減少了130萬人，或3%，特別是15歲到19歲的青年減少68萬人，或16%。同時兼業農家開始急劇增大，專業同兼業農戶的比率，1947年為55.4比44.6，而1950年為50比50，1953年為40.9比59.1，並且以農業為副、他業為主的第二種兼業農戶的比重顯著增加。這些情況顯示如果不是一定規模以上的農家，就放棄了農業，又顯示從事農業的目的已經開始迅速從自給糧食改成牟利經營。這種傾向在關西地區特別顯著，那裡的蔬菜、果木、乳製品等經濟作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這種情勢下，下層農民迅速分化，特別是家庭中的次子、三子那些青、少年和新制學校的初中、高中畢業生中脫離農業、走向城市的人數增加；他們即使留在農村裡，而擺脫了家庭的束縛，上班拿薪資的也趨於增加，結果據說在多數地區，一個農村家庭成員的收入，如果不是經營1町或1町5反田地以上的階層，就還不如經營不滿3反田地的階層好些（并木正吉：《農村在變》，1960年版，28頁）。第98表所示1町以下的農戶的迅速減少即能說明這種情形。

但是這些脫離農業的人，並沒有因為脫離農業而提高生活，却同城市的貧民階層和工人子弟一起成為勞動力的主要源泉，與強制訂定的低米價共同構成日本低工資的主要基礎。特別是由於這

些劳动力的绝大部分不是流入大工厂，而是流入中小企业，就更增强了这种关系，而成为垄断资本经由把中小企业编入分包系统而获取超额利润的基础。决定低工资的产业预备军的数目包括完全失业者100万、农村过剩人员160万、要求就业的新制初中、高中毕业生80万和离乡找零活干的200万等，足以表明农村在土地改革后依然是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这是土地改革和小规模农耕的矛盾的发展，又显示战后农业进展的限度。

而工农联盟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其现实意义。

后 序

(和約生效^①后日本壟斷資本主义发展的素描)

日本的工矿业生产于 1951 年突破战前 1934 年至 1936 年的平均水平，經濟規模于 1956 年超过战前的两倍，1960 年扩展到战前規模的四、五倍。在 1953 年到 1954 年之間一度发生經濟危机以后，迎着世界經濟好轉的浪头，日本产业的增长率在 1954 到 1957 年間，至少有 20%，多的达到 60%，这显示日本經濟以惊人的速度进展，壟斷資本体系就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而正式建立。1957 年到 1958 年的危机虽使这个发展一时頓挫，但自 1958 年秋以后重行上升，这表现在繼續大力进行設備投資，同时产业增长率亦未見衰退，終于使日本經濟拥有超过法国的生产規模，发展为巨大的壟斷資本主义。

这一发展是依靠国家壟斷資本主义的加强，把全国的力量都用来养肥壟斷資本而实现的。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充重工业与化学工业所需大量資金，系由日本銀行和国家銀行支持的金融机关所供应，壟斷企业的龐大超額利潤，則系經由与政府的行政机能相勾結的卡特尔活动而获得的，并得到国有铁道和“电报电话公社”等国营企业的低价政策的保证。这种迅速的发展使人們感到眩惑，

^① 指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沒有中苏等国参加討論和簽訂的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約”，这个“和約”从 1952 年 4 月 28 日起“生效”。——譯者

发生“神武景气”、“岩户景气”^①这些说法，产生过股票涨价高潮，又使政府唱起国民收入将增加一倍的高调，甚至于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影响，产生强烈的修正主义思潮。有些人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结构改革结合起来，说资本主义可以经由绝对和平的途径长入社会主义；有的人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已经摆脱美帝国主义而完全独立，并认为垄断资本同美国的对立斗争一定会使它转向和平阵营。

但是这种迅速的发展并不是日本垄断资本专凭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它的弱点至今还是存在。日本经济的扩大是在世界规模的、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和军需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实现的。这不仅在1951年朝鲜战争时为然，1953年到1954年的过程和摆脱1957年到1958年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也能显示：在克服危机、导致扩大再生产上，来自美国的特需和借款以及对美国及其势力范围的输出之增进实在起了决定性的重大作用，这种情况甚至规定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结构。而且生产扩大引起市场，特别是输出市场的狭隘，以致发生经济危机时，经常是先发生美元不足的危机，不得不采用通货紧缩政策，只靠向美国恳求援助来摆脱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成为确定的，只好依凭严格的外汇管理和国家的援助，强使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首的产业窜进国际市场，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中赶上国际生产力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于1954年和美国缔结共同安全条约，1956年后得自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和世界银行等的借款年达好几亿美元之巨。

① 据传说神武是第一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后裔，岩户是天照大神隐居过的地方，在日本垄断资本家的吹嘘下，人们称1955年后发生的两次经济繁荣为“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是说有“神助”的意思。——译者

誠然，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能使日本资本主义“改善体质”，使社会分工深入，并扩大了市场。但是这一“改善体质”是在低工资结构的改组或再现的底子上进行的，而这个结构又是以土地改革与零星规模农耕制的矛盾为基础的。这正是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的本质所在，也就是在国内市场的消费基础依然狭隘的情况下扩大生产。这个矛盾就使以夺取稳定的世界市场为目的的帝国主义复活成为必然的方向。而且这一复活不是在同美国对立的基础上进行的，恰恰相反，是同美国垄断资本密切勾结，即使牺牲本国的主权，也企图依凭美国援助来进行对外扩张。在1957年到1958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战犯岸信介组织的内阁不惜断绝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来恳求美国增加援助，又用赔偿形式向东南亚各国扩大资本输出，这正好证实了上述企图。

有些人把日本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的名次作为标志，认为日本资本主义是加强了，我们在承认这方面的名次提高的同时，却不能不从现在对帝国主义体系日益处于优势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比重增大这点来进行评价。就拿资本主义内部关系来说，日本作为一个生产力的单位，比起欧洲共同市场、英联邦和美国来还是处于显著劣势；又就地理条件来说，日本在远东的政治、经济上都是很孤立的。这种情况使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更不稳定，并使日本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弱的一环。为了弥补它的弱点，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决定蹂躏人民的意志，增强同美国的军事上的勾结，1960年修改安全条约就是这种打算的表现。

但是美国的援助是以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为中心进行的，这里还有日美垄断资本集团互相竞争的一面。过去美国为了完成战后的美国世界体系，曾在日本强力推行道奇路线；现在美国因其世界地位和美元的力量降低，又强迫日本实行汇兑自由化。

这是以世界最高生产力自夸的美国由于扩充军事力量而提高了生产能力，从而企图扩大输出市场而大规模地采用的政策。这种措施对于依靠提高生产性能和低廉工资而达到在世界上进行竞争的水平的一部分垄断资本固然是有利的，但总的来说，对于还没有克服生产落后情况的日本，却会使它在国际市场处于更加困难的地位，并在国内加剧垄断与非垄断企业之间以及垄断资本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我們可以在这里预测日本在60年代世界史上的前途。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经由反对安全条约和三池煤矿罢工等斗争，觉悟开始迅速提高。现在正以巨大的步伐，在实践生活中走上符合世界发展规律的道路，这是日本人民的雄姿。

参 考 文 献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列举了具有基本意义的昭和年代以后的主要讲座之类的书。引用的文献还在正文中随时注明。

讲 座 类

改造社：经济学全集 1927 年
 上野书店：马克思主义讲座 1927 年
 岩波书店：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 1932 年
 东洋经济新报社：现代日本文明史 1941 年
 日本评论社：社会构成史大系 1949 年
 潮流社：经济学全集讲座 1949 年
 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 1950 年
 土地改革记录委员会：土地改革颠末概要 1951 年
 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日本财阀及其解体 1951 年
 岩波书店：日本资本主义讲座 1953 年
 东洋经济新报社：太平洋战争史 1953 年
 农业发展史调查会：日本农业发展史 1953 年
 大藏省昭和财政史编纂室：昭和财政史 1954 年
 弘文堂：现代日本资本主义大系 1956 年
 日本评论新社：社会科学双书(产业) 1956 年
 御茶水书房：明治史研究丛书 1957 年

大月书店：现代日本的经济和政治讲座 1958 年
 东洋经济新报社：产业丛书 1958 年
 平凡社：明治维新研究史讲座 1958 年
 农业发展史调查会：主要地带农业生产力的形成史 1958 年
 劲草书房：日本近代法发展史讲座 1958 年
 东洋经济新报社：危机论讲座 1958 年
 东洋经济新报社：现代资本主义讲座 1958 年
 岩波书店：现代日本产业讲座 1959 年
 有斐阁：自由民权期的研究 1959 年
 大月书店：日本经济分析季刊 1959 年
 有斐阁：中小企业讲座 1960 年
 合同出版社：现代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双书 1960 年
 青木书店：战后资本主义分析丛书 1960 年
 东洋经济新报社：日本现代史大系 1960 年

 著 作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 1930 年

- 野村順之助(市川正一): 日本金融資本
发展史 1931年
- 美濃部亮吉: 卡特尔、托辣斯、康采恩
1932年
- 大内兵卫: 日本財政論—公債篇 1932年
- 山田盛太郎: 日本資本主义的分析 1934
年
- 平野义太郎: 日本資本主义社会的机构
1934年
- 小林良正: 日本产业的結構 1934年
- 風早八十二: 日本社会政策史 1937年
- 名和統一: 日本棉紡业和原棉問題的研
究 1937年
- 丰崎稔: 日本机械工业的基本构造 1941
年
- 細川嘉六: 殖民史 1941年
- 山田胜次郎: 米和茧的經濟构造 1942年
- 信夫清三郎: 近代日本产业史序說 1942
年
- 梁原百寿: 日本农业的基本构造 1943年
- 飯淵敏太郎: 日本信用体系前史 1948年
- 守屋典郎: 棉紡生产成本分析 1953年
- 平野义太郎: 平野义太郎論文集 1948年
- 柯亨(美): 战时战后的日本經濟 1950年
- 島恭彦: 日本資本主义和国有铁道 1950
年
- 別烏茲勒尔(苏): 日本的財閥 1951年
- 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 危机中日本
資本主义的結構 1951年
- 鈴木武雄: 現代日本財政史 1952年
- 大島清: 日本危机史論 1952年
- 丰田四郎: 日本軍国主义的复活 1954年
- 庄司吉之助: 明治維新的經濟构造 1954
年
- 服部之总: 服部之总著作集 1955年
- 大河内一郎、隅谷三喜男: 日本的工人
階級 1955年
- 政治經濟研究所: 在日本的外国資本
1955年
- 高桥龟吉: 明治大正財界变动史 1955年
- 卢基揚諾娃(苏): 日本的壟断資本 1955
年
- 历史学研究会編: 明治維新和地主制
1956年
- 吉村正晴: 日本貿易政策 1956年
- 山口和雄: 明治前期經濟的分析 1956年
- 楳西、加藤、大島、大内: 日本資本主义的
成立、发展、崩潰 1957年
- 伊东岱吉編: 战后日本的工业政策 1957
年
- 加藤俊彦: 我國銀行史論 1957年
- 盐澤君夫、川浦康次: 寄生地主制論
1957年
- 小林义雄編: 企业系列的实态 1958年
- 小山弘健、淺田光輝: 日本帝国主义史
1958年
- 古島敏雄編: 日本地主制史研究 1958年
- 松井清編: 近代日本貿易史 1959年
- 相原茂編: 日本的壟断資本 1959年
- 山田盛太郎: 日本农业生产力的結構
1960年
- 矢木明夫: 日本近代制絲业的成立 1960
年
- 大石嘉一郎: 日本地方財行政史序說
1961年

索 引

一 画

- 一县一行主义……………(369)
一九三二年共产国际提綱……………(245)

二 画

- 二一罢工……………(384, 388)
二二六事件……………(327, 330)
二十一条要求……………(192)
八幡制铁所……(124, 137, 172, 206、
264, 304)
人民民主……………(374, 378)
“人情关系管理”方法……………(424)
九州北部重工业、化学工业
地区……………(304)
九一八事变……………(286, 291)

三 画

- 三井銀行…(56, 72, 99, 116, 130, 132、
162, 199, 215, 280, 419)
三井合名公司……………(181, 215, 341)
三井物产公司…(22, 109, 141, 146、
162, 169, 182, 214, 225, 281, 341, 386)
三池煤矿…(80, 86, 110, 139, 175, 211)
三菱重工业公司…(309, 327, 348, 369)
三菱合資公司……………(99, 181, 215)

- 三菱輪船公司……………(64)
三菱商事公司……………(215, 386)
大正政变……………(192)
大久保利通……………(63)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356)
大阪棉紡公司……………(104, 113, 169)
大藏省存款部……………(130, 236, 419)
土地法……………(444)
土地委員……………(403)
土地改革……………(380, 406, 439)
土地調整法……………(357)
土地調查令……………(216)
土紡机制紗……………(69, 104)
工資統制令……………(355)
工資的双重結構……………(424)
工厂发卖概則……………(79)
工业組合法……………(288, 338)
工业原料依賴美国……………(392)
工作母机事业法……………(349)
工会总同盟……………(228)
广畑工业地区……………(304)
川崎造船所……………(108, 173, 270)
义和团事件……………(144, 158)
万岁起义……………(228, 241)
土族授产……………(46)
小型拖拉机……………(321)

四 画

- 丰田佐吉·····(134、174、272)
 币制統一·····(52)
 巴丹織机·····(70)
 反对破坏防止法罢工·····(426)
 反对征米和征税的斗争·····(406)
 天保改革·····(20)
 开放国禁·····(23)
 天皇制法西斯·····(291、330、341、359)
 日立制作所·····(175、205、271、328、
 369、435)
 日本制铁托辣斯·····(302)
 日本开发銀行·····(419)
 日本共产党·····(228、244、253、282、
 291、329、382)
 日本銀行·····(80、99、117、198、235、
 278、293、337、360、409、411、417)
 日本輕金屬公司·····(420)
 日本鋼管公司·····(172、303、430)
 日本兴业銀行·····(130、166、287、293、
 296、337、338、369、418)
 日本氮气公司·····(176、273、312、343)
 日本农民組合·····(240、382)
 日本发送电公司·····(347、431)
 日本輸出入銀行·····(419)
 日本邮船公司·····(103、113、125、128)
 日本制鋼·····(202)
 日英同盟·····(158)
 日俄战争·····(159、161)
 日德意三国同盟·····(336、352)
 日美安全保障条約·····(421)
 日美通商航海条約·····(334、350、420)
 日美經濟合作計劃·····(420)
 日美壟断集团的竞争·····(449)
 无产阶级·····(156、189、274)
 无条件投降·····(377)
 井上准之助·····(231、233、283)
 不平等条約·····(58、59)
 毛澤东·····(335)
 六三罢工·····(426、432)
 太平洋战争·····(359)
 飞机制造事业法·····(347)
 公安条例·····(385)
 公定米价·····(439、441)
 公团·····(389)
 公定价格·····(339、354)
 公債政策(原始积累过程中的)·····(45)
 中小企业·····(290、355、422)
 中上川彦次郎·····(107、116)
 中島飞机公司·····(365、376)
 中农的意义·····(444)
 中农富农增加的趋势·····(442)
 中国共产党·····(330、335、359、374)
 中国再分割·····(161)
 中国市場·····(114、123、132、143、144、
 169、176、184、217、252)
 中国革命·····(392、407)
 中日战争·····(392)
 中日甲午战争·····(118)
 分包工厂·····(299、308、310、365、366)

五 画

- 长崎造船所·····(108、117、138、173、203、
 236)
 长州藩·····(39)
 饥饿輸出·····(178、411、429)
 尼龙·····(401、437)

- 失业者·····(253、290、381、446)
 汇兑危机·····(429、448)
 汇兑自由化·····(449)
 汇兑跌落·····(294)
 汇兑管理·····(295、410、429)
 东京电灯公司·····(175、181、213、269)
 东海道线·····(102)
 东山养蚕地区·····(8、27、65、67、218)
 东京芝浦制作所(东芝)·····(349、369、435)
 东亚共荣圈·····(336、360)
 东洋人造丝公司·····(272、437)
 东洋拓殖公司·····(163、217、325)
 东南亚活动·····(420、449)
 石油业法·····(307)
 石油化学工业·····(437)
 生产管理斗争·····(382、397)
 生产怠工·····(381)
 扩大生产·····(337、346)
 外资法·····(412)
 外资输入·····(389、412)
 外资金库法·····(376)
 世界民主力量·····(382、403)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407)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美国为首的)·····(407)
 对日妥协政策·····(336)
 对日借款·····(392)
 对日援助对等基金特别会计·····(409)
 对等基金·····(408)
 对日资产冻结·····(352)
 民法·····(148、154)
 北陆地区缫业·····(96、136、169、210、261、319)
 加工贸易方式·····(389)
 加藤高明·····(166、192)
 电气产业工会·····(396、426)
 电源开发促进法·····(431)
 电力联盟·····(306)
 专制主义·····(40、41、52、98、115、117、122、123、155、166、192、228、246)
 田沼时代·····(19)
 旧金山和约·····(421、426)
 卡特尔·····(181、281、238、416、427)
 占领军经费·····(390)
 出兵西伯利亚·····(217)
 台湾银行·····(167、236、242、273)
- 六 画
- 西南战争·····(44)
 再禁黄金出口·····(286、291、294、311)
 关东大地震·····(236)
 关税定率法·····(142、176、246)
 关于“民主化”的命令·····(380)
 有机合成化学工业·····(436)
 列宁·····(161、192、217、227、229)
 池田成彬·····(287、327)
 价格补助费·····(388、390、409)
 米谷法·····(238)
 米谷统制法·····(323)
 米谷配给统制法·····(357)
 米的商品化·····(71)
 米的双重价格·····(361)
 产业组合运动·····(323)
 产业资本的确立·····(126、140)
 产业合理化·····(255、288、300、318、411、422)
 产业复兴公团·····(384)

- 产业保卫斗争……………(413)
- 产业构造的高度化……………(299,341,429)
- 产业资本对商业资本占优势……………(253)
- 产业别工会会议(产别会談)…(382、414、421)
- 企业整顿令……………(360)
- 企业合理化促进法……………(423)
- 行政紧缩……………(413)
- 农林中央金库……………(361)
- 农民依靠农业以外的收入……………(220、357、445)
- 农村市场的扩大……………(440)
- 农业危机……………(237,290,320)
- 农业阶梯……………(91,136,171)
- 农业会……………(361)
- 危机(1890年)……………(111)
- 危机(1897—1898年)……………(144)
- 危机(1900年)……………(144)
- 危机(1907年)……………(179)
- 危机(1920年)……………(233)
- 危机(1929—1932年)……………(284)
- 危机(1948—1949年,美国的)…(407)
- 危机(1957—1958年)……………(448,449)
- 先期付款……………(370)
- 自由民权运动……………(84,94)
- 自耕兼佃耕农的中农化……………(186,220、239,321,444)
- 合成硫酸……………(272)
- 夺米风潮(“米騒动”)……………(225,228)
- 在中国的棉纱厂……………(257,317)
- 低工资……………(133,154,291,313,389、424,442)
- 交易管困……………(367)
- 动力电气化……………(175,213,269)
- 兴办企业热……………(93,125,164,232)
- 团体等规制令……………(413)
- 七 画
- 村社……………(3,16,51,84,171)
- 运输力的破坏……………(375)
- 远东委员会……………(382)
- 远洋航路补助法……………(173)
- 技术输入……………(420,423)
- 劳务调整令……………(357)
- 劳动市场的形成……………(152)
- 劳动节……………(235,384,426)
- 改革地税……………(48)
- “改善体质”(日本资本主义)(427,448)
- 改良坐禅制絲……………(67)
- 近代化投资……………(421)
- 近代化信用制度……………(80)
- 麦克阿瑟……………(383,420)
- 尾西織业地区…(15,30,97,170,211)
- 投原子弹……………(379)
- 芝浦制作所…(108,174,205,271,273、327)
- 护宪三派内閣……………(246)
- 佃租统制令……………(358)
- 佐久間水閘……………(431)
- 把中小企业编入分包系统……………(446)
- 把中小企业编入財閥系统……………(422)
- 抑制通货膨胀政策……………(412)
- 八 画
- 社会党……………(422)
- 社会倾销……………(328)
- 社会主义体系的优势……………(378,449)
- 补助费……………(98,148,376)

京仁铁道修筑权……………(157)
 岩崎弥太郎……………(64)
 肥料配给公团……………(436)
 和平四原则……………(426)
 抵制日货……………(295)
 征用令……………(361)
 征粮制度……………(358、371)
 国内市场……………(75)
 国内劝业博览会……………(64)
 国立银行条例……………(55)
 国有棉制度……………(402)
 国有铁道工会……………(339、414、426)
 国家公务员法……………(385)
 国家总动员法……………(337)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02、263、291、
 296、301、341、360、388、417、447)
 国家债务的偿还……………(409)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414)
 松川事件……………(413)
 松方正义……………(80)
 松下电气公司……………(272、435)
 矿山须知书……………(63)
 金禄公债……………(44)
 金本位制的采用……………(142)
 金融机关再建整飭令……………(387)
 明治专制宪法……………(115)
 享保改革……………(19)
 官办棉纺厂……………(69)
 知多……………(134、208、261)
 股份公司制度……………(58)
 武藤山治……………(107、133)
 罗根建议……………(408、410)
 物价厅……………(383)
 物资动员计划……………(347)

“奉还大政”……………(40)
 拼凑经济集团……………(295、332)
 放棄耕作……………(406、439)
 凭票配给制……………(338)
 汽车制造事业法……………(308、347)

九 画

保持国体(天皇制)……………(377、380)
 美国占领政策……………(317、384)
 美国的援助……………(392、409、449)
 美国借款……………(429)
 美国禁运废铁……………(336、345)
 美国资本的侵入……………(412、420)
 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392、394)
 军需金融……………(338)
 军需省……………(365)
 军需公司法……………(363、369)
 军需工业动员法……………(203)
 军事财政政策……………(229、293)
 军事监狱劳动……………(358、371)
 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122、160)
 复兴金融金库……………(389、391)
 相对的稳定期……………(244)
 战时利得税……………(380)
 战时利润……………(370)
 战时经济……………(334、350)
 战时补偿的冻结……………(380)
 战时经济变为平时经济……………(386)
 战后日本垄断体系的确立……………(407)
 总评……………(414、422、426)
 总动员法……………(334)
 南方开发金库……………(360)
 南满铁道公司…(163、183、217、297、
 328)

封閉机关管理委員会……………(384)
 帝国主义的复活……………(429、449)
 修改条約……………(117、142)
 修改安全保障条約……………(449)
 神武景气……………(447)
 信用危机……………(242、277)
 计划造船……………(433)
 重要产业統制法……………(288)
 重要事业場所劳务管理令……………(361)
 指定提供賠償……………(394)
 持股整理委員会……………(368)
 泉州… (65、70、96、134、170、208、262)
 临时工……………(328、422)
 临时軍事費……………(202、336、362、381)

十 画

連鎖制……………(338、353、429、434)
 馬克思……………(23)
 罢工……………(156、189、225、230、236)
 原始积累……………(81)
 通商司……………(54)
 通商条約……………(24)
 通貨膨脹(77、198、235、293、337、363、
 373、381、386)
 收縮通貨膨脹……………(393、409)
 通貨管理制……………(295、301)
 通貨緊縮危机……………(411)
 財閥… (57、79、116、162、214、327、
 341、368、385、386)
 财产稅……………(380、440)
 財政投資……………(417)
 財政寡头制……………(287)
 財政通貨膨脹……………(293、337、391)
 財閥系統銀行称覇……………(230、419)

特需……………(415)
 特約組合……………(259、317)
 特权商人行会……………(10)
 高桥是清……………(291)
 海外定期航綫的恢复……………(433)
 炮轰下关……………(25)
 造船輸出……………(434)
 桐生絲織业……………(18、71、95、136)
 納屋制度……………(139)
 納粹的办法……………(360)
 兼背織布… (134、168、208、257、261、
 318)
 兼充职工的农家……………(357、365)

十一 画

救世起义……………(36)
 救济援助資金……………(392、416)
 商法的制定……………(98)
 商品別复数匯兌率……………(389)
 基础工业大体确立……………(263)
 野口遼……………(176、313)
 深夜操作……………(133、154)
 深夜操作的禁止……………(257)
 貿易庁……………(383)
 貿易管理……………(384、402)
 貿易統制令……………(352)
 貿易在再生产构造中的媒介
 作用……………(252)
 第十五国立銀行……………(57)
 第201号政令……………(393)
 职业介紹所……………(355)
 寄生地主制……………(7、148、403)
 設備近代化……………(422、423)
 掠夺占領地人民……………(373、376)

康采恩……………(181,281,327)
 停战处理费……………(387)
 “清除赤色分子”……………(421)

十二画

殖民地丧失……………(386)
 殖民地米移入日本……………(326)
 单一汇兑率……………(408,410)
 超额放款……………(418)
 黑市价格……………(339,355,401,437)
 黑市利润……………(394)
 棉纺业联合会…(107,113,146,154,
 257,319)
 棉纺业侵入中国……………(258)
 棉織工場手工业……………(15)
 朝鲜战争……………(415)
 朝鲜市场…(119,132,157,169,176,
 216)
 朝鲜銀行……………(167,242)
 朝鲜氮气公司……………(312)
 朝鲜的并吞……………(183)
 朝鲜、台湾米塔产计划……………(242)
 准战时体制……………(330)
 集成館……………(32)
 雇佣劳动……………(84,152,188,222)
 統制会……………(343,360)
 最高度自动化装置……………(435)
 道奇路線……………(408,422,434)
 筑丰……………(110,139,211,291)
 硫酸工业轉向煤气生产……………(436)
 联合企业……………(304,312)

十三画

新日元……………(387)

新宪法……………(382)
 新物价体系……………(388,396)
 新通貨条例……………(53)
 新兴康采恩……………(312,313,326)
 資金运用部……………(419)
 資本的集中……………(181,288)
 资本主义工业化……………(131)
 资本主义总危机……(226,227,276,
 282,378)
 經濟安定本部……………(383,383)
 經濟安定九原則……………(393,407)
 經濟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385,
 392,430)
 經濟复兴援助資金……………(392,416)
 铁道国有……………(163,166,274)
 鈴木商店……………(194,225,236,278)
 “傾斜生产”(重点生产)(388,394,396)
 煤矿国营……………(389,397)
 煤矿工会……………(397,426)
 粮食管理……………(361,372,383,404)
 粮食劳动节……………(354)
 禁止中国貿易……………(411)
 禁止黄金出口……………(197,247)
 傾銷……………(295,312,317,434)
 解散財閥……………(380,385)
 解除黄金出口禁令……(247,277,283)
 索甫税制……………(408,411,439)

十四画

銀行法……………(280)
 銀行条例……………(99)
 銀行的集中(合并)(129,280,297,369)
 輕金屬制造事业法……………(346)
 “滿洲国”……………(316)

滿洲重工業……………(297,328,343)
 綜合平衡預算……………(408)
 增产興業(明治政府)……………(61)
 蒸汽力改為電力……………(212)

十五画

積濟正金銀行……………(56,187)
 榎須賀海軍工廠……………(62,108,173)
 蔣介石……………(335,379,407)
 廢藩置縣……………(44)
 諏訪制絲業……………(31,65,68,93)
 澁澤榮一……………(103,104,116,158)
 寬政改革……………(20)

十六画

輸出入交易法……………(416)
 輸出入連鎖制……………(353)
 鮎川又介……………(297,327)
 鋼鐵联合作業……………(137,265,303,430)
 器械制絲……………(67,68,93,135,169,209、

259)

十七画

濱口雄幸……………(247,286)
 薪資生活者……………(222)

十八画

織機电气化……………(208)
 織物業的織機動力化……………(170)
 薩長盟約……………(37)

十九画

壟斷形态(早期)……………(116)
 釀新禁止法……………(385,427)
 藩營工廠……………(33)
 藩政改革……………(22)

二十一画

鶴見、川崎工業地区……………(273,304)